

将军县的初心故事

中共金寨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金寨县档案馆 编著

国家行政管理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将军县的初心故事/中共金寨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金寨县档案馆编著.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20.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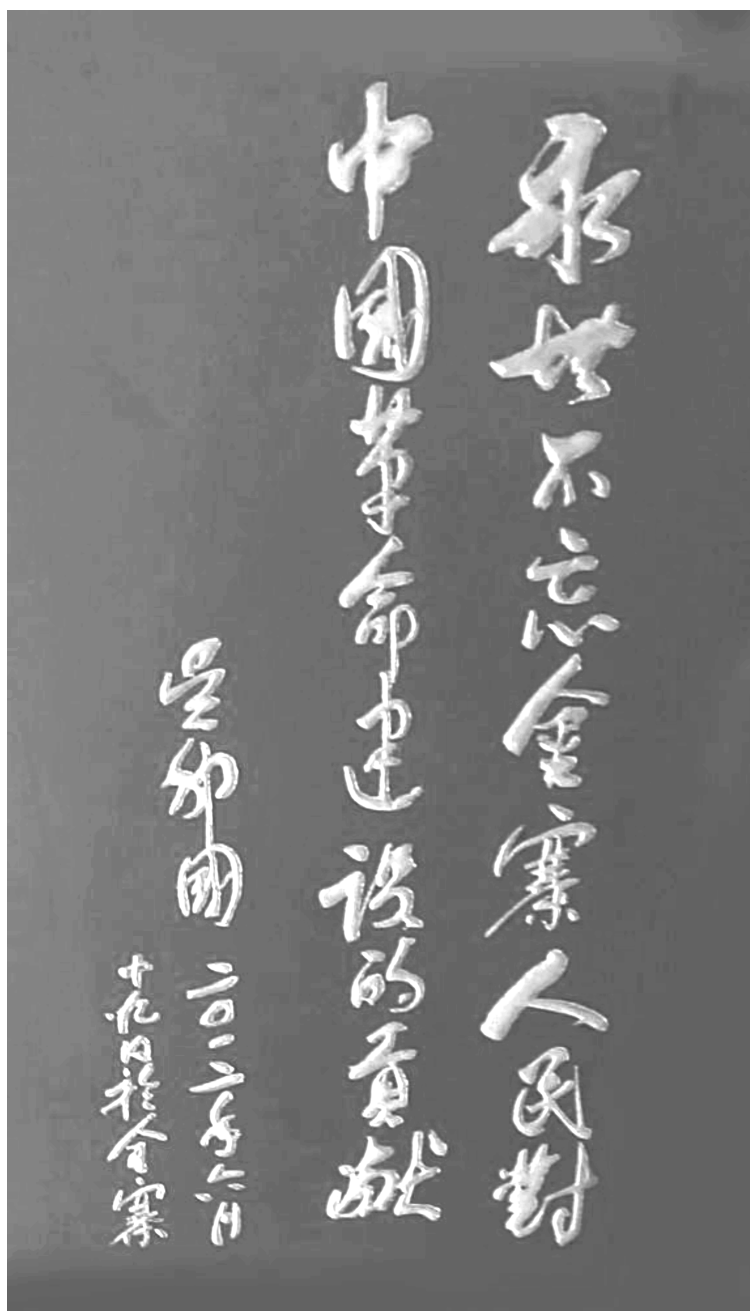
ISBN 978-7-5150-2476-9

I. ①将… II. ①中… ②金…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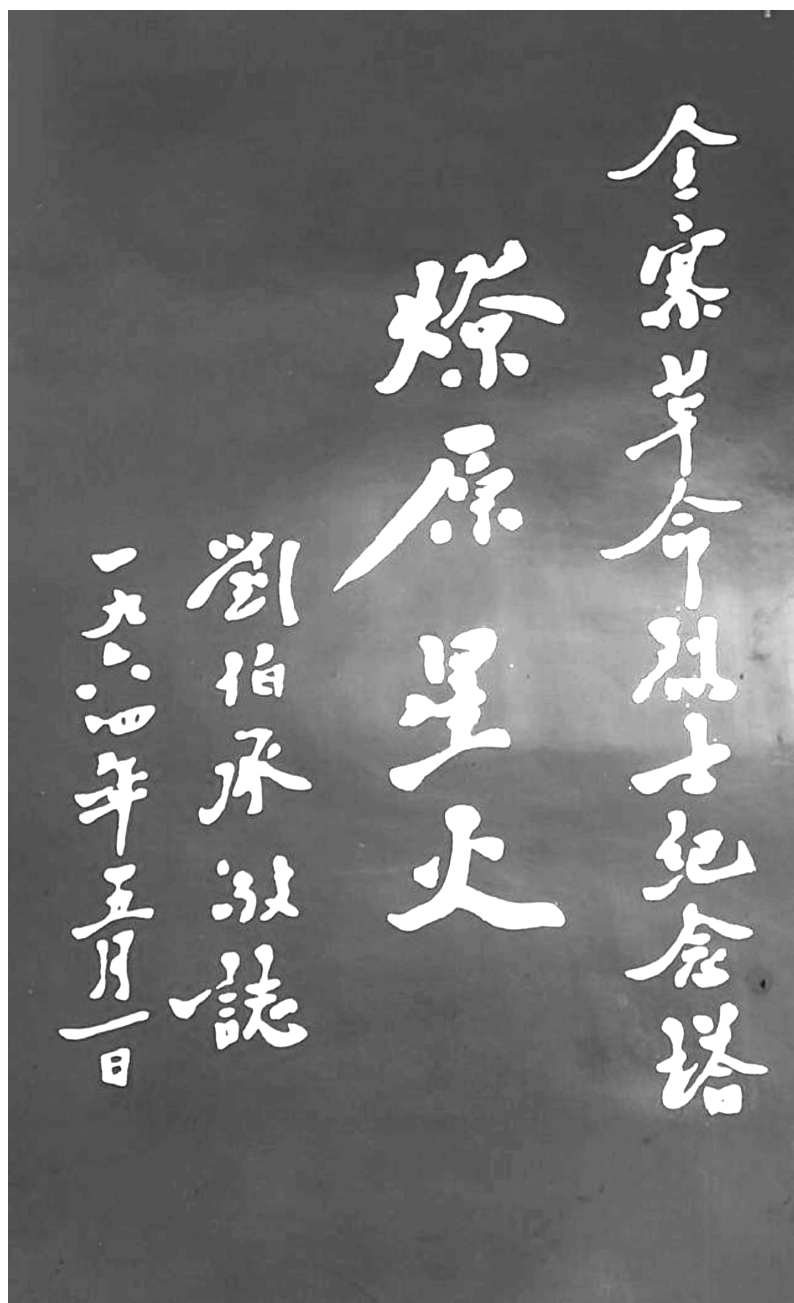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158981 号

书 名 将军县的初心故事
JIANGJUNXIAN DE CHUXIN GUSHI
作 者 中共金寨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金寨县档案馆 编著
责任编辑 陆夏
出版发行 国家行政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6 号, 100089)
综 合 办 (010)68928903
发 行 部 (010)68928738 6892887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2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70 毫米×240 毫米 1/16
印 张 14. 5
字 数 270 千字
定 价 45. 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可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8929022



2012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在金寨考察指导工作时，为老区题词



1964年，刘伯承元帅为新建的“金寨革命烈士纪念塔”题词

本书编写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主 编 胡 遵 远

副主编 马 贤 军 乐 登 高 李 业 坤

胡 本 昌 谢 德 震

成 员 王 亚 丽 任 少 松 江 敏

李 燕 李 雨 迪 李 泽 波

周 杰 姜 茜

前 言

安徽省金寨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县、全国著名的将军县，是红二十五军的初始诞生地、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发源地、红二十八军的二次重建地，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抗日战争时期，金寨是安徽乃至鄂豫皖边区抗日救亡运动的指挥中心。解放战争时期，金寨是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主要目的地和实施战略转移的重要后方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金寨人民为了响应毛泽东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再次奉献出包括县城金家寨在内的3大经济重镇和10万亩良田、14万亩经济林，10万群众在只有很少补偿的情况下，主动告别了世代繁衍的家园、移居深山。改革开放以来，老区人民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号召，坚持做到规范管理、不断完善生态保护工作机制，防治并举、努力提升生态环境和生态质量，坚守底线、着力优化生态空间格局，绿色为先、强力推进生态经济发展和资源节约利用标本兼治，积极改善生态生活环境。为了使祖国的天更蓝、水更清，金寨人民一直在默默地牺牲和奉献着……

2016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金寨视察指导工作时，不仅对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而且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红色基因的传承弘扬作出了重要指示。总书记满怀深情地说：“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回想过去的烽火岁月，金寨人民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我们要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红色江山世代传下去。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既要注重知识灌输，又要加强情感培养，要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要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配合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我们计划编写出版一套“将军县的红色文化系列丛书”，包括《将军县的初心故事》《将军县的军旅故事》《将军县的红色记忆》《将军县的英模风采》《将军县的红色传承》等。这本《将军县的初心故事》收集了近几年我和我的同事们已经公开发表的以金寨为主，覆盖整个大别山区的老红军、老将军的初心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有“壮志未酬身先死”的革命先驱，有“乌蒙磅礴走泥丸”的长征英雄；有矢志不渝的红军战士，有百折不挠的共产党员；有永葆本色的人民公仆，有勤俭一

生的开国将军……他们的故事，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情节曲折、语言生动，不仅鲜为人知，而且充满传奇和神秘色彩，展现给读者的是一幅幅浴血奋战、视死如归的壮烈场景，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凯歌，读起来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本书中，我用“确立初心”“践行初心”“坚守初心”“不忘初心”将文章分为四个部分。

薄薄的一本书，折射出厚厚的一段历史。可以这么说，金寨的革命史、发展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兴党、强党成长史、奋斗史的高度浓缩，也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复兴史的集中体现。金寨的革命史、斗争史进一步证明和印证了只有确立党的初心、践行党的初心、坚守党的初心、不忘党的初心，才使中国实现了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才使中华民族实现了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才使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第70个年头。我们正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越是此时，越要保持清醒、保持定力，越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砥砺前行，“始终不忘初心，永远牢记使命”。期盼本书能够为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提供有益的帮助，也期盼大家能够喜欢这本《将军县的初心故事》。

受时间和资料限制，还有很多金寨籍老红军、老将军的事迹未能收入本书。欢迎大家积极提供相关资料材料，我们将努力通过其他途径进行广泛宣传。

由于水平有限，在编写过程中，难免还有疏漏不妥之处，恳请各位读者见谅指正。

主编 胡遵远

2019年12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确立初心

第一篇	红军虎将旷继勋	3
第二篇	吴焕先：牺牲于长征胜利前的红二十五军军魂	7
第三篇	年轻军事家蔡申熙	13
第四篇	詹谷堂：宁死不屈的共产党人	20
第五篇	周维炯：不该早陨的将星	24
第六篇	肖方：鄂豫皖苏区的猛虎	31
第七篇	大别山永恒的桂花——记安徽省金寨县袁大桂烈士	36
第八篇	余品英：坚贞不屈的女英雄	39
第九篇	革命展旗人 视死忽如归 ——大别山区革命烈士毛绍成的故事	42
第十篇	“红小鬼”敌营虎穴传情报	46
第十一篇	女英烈头断血流志不移	53
第十二篇	好少年献身革命最风流	57
第十三篇	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县首任县长白涛	60

第二部分 践行初心

第十四篇	徐向前鲜花岭上出奇兵	71
第十五篇	徐海东：“我是青山军事大学毕业的”	73
第十六篇	红土地上走出的将军——李耀的长征故事	75
第十七篇	“决死队长”曾绍山突围搬兵	79
第十八篇	方子翼四过雪山草地	84
第十九篇	开国将军方升普	88
第二十篇	但远嵩：九死一生的长征路	92
第二十一篇	林月琴：军中第一女大校	96

第二十二篇	红军老战士郝毅的长征故事·····	99
第二十三篇	红军老战士朱世卿的烽火岁月·····	103
第二十四篇	特灶班长李开文的感人故事·····	107
第二十五篇	一位西路军战士的“流浪”生涯·····	117

第三部分 坚守初心

第二十六篇	四起三落终不悔 一代风范励后人 ——洪学智的初心与使命·····	125
第二十七篇	从师长降为挑夫再升司令的“游击大师”·····	129
第二十八篇	中原突围中的皮定均·····	134
第二十九篇	江上青在金寨的100个日日夜夜·····	138
第三十篇	金寨籍女红军彭素的长征故事·····	140
第三十一篇	金寨女红军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145
第三十二篇	红色女特工文媛·····	153
第三十三篇	红色特工王文、王凤岐的传奇人生·····	157
第三十四篇	老红军张泰升的战斗人生·····	162
第三十五篇	“将军县”的女红军——“三寸金莲”走完万里长征·····	168

第四部分 不忘初心

第三十六篇	洪学智将军的“八条铁令”·····	181
第三十七篇	三位开国将军的家风故事·····	184
第三十八篇	自设关卡树家风 ——“三让将军”徐立清的家风故事·····	187
第三十九篇	开国少将胡继成与家人的故事·····	191
第四十篇	开国将军言传身教润后人·····	195
第四十一篇	老红军邓六金、陈兰曾为金寨脱贫“鼓与呼”·····	199
第四十二篇	上将夫人、老红军张文的故事·····	202
第四十三篇	金寨籍老红军梅少卿的家风故事·····	207
第四十四篇	金寨籍老红军陈瑞先的家风故事·····	211
第四十五篇	老红军骆斌：言传身教正家风·····	214
代 结 束 语	英雄金寨 多姿多彩——给您说说咱金寨·····	218

第一部分

确立初心

什么是初心？什么是使命？2019年5月31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

2018年3月1日，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千千万万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的光芒。

可以这么说，金寨地区的党组织和广大军民就是总书记所肯定的千千万万个具有坚定信念、执着追求，为了理想而历尽苦难、流血牺牲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典型代表！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他们坚定信仰、确立初心，为了理想不惜流血牺牲。尽管他们也知道，自己追求的目标并不会在自己的手中实现，但是他们坚信，只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持续努力、一代又一代人为之不懈奋斗，美好的愿望和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够实现，正所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在苏区建设和长征途中，金寨地区的党组织和广大军民就是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一次次绝境重生，最后终于取得胜利。

红军虎将旷继勋

旷继勋烈士是红军著名高级将领，曾发动蓬溪起义，建立了四川第一个红色政权，并直接参与和领导了湘鄂西、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对中国革命事业和红军建设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谱写了一曲壮丽的诗篇。

建立四川第一个红色政权

1916年，19岁的旷继勋参军。1922年初，在一次剿匪行动中，他因只身擒杀匪首张申庭而一战成名。此后，作战勇猛、才华卓著的他很快便从一名普通士兵逐级提拔为第七混成旅代理旅长（川军邓锡侯部）。

1923年，为抗击直系军阀吴佩孚侵川，旷继勋率部划归刘伯承指挥。在和刘伯承的接触中，他对马列主义真理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并逐渐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而开启了他追求进步的历程。

不久，他得知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中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后，就主动在部队中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四川分会”，并派营长钟克戎到广州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党组织派出了秦青川等人来到旷继勋的部队开展工作，很快将旷继勋指挥的川军第七混成旅发展成我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1926年，旷继勋经秦青川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及其武装力量进行严酷打压，四川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1929年6月29日，旷继勋在中共四川临时省委的领导下，毅然率川军第七混成旅4000多名官兵发动蓬溪起义，并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全旅改编为3个师，旷继勋任总指挥，罗世文任党代表。

在“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成立大会上，旷继勋对起义将士发表演讲。他讲道，红军是工农的队伍，任务是解放工农，并提出“我们愿意和大家

一起，为工农的利益而革命，为工农解除痛苦而牺牲”。在部署就绪之后，旷继勋率领红军部队乘夜急进，一举攻下了蓬溪县城，并建立了蓬溪县苏维埃政府，这是四川省第一个红色政权。

蓬溪起义是一次震惊全川的武装革命活动，打破了大革命失败后四川白色恐怖的危局，震撼了国民党军阀统治，推动了四川革命形势发展，有力支援和配合了鄂西根据地的开拓。

在湘鄂西，扩红与打仗两不误

1930年春，红六军在湖北监利成立，军长孙德清，政治委员周逸群，孙德清因病去上海治疗后，党中央改派旷继勋为红六军军长。旷继勋上任后，“以迅猛的攻势，横扫了苏区内敌军据点”。1930年2月7日，红六军在江陵县新观镇（现属监利县）誓师出征，攻占了龙湾、老新口、潜江、郝穴等地。由于红六军节节胜利，中共鄂西特委在1930年4月成立了鄂西苏维埃五县联县政府，周逸群任主席。

为贯彻党中央红四军与红六军合编成立红二军团的指示，旷继勋率红六军南下，先后攻下了华容、石首、南县等7座县城，开辟了大片革命根据地。1930年7月，红六军和红四军在湖北公安胜利会师，成立了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政治委员周逸群），下辖红二军（原红四军改编而来）和红六军，红二军军长由贺龙兼任，旷继勋仍任红六军军长。

红二军团成立之后，旷继勋率红六军渡江东进，又攻下了岳口、仙桃、天门等城镇。1930年9月，旷继勋率红六军攻下敌军重兵把守的监利县城。监利城的解放，在红二军团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从此，荆江南北，红旗飞舞。鄂西湘西连成一体，互为犄角，湘鄂西的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旷继勋担任红六军军长7个月的时间里，红六军从最初的5000多人迅速发展到了12000多人。

此后，旷继勋根据中共中央安排，离开红六军，到中央军委工作。刘伯承曾称赞旷继勋说：“他能够急流勇退，在荆州、洪湖做艰苦的士兵工作，并且把队伍交给贺龙同志指挥，一切为党而干，表现了良好的品质和坚强的党性。”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卓越领导者

1930年11月，旷继勋受党中央派遣，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1931年

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旷继勋任军长，余笃山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参谋长，全军12 500余人。

红四军成立后，旷继勋坚持“有阵地的向外发展，有后方的向前进攻，肃清赤区反动武装，打通苏区联系”的作战方针，积极出击、连续拔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内的白军据点。1931年1月26日，旷继勋指挥红四军发动磨角楼战役，一举攻克国民党军第十三师严密防守的坚固据点——磨角楼。1931年2月初，旷继勋召开全军动员大会，提出“打下新集过新年”的口号。新集（即今新县县城）位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间地带，将根据地分割成两个部分。旷继勋指挥红四军浴血奋战，最后运用坑道爆破战术攻克新集，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随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旷继勋开始采取“以飘忽战术趁着敌人不备，突破敌人，使敌人将军事布置处于被动地位，诱敌出阵而消灭之”的战术。1931年3月1日，旷继勋根据地地下党提供的情报，抓住平汉线南段敌人兵力空虚的战机，主动出击，两次重创了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二师。国民党在报告中称：“我袁师因寡不敌众经两次损失，可使用兵力不足一团”。红四军两次出击，引起了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和武汉绥靖公署的惶恐和不安。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和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命令国民党军队分路出击，企图寻找红四军主力进行决战。

旷继勋率领红四军利用国民党军第三十四师轻敌冒进、孤军进入双桥镇的有利战机，发起了双桥镇战役，歼灭敌第三十四师大部，俘虏副师长及以下官兵5 000余人。双桥镇大捷之后，红四军从成立之初的12 500多人发展到15 000多人。

蒋介石得知双桥镇失败后，命令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和武汉绥靖公署限期“剿灭”鄂豫皖红军。旷继勋率领红四军又开始第二次反“围剿”斗争。面对蒋介石13万重兵的围剿，旷继勋继续采用“飘忽”战术，先是避开进攻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敌重兵集团，率红四军主力东进皖西，攻击孤军进犯皖西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1931年4月25日，红四军在独山镇战役中歼敌2 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 800余支。国民党军此时发现红四军主力在皖西，急忙向皖西集结，而旷继勋则率领红四军主力4个团迅速西进杀回鄂豫边革命根据地，5月9日在浒湾击溃了孤军南下的国民党军第五四三师，毙伤俘虏敌人1 400多人，缴获长短枪1 000余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红四方面军再立功勋

1931年，旷继勋被调任红四军第十三师师长。旷继勋以大局为重，在皖西率领红军与反动武装周旋作战，保卫革命根据地，从8月到9月，领导皖西地方武装和红军又消灭敌匪数千。1931年9月，旷继勋奉命在皖西麻埠（今金寨县境内）组建红二十五军。由于他深入基层，积极发动群众，组建工作顺利完成。1931年10月，红二十五军在皖西麻埠成立，旷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1931年11月7日，红二十五军到湖北黄安七里坪与红四军会师，按党中央的指示，在此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旷继勋仍任红二十五军军长。

红四方面军成立之后，旷继勋率领红二十五军参加了商潢战役和苏家埠战役，为粉碎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向川北转移途中，于1932年12月在四川省通江县成立了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旷继勋担任主席。旷继勋在担任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后，立即抽调红四方面军数千名干部在川北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同时筹建了基层党组织与各级苏维埃政权。

1933年5—6月，旷继勋率领红四军第十二师参加了空山坝战役，为粉碎川军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三路围攻”作出了突出贡献。令人痛心的是，6月，旷继勋就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四川省通江县洪口场，年仅36岁。

2009年9月10日，旷继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作者：胡遵远，原载《人民政协报》2019年7月4日。）

吴焕先：牺牲于长征胜利前的 红二十五军军魂

吴焕先，1907年生于湖北省黄安县箭厂河乡（今河南新县箭厂河乡），是鄂豫皖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红二十五军政委。1935年8月21日在甘肃省泾川县牺牲。

组建红二十五军

1924年，吴焕先在麻城蚕业学校读书，放寒假的时候，他带回家一张马克思的画像贴在香案上。父亲很生气，斥责他说：“这是敬祖宗的地方！”吴焕先说：“他是革命导师，照他的办法，就会创造出个新社会来！”父子俩为这事还吵了一架。1926年，吴焕先毕业后，在党的领导下，搞起农民运动。一些被清算的土豪劣绅，对吴焕先恨之入骨。有一天恶霸方晓亭带着地方民团，把他父亲、哥哥、嫂子等在内的六口人杀害了。吴焕先回来，看见母亲和弟弟伏在六位亲人的遗体旁边哭得死去活来，自己也悲痛万分。他擦去了眼泪，对母亲说：“妈妈，你们快走吧，只有打倒军阀、地主阶级，劳苦大众才会有家，才会有活路！”为了避免母亲再遭杀害，吴焕先劝她丢开家业，到外乡投亲靠友。

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吴焕先也深刻认识到：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得有自己的武装。第二天，他就组织农会的骨干分子，在他家门口架起20个铁匠炉，连夜赶制鱼叉、大刀、梭镖。他们奇袭民团、乡公所。农民武装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190人发展到3000多人。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了！为配合北伐战争，他们向封建地主和一切反动势力进行了猛烈冲击。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叛变，陈独秀搞投降路线。但黄麻地区的党组织抓住枪杆子不放手，一支枪也没被缴去。1927年5月间，光山县柴山堡大土豪陈日辉带着1万多人的反动红枪会，向吴焕先领导的农民武装扑来。在木城寨血战了七昼夜，他们打败了反革命武装。同年8月，吴焕先和其他领导同志一

起，又主动配合麻城农民自卫军打败了恶霸头子王芝庭的反动武装，活捉了王芝庭。这一连串的胜利，震撼了鄂东北的封建统治。共产党的威望更加提高，吴焕先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名字在广大人民中间更加响亮地传开了。

1927年11月，爆发了著名的黄（安）麻（城）武装起义，吴焕先同志是领导人之一。此后，革命形势时起时落。到1932年初，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政权和红军大大发展起来了。可惜的是，张国焘极力推行错误路线，先“左”后“右”，于1932年10月惊慌失措地带着红军主力越过平汉铁路向西去了。此后，敌人并没有减轻对根据地的压力，仍然集中15个师的兵力反复清剿鄂豫皖根据地。这时，几乎村村都遭到血洗，房屋在火光中变成废墟，成百上千的老弱妇幼被集体枪杀。几千名青年妇女被装上汽车送往河南、武汉贩卖了。在这严峻的形势下，鄂豫皖地区多么需要统一领导啊！多么需要一支强有力的红军坚持斗争！这时担任鄂东北游击司令的吴焕先同志勇敢地站出来了。他找到省委书记沈泽民、郑位三老同志，建议迅速把分散的红军游击队、伤病员集中起来，重建红二十五军。省委作出了重建红二十五军的决定，任命吴焕先同志为军长，王平章为政委，徐海东为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在很短时间之内，吴焕先同志就把军部、两个师、五个团、两个特务营，全部组建起来了。他亲自到各师团，到各个连队给干部、战士讲话。他讲道，鄂豫皖根据地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能丢，大别山的红旗不能倒！战则存，不战则亡，我们一定坚持到最后胜利！

全军重建不久，吴焕先等同志就指挥部队连续打了三个胜仗：在郭家河子将敌人一〇四旅全部歼灭，俘敌2000余人，缴获长短枪2000多支，我军只伤亡几十人；在潘家河子歼灭敌人一个整团；接着，又在杨泗寨歼敌300多人。三战三胜，军威大振，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全军指战员为部队有这样一位指挥才能出众的军长而无比兴奋。

官兵爱戴的卓越领导者

1933年4月除地方武装外，红二十五军主力发展到13000多人，被敌人摧毁的鄂东北苏区，又逐渐恢复了一大片。但是，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下，省委负责人贸然决定攻打敌人据点七里坪。结果，红二十五军损失过半，敌人也更加疯狂起来。

七里坪战役之后，吴焕先和徐海东各带一支部队，在皖西和鄂东北战斗达半年之久。1934年4月，两支部队在商城县东南豹子岩（今金寨县汤家汇镇豹迹岩村）又会合了。在出生入死的战争年月里战友相逢，分外亲切。这天夜

里，两人整整谈了一宿，谈胜利，也谈失败。谈到七里坪战役中损失那么多同志时，都感到教训太沉痛了。最后吴焕先同志说，要从血的教训里找出新的路子、新的斗争策略来！

不久，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会上确定吴焕先改任政治委员，徐海东同志改任军长。吴焕先和徐海东在会上提出，今后红军和游击队的行动要“灵活、慎重，不要机械”；作战方针要从实际出发，“打不了不打，打不胜不打，要打就打歼灭战！”

蒋介石第五次“同剿”中，又把东北军从华北调到鄂豫皖地区，敌人总兵力共80多个团。吴焕先同志坚信红二十五军是在残酷的战争中锤打出来的，不会被数量占优的敌人打垮，问题是如何以小的代价打败敌军。他亲自找从敌占区来的商贩谈话，亲自审讯俘虏，对东北军作了细致的调查研究：东北军装备强，但他们来鄂豫皖人生地不熟，又不善于山地作战。不少官兵思乡怀土，不愿打内战，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分不满。吴焕先同志给干部们作了报告，要求除军事上坚决打击之外，必须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政治瓦解。他召开瓦解敌军工作会议，制定《哗变士兵优待条例》，组织“哗变士兵招待委员会”，要求部队一定要遵守俘虏政策，彻底纠正张国焘时期虐待俘虏的错误。根据东北军的情况，战场喊什么话、做什么手势，他都作了具体交代。

1934年7月17日，在罗山县长岭岗，东北军一一五师3个团向我进逼。我军已准备转移，但掩护部队一打，敌军就仓皇后退。于是，军领导立即组织部队对敌发起猛攻。战士们边冲锋边高声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的弟兄不要上老蒋的当！”“枪口对外！”在军事压力与政治瓦解之下，敌人纷纷缴械投降。敌师长见势不妙，带一部人逃了命。我军俘虏敌团长以下近3000人，光机枪就缴获60多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长岭岗战斗之后，为扩大我军政治影响并解决部队的物资困难，红二十五军打开了罗田县城，缴获甚丰。但在进攻英山城时，发现敌人增加了兵力，而且碉堡坚固，设防严密，如果冒险硬攻，必然造成重大伤亡。吴焕先同徐海东商量：要接受七里坪战斗的教训，机动灵活，敌变我变。于是果断地决定放弃攻打英山，改为奔袭太湖县城。太湖县城是敌人的后方，防守薄弱，远距奔袭，出其不意，胜利把握大。同时此处距安徽省安庆较近，物资丰富，攻克后，政治影响会更大。为了达到奔袭的目的，除留下一支小部队佯攻英山，主力昼夜兼程，连续行军200多里。战士们不了解情况，有些埋怨情绪，吴焕先同志在行军行列里跑前跑后，边走边作战斗动员。他风趣地说：“同志们，东北军给咱们换了装备，可是目前还是缺吃少穿，英山的敌人又不肯给我们，可

太湖的县太爷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大家愿不愿意去领啊？愿意领，就不能怕脚板疼！”吴焕先同志的讲话富有鼓励性，掉队的同志听说吴政委在前面讲话，拄着棍也要赶上去。这天夜里，各部队都提前到达了。当敌人的眼睛还在紧张地盯着英山的时候，我军已攻占了太湖，全歼守敌，缴获了大批布匹、药品、粮食和武器弹药。当时，全军每人都发到一把雨伞，大家高兴得不得了，议论道：“一把雨伞就是一间房啊！”红军还把许多粮食、衣物、食盐分给城内外的人民群众。敌人慌了手脚，赶忙调回一部分“围剿”部队来防守后方。

吴焕先同志没有进过军事学校，但他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胜仗和败仗中找出经验教训，找出新的斗争策略，所以他很快成为大家爱戴的军政双全的卓越领导人，他的名字和形象已形成一种力量，他走到哪里，哪里的部队都是一片群情激昂。

进军鄂豫陕边界

1934年9月，程子华同志来到鄂豫皖根据地，传达了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红二十五军向鄂豫陕边界进军，创建新的根据地，留下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同志带领部分游击队坚守根据地。于是，当年11月，在省委领导下，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始长征。实践证明，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是正确的：鄂豫皖根据地保留下来了，同时在陕南也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到陕北时红二十五军由3000人扩大到4000余人。

吴焕先同志很讲究斗争策略，在我军跨过平汉铁路进入河南地界时，到处是寨子，都由民团和地主武装把守阻拦我们。这时，我军为了避免冲突用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派人和那些地方武装谈判，要求借路通过，互不侵犯。结果那些地方武装让开大路，甚至让我们从寨子中间通过，缩短了行军时间，避免了损失。

红二十五军西进到达鄂豫陕边界以后，打了许多胜仗。先在三要司歼敌一个营，接着在庾家河歼敌800多人，在蔡玉窑击溃敌二十六旅，在洋县石塔寺打垮敌警二旅、打伤其旅长张飞生，在葛牌镇全歼敌警三旅，在袁家沟口全歼敌警一旅、俘敌旅长唐嗣桐，等等。同时，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很快就在鄂陕、豫陕边界和华阳地区建立了两个县、数十个乡的革命政权及许多地方武装，主力部队也有了发展。1935年春天，蒋介石从各处拼凑了30多个团的兵力，对我军发起了大规模进攻，并限令在五、六、七三个月之内，全歼红二十五军。恰在这时，鄂豫陕边区省委书记徐宝珊同志因病去世，省委决定让吴

焕先同志代理书记职务。在此紧急时刻，他主持召开了省委军事会议，研究和制定了有关反“围剿”的作战方针，决定采取“先疲后打”的灵活战法粉碎了敌人的围攻。7月中旬，我军又乘胜打出终南山，前锋部队直抵西安以南20余里，威胁敌军老巢。蒋介石妄图在三个月之内消灭我军的“围剿”计划彻底破产。

会师陕北迎接党中央

吴焕先同志常说，要好好保存我们的骨干，有一天，这些骨干都要成为担负重任的领导干部。他十分关心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四方面军的行踪。吴焕先同志曾说，消灭敌人一个团也不如缴获一部电台，有了电台就可以听到中央的指示了。打出终南山以后，红二十五军从缴获的报纸上和交通员带来的信息中获悉红一、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合，并有北上的动向。吴焕先同志和省委其他同志认真研究了斗争形势的重大变化，召开了鄂豫陕边区省委会议，决定带领红二十五军急速向甘肃方向挺进，策应党中央与主力红军北上。同时，决定红二十五军北上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留下郑位三、陈先瑞等同志继续领导陕南地区的斗争，巩固和发展这块新建的革命根据地。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果断的行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沿着秦岭北麓走了几天，随后又转入秦岭山中，继续向西挺进。8月初，红二十五军很快就进入甘肃境内，攻占两当县城，渡过渭河，攻下泰安，如同闪电一般地出现在陇东高原。吴焕先同志每到一地，都要教育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切实做到秋毫无犯。他说，我们每天行军打仗，切莫忘了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他针对敌人散布的种种反动谣言，要求部队走到哪儿，就要把红军的优良作风带到哪儿，让新区群众晓得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工农队伍。在路过留坝县时，部队住宿在一座大庙里面，当时因为把庙里搞得很脏，纪律也不太好，吴焕先就把有关单位的党支部书记召集起来，进行教育。他说，这座庙宇是我们国家的名胜古迹，我们红军队伍一定要爱护文物古迹，搞好卫生，对庙内的一切陈列物品都不得随便拿动。同志们临走时把庙内收拾得干干净净。吴焕先同志以身作则，模范遵守群众纪律。他深入调查研究，根据不同地区的民情风俗，适时提出一些新的规定。在到达回民聚居的兴隆镇之前，他了解到军阀部队在这一带所造成的民族隔阂，到达兴隆镇时，吴焕先结合当地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对部队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他制定了几项必须遵循的规定：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打回族的土豪；不准在回民面前说“猪”、骂“猪”；等等。

后来，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会师以后，党中央曾夸奖过红二十五军路过回民区时留下的良好影响，毛主席说红二十五军的民族政策水平很高，执行得很好。

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攻克隆德县城，翻越六盘山，绕过平凉直抵泾河北岸的白水镇。这时，敌三十五师之骑兵团及二〇八团数千人，突然从西峰镇方向猛扑过来，企图在泾河北岸堵击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则决定南渡泾河，佯作夺路入陕之状，把敌人从泾河沿岸调离开来然后再乘机渡过泾河，挥戈北上。8月21日，红二十五军冒雨来到泾川县城西南渡河。谁知，部队刚过一半，山洪突然暴发河水猛涨，有几个同志不幸被急流卷走。军部交通队和担任后卫任务的二二三团，大部被阻在泾河北岸，吴焕先同志因为指挥部队渡河，也被隔在北岸。这时，敌二〇八团千余人，乘机由泾川方向猛扑而来，企图把我后卫部队压在河边，背水作战。吴焕先同志一看情况危急，立刻带着军部交通队一百五六十人，直插敌人腰部。他向战士们高声呼喊：“同志们，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压住敌人就是胜利！”战士们不顾泥泞路滑，一鼓作气地冲上前去，抢占了制高点，把敌人侧后截成两段，从塬上压到沟里，敌团长马开基被击毙。这一仗，打得勇猛顽强，敌二〇八团1000余人全部被歼灭。

可是，就在战斗的最后时刻，吴焕先同志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全军指战员无不热泪滚滚，悲恸不已。此时此刻，河水好像也在呜咽，秋风似乎也在悲歌！

红二十五军的战友们抬着吴焕先同志的遗体渡过泾河，当晚把他掩埋在陇东高原。随后，省委决定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徐海东同志任军长，带领全军踏着吴焕先同志尚未走完的征途，奔赴陕北。1935年9月18日，红二十五军胜利地到达水坪镇，与陕北红军会师，编为红十五军团。同年10月，红二十五军终于迎来了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毛主席在接见徐海东和程子华同志时，表彰了红二十五军的远征功绩。这个大功，要归于千百个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要归于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要归于鄂豫陕三省广大人民群众，也要归于省委和吴焕先同志。

（作者：胡遵远，原载《法制博览·名家讲坛》2017年第1期。）

年轻军事家蔡申熙

蔡申熙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杰出指挥员、军事家，是红十五军主要创始人之一，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位横空出世的军事天才，在大别山区创造出系列令人叫绝的经典战例，其短暂一生中最精彩的华章是在鄂豫皖根据地谱写的。徐向前元帅称赞他：“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斗战役中机智果断，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信。”

四面绝境反冲锋

1906年出生的蔡申熙是湖南醴陵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队学习，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春，蔡申熙被上级派赴鄂东南阳新、大冶和蕲（春）黄（梅）广（济）地区领导游击斗争。走上军事舞台的他指挥红八军四、五纵队北渡长江，在20多天内战宿松、取六村、攻广济、克漕河、占英山，五战五胜打出了军威。同年10月16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红八军四、五纵队改编为红十五军，由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委，全军下辖两个团，共2000余人。蔡申熙两个月内亲手组建一支劲旅——红十五军，创造了红军历史上建军时间最短的纪录。红十五军组建后，蔡申熙的军事天才得以充分展现，他率部东进皖西攻克太湖县城，后经英山、罗田等地到达鄂豫皖苏区，参加第一次反“围剿”。其时红十五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原指望得到物质上的援助，谁知步入苏区后才发现主力红军全部外出，而国民党正集结十万部队在“围剿”根据地。可根据地的主力红一军当时并未察觉，仍在按照自己的行动方案展开进攻。红一军据报新洲城兵力空虚、只有少数民团防守。为解决部队冬装问题，红一军奔袭新洲，将毫无防备的郭汝栋第二混成旅悉数歼灭。此战误打误撞打乱了敌人的“围剿”部署，推迟了敌人的总攻时间。历史就这样将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重担搁在了蔡申熙的肩上。

国民党被迫重新部署部队合围红军。但红一军仍不知危险正在临近，竟然一个转身大踏步离开了鄂豫边根据地前往皖西。担任总指挥的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大喜，认为遇到一举占领“匪区”、荡平“匪巢”的良机，立即下令发动总攻。等他们进入苏区时，却惊奇地发现这里还有另外一支主力红军——红十五军。对于红十五军将士来说，骤遇强敌也是误打误撞。他们不远千里来到大别山，主要是想与红一军会合。由于通信条件差，他们在皖西与红一军隔着一座山头竟擦肩而过，来到了战云密布的鄂豫边，一头撞进国民党重兵包围的“陷阱”里。蔡申熙当时承受着巨大压力：一是红十五军指战员都身着单衣、草鞋，隆冬将至天气寒冷，战士们体质明显下降，更要命、更揪心的是子弹奇缺，每个战士平均只有三发子弹。二是红十五军战士是抱着求援的心理来会师的，没想到红一军没找到，却要与多达十万的敌军对阵，许多人产生了厌战的消极心理。三是根据情报，进攻鄂豫边的敌军，仅国民党正规军就有7个师和1个旅，而根据地内能够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仅有6个教导队。面对强敌，新任鄂豫皖特委书记的曾中生亲自到部队进行动员：“我们已经电令红一军回师救援，目前根据地还有不少兵力可以与敌周旋。”这时部队领导层出现两种强烈呼声：一种是主张将全军分散到各县打游击；另一种是不同意分散部队，主张跳出敌人铁桶阵，打到别的根据地去。红十五军生死系于一线，蔡申熙与曾中生、陈奇商量后，召开全军兵士大会，提出：“以口就粮，可以填饱我们的肚子，但是保不住我们的脑袋，分散游击正中敌人各个击破红军的诡计；脱离现有根据地，可以保住我们的脑袋，但丢掉了红军的灵魂，我们决不做贪生怕死之辈。我们走第三条路，突破敌人重围到皖西与红一军会合，然后一齐杀回来！”经过三天整顿，红十五军官兵统一了认识，东进至鄂东北福田河时，遇到敌军一个团的堵击。蔡申熙在绝大多数指战员有枪无弹情况下，毅然下令吹冲锋号，他的口号是：“接近敌人就是胜利！”指战员都明白陷入了绝境，如不能尽快冲入敌阵，就会在开阔地带变成敌人的活靶！于是将士们拼命地迎着敌人的枪口奔跑，一批批战士在通过旷野时被子弹撂倒，但密集的火力和大量的伤亡并没有迟滞他们奔跑的速度。敌军指挥官愣住了，惊呼：“哪有拿着脑袋往刺刀上撞的打法！”红军战士强悍的作风和无畏的精神终于压垮了敌人，他们冲破数道战壕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最终全歼该团数百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械物资，解决了一直困扰部队的弹药问题。

1931年1月上旬，红十五军与红一军会师，两军移驻商城南部的长竹园合编为红四军，由旷继勋任军长，徐向前任参谋长；原红十五军改编为红十师，由蔡申熙任师长；原红一军改编为红十一师，由许继慎任师长，全军共12 000余人。

创新战术树经典

主力红军回师鄂豫边，迫使敌军处于守势。侵入根据地的敌军采取深沟高垒战术，动辄修筑四五道战壕，然后固守不出，战士们嘲讽为“乌龟战术”。可由于红军缺少重武器、缺乏攻坚经验，一时间还拿“乌龟战术”没有办法。但红四军军部毕竟有曾中生、徐向前、蔡申熙、许继慎四位黄埔高才生，经过几天琢磨，他们想出了围点打援、坑道爆破和飘忽战术三种破敌之法，并将率部试阵的任务交给了蔡申熙。

试阵的第一仗是围攻磨角楼。磨角楼位于麻城以北，驻军只有国民党第三十师夏斗寅部一个营，但筑建了坚固的纵深防御体系。按照计划，蔡申熙率领红十师主力向磨角楼发起攻击，作出强攻的姿态，迫使守敌向后方求援。夏斗寅不知是计，派4个团紧急驰援，结果被等候已久的徐向前逮个正着。他指挥红十一师以逸待劳击溃援兵。敌人援兵一退，磨角楼守敌见大势已去，只得放弃抵抗缴械投降。磨角楼一仗虽歼敌只有数百人，但在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它开创了围点打援的先河，从此这个战术成为红四方面军克敌制胜的主要法宝。

试阵的第二仗是强攻新集。新集三面环山东临潢河，城墙高两丈有余，城池碉堡全部用长方岩石灌以糯米浆砌成，异常坚固，机枪打在上面只能留下一串麻点，即使是用迫击炮轰，也只能敲去半个角。蔡申熙率红十师进攻新集，打了一个星期进展不大。驻守在镇内的地主武装站在城墙上，一边悠闲地解开裤带撒尿，一边嘲讽地喊道：“土包子，再打一个月也是一样！”蔡申熙不动声色每天照样发动佯攻，暗地里却利用城北一家小店作掩护，悄悄地挖了一条四五十米长的坑道一直穿到城墙底下，然后将数百斤烈性炸药塞进棺材里，推到坑道尽头。点火前，蔡申熙问战士：“城墙上还有没有敌人撒尿？”“多着呢，成排地站在墙垛上。”“好，让他们到天上去撒！”几分钟后，突然天崩地裂般一声巨响，十几个站在城墙上的团丁一齐飞上天，红军战士冒着硝烟冲进镇内，干净利落全歼守敌1000余人。据考证，这是红军历史上最早进行坑道作业的战例。攻克新集的战略上意义更大，此仗一举拔除了长期横梗在根据地内的心腹大患，打通了鄂豫边和商南根据地的路线，新集也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中心。试阵的第三仗是双桥镇战役。红四军为扩大战果主动向平汉铁路出击，先后袭占李家寨和柳林车站，还冒雪截获一列军车，毙俘敌军2000余人。红军的袭扰，使北部交通大动脉处于瘫痪状态。国民党武汉行营任何成浚急令孝感驻军岳维峻第三十四师前往解围。红四军侦知岳部动向，从50

里外奔袭敌人。战斗在孝感双桥镇打响。蔡申熙与许继慎分别率领红十师、红十一师，从两岸展开进攻。这是一场有悖常理的战役。兵法曰：倍则攻之，十则围之。岳维峻部拥有超过6个团的兵力，红军参战部队加上地方武装也只有6个团，兵力略处下风。按照常规，这只能打场击溃战，但由于红军将士的英勇顽强，此役竟然打成了歼灭战。对于这场战斗，时任军参谋长的徐向前有一段精彩回顾：“3月9日拂晓，我东西两岸的突击部队发起攻击，迂回部队翻山越岭向敌后猛插。敌遭到突然攻击后仓皇组织反击，我三十团、三十一团与敌展开争夺制高点激战。上午10时左右，我迂回部队第二十九团占领双桥镇西南尖鸡岗，罗山独立团亦抵东南的小葵山一带，敌三十四师陷入我军四面包围之中。周围数十里的群众，也在地方党的动员和组织下，拿着土枪、大刀、长矛前来参战，呐喊声响彻两岸，场面极为壮观。岳维峻‘狗急跳墙’，亲自带着两团人出镇反扑。敌人仗着飞机、大炮掩护，企图打开缺口向南逃窜。战况十分惨烈，大白天我们站在山头看得清清楚楚：敌人扑上来，我军反击下去；阵地被敌夺去，又被我军夺回，敌我双方反复冲杀，肉搏格斗扭成一团。我们的部队真英勇，发挥了近战歼敌的战术特长和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干部带头冲锋、肉搏，伤亡再大也不打退堂鼓，我十师师长蔡申熙胳膊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这场硬仗鏖战数小时难分难解。中午敌人筋疲力尽，我们下令预备队出击，对敌猛烈分割穿插直扑双桥镇内，打瘫了敌人的指挥系统。这一锤子下去，敌人受不了了，很快被我军分割全歼结束战斗。此役经过七个小时，我军毙敌上千人俘敌5000多人，缴枪6000多支。”这是红四军第一次通过飘忽作战（运动战）取得歼敌一个师的空前大捷。这场胜利，宣告鄂豫皖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取得最后的胜利。带领部队摸索和实践新战法的蔡申熙成为红四方面军战略战术的开创者之一。

在双桥镇战役中，蔡申熙被敌人机枪打中右臂、左腿。由于伤势严重、医疗条件差，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右臂残废。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手脚伤残意味着军事生涯的结束。蔡申熙也有过消沉和怅惘，但在既成的事实面前，他逐渐平静下来找到组织：“我虽然手不能拿枪，脚还能走，口还能讲，可以分配我一点其他工作。”于是组织上安排他担任彭（湃）杨（殷）军政学校校长。其实，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其紧迫的任务，其重要性不亚于任何一次战役。由于工农红军基本上是从游击战争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绝大多数指战员都是“泥腿子”出身的农民，他们仅有的一星半点军事知识是从战争中感受的，在红军由游击战进入运动战的时候，急需对军队的干部进行系统正规的军事、政治教育。另外，红军部队强调以身作则，干部冲锋在前、撤退在后，紧急时即使是师长、军长也得赤膊上阵，这样干部的伤亡率特别高，也需要成批培养后备干

部。蔡申熙仔细审订各种教学计划，根据战场需要和学员情况适时地调整课程，还别出心裁地从俘虏中挑选一批军官担任教员，让他们教授国民党军队行军打仗的军事律条和基本做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蔡申熙在军校主持了4期训练，培养了1000余名学员，他们后来大多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团营级干部。

1932年7月，旷继勋指挥红二十五军2000多人保卫皖西霍邱。而围攻县城的是国民党徐庭瑶第四师，兵力超过6000人，红军与其血战五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县城陷落，除旷继勋率百余人从西门泗水脱险外，守城部队牺牲千余人、被俘千余人。临危受命的蔡申熙抵达皖西后立即就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四处召集余部整理部队，重新编组了第七十四师和七十五师，使全军人数聚集到1万余人。当时皖西处于被敌分割突进的被动状态，我军原先占领的县城和集镇纷纷失陷，各物资储备据点丢失，许多指战员被敌俘获。由于缺少地方党和政府的有力支援，红二十五军经常处于断炊困境。蔡申熙带领红二十五军在南起英山、北迄霍邱的广大地区，与各路进攻之敌展开激战，并在苦苦支撑中捕捉到转机。一日，红军获悉国民党第七师两个团押解着大批战俘进驻六安郭店子，蔡申熙率部突袭郭店子，与驻敌展开肉搏战，杀死敌副团长桂华峰以下600余人，救回被敌俘获的伤员数百名，并缴获大批粮食和军用物资，一举挽回逆势，初步稳定了皖西岌岌可危的局势。

将星陨落苍天妒

由于蔡申熙的天才谋划和徐向前的出色指挥，红四方面军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在大半年内先后进行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和潢（川）光（山）四大战役，先后歼敌6万余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国民党正规部队达40个团。这是红军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大捷，使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得到迅猛发展，苏区版图面积达40000余平方千米，人口超过350余万，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邱五座县城，建立了26个县的革命政权。红四方面军组成两个军6个师，主力部队达到45000千余人，地方武装发展到20余万。慑于红四方面军的锐利兵锋，国民党被迫作出战略调整，将第4次“围剿”的重点由江西苏区转移到鄂豫皖苏区，蒋介石指挥50万大军进行“围剿”。

陶醉在大捷之中的张国焘并未意识到危机。他在鄂豫皖省委成立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毫无根据地鼓吹：“国民党主力只剩下七个师，其余都是杂色部队，红军现有这样的力量，已经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骄纵轻狂的张国焘竟将中央警告置诸脑后，一意孤行下令部队向武汉方向进击，进行所谓的“不

停顿的进攻”。向来冷静的蔡申熙察觉到了日益迫近的危险。他经过反复思考，向张国焘提出了应该预觅退路的问题。但张国焘并未听入心中，为了应付蔡申熙，张国焘让他做些准备工作。

果然，张国焘的错误决策很快给红军酿成严重损失。1932年8月，蒋介石命令围剿部队发起总攻，各路敌军如潮水般涌进苏区中心区。红四方面军猝不及防，仓促从麻城撤围赶回苏区御敌，在冯寿二、七里坪、扶山寨连打三仗，均未能阻止敌军攻势，被迫转移到皖西与红二十五军会合。在皖西，主力部队又遭到敌军追击纵队和拦截纵队夹击，未能实现在皖西打开局面的战略意图。红四方面军决定南下英山，会合地方武装寻找战机。部队抵达英山以北燕子河时，先头部队报告：“敌军已抢先一步占领英山。”鄂豫皖中央分局遂在燕子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绝境之下的对策，这次会议军史上称为燕子河会议。

蔡申熙是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是全区重大军事计划起草人，此时他的战略眼光赢得了全体同事的信任，“我的意见早在几个月之前就提交军事委员会了，四个字：向西转移。”蔡申熙进一步解释，“鄂豫皖苏区本来空间就十分狭小，回旋余地有限，现在主要据点丢失、交通要道被占，中心区一下子涌进几十万敌军，我军多达数万人，运动得开吗？当今之计唯有向外线转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外线转移的最佳方向不是东出，而是西进，潜（山）太（湖）地区不如京汉铁路以西的应山、随县、枣阳一带有利，据我前期调查，那里有党的组织基础，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也在那里活动过，那里地处鄂豫川陕四省边境，南靠桐柏山，地形条件比较有利。”军队和地方干部被蔡申熙说服了，放弃了一度占上风的东出潜太和坚守内线的主张，同意经英山转往黄麻老区，然后留一部分部队保卫根据地，主力向西转移。会后红四方面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张国焘、蔡申熙带领，一路由徐向前、陈昌浩带领，分道向鄂豫边转进，10月初在新洲会合，几天后抵达黄安的高桥河、河口镇一带。为了准备即将进行的西征，部队进行了精简和调整。鄂豫皖军委为此发布了红四方面军编制问题的决定，任命蔡申熙为红四军军长兼第十师师长。

河口之战是红四方面军西征前的最后一仗。10月8日，穷追不舍的胡宗南第一师、俞济时第八十八师与红军主力相遇，遭到蔡申熙部的强力反击，敌军伤亡2000余人退入河口镇。第二天，蒋介石加派第二师从冯寿二方向投入战场，准备与河口之敌构成东西夹击之势。蔡申熙又率部前往冯寿二御敌，在仙人洞一带激战两昼夜。10月10日中午，援敌不断加入战斗，从南、北、西三个方向构成对蔡部的包围之势。蔡申熙果断命令部队后移，向新阵地转移。多年战斗生涯中蔡申熙有个习惯，冲锋时总将指挥位置前移，撤退时与殿后部队一同撤离战场。这次也不例外，他的指挥所与负责断后的部队边打边撤。此时

敌军从三个方面合围，试图截下这段“尾巴”。眼看敌人就要扑到面前了，警卫员劝说不动干脆就架着蔡申熙往下撤。“放手！”蔡申熙怒吼着挣脱出来：“队伍还没全部撤到安全地带，我不能走！”突然，尾追的敌军冲锋枪子弹射中了蔡申熙的腹部。他咬着牙一手捂着肚子，一边挥枪还击一边指挥战斗。鲜血喷涌而出，瞬间整个腹部都被染红了。由于失血过多蔡申熙昏迷过去，等他醒来时部队已撤到安全位置。当时卫生条件极其简陋，药品奇缺，连最普通的麻醉剂都没有。蔡申熙的肚子被子弹打得稀烂，军医一无药品二无设备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痛苦呻吟。闻听蔡申熙中弹后，徐向前、王树声、曾中生等战友飞驰前来探望，无不痛哭流涕难过万分。徐向前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河口）战斗中，红十一师政委甘济时同志牺牲了，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负重伤，我去看望了他。那天正下雨，他躺在床上，疼得没办法，要人补他一枪。我对他进行了安慰，就急忙指挥部队去了。”

弥留之际，蔡申熙深情地望着泪流满面的妻子曾广澜，艰难地说：“你要永远跟党走……”当晚，蔡申熙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时年仅26岁。

（作者：胡遵远、张应松，原载《协商论坛》2017年第6期。）

詹谷堂：宁死不屈的共产党人

在蜿蜒起伏的大别山区，广泛传颂着詹谷堂这个英雄的名字。他追求共产主义理想，为了让普天下劳苦大众能够翻身解放过上好日子而毅然献身革命，矢志不移，奋斗终生。面对敌人的屠刀，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高贵品格和英雄浩气。

亲手播撒革命火种

詹谷堂，又名詹生堡。1883年出生，家住金寨县南溪镇葛藤山的一个村庄。詹谷堂是清末秀才，以教书为生，因为三个“出众”而被称为奇才。一是人品出众，爱国忧民，正义善良；二是才华出众，知识渊博，出口成章；三是相貌出众，眉清目秀，仪表堂堂，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

1924年冬，詹谷堂和袁汉铭等人在汤家汇笔架山农校建立了金寨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也是皖西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从此，革命的星火便在金寨开始燃烧。

1929年5月，詹谷堂参与组织领导了著名的立夏节起义，并取得了全面胜利。5月9日，各路起义大军会师斑竹园，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看到他建立第一个党组织时发展起来的共产党员周维炯、漆德玮、李梯云等都成为立夏节起义和红三十二师的领导人，詹谷堂喜不自禁，在红三十二师师部挥笔写下了“斑竹满园制作数杆长枪维持共产，红花遍地训练三军大队保障民权”的楹联，贴在大门上。10日，詹谷堂参加了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红三十二师在斑竹园文昌宫召开的地方党组织和红军领导干部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创建革命根据地，成立商城县临时办事处，并作为商城县临时革命政府行使职权，詹谷堂任办事处副主任。之后，詹谷堂经常随军活动，到处宣传革命道理和起义盛况，并参与组织赤卫队、扩充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各项工作，成为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不幸落入敌人魔掌

金寨地区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根据地的迅速扩大、红军和赤卫队战斗力的迅速增长，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

1929年7月，敌人调湖北夏斗寅部的两个团，会同河南民团头目顾敬之、柯寿恒等共3600余人，分三路向商南地区红军进攻。红军在当地赤卫队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奋战数日，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但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不得不向鄂豫边麻城、光山方向转移。詹谷堂因根据地工作需要，经组织决定，与部分同志留下坚持斗争。

红军转移后，国民党部队与地方民团疯狂地开展搜山清户，搜捕革命武装人员、共产党员和农会骨干。留下的党员和地方武装人员白天隐蔽，晚上秘密开展活动。詹谷堂隐藏在后山上的一个山洞里。

8月18日正中午，一个老乡上山给詹谷堂送饭，不幸被敌人发现。敌人一边尾随紧盯，一边派人向葛藤山清乡局报告。清乡局立即派100多名团丁进行搜山，詹谷堂不幸被捕。

詹谷堂德高望重、名声很大，团丁们不敢绑他，前呼后拥地押着他下山。詹谷堂毫无畏惧、昂首挺胸地走到葛藤山清乡局。

一进门，见清乡局长坐在里面，詹谷堂顺手抄起一把椅子朝他砸去。清乡局长见势不妙，慌忙躲开，大声嚷道：“还不快将‘共匪’头子绑住。”十多个团丁一哄而上，用绳子将詹谷堂捆绑起来。抓住了詹谷堂，清乡局长不敢耽误，立即将其押送到南溪，送交顾敬之民团团部。

坦然面对生死

詹谷堂被带到南溪后，顾敬之欣喜若狂。他早就知道，詹谷堂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当地共产党首要分子，在当地影响很大。晚上，他在当地豪绅招待的酒宴上扬言：“共产党的头子抓到了，他们的组织即将破获，‘共匪’很快就要瓦解，天下还是我们的天下，大家一切照旧，天不变道亦不变！”

饭后，顾敬之亲自在火神庙对詹谷堂进行审问。

“你就是詹谷堂吗？”顾敬之趾高气扬地问道。

“既然知道，何必废话！”詹谷堂大声喝道。

顾敬之一愣，停了一会儿又问：“詹谷堂，你办的是什么党？”

“我办的是党上之党！”詹谷堂巧妙地回答。

顾敬之见问不出究竟，气得不断挠头，强压怒火继续问：“詹先生，你熟读圣贤书，还是个秀才，为什么要干共产党？”

“为了消灭你们这些吃人的野兽！”

詹谷堂的回答噎得顾敬之说不出话来，他再也不顾斯文，暴跳如雷，拍着桌子大声吼叫：“打！给我打！狠狠地打！”

皮鞭、木棍雨点般落在詹谷堂身上，鲜血立即染红了白短褂，詹谷堂咬着牙，一声不吭，一会儿就昏死过去。

“用凉水浇！”

一盆凉水泼过去，詹谷堂苏醒了。顾敬之还没有来得及问，只听詹谷堂喊道：“打吧！杀吧！共产党是打不垮，杀不完的！”

顾敬之望着鲜血淋淋、气息奄奄的詹谷堂，感觉问不出什么结果，无可奈何地抓抓头，离开了审讯室。

敌人的第一次审讯失败了。

第二天早晨，顾敬之又开始第二次审讯，他奸笑着走到詹谷堂面前，用拉家常的口吻说：“你今年才46岁，家中还有老母、妻子、儿女，你这样死了……”

“我死了没有关系！革命的种子已经撒出去了，不久就会遍地开花结果。革命的星火已经点燃，很快就会燎原！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不等顾敬之的话讲完，詹谷堂的话语就像排炮似的轰了过去。

顾敬之惊怒交加，但还是按捺住性子往下问：“你说共产党员有多少？在哪里？”

“多得很！天上有多少星星，地下就有多少共产党员！”

“你说说名字。”

“名字？有一个！”

“谁？”

“詹谷堂！”

詹谷堂嘲弄般的回答，气得顾敬之像一条疯狗一样狂蹦起来，他恶狠狠地威胁：“你再不讲，我就要你的命！”

“你杀得了我詹谷堂，灭不了共产党！”

“上刑！上刑！”顾敬之气急败坏地吼道。

烈火烤，烙铁烙……詹谷堂咬紧牙关，几度昏死过去。敌人将昏死的詹谷堂拖进牢房。当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立即挣扎着对同狱的同志说：“我们是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要有坚强的意志，要能忍受最大的痛苦。我们的队伍会回来的……”

“你放心吧！我们会跟你一样！”大家纷纷表示。

詹谷堂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当天下午，詹谷堂被带出了牢房。他和 10 多个同志一起被押往刑场。他感到最后时刻到了，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一阵枪响，10 多位同志一个个倒下了，他又被带回牢房。原来这是让他陪斩，敌人妄图以此摧垮他的意志，从他身上获取有用的口供。

继续提审，继续用刑，他有问有答，敌人想要的东西却一字不说；继续陪斩，继续摧残，他威武不屈，敌人束手无策！就这样前前后后折磨了 10 多天，詹谷堂被折磨得遍体鳞伤，气息奄奄。

8 月 28 日晚上，顾敬之抱着侥幸的心理，再次对詹谷堂进行审讯，仍然毫无结果。半夜时分，詹谷堂又被打得皮开肉绽，拖回牢房。

詹谷堂抚摸着流血的伤口，感觉自己的血快要流尽了，他挣扎着站起来，用手指蘸着自己伤口流出的鲜血，在墙壁上一笔一画地写下“共产党万岁”5 个大字。当最后一笔写完时，他脸上露出了微微的笑容。随后便倒在地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晨，敌人打开牢门一看，墙上有 5 个鲜红大字，吓得倒退了几步。顾敬之得知詹谷堂已经死去，仍不解心头之恨，令人将詹谷堂的尸体拖到南溪的河湾边，对着头又开了两枪，曝尸河边。

漆黑的夜晚，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含着眼泪将詹谷堂的遗体偷偷地送到 10 千米外的葛藤山，安葬在名叫獐子岩的山上。直到 2007 年，詹谷堂烈士的遗骨才迁入金寨县红军烈士陵园。

（作者：胡遵远、江敏，原载《党史纵览》2017 年第 1 期。）

周维炯：不该早陨的将星

周维炯是大别山豫东南红军和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卓越的红军指挥员之一。他192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大革命失败后回乡积极从事农民运动，打入反动民团做兵运工作。1929年5月参加领导了立夏节起义（又称商南起义），后任红三十二师师长，领导当地党组织和红军开辟了豫东南革命根据地。1930年后先后任红一军第二师、第三师和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红三十二师的创建和红三师、红二师、红十一师的建设，为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命

周维炯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周德怀，母亲漆先美，兄弟姊妹六个，他排行老二。7岁时就读于五舅父漆先涛私塾馆，与表兄漆德玮一起读书。周维炯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他不仅爱学文，而且爱学武，常和漆德玮求教于二舅父漆树仁练习武术，一心想做文武双全的英雄人物，治国安邦。

1921年秋，周维炯考入南溪明强高等小学，他在这里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思想，进步很快，各科考试成绩常常名列前茅。

1923年秋，周维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笔架山甲种农业学校。在共产党员、国文教师罗志刚，进步教师占谷堂等培养下，更加勤奋读书，认真阅读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受益很大，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开始信仰共产主义，并积极参加“读书会”“研究会”“演剧社”，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

1924年，周维炯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和漆德玮从农校毕业，前往开封求学。经共产党员林承蔚介绍，与共产党员吴芝圃接上了党的

关系。

1927年春，周维炯等一批共产党员，受中共商城党组织的派遣，前往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周维炯在军校学习期间，多次到农讲所聆听毛泽东、萧楚女、陈潭秋等著名共产党人的讲课，明确了农民运动的方向，树立了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念。

发动立夏节起义，组建红三十二师

大革命失败后，周维炯找到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学习的漆德玮、漆德琮等商议，毅然决定返回家乡，组织武装斗争。周维炯回乡后，以教书作掩护，积极同漆德玮、袁汉铭、詹谷堂、漆德琮、漆禹源、漆海峰、罗圃城（罗卓如）、罗雾岚、廖炳国、李梯云（李泽辉）、肖方（肖大椿）等一批革命意志坚强的共产党员活动在吴家店、简家坳、老鹄窝、平头山、白沙河等地，整顿恢复农民协会，组织了一支有10余支枪的秘密农民武装。1928年2月14日，中共商南区委和共青团商南区委成立，周维炯当选为区委委员和团区委书记。

这年春天，国民党在县、区都组织“自卫团”，招兵买马、扩充兵力。中共商南区委派周维炯、漆德玮等一批共产党员到县、区民团当兵，搞兵运工作。周维炯打入商南大绅士杨晋阶的民团，利用与团总杨晋阶的师生关系建议改造民团。杨晋阶委任周维炯为驻丁埠民团分队教练兼第四班班长。周维炯训练有方，作风正派，对士兵耐心教授、身体力行、不打不骂，很快赢得士兵的信任和爱戴，杨晋阶也更加器重。周维炯在民团站稳脚跟后，立即开始进行革命活动，发展中共党员7名，尔后又在周围农民中发展中共党员4名，建立了中共支部，周维炯任书记。1929年春，中共商（城）罗（田）麻（城）特委决定举行商南武装起义。徐子清、肖方分任正、副指挥，周维炯负责军事，时间定于农历立夏节。

5月6日，周维炯主动担任值星，以打扫卫生、整理内务为名，将枪支弹药集中放到厢房里，便于顺手夺取。下午，他向副队长张瑞生建议放假半天，向驻地丁家埠各商家摊派鸡鱼肉酒，备好酒宴。晚上，团总杨晋阶在牛食畈收捐未回，周维炯怕事情有变，派人通知肖方将杨晋阶监视起来，相机行事。晚宴持续到深夜，副队长和不少团丁都醉倒了。周维炯见时机已到，喊了声：“动手！”大家立即控制了存放枪支的房间，封锁了宿舍，捆绑了张瑞生。丁家埠民团40多人全部起义。这天夜里，南溪、李集、斑竹园、牛食畈、禅堂、白沙河、汤家汇等地，同时暴动成功。5月9日，各地暴动武装会师斑竹园，

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周维炯任师长，下辖第九十七、第九十八团两个团，全师 100 余人。这是安徽金寨境内组建的第一支工农红军队伍。从此，开始了创建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转战于商南与皖西的山山水水

红三十二师成立后，在李家集、南溪、冈家山、大埠口、胭脂坳等地，发动群众、收缴枪支、扩大红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打土豪、分财产斗争。在商城县民团大队任第二分队长的漆德玮带着挑选的一班人（全是中共党员和“兄弟会”成员），携带 8 支短枪，回到金寨，就任红三十二师副师长。周维炯和党代表徐其虚粉碎了商城县民团大队长王继亚的围攻，又率领红三十二师东征，一举攻克六安重镇——金家寨。接连进击多支民团，连战皆捷，威震皖西，许多贫苦农民青壮年踊跃参军，一些土豪劣绅的护庄队和小股土匪惧怕被歼，纷纷向红军投诚，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红军发展到 300 余人，成立了司令部和一支手枪队。回师途中，收编河南一股流散土匪 100 多人。“大别山，峰连峰，出了个英雄周维炯。打人民团闹暴动，闹得满天红！”这是鄂豫皖边区流传下来的一首民歌。

1929 年 7 月底，湖北军阀夏斗寅派出 1 个团兵力，会同商城、罗田、麻城、六安、霍山等地民团，共 4 000 多人，向根据地的中心区南溪、丁家埠一带进攻。红三十二师跳出根据地，转向外线，在麻城边界，与徐向前领导的红三十一师会合，以避实击虚的战术，打了许多胜仗，然后返回商南，给地主民团、清乡队、还乡团以致命打击。

红三十二师到达黄（安）光（山）边界八字门楼的第二天，中共商城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增选周维炯为县委委员。

正当周维炯等率领红三十二师恢复发展革命根据地之际。河南省一个名叫漆藏洲的处长从开封回来，他极端仇视革命运动，在群众中咒骂共产党和红军，扬言要依法惩治漆姓参加红军的人，他还秘密地同两城四区反动民团头子顾敬之和一些土豪劣绅相勾结，搜集共产党情报，制造谣言，破坏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周维炯是漆藏洲的外甥，漆德玮是漆藏洲的侄儿，他们大义灭亲，周维炯亲自宣布对九舅漆藏洲进行枪决。

11 月 19 日，应中共安徽省霍山县西镇区区委书记刘仁辅之请，周维炯带兵 80 余人连夜前往，配合霍山县西镇区暴动。一夜之间，整个西镇地区反动势力全部覆灭，西镇工农革命委员会建立了。

1929 年 12 月 26 日，周维炯率部解放商城，全歼守敌，建立了县苏维埃政

权。《八月桂花遍地开》这首著名的歌曲，就诞生于这次胜利的庆祝活动中。

纵横驰骋鄂豫皖

1929年12月21日，中央派刘英任红三十二师师长、李荣桂任师政治部主任，调周维炯到上海受训。商城县委认为，目前工作紧张，原有负责同志不应去上海，决定周维炯任副师长。

会后，周维炯率部分红军三进皖西。在那里消灭地主豪绅的反动武装，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产，号召广大农民青壮年踊跃参加红军，并成立了一〇一团，周维炯兼任团长。后收编土匪，扩大革命力量，充实红军枪支。在金家寨收编土匪成立混成团，又收编六安民团大队成立一〇三团。红三十二师发展到800人。

1930年1月15日前，周维炯率部回师商城，参加县、师代表联席会议。会后，周维炯率领红军一部四进皖西，发动群众，消灭反动武装，打土豪分财产，扩大红军。不久，和徐百川领导的红三十三师会合，组成前敌指挥部，周和徐分任正、副指挥长，分兵出击，20余天时间即驱逐和消灭了麻埠、独山等地数股残敌。4月间，两路红军会合，一举攻克霍山县城。

从此，豫东南和皖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在一起。随后，周维炯率红三十二师九十七、一〇一两个团回师商南，配合徐向前领导的红三十一师，横扫盘踞在商南五关的残敌，打通了向鄂东北的要道，实现了豫东南和鄂东北两块革命根据地之间的连接。从此，鄂豫皖三省边区三块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整体。

1930年4月，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根据中共中央1930年3月18日的指示信，将红十一军改为红一军，原三个师的番号依次改为第一、二、三师。红三十二师在商南与军部会合，在南溪改编。继之，军部率领红二师与红三十三师会合，军部决定，从红二师抽出一部与红三十三师合编为第三师，周维炯任师长。

6月中旬，红二、三师在军长许继慎、政治委员曹大骏的率领下，向六安、霍山西部地区的反动据点发起进攻，先后收复流波、麻埠等地，第三次打下霍山县城，歼灭地方反动武装1000余人。六安潘善斋新编第五旅反扑，遭到红二、三师迎头痛击，大部被歼。战后，红二、三师在军部的领导下，就地休整补充，发动群众，恢复、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进行土地改革等运动。

7月初，红二、三师在军部的率领下，继六安、霍山战役之后，乘胜南下英山，与中共英山县委领导的游击队会合，扩大革命根据地。周维炯、漆德玮率红二、三师，攻克英山县城，全歼韩杰旅，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这是又一次

重大胜利。周维炯在战斗中负了伤。

但这时正值第二次“左”倾路线统治全党，鄂豫皖根据地也深受其害。当时的“长江总行动委员会”责令红一军不惜一切牺牲“打到武汉过中秋”，并把红军和党政机关中大批家庭出身稍微富裕的干部、战士清洗出革命队伍。周维炯对上述不切实际的行动和“左”的做法多次提出不同意见，不仅未被采纳，还被批判为“富农路线的同情者”“机会主义”。直到10月下旬，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左”倾路线的精神传达后，以上错误做法才有所收敛。

10月16日，红一军军部率红二、三师攻克光山县城。红一军在城内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决定将全军整编为第一、二两个师。各级干部也进行了调整，周维炯任第二师副师长。

1930年冬，蒋、冯、阎混战结束，蒋介石调集兵力，分头对各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红一军军部决定主动出击，率师远程奔袭金家寨，横扫皖西之敌。周维炯率红二师将金家寨紧紧围住，激战3个小时，全歼守敌四十六师1个营和8个民团，共1500余人，缴获长短枪1000余支，迫击炮两门。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得知消息，急调一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皖西革命根据地进犯。12月30日，周维炯率红二师迎击，击毙俘敌团长以下2000多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继之，红一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麻埠、独山、叶家集、苏家埠、韩摆渡、霍山等地顽敌，全部恢复了皖西革命根据地。

1931年1月中旬，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在商城县长竹园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下辖第十、十一两个师。周维炯任红十一师副师长兼三十三团团长，5月任师长。

3月1日，周维炯、吴汉英率三十三团奔袭占领李家寨车站，袭击国民党军一列军车，旅长侯良华当场毙命，团长李伯文被活捉，押至九里关枪决。5日，周维炯等率红十一师将驻守柳林车站的国民党新编十二师袁英部包围，歼灭一个营，击溃两个团。这两次战斗，共毙俘敌军1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3月9日，国民党军三十四师岳维峻部，由湖北孝感向北，被红一军包围在双桥镇，激战半日，未能取胜。周维炯率三十三团，组成三个梯队，冲进双桥镇敌指挥中心，一阵猛打，使敌人指挥失灵，红一军趁势发起总攻。此战毙敌1000多人，生俘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5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6000多支，迫击炮10门，山炮4门。这是鄂豫皖红军成立以来俘敌最多、缴获最大的一次胜仗。

8月1日，红四军南下，强攻英山县城。周维炯率红十一师攻进北门，与攻进南门的红十二师全歼守敌1000余人，团长被活捉。

8月中旬，周维炯率领红十一师冒着酷暑天气，急运行军100多里，奔袭遭河镇敌新编第八旅，经一个多小时激战即全歼该旅，乘胜攻占了广济县城。在清水、罗田等地的战斗中，周维炯率领的红十一师亦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战绩。

艰苦紧张的战争生活，使周维炯无暇顾及家庭和个人问题，几年中他只回过一趟家。1930年冬，周维炯率红二师路过滕家堡一带，遇到商南、皖西边境外逃的大批难民，许多都是红军的亲属，其中有周维炯的父亲和妹妹。周维炯一手搀扶着父亲，一手拉着小妹妹，安慰说：“革命根据地遭到敌人的破坏，父老乡亲身受蹂躏残杀，战士们心里都像火烧的一样难受。红军一定要打回去报这个仇！现在我有军务在身，也顾不得你们了，你们回家吧！红军一定会回去的。”说罢，挥泪告别亲人，踏上了征程。他的未婚妻多次在行军的路口上等他，有一次终于等到了，周维炯满怀深情和歉意，对她说：“革命成功了，我们就成亲。”说罢策马而去。

将星陨落于“肃反”

红四军南下蕲（春）黄（梅）广（济）取得重大胜利，蒋介石在战场上遭到惨败，恼羞成怒，施离间计，妄图挽救败局。国民党特务头子曾扩情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关系，派特务送信给鄂豫皖院军委皖西分会主席兼红四军第十二师师长许继慎，诡称与许已有来往，欢迎许率部归降。许继慎识破了敌人的阴谋，红四军领导人断定“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并认为“许不会有什么问题”。红四军领导人还将此情况向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报告，并把国民党派遣特务和信送他处理。对这样重大问题，张国焘既不倾听红四军领导人的意见，又不调查研究，竟以此信为借口，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中发动了一场名为“肃反”、实为排除异己实现个人野心的运动。

张国焘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掌握了党、政、军领导权，极力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全盘否定已取得的伟大成就，错误地号召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所谓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无理指责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提出按照四中全会的组织路线，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苏维埃政府实行“改造”。大肆撤换党政、军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周维炯和一些高级干部多次对张国焘善意地提出意见，张国焘不但不予以采纳，反而诬指曾中生、许继慎、周维炯等一大批红四军将领“对抗中央分局”“反党”“反革命”。

1931年9月13日，张国焘派陈昌浩到红四军军部，接管了曾中生的红四军政委职务，开始“肃反”。陈昌浩按照张国焘的指示逮捕了红四军大批干部，并命令红四军开到光山白雀园。红四军边战边走，在商城余子店逮捕了周维炯、许继慎等高级将领。9月底，红四军移驻白雀园地区，张国焘从新集专程来到白雀园主持“肃反”运动，以“全力肃清四军中之反革命和整顿四军”。

周维炯在“肃反”中被诬陷为“改组派”“反革命”，受尽了各种酷刑，却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临死前的一次严刑审讯中，他横眉冷对、怒斥张国焘：“老子自领导商城起义以来，从没有一天离开过红军、离开过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天天同敌人打仗！老子不是反革命，你才是真正的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老子不怕你打死，20年后，老子还要干革命！你总有一天要受到党的惩罚、人民的审判，落得可耻、可悲的下场！”张国焘被斥责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1931年10月，他密令鄂豫皖政治保卫总局将周维炯押解至鄂豫皖中央分局所在地——河南省光山县新集处决，其母和小妹也因“改组派头子家属罪该同等”而惨遭杀害。

（作者：胡遵远，原载《安徽档案》2016年第5期。）

肖方：鄂豫皖苏区的猛虎

肖方，原名肖大椿，1907年生于湖北省罗田县滕家堡北面洗儿岭肖家冲一个地主兼商人家庭，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毕业，曾任罗田县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共商（城）罗（田）麻（城）特别支部书记，罗田大革命时县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九十七团团团长、红一军第三师副师长、中国工农红军中央教导第二师师长、红四军第十二师副师长兼三十四团团团长等重要职务。

选择信仰为百姓

大别山区的鄂豫皖三省的结合部洗儿岭，山高岭大，层峦叠嶂，物产丰富。但在军阀混战时期，官匪狼狈勾结，地主劣绅暴敛，加上旱涝灾害肆虐，出现“张家卖孩子、王家卖妻子”的惨象。看到老百姓水深火热的悲惨生活，出身富裕的肖方在少年时代就忧国忧民，生活极其俭朴，常以扶困济贫、舍己助人为乐。

选择信仰的过程，是艰难苦涩的。但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信仰的味道又是甜蜜的。肖方6岁到麻城等地上学读书。1917年，同胞兄肖阳春到黄州、武汉中学求学，学习勤奋，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还经常把平时节省下来的钱帮助家庭困难的同学缴纳生活、学习费用。受到董必武、恽代英、萧楚女等教育和影响，他开始信仰共产主义。看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他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毅然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教育影响下，肖方于1926年8月由李梯云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的派遣，他回到罗田进行革命活动，创建中共罗田支部。这引起了地方豪绅以及肖氏族长的反对和仇视，采取各种伎俩，妄图阻挠肖方兄弟从事革命工作。

1926年7月，肖方父亲病重。肖氏族长肖仙平妄想借父子之情诱劝肖方兄

弟。肖仙平先指责肖方兄弟宣传新思想、组织青年协进会、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是“过激行动”，继而以资助升学、高官厚禄为钓饵，诱使肖方兄弟改弦更张，还以挑衅的口吻问道：“我看你家乡下有田产，镇上有烟铺，在这方圆几十里内，也称得上是上户殷实人家，那么，打倒土豪劣绅，不是连你们的父亲也打倒了么?!”

面对族长挑拨，肖方斩钉截铁地说：“是的，家父要是像你一样，那就坚决打倒！不过，我们正在做父亲的思想工作，要他不收租、不索债、不逼田，交出财产，支持农民起来革命。否则，我们将同家里一刀两断！”

肖仙平狼狈不堪。十天以后，他在肖氏宗祠召来各户户长及宗族中有名望人物50多人，妄图利用族规压肖方兄弟就范。肖方利用这个机会，宣传革命，揭露肖仙平利用族长职权侵吞族产，盘剥穷人的丑恶行径，使肖仙平威风扫地。

1927年4月29日，在“四一二”反革命叛变后，肖方不得不转移到豫东南地区从事革命活动。后来多次经过自己家门，但从不回家，真正做到了从思想感情到实际行动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了界限。

红旗卷起农民戟

1926年5月，受党的派遣，肖方同李梯云等到罗田进行革命活动，创办免费的滕家堡平民学校，成立“滕家堡青年协进会”，在工农、青年知识分子宣传革命思想，号召青年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土豪劣绅，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9月，北伐军进入湖北，大别山革命形势不断高涨。滕家堡地区广大农民在省农协特派员何保善以及肖方、李梯云等同志宣传下，纷纷成立农民协会。这里成为罗田全县农民运动的中心。下旬，罗田召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肖方当选为县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10月底，作为中共高（城）罗（田）麻（城）特支书记的肖方，负责鄂豫交界三县的革命工作，指挥收缴了滕家堡反动商团的枪支，建立了农民自卫军。

1927年初，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吓跑了罗田旧县长，党组织决定肖方任罗田县县长。革命群众掌握了政权后，肖方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革命措施：破除封建迷信；取消苛捐杂税；禁止重利盘剥；惩办大地主、大劣绅；清除祖庙会产；实行婚姻自由；打击贪官污吏；等等。农民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开展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肖方将全县划分为12个区农协，由县农协派出特派员掌握，各区农协再派出委员下去组织乡农协。在3个多月内创办两期

“党义研究班”，招收知识青年和农运中坚分子入学，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还成立了“反英运动委员会”，召开了两万余人的反帝群众大会，组织了“反帝爱国演讲会”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以滕家堡市党部名义，收缴了滕家堡反动武装陈伯华商团长短枪十多支，最后发展成县农协的农民自卫军。到1927年夏季，全县农协、妇协、工会、商会等相继成立。

面对农民运动的兴起，地主豪绅又怕又恨，派奸细混入农民协会窃取领导权，甚至用赶走和杀害农会干部的卑劣手段，妄图搞垮农民协会，破坏农民运动。

肖方及时地识破了敌人阴谋，采取断然措施，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1926年12月，固基河及紫云白地区地主、豪绅、流氓等组织假农会，企图以假乱真，破坏农会威信。肖方发觉后，下令立即解散。自上而下地改组各级农会，从组织上保证了农会的纯洁性。

星火燎原大别山

“叫一声农友们，你呀你是听，共产党来了救穷人，农友翻了身。打倒土豪和劣绅，我们当家做主人……”这是20世纪20年代末，金寨地区老百姓经常唱的红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大别山地区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肖方前往加入叶挺的国民革命军，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接着，根据党组织决定，肖方秘密转移到金寨西部的关王庙、银山畈、斑竹园、胭脂坳、墨园、太平山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与中共鄂东特委联系，与贫苦农民、工人、士兵交朋友，在太平山组织党的外围组织“兄弟会”，开展了“五抗”和均粮等斗争。1928年2月，大雪覆盖着大别山区。在斑竹园小河老鸹窝，中共南邑区委诞生了。肖方和李梯云、漆德玮等被选为委员，开展了工运、农运、兵运、筹枪、筹粮、筹款等斗争。不久，商南党组织在穿石庙召开党的干部会议，决定选派党员打入民团，夺取地主民团枪支弹药，发动革命武装起义。

1929年3月13日，中共豫南特委和鄂东特委在光山县柴山保举行联席会议，鉴于商城县委被破坏，商南局势越来越严重，决定先发制敌，立即举行革命武装起义。为便于指挥，豫南特委考虑商南和鄂东接壤，党组织原来与商罗麻特别支部有联系，将商南党组织委托鄂东特委就近指挥。鄂东特委派徐子清、徐其虚、肖方等，把商城南部、罗田北部、麻城东部划为特别区。4月6日，在吴家店太平山穿石庙召开商南各地区党员干部会议，选举产生了商罗麻特别区委员会，书记徐子清，选举肖方等为委员，负责领导商南地区武装起义。

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成立后，鉴于敌清乡日益紧张情况，1929年5月2日再次在金寨吴家店太平山穿石庙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利用立夏节（农历三月二十七）晚上，立即发动商南武装起义。

5月4日晚，一场革命风暴正在酝酿着。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在墨园高氏祠召开商南各支部书记和农民武装组织负责人会议，成立起义指挥部，宣布起义决定，讨论具体行动计划，明确徐子清、肖方、周维炯、徐其虚担任正副指挥，廖炳（秉）国、漆先棣负责通信联络。前线总指挥部设在斑竹园桥口王家下湾。肖方等认为，胜利的关键在于进步民团起义的胜利，多处民团有党员同志作内应，革命武装起义成功是可能的。

根据起义点分散、交通不便等情况，会议对七路起义的行动又作了具体分工。其中，周维炯、肖方、毛月波、漆承楼等负责丁家埠、李集、斑竹园等地起义。

立夏节早上，丁家埠民团头子杨晋阶，到牛食畷消遣。接到周维炯报告杨晋阶在牛食畷老盐店未回的消息，肖方想万一杨晋阶有阴谋，对整个起义将产生不可设想的严重后果。立即带领华尔忠、廖家堂等8人，化装成跑行商生意的，赶到老盐店“住宿”。杨晋阶正和阎九爷等几个阔佬在西厢房打麻将，4个护兵在店堂里赌牌九。深夜，杨晋阶有些睡意，但他的随身警卫仍握着手枪，不离一步。肖方正在着急，忽然警卫出去小便，他立即示意廖家堂跟出去。肖方等冲进西厢房，两支盒子枪对准杨晋阶，命令他举起手来，将其捆绑。阎九爷等吓得呆若木鸡。华尔忠等缴了在店堂里赌牌九的4个护兵的枪。肖方牛食畷活捉杨晋阶的消息不胫而走，方圆几十里的群众听到后莫不拍手称快。

5月9日，立夏节各路起义队伍会师斑竹园，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师长周维炯，党代表徐其虚，肖方任九十七团团团长。第二天，肖方和徐其虚、徐子清、周维炯等在斑竹园文昌宫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形成十条决议，决定扩大红军，发展赤卫队和农协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不久，形成了以吴家店、南溪为中心的纵横六七十里之豫东南革命根据地。后来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百战铸就鄂豫皖

1929年5月16日，王继亚民团和顾敬之民团分两路从狗迹岭、挥旗山向南溪扑来。当晚分驻在南溪吴氏祠和余山土地庙，准备进攻红军。红三十二师得到消息后立即部署兵力迎战，决定先消灭余山土地庙之敌，吸引吴氏祠敌人

来援，各个击破。午夜，肖方等率九十七团摸掉了敌岗哨，向土地庙猛攻。敌伤亡逾半，驻在吴氏祠的王继亚来援。漆德玮率九十八团在上坳迎头痛击，周维炯预备队从左侧攻来，敌人溃逃回县城。红军首战余山之战，挫败了敌人进剿红军的计划。群众歌颂道：“四月初七八，攻打王金牙，王金牙不管打，一打就散花，哎哟哟，缴枪四十八。”

在反“罗李会剿”等斗争和后来的几次反“围剿”中，肖方严格按照上级作战意图，率部转战于鄂豫皖三省的信阳、商城、霍山等几十个县，参与指挥了许多重大战斗，取得了赫赫功绩。

1929年12月25日，红三十二师奉命冒着漫天大雪攻打河南商城县城。商城县城号称“铜墙铁壁、坚不可摧”。肖方建议智取和攻坚相结合，天亮前，分别隐蔽进入预定位置。肖方率九十七团攻西门，九十八团攻东门，特务营攻北门，一百团隐蔽在南门外树林里，待机强占南门。以南门枪响为号，一齐总攻。肖方九十七团战士闵鸿友攻入城内与敌展开白刃战，一连刺死4个敌人。不到3个小时，就攻克了商城，歼敌300多名。

这是红军解放河南的第一座县城。群众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奔走相告：“民国十八春，红军打商城，打得民团乱纷纷，喜坏我穷人。二十五清早，红军计划好，手提油条肩挑草，就把城破了。”

1930年春，鄂、豫、皖的红军为了统一领导，先后将红三十一师、红三十二师、红三十三师改编为第一军一师、二师、三师，肖方任第三师副师长。肖方等率红军乘机大举出击，驰骋于皖西和平汉线地区，先后攻克了霍山、英山等6座县城以及花园、信阳等车站，歼灭了成连营成团旅的正规部队，迅速壮大了红军队伍，其中攻克英山、罗田等县城，都是肖方参加指挥并担任主攻的。

1931年1月，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在商城会师，合编为红四军。2月，在皖西成立中国工农红军中央教导第二师，因为肖方指挥才能和战绩优秀，被任命为师长。教导第二师不久改编为红四军十二师，肖方任副师长兼三十四团团团长。

1931年9月1日，红四军在洗马畈全歼敌十军军长徐源泉的四十一、四十八师两师各一个旅。洗马畈战斗，肖方担任主攻，大获全胜，歼灭敌人近千名。这是他牺牲前参加反“围剿”的最后战斗。这次战役的胜利对于黄、广、英地区苏区的恢复，起了重要作用。

1931年秋，张国焘为了排除异己，借所谓“改造”红军领导，别有用心地大搞“肃反”，于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以莫须有罪名残酷地秘密杀害了肖方，时年24岁。这是党和红军的事业的巨大损失。

（作者：李业坤，原载《铁军》2019年第4期。）

大别山永恒的桂花

——记安徽省金寨县袁大桂烈士

袁大桂，金寨县古碑七邻湾人。西镇武装暴动后，她参加农民协会、妇女会工作，被选为霍山县六区苏维埃常委。她积极组织妇女做军鞋，慰问红军，成绩显著，多次被评为县、道区模范工作者。1932年10月，主力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战略转移后，她在掩护伤病员时被捕，为了党和红军的事业，为了苏维埃政权，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袁大桂出生在七邻湾一个贫农家庭，17岁就被迫出嫁，丈夫因病去世，后来改嫁。袁大桂性格开朗，宽厚善良，蔑视权贵，辨明善恶，从不贪恋荣华富贵，也不恪守封建礼教。参加革命后，任霍山县六区苏维埃政府常委。由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经燕子河地区西去川陕战略转移。袁大桂因病不得不留在家乡坚持斗争，最后不幸落入燕子河地方的恶霸地主余景高之手。

1929年冬，燕子河地区党组织在红三十二师的有力支持下，西镇成功暴动，成立了六区苏维埃政府。37岁的袁大桂毅然决然走出家门，积极参加了革命武装起义，打土豪、分田地，成为拥军优属的积极分子，还担任了拥军慰劳队长。走到哪里，她就在那里替红军家属挑粪、播种、插秧、打场、栽菜，什么活都干，还主动地向乡亲们宣传红军和苏维埃的好处、拥军的光荣、革命成功后的美好未来。因此，群众都十分喜爱和尊敬她。

1930年4月初的傍晚，春寒彻骨。红军队伍夜晚露宿在袁大桂家门的草堆边、山坎上。他们穿着破旧衣服，瘦骨嶙峋，但却又说又笑，又拉又唱。看到很多红军还只是十几岁的娃娃，有的脚板打起了一层层血泡，有的脚后跟裂开了一道道血口子。袁大桂非常心痛，仿佛小战士脚上的伤口和血泡是在自己身上一样。她把自己想为战士编草鞋的想法告诉了慰劳队的姐妹们。大家都说，一定要保护好红军的脚板，让他们走得稳，跑得快，多消灭敌人，多打胜仗。她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家编草鞋，还鼓励红嫂们多做草鞋，到每个山村收草鞋，

给红军送草鞋。她还编了《草鞋歌》等很多歌谣，在群众中教唱：“我编草鞋为哪个哟，送给红军好哥哥；红军穿上布草鞋哟；打击敌人多利索。布草鞋，厚登登，编双草鞋送红军，草鞋虽轻情意重，它是姐妹一颗心！”

在编、收草鞋的过程中，袁大桂饿了，咬几口红芋、玉米馍馍；渴了，捧一手山溪水；病了，也顾不得休息。红军战士们都亲切地称她为“草鞋队长”。

每当“草鞋队长”来到红军宿营地时，红军队伍就一片欢腾，端凳的，让座的，递水的，盛饭的，像迎接久别归来的亲人。袁大桂顾不了这些，连声说：“不要水，不吃饭。我要大家换双新草鞋，准备打胜仗！”她还向红军讲一段段群众生动的拥军故事，和群众一起边唱边跳《八月桂花遍地开》，红军战士战斗情绪更加高涨。然后，在一片亲切的呼唤和热烈的掌声中，大桂又迈开大步，翻山越岭，继续去完成新的编收、交送草鞋任务。

看到她每天清晨出门，夜半归来，丈夫刘本安总是煨着一罐玉米糊等候着她。一天晚上，她吃完玉米糊，将粗泥碗一推，又忙着拿针穿线，为红军又赶做布草鞋。在摇曳的梓油灯光下，看着妻子疲惫的脸色，疼爱地说：“大桂，你瘦多了。受得了吗？”“没事的。”大桂总是笑着。看着妻子强忍着极度的疲劳做军鞋，刘本安被她的精神感动了。他拿出前几天大桂熬通宵、密针细线给他做的一双老土布袜交给大桂，说：“这是你的心血，也是我的一份心愿。我捐了，送红军穿吧！”

1930年下半年，大桂入党了，并担任了六区苏维埃常委。她的担子更重了，也更忙了，但她并没有放弃“草鞋队长”的责任，同时兼任了红军伤病员的护理工作。当时，环境极为艰苦，红军和白区相交，往往是三步一岗，一沟几岗，没有固定的界线，双方“拉锯”，战斗频繁，红军伤亡很多。伤员们住的“病房”，十分简陋破旧。大桂替伤员包扎伤口，端水喂饭，洗涤沾满脓血陈迹的鞋袜衣物等，服务十分周到细心。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不得不撤离苏区了。当时，要求各地基层干部火速“裹队”，也就是在哪里赶上部队就紧急随军行动。

由于长期积劳成疾，日晒夜露，袁大桂患上严重的眼病，眼睛几乎失明了，无法随军转移，只得留下坚持战斗，隐藏在杨家湾的贫农大嫂万爱萍家中。红军主力走后，敌人蜂拥窜入根据地，残酷血洗苏区。燕子河恶霸地主余景高，纠集地方反动势力，成立伪十区办事处，横行乡里。10月的一天，万大嫂正在用沙罐煨鸡，给病重的袁大桂补补身子。突然，余景高手下的一群匪徒破门而入，将袁大桂逮走了。

“刘家嫂子，受惊了！”余景高假惺惺地嘿嘿一笑，“你留下来就好，改恶从善，既往不咎。”“就你一个？不会吧，听说还有不少伤病员，他们在哪里？”

只要你说了，我们一概以礼相待。嘿嘿，都是地方人嘛！”

袁大桂一声不响，高昂着头，望着崇山峻岭和遥远的长空，心里祷告着：“红军伤病员啊，你们更快地走远吧，不能再落入这般野兽的魔掌啦……”

余景高凶残地说：“嗯，刘家嫂子，快说嘛。”

“说什么？说红军在哪里吗？！”“竹子有多少，山有多少，红军就有多少！”“桂花花瓣有多少，红军就有多少！”

余景高原形毕露，采取一系列残酷刑讯。袁大桂从容坚定，不屈不挠。她总是回答：“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坏蛋，不可能知道红军的秘密！”

余景高气急败坏，像疯狗似地大声嘶叫：“来人，我要看看这个红匪婆子有多少秘密！”

匪徒们如狼似虎，应声将大桂捆绑在圆柱上。“打，狠狠地打！”棍棒齐下，急如雨点。她不呻吟，不低头。衣服破了，血肉模糊了，大桂昏迷了过去。

匪徒们的手嗦嗦发抖。余景高露出了野蛮的狼性，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赤化的女人，难道是铁打的？”说着沮丧地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

余景高走了，他们去和刘氏族长刘良伦密谋更阴险毒辣的手段。刘本安以同族的情分向刘良伦哀求，要求保释袁大桂。刘良伦大怒：“你留匪婆子干什么？要活命，拿五百大洋来！”

袁大桂知道后，坚决不同意丈夫的做法。她舍生忘死参加革命，深知家中很贫穷，哪有积蓄？

第三天，快近黄昏的时候，匪徒们赶来许多老百姓，刘良伦也来了，余景高站在台阶上，阴阳怪气地说：“父老兄弟们，乡亲们，休怪我余某不仗义。做个善良老百姓，安分过日子，多好呀！你们看看，这个刘家媳妇，不安守本分，跟共产党瞎跑，落得这种下场。哪个再不安分守己，就和她一样！”人群一阵小小骚动，人们暗暗骂道：“这般禽兽，总有一天红军会回来剥掉你们的皮！”

刘良伦装模作样地说：“乡里乡亲的，这是我刘门不幸，这个匪婆子，玷污了我老刘家祠堂，我要用烈火来清洗污痕。来人，照规矩办！”

其实，敌人在设计着更为惨绝人寰的酷刑。一次，二次，三次……最后，袁大桂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敌人无可奈何，兽性大发，把她拖到乌龟墩大桥边的河滩。她一路上不停地怒骂敌人，用尽最后一点气力高呼：“你们今天杀了我袁大桂，后面还有很多袁大桂战斗着！”伴随着“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响彻在燕子河的上空，袁大桂壮烈地牺牲了。

（作者：李业坤，原载《皖西日报》2017年10月9日。）

余品英：坚贞不屈的女英雄

余品英，金寨沙河人。1929年5月6日商南地区立夏节武装起义后，余品英毅然冲破封建世俗观念的禁锢，积极主动地加入打击土豪劣绅的行列。不久，她被吸收参加沙河乡苏维埃妇女会工作。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她积极动员和组织妇女做军鞋，照顾红军伤病员，为支援部队作战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推选为沙河乡苏维埃党委宣传委员。

余品英诚挚热情，自编自唱山歌，深得乡亲们的喜爱。她负责三区的教育和扫盲工作，自编教材、自己兼课，多次受到县苏维埃的表扬。

1930年春，余品英担任区委宣传部部长，负责全区的教育和扫盲工作。在她的努力下，全区6个乡，很快都办起了小学，有些边远村庄，还办了夜校、识字班。

为了解决师资不足的困难，余品英除了自己兼课外，还办起了师资培训班。她要求各乡苏维埃安排教师生活，使其田有人耕、地有人种、柴有人打。这样，教师们就安心工作了。三区的教育工作经常受到县苏维埃的表扬。

余品英办教育还善于发现问题，并及时想办法解决。有一次，她发现上夜校的学员们听课时都在下面打瞌睡。她马上找一个学员问：“为什么不听课？”学员说：“老师教我们念的句子，我们一个字也不认识。”

余品英得知这个问题后，便和老师商量，编了一些常用词语识字课本。如“中国共产党”“农民协会”“财主”“穷人”“男女平等”“减租减息”等。从字义到词义，结合宣传党的政策，引导大家识字，提高阶级觉悟。这样，有效地提高了大家上夜校的积极性。

余品英还发现，参加夜校学习的妇女很少。她通过了解，得知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妇女家务重，走不开；二是受封建思想影响，认为识字没有用处；三是父母、丈夫、公婆们不放心，怕学野了心、走邪了路。余品英认为，妇女历来都被当作是家庭的附属品，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如果妇女再不读书识字，那何时才能翻身解放？于是，她召开各乡苏维埃妇女干

部会议，把动员妇女上夜校作为解放妇女的一项任务来抓。经过宣传动员，各乡妇女中很快掀起上夜校的热潮。

1931年夏，我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敌人为了报复，经常出动飞机在苏区撒化学毒剂。很多人皮肤感染溃烂，有些人中毒死亡。

这时，余品英已调任豫东南道委常委兼妇女主席。她看到群众遭受如此痛苦，心里十分难过。一次，道委讨论治愈群众中毒感染问题，分管医疗工作的同志提出，治疗这种感染一定要用一种德国生产的抗菌素。这种药，只有到白区去买。但当时到白区的道路都被敌人封锁，无法通行。余品英便提出，由她亲自去商城县城找仁济药房老板王泽芳。组织上开始不同意，怕她一个女同志出问题。余品英说：“正因为我是个女同志才容易活动。”组织上被她说服了。

一天，余品英化装成一个卖柴的村姑，和一个老交通员潜入到商城县城。为了试探敌人的搜查方式，余品英开始并未到仁济药房买药，而是买了一些日用杂货，同老交通员来到县城南关哨卡。他们发现哨兵们对穷人查得很仔细，而对阔绰的男女，不但不搜查，还点头哈腰，施礼放行，这给了她很大启发。她立即找到仁济药房老板王泽芳（王的两个本家弟弟都是共产党员），说明来意后，得到王泽芳的大力支持，买到了一些德国产的抗菌素。余品英化装成一个阔少妇，老交通员化装成佣人，雇了一顶大轿，把药装在皮箱里，放在轿座下面，坐着轿子，向城门南关而来。到了哨卡，敌人刚要掀轿帘，就被余品英大骂一顿，敌人吓得直点头，乖乖地让她出了城。

余品英就是这样神出鬼没地往返于敌占区，不但买回了大量药品，还购买了很多急需的军用物品，解决了苏区当时的困难。

1931年秋，为了配合红军主力进行第三次反“围剿”，豫东南道委命令余品英和道委直属独立团第五营营长夏学山带两个排的兵力，开展游击战争，相机打击敌人，保卫苏区人民。

一天，余品英得悉敌人在胭脂、河坪、鸡蛋坪一带疯狂屠杀我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便决定和夏营长前去营救。不巧，中途和敌五十四师一部相遇，他们多次冲锋，均未击退敌人。余品英考虑到我军子弹缺乏，不能恋战，便命令夏营长率部向右侧山峰突围，她带领警卫员李承贵负责掩护，夏营长坚持由他掩护，要余品英带队突围。余品英严肃地说：“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你要服从命令。”夏营长拗不过，只得服从，带着部队向右侧山峰突围。

余品英立即攀上一棵大树，向敌军连开数枪，并高声喊道：“白军们听着，我们是红军游击队，希望你们只和我们交战，不要残害黎民百姓。你们也是人，要讲良心，屠杀自己的骨肉同胞是历史的罪人，不算好汉！”喊罢，又连发数枪。敌人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和枪声，立即扑了过来。

余品英很快溜下树，和警卫员小李藏进一个深沟石洞里，敌人嚎叫着搜了一阵，连人影也未见到，只得离去。

晚上，余品英带着小李摸回娘家。可是，家里被敌人糟蹋得一片狼藉，空无一人。余品英正想找点吃的，一个连的敌人包围过来，一部分敌人已窜到门口，她顺手提起一个火炉，向窜进门的几个敌人砸去，果然有效，敌人被眯了眼，呛得直咳嗽。余品英迅速拉着小李跳出窗子，潜入山林。敌人又扑了个空。

1932年秋，我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主力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国民党敌军30多万人，乘虚直入，整个苏区一片白色恐怖。道委指示余品英和夏营长带领一部分逃难群众向深山转移。然而，当他们来到椿树坳的山岭时，被敌人包围了。

狡猾的敌人怕搜山挨黑枪，便采用“火搜”——放火烧山的办法。熊熊烈火从四周直向战士们和逃难的人群扑来。

“突围出去，不能坐等烧死！”余品英和夏营长商量之后，决定各带一个排战士，将逃难群众分成两组，向东西两个方面突围。可是，余品英还没有走出一个山梁，就有退回的战士向她报告：夏营长受伤被俘了，战士们大部分壮烈牺牲，逃难的群众也多被敌人打死和抓去。余品英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义愤填膺，复仇的火焰在她胸中燃烧。她向战士们高喊：“同志们，为人民报仇的时刻到了！”说罢她便命令一个班长继续组织群众突围，自己则率二十多名战士冲出火焰，杀向敌群。血战半个小时，战士们大多倒下了。她正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时，被从后面窜过来的两个敌人抱住了。

敌人对余品英、夏学山进行审讯，每次都是严刑逼供。可是，任凭敌人如何凶残，这两个坚强的战士什么也不说。最后，敌人要他们自首，也被他们严词痛斥。

余品英悲愤激昂地说：“不要啰嗦！你们任何手段都吓不倒共产党人。我等着你们这一着！”敌人无计可施，最后将余品英杀害。

年仅22岁的余品英，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作者：胡遵远，原载《皖西日报》2019年3月11日。）

革命展旗人 视死忽如归

——大别山区革命烈士毛绍成的故事

毛绍成，又名展旗，安徽金寨吴家店镇包畈人。1927年参加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积极领导妇女参加革命斗争，并任中共赤南县委妇女部部长。在保卫苏区的艰苦斗争中，她多次组织妇女干部深入前线开展宣传慰问活动、护理伤病员，支援红军作战。因其工作出色，多次受到县委和红军领导的表扬。

农家女子早觉醒，带领乡亲闹革命

毛绍成1903年出生在吴家店镇包畈村（时属商城县南乡）的一个贫苦家庭，她是一位思维敏捷、性格开朗的姑娘。常因衣食不得饱暖，愤恨世道不平，痛骂地主老财对贫苦百姓的剥削和压榨。

毛绍成在23岁这年夏天，听说斑竹园、佛堂坳一带，贫苦农民联合起来办农民协会，向地主豪绅和官府衙门抗租抗税，闹得很热火。她心想：真要是穷人都一条心和富人作对，那就好了。穷人这么多，就不怕富人欺压了。为了弄清情况，她特意到斑竹园一个亲戚家探听虚实。当她亲眼看到农民协会开大会，要地主老财减租减息时，激动得直流眼泪。她回到家里，到处宣传斑竹园穷人办农会、要地主减租减息的新鲜事。毛绍成的父母都是忠厚老实的庄稼人，怕她惹事，总是不让她出门。毛绍成说：“你们怕了一辈子的事，到现在不还是穷得叮当响？你们怕，我不怕，杀头坐牢我一人承担！”毛绍成的父母没办法，只得由着她。

当时在毛绍成家乡以教书为掩护的共产党员晏人凤和漆承文两人，见毛绍成敢于革命和斗争，便常找她到学堂去，教她认字，向她讲解革命道理，教她出面组建农民协会。毛绍成得到指点后，信心更足了。经过她反复宣传动员，农民们慢慢地觉悟起来。到第二年夏天，在毛绍成的家乡、一个偏僻的山村

里，掀起了大办农协会的革命高潮。毛绍成经常在各种农民集会上，演讲穷人受剥削、受压迫的痛苦，揭露地主老财压迫剥削穷人的罪恶，并动员妇女铲除封建思想，冲出封建礼教，实行男女平等，报名参加农会，和男同志一起闹革命。乡亲们都夸赞说：“没想到毛绍成这个穷家女子，竟然有这般胆识和才能！”党组织看到毛绍成立场坚定、工作积极，第二年春天便接收她加入了共产党。

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

张品清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恶霸地主，他对毛绍成宣传革命道理、领头创办农协会非常害怕，成天在屋里骂，并威胁说，要到县衙告她聚众为匪、扰乱乡里，扬言要把参加农协会的人都弄去坐大牢，并派人挑拨农协会干部之间的关系。其他一些地主老财也跟着起哄，散布攻击农协会的言论。以至于有些胆小的人害怕起来，有的要退会，有的不敢参加农协会活动。毛绍成得知张品清破坏农协的消息后，极为气愤，决定打击张品清一下，以便杀一儆百！一天，毛绍成带领乡农协会30多名会员，来到张品清家，把张品清捆了起来，要他交待攻击破坏农民协会的罪行。张品清开始还想抵赖，毛绍成立即要几位受他挑拨的会员，当面揭发他的罪行。张品清无法抵赖，只得老老实实地交待了破坏农协会的罪行，被罚退出三年的租课。其他地主豪绅见张品清被罚了，都吓跑了。毛绍成便趁势发动农协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组织妇女会、儿童团反对包办婚姻、反对封建迷信活动，推动了革命形势的顺利发展。

1928年夏季，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到了吴家店，县委指示各地党组织积极筹粮、筹款、筹枪，准备武装暴动。

急中生智慧，化险为平安

由于我党活动频繁，引起了商城县衙的警觉。他们一方面设密探，派清乡队查找我党的组织；一方面鼓动地方绅士招兵买马，拼凑反动武装，镇压农民运动。中共商城南邑区委为了不至于使武装暴动这一大局受到影响，便命令各地党组织隐蔽活动，积极为武装暴动作准备。当时担任支部委员的毛绍成同志被分配负责组织联络和消息传递工作。

一天清晨，毛绍成和弟弟到民生堂药店（党的地下联络点）以抓药为由送情报，没走几步，就被几个清乡的匪兵盯住了。毛绍成送的是一份议定起义时间的重要情报，如被敌人搜去，将对整个起义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毛绍成看

着弟弟，忽然急中生智，装着打弟弟的样子，将情报塞在弟弟裤腰里，叫弟弟将情报安全送到民生堂。敌人拦住毛绍成搜遍了她全身，啥也没搜着。毛绍成反守为攻，将匪兵们大骂一顿，并说要报告敌人长官，告他们行为不轨，青天白日拦截妇女，吓得匪兵们直向她说好话。

一夜春风来，革命红花开

1929年5月6日立夏节，根据区委指示，毛绍成的家乡以镇压张绪清、张品清等10个地主的革命行动为标志，举行武装暴动。

下午，毛绍成将暴动任务分别详细通知各党小组和乡农会领导成员，晚上，全乡统一行动，支部书记晏人凤和毛绍成等带领数百名手持大刀、长矛的农协会员，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分头镇压了张绪清、张品清等十个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第二天早上，乡农协会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农民武装暴动的胜利。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千家万户，男女老幼拍手叫好。

同晚，斑竹园、南溪、丁家埠等地武装起义都获得了全胜。5月9日，各地起义队伍在斑竹园朱氏祠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打土豪、分田地，开创根据地的斗争，革命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

英勇无畏跳悬崖，宁死不屈见忠贞

1931年夏，红军取得了第一、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根据地得到了迅速发展。毛绍成调升为赤南县委妇女部部长，领导全县妇女开展拥军、支前工作，经常受到县委和红军领导人的表扬。

1932年秋，第四次反“围剿”失利，主力红军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赤南县委机关不得不转入地下开展活动。因毛绍成是女同志、便于行动，县委机关文件全部由她负责保存，经常来往于敌人空隙中，探听敌情，传递指示。

敌人知道毛绍成是我党重要干部后，曾采用追踪、坐探、收买叛徒等办法抓捕毛绍成。一次，毛绍成回家看望病卧在床的父亲，父亲对她说：“外面风传敌人正在用大价钱买你的人头，你可要小心啊！”毛绍成说：“敌人逮不到我，就是逮到我，为革命牺牲也是光荣的，也算您老人家没有白养我一场！”父亲微笑道：“你不愧是我毛家好后代，但总是小心为好。”毛绍成说：“爹，你放心，群众都向着我们！”

敌人的嗅觉也很灵敏，由于坐探告密，毛绍成到家第二天，国民党的一个连就将毛绍成住的村子包围了。毛绍成刚把文件包放在一块大石板下藏好就被

捕了。

敌人开始采取软办法诱降，要毛绍成交出县委成员名单和活动的地方，遭到她的痛斥和拒绝，接着就用酷刑摧残，皮鞭打、杠子压、灌辣椒水，所有刑具都用遍了。毛绍成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是敌人想要的一点东西也没捞到。

一天清晨，敌团长亲自审问毛绍成，她想：这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我死，也不能死在敌人枪口下。便对敌团长说：“好吧，你们也不用费神了，我有一包文件和一支枪，在一个山崖里藏着，我带你们去取吧。”敌团长欣喜若狂，命一个连长带一个排，跟毛绍成去取。

她带着几十个荷枪实弹的匪兵，来到一个悬崖上，指着悬崖下的深潭，对匪兵们厉声说：“到了，你们松开我的手，我带你们下去拿！”

敌连长走到崖边，伸头往下一看，心想这么陡峭的石崖，下面又是个深潭，你插翅也难飞。便命令匪兵给她松绑。

毛绍成向自己留下战斗足迹的山山水水端详了一阵，便使尽全身力气，纵身向崖下跳去。敌连长见状惊叫起来，向崖下连发数枪，但并未打中毛绍成。毛绍成坠入深潭，未被淹死，又被急流冲出水面，结果再次落入敌人魔掌。

面对生死志亦坚，正气凛然敌胆寒

敌人仍不甘心失败，派一个匪婆化装成囚徒，和毛绍成“谈心”，妄图套出我县委活动的去向，被毛绍成识破后，遭到毛绍成一场大骂。敌人又派人向毛绍成游说，劝毛绍成投降，又遭到痛斥。敌团长恼羞成怒，骂毛绍成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又对毛绍成进行百般摧残。毛绍成说：“什么刑罚我都不怕，就等你们一颗子弹！”敌人说：“一颗子弹太便宜你了！”便命喽啰们端来一盆熊熊的炭火，里面放了两把烧红的火钳。他对毛绍成嚎叫道：“给你最后一个机会，现在交出共产党的情况还不迟。要不就叫你吃红头点心。”可是不管敌人如何叫喊，毛绍成一直一言不发。她的全身都被烙得皮焦肉绽，但是她强忍着钻心的疼痛，咬紧牙关，不叫一声。敌人无计可施了，用乱刀砍死了毛绍成。

就这样，大别山的好女儿、英勇的红军战士——毛绍成，为了革命的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

（作者：胡遵远，原载《中华魂》2019年第4期。）

“红小鬼”敌营虎穴传情报

廖业红是红四方面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的妹妹，14岁参加红四方面军少共国际团，任话务员。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时，被国民党十四军四十二师俘虏。师长陈玉阶看她还是个孩子，满脸稚气、眉清目秀，只是随便审问了一下，便把她留在师部卫生队，要她学医，将来好给自己当护士。陈玉阶的老婆也姓廖，叫廖华琼，是少校军医。她见廖业红性情温和、手脚麻利，便把她留在自己身边，一面当勤务员，一面教她学医，并要廖业红叫她姑姑。廖业红想，既然落入敌人魔掌，就得暂时委屈一下，只有找机会跑出去，才能回到红军队中去。她对学医很有兴趣，很希望将来在红军队里当一名医生，为伤病员们疗伤治病。所以她除了侍奉廖华琼、跟廖华琼在卫生队护理伤员外，就是抓紧一切时间读医书，并经常向廖华琼询问一些她不懂的问题。廖华琼很喜欢廖业红的勤快和好学精神，关系越来越融洽，连廖华琼的卧室也让廖业红随便出入了。有一次廖华琼在卧室给廖业红讲课，陈玉阶进来很不满意，又是踢凳子，又是摔东西，廖业红很识时务地退出来了，清楚地听到陈玉阶批评廖华琼：“别看她年纪小，她可是个红军俘虏啊！这屋里有很多机密文件，要是叫她知道了，万一捅了出去，可要误大事！”廖华琼也不高兴地说：“什么红军，十几岁的孩子，我还准备收她做女儿哩。她只要跟我学三年，肯定是个好医生。”

陈玉阶说：“我是个军人，我的天职告诉我要百倍警惕！”

廖华琼也不示弱地说：“你神经过敏，只知道你的天职，就不懂得一点人性，我看业红这孩子不像你们经常说的红军那样野蛮！”

后面的激烈争吵，被一个来报告的副官打断了。但廖业红从当晚给廖华琼打洗浴水和整理被褥时观察，廖华琼对她仍亲密如常。廖华琼还摸摸她身上穿的衣服说太单薄，拿出一件毛衣，要她穿上。

发现秘密，开弓得手

廖业红听过廖华琼和陈玉阶的一段争吵后，知道了一个重要情况，就是陈玉阶屋里有很多机密文件。廖业红心想：机密文件肯定是作战的内容，要是能了解一些送给红军，该有多好啊！从此，廖业红除了潜心钻研医学外，就是想办法看到陈玉阶的机密文件。但这些机密文件放在什么地方呢？只能趁做勤务时，才能进到陈玉阶卧室，进去时也不敢乱看，只能随时留意。她发现有几个放衣服的柜子没上锁，她还帮廖华琼拿过几次衣服，只有一个柜子上锁，只看见陈玉阶和他的机要科长开过一两次，柜门上还印有国民党党徽。廖业红心里有数了，心想：你陈玉阶就是一只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我要耐心地等着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一天晚上，廖业红正给廖华琼送洗浴室，只见刘副官慌慌张张进来，向陈玉阶耳语几句。廖业红知道有紧急军情，陈玉阶要廖业红给他灌热水袋子。廖业红知道这是陈玉阶有意把她支开。她退出室外，想在室外听听，那个刘副官很谨慎也跟着出来了。凭廖业红的直觉，刘副官是防止屋外有人偷听。廖业红怕引起怀疑，随机应变地说：“师长叫我给他灌热水袋子，我忘了拿，刘副官，麻烦你进去帮我拿一下。”刘副官进去拿了热水袋子出来，廖业红接过后迅速到司务室灌了热水，很快又轻脚轻手回来了，躲在门外偷听刘副官和陈玉阶讲话。虽然话音很小，廖业红还是断断续续听到了一些，好像是上级有什么紧急命令，又听说“大孤山……明天上午9时全师统一行动……”廖业红顿时明白：大孤山是省委机关所在地，又是红军后方弹药、给养秘密储备的地方，万一被敌人毁了，后果不堪设想！必须设法把情报送出去，否则省委和红军军需将受到巨大损失！

廖业红正在沉思，刘副官开门出来，廖业红猛然醒悟，慌忙上前和刘副官撞了个满怀。廖华琼听门外有响动，也来观望，廖业红说：“姑姑，你看刘副官差点把我撞栽倒了！”

陈玉阶也很警惕地出来问廖业红：“你什么时候来的？”

廖业红说：“我装好热水袋，刚到门口，就被刘副官撞了一下。”说罢将热水袋递到陈玉阶手里：“师长，你试试热不热，不热，我再去重灌！”

陈玉阶接过热水袋，左手换到右手说：“热，蛮烫的！”他听说廖业红回来，便放心地说：“你去休息吧，晚上没事了！”

廖业红说：“姑姑说今晚还要给我讲课呢！”

廖华琼说：“今晚不讲了，你把原来学的好好温习一下，明晚再讲。”

廖业红心想：我哪能叫你再讲课啊，我要想办法尽快把情报送出去！

委托药农，星夜传书

廖业红回到卫生队，假装温习功课，心里想着如何送情报出去。经过反复思索，终于想出了一条路子。师部不远处住着一个老药农，那一天，她和廖华琼上山采药，就是他带的路。廖业红认为这位药农是可信的，要是请他送情报或许有把握。时间不容她多考虑。她想：万一老药农将她出卖了，牺牲就在眼前，也是死得其所。她看看时钟，已经快10点了。她想：这儿离大孤山有100多里路，再迟就来不及了。但用什么理由出去呢？她想：这正是为革命献身的时候，冒再大的风险，也要把情报送出去，一点也不能再犹豫了。廖业红出了卫生队，经过师部门口的哨位时，对哨兵说：她奉廖医官命令，要去药农家寻一味急用中药，廖医官等着用。哨兵知道她和师长夫人的关系，也未加阻止。廖业红一路小跑，直奔老药农家，掏出积攒的两块银元，向老药农深鞠一躬说：“老伯，我有一件紧急的事要拜托你老人家！”

老药农说：“姑娘，什么事这么急，你尽管讲，是不是缺什么药了？”

廖业红说：“老伯，我相信你，我什么也不怕了，我原来是红军战士，在两个月前的一次战斗中被四十二师俘虏了。师长太太和我同姓，看我是个孩子，叫我给她当勤务，跟她学医。但我天天都想回到红军中去，可是没有合适机会，人生地不熟，不便轻易行事。我今晚得到一个重要情报，四十二师明天上午全部出动，围攻大孤山。那里是我们的省委机关，又是红军后方军需储备库，万一省委没有准备，那就是大灾大难。大伯，你要是想发财，就把我抓住送给陈师长，马上就会得到大把银元奖赏；你要是想帮红军一把，烦你将这个情报连夜送到大孤山。”说罢把写好的一张纸条递给老药农。

老药农好像不认识廖业红似的，反复沉思，约有一刻钟没有吱声。廖业红等得忐忑不安。老药农终于开口了：“孩子，我也相信你，你要发财也可以说我是红军坐探，向陈师长报告，马上也可以发财升官。”说罢，推开廖业红一只手递过来的两块银元，接过了廖业红另一只手中的纸条，塞进袜筒里，说：“钱，我见过，不要。这纸条我收下了。放心吧，我一定在明天中午前送到。不瞒你说，我两个儿子都是红军，这件事我一定办好！”说罢，立起身来，腰里插了一把砍柴刀，说：“姑娘，你也回去吧，不要引起敌人怀疑，我这就上路了。”

廖业红说：“老伯，我真想跟你一起回到红军里去啊！”

老药农说：“这万万使不得，万一敌人发现了，我们不但都走不了，还会

出大乱子。我去向红军首长报告，你继续在敌人那里干，兴许以后有更大用处哩！”

廖业红点头称是，老药农立刻消失在夜幕中，廖业红也顺利回到卫生队。

当天夜里，廖业红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好像听到部队有什么行动，她装着出来上厕所，确实看到有不少人骑马来来往往，电话铃也不断发出阵阵响声。

有惊无险，夹缝生存

第二天上午8时，一阵紧急集合声，敌四十二师除留一些后勤人员外，全部开拔了，廖业红来到廖华琼处装着很害怕的样子，问：“姑姑，部队都走了，就剩下我们这些人？”

廖华琼说：“别怕，你还当过兵哩，这是军队里常有的事，他们是外出训练，明天就回来！”

廖业红真是度日如年，这一天是她最担心的一天啊！万一情报不能及时送到，误了大事，如何是好啊！

第二天半夜，部队开回来了。陈师长一进屋，便大发脾气地骂道：“妈的，红军真鬼得狠，害我们扑了个空，回来时，后卫部队还遭到红军伏击，损失了100多人！”

陈玉阶看廖业红在屋里，不便发作，便一下倒在床上出大气！

廖华琼上前帮他盖好被子说：“你好好休息一下，打仗总有胜有败，不就损失了百多人吗，值得这么生气？”

陈玉阶说：“损失几百人没事，我觉得事情很奇怪，我们去时，红军锅里饭还是热的，他们哪里得到的情报，跑这么快？”说罢，坐起来要喝茶。廖业红很麻利地泡了一杯茶递上，陈玉阶看了廖业红足有一分钟才接过茶，好像要从她脸上找出答案似的。

廖业红装作姑娘害羞似的，低下头。她倒不怕敌人看她，而是怕有一点失态，引起麻烦。她暗自庆幸这次的成功。更想着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成功！

第二天上午，廖业红想到老药农家去听听老药农是否带回什么任务，便对廖华琼说：“姑姑，我想研制一种止血的中药，上次采药我膝盖跌破，老药农扯一把名叫‘断血流’的中药草给我敷上后，效果很好，我想把它制成粉剂。如果能成功，不但使用方便，还能节省一些药费开支。”

廖华琼很欣赏廖业红的创造精神，说：“我在医学院读书时，就听说过有

这种中药，但没有看见过，更没有使用过。我们一道去找那位老药农访问一下，如果本地能采到，当然是件大好事。”说罢，就要和廖业红一起走。廖业红心想：带上这么大个尾巴，怎好和老药农说话呢？但事已至此，只好见机行事。她俩来到老药农家，廖业红向老药农介绍说：“这是上次和我们一起采药的廖医官，她想问问老伯上次给我止血的一种叫‘断血流’的中草药，能否大量采集？准备制成中成药，想请老伯帮忙。”

老药农见到廖业红很高兴，但看跟着她来的一位官太太又很讨厌，便说：“你们用的都是洋药，要这种野草有什么用？”他想把这位官太太支走，找机会专门和廖业红谈话。

廖华琼说：“中草药是我们祖国医学宝库中的精华，我们想研制一种止血的粉剂，临床试验一下。”

老药农灵机一动说：“你们要是真想要，下午叫这位小姑娘来，我带她去找一点你们试试。”说罢，用眼睛示意廖业红赶快把廖华琼带走。

廖业红会意，便说：“姑姑，下午我来跟老伯伯上山采集好吗？”廖华琼连声说好。下午廖业红来到老药农家，老药农很亲切地引她到屋里坐下，又到外面看看没人，便进屋来，说他是第二天早上将情报送到的。省委领导非常重视，当即命令机关人员全部转入深山老林，文件和军需物资全部坚壁起来，说请廖业红放心，还说要给她记功。但要她十分警惕，不要让敌人抓住把柄，所以省委也未写回信，只是叫老药农带口信，并让告诉廖业红附近杨树梢开饭店的刘老板也是地下交通员，有重要情报交给他也行，暗号是“只吃馒头，不吃油条”。老人越讲越兴奋，并说打听到了他的两个儿子的部队，大儿子已当上了红军连长。廖业红也很兴奋，感到有这么一位可信可敬的慈祥老人作联络员，实在太好了。说了一会话，老药农便带廖业红上山扯了一把“断血流”给廖业红说：“这种草药山上到处都是，你赶快回去，不要引起敌人怀疑。”

廖业红带着“断血流”药草回到卫生队，便出了她意料不到的事：特务连两个持枪的士兵将她带走了，等待审讯她的正是敌师长陈玉阶。廖业红刚进屋，陈玉阶便拍着桌子喝道：“你个黄毛丫头竟敢在我这里盗窃情报，你说，你怎么把情报送到大孤山的？”

廖业红见状不好，但仍然冷静地说：“师长说的事，我一点也不明白！”

陈玉阶又拍桌子喝道：“好，你还敢装佯！”

原来廖业红那天晚上经过门口哨位到老药农家去的事，叫特务连长看到了，他问门口哨兵，哨兵说是廖太太叫她去老药农家寻什么单方，所以没敢阻拦。大孤山“围剿”扑空后，特务连长对廖业红那天外出产生了怀疑，便把情况报告了陈玉阶，陈玉阶又问廖华琼有没有此事，廖华琼说没有，故而陈玉阶

认为那晚和副官讲话被廖业红听见，大孤山情报是廖业红通过老药农送去的。

陈玉阶正审问廖业红时，老药农也被抓来了。廖业红已经完全明白，感到欣慰的是情报送到了，省委和军需物资避免了损失；但她又感到痛心，连累了老药农。她想，必须尽量保护老药农，自己牺牲。

老药农看廖业红正在被审讯，已明白了八分，他也感到为红军办了一件大好事，死而无愧。可惜廖业红小小年纪，死得太早了，便没等陈玉阶审问就说：“长官找我可是因为向大孤山送情报的事？要为这事，你们就不要烦神了，情报是我送的。”

陈玉阶问：“你还诚实，但你必须交待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围剿大孤山的！是谁向你透露的？”说着，两眼盯着廖业红。

老药农说：“你们那天晚上打电话，我在后山上听到的！”陈玉阶大怒说：“你胡说！我们打电话又没说要围剿大孤山红军，你这瞎编，能骗过谁？！”

老药农说：“我是听你们打电话说什么大孤山大孤山的，我儿子他们就在大孤山当红军。所以我估计你们是要围剿大孤山。信不信由你们！”说罢，一头撞在门前的石柱上，气绝身亡！

廖业红看到老药农悲壮就义，心里十分疼痛，她知道这是为了保护她而死的。

廖业红见敌人找不出对证人，老药农交待的又合乎情理，便只承认那晚到老药农家寻找药治自己的妇科病，其他任凭敌人如何审问，一概推说不知。廖业红本来想敌人可能要枪毙她，她已作好了牺牲的准备。但奇怪的是陈玉阶审问了一阵后，居然说：“我念你年轻，和太太又是宗家，不追究了，以后可要小心，不准随便外出！”说罢转身走了。这时廖华琼进来了，对廖业红说：“孩子，别怕，今后好好帮我做事，多看医书，不要管闲事，有我呢！”说罢，拉着廖业红回到卧室给廖业红讲课去了。

“欲擒故纵”，陷入圈套

廖业红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她在红军训练部里，听教官讲过孙子兵法中的三十六计，她想莫非是敌人的“欲擒故纵”之计？所以当廖华琼拉她到卧室要给她讲课时，廖业红故意说：“姑姑，你这里是军机要地，我最好不进去！”

廖华琼说：“我叫你进来嘛，怕啥，师长也不过是考验你一下，不然他能准我带你来？你要是真不进来，相反会怀疑上次情报是你透露的呢！”

廖业红一连好几天照常伺候廖华琼，照常读书，也未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半个月过去了，一切都很正常，廖业红顾虑渐渐消失了。有一天晚上，廖华琼叫她去听她讲课，但廖业红进屋后一个人也没有，过了几分钟，刘副官进来说，太太和师长去一三六团会餐去了，半个小时后就回来，要她等着，还和廖业红开了几句玩笑，门一带走了。这时廖业红发现茶几上放有一个大卷宗，上面写有“绝密”两个字。廖业红心里动了，她听说敌人最近正在发动什么“三个月清剿”，但不知到什么地方清剿。如果要是把这个情报搞到手送到省委该多好啊！但她不敢轻易动手，又过了几分钟，廖业红确实耐不住了，于是便大着胆子，掀开卷宗，还没看一页，陈玉阶推门进来了，大喊：“来人！”立刻进来两个卫兵。陈玉阶命令：“把她绑起来！”

陈玉阶连夜审讯，廖业红坦言：“我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虽然很年轻，但我对得起祖国和人民。你们也别想问我什么，更别想叫我帮你们干什么，我只要求快给我一颗子弹！”说罢，双目紧闭，任凭陈玉阶如何审问，一句不答。

廖华琼走过来拉住廖业红的手说：“孩子，你就不能为你自己想想，你学医很有前途啊！”

廖业红睁开眼说：“你我虽是敌对立场，但你是医生，救死扶伤，所以我再喊一声姑姑，我要求一颗子弹，行吗？”

陈玉阶知道再也审不出什么名堂了，想利用她也很难，便命两个卫兵：“拉出去！”一颗罪恶的子弹，结束了廖业红年仅15岁的生命！

（作者：胡遵远、台运行，原载《铁军·纵横》2019年第3期。）

女英烈头断血流志不移

沈仲华：受尽酷刑口不开

1935年9月下旬，金寨境内负责农会和游击队工作的沈仲华等19位同志被捕。

敌人抓到沈仲华等同志，欣喜若狂，想就此机会将农会组织和游击队一网打尽。第二天，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进行了提审。敌人对沈仲华采用各种手段进行审问，毫无结果。

一次提审后，沈仲华回到牢房，难友们关切地询问起审讯的情况。沈仲华聚拢大家，说：“革命战士、共产党员就是要经得起任何考验。敌人是不会让我们活着出去的。但我们活一天，就要和敌人斗一天。现在敌人关住了我们的身子，却关不住我们的嗓子。来！我们用歌声来让他们颤抖。”大家围坐一起，唱起了《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雄壮的歌声如一股洪流激荡着牢房的每一个角落。

次日下午，敌人将沈仲华单独关进一个牢房。不一会儿，牢门打开，提审她的副官进来了。

沈仲华道：“你又找我做什么？”

敌副官一脸谄意，道：“我特意来看你的。”

沈仲华一个冷笑：“谁要你看。你姑奶奶向来用不着狗来看。”

敌副官不以为然：“你不要这样凶。你要是不说的话，会死人的。年纪轻轻死了多可惜！只要你答应不干共产党，我保你不死，说不定还能做我的太太。”

沈仲华听到这些，本想给他一个耳刮子，无意中却发现他身后挂着一把亮晃晃的刺刀，便默默地待他把话说完，似笑不笑地应道：“好啊。但你总得把我的手松开吧。”

敌副官以为她回心转意，满心欢喜地解开了沈仲华反绑的双手。沈仲华乘

其不备，敏捷地抽出刺刀，迅速地刺向他的胸口刺去，敌副官硬是没有反应过来，便瞪着双眼、哼都不哼一声地倒下了。

沈仲华再次被带到审讯室。这次审讯室里摆满了各种刑具：老虎凳、烙铁、皮鞭、大刀、吊绳……

“你怎么敢刺死我们副官，你们在山里隐藏的到底有多少人？他们藏在哪里？快说！”一个敌军官歇斯底里地吼道。

沈仲华昂首挺胸，冷目横对：“多少人？全中国受苦受难的老百姓都是我们的人！”

一阵酷刑，沈仲华昏死了过去。

两天后的下午，沈仲华第三次被带到审讯室。

敌人急不可耐地问道：“你到底说不说？”

沈仲华应道：“还说什么？要话一句没有，要命一条。”

敌人穷凶极恶，把特制的电话线插进她的手缝里，再狠摇电话机。沈仲华感到一阵麻木，但她强忍着；敌人又将她双手反剪腾空吊在屋梁上，背上压上四块砖，她还是强忍着；敌人再将她按在地上，强灌辣椒水，辣椒水从她口中、鼻中喷涌出来。她昏迷过去，丧心病狂的敌人却用凉水把她泼醒再灌……

次日，沈仲华在难友的呼唤下，从昏迷中苏醒。望着围在身边的难友，她还不忘安慰和关心：“我不要紧。大家都很好吧？”敌人见她醒过来，二话没说，又把她拖进审讯室……敌人用尽酷刑，却未能使沈仲华松口半分，最后无技可施，决定杀了她。

1935年农历10月6日下午，狱中同志均被押了出来。沈仲华明白这已是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抬起头来看了看火红的太阳，拽拽衣襟，在难友的搀扶下，艰难地走到吴家店街北河边的草坪上。

敌人先开枪打死了15位同志，然后将沈仲华向前推搡两步，鸣空放了一枪，对她道：“听着！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说了还不晚。”

沈仲华竭尽全力支撑起虚弱的身体，怒斥道：“别废话！要杀便杀，共产党是杀不尽的！红军很快就会回来了，你们的日子不长了……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苏维埃万岁！”

“快开枪！快开枪！”敌军官气急败坏地向手下命令道。

“砰……”山中树林间的秋叶被震落了一地……

张敏：用孩子的生命换来战友的安全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西去长征后，留守在大别山区的红军处于更加

危险的环境中。在此期间，金寨县金刚台上活跃着一支特殊的红军队伍——金刚台妇女排。有一首歌谣真实地反映了她们的战斗生活：“山沟石洞是我房，树枝稻草盖身上，山菜野果能当粮，三天不吃打胜仗。”

她们中的女战士张敏带着一个还在吃奶的孩子，由于缺粮断炊、营养不良，导致张敏身体较差、缺少奶水，孩子经常饿得哇哇直哭。有一天，正当敌人又一次开始搜山清剿时，孩子又饿得大哭起来。随着敌人的一步步紧逼、一步步靠近，孩子的哭声随时都会暴露十几个战友的藏身之处，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此时的张敏来不及多想，毅然地将空瘪的乳头紧紧地堵住孩子的嘴，紧紧地捂着、捂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短短的十几分钟，就好像几个世纪那么漫长。

敌人走远了，战友安全了，张敏却发现孩子面色发紫、早已没有了呼吸，张敏的心碎了……她含着泪说：“孩子，娘对不起你啊！娘实在是没有办法啊！”战友们被保护下来了，大家含着泪，用手扒了一个坑，准备将孩子那小小的遗体掩埋起来。可是，张敏怎么也舍不得放下怀里的孩子，她就那么紧紧地抱着、紧紧地抱着……

王明玉：用自己的生命保守伤病员的秘密

王明玉是一名女红军战士、女护士。在一次战斗中，弱小的王明玉跌倒了、又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就这样，硬是将20多位不能走动的伤病员一个个地背到树林深处隐蔽起来。

当她回到村子里去取药箱时，不幸落入敌人的魔掌。敌人看她背着药箱，就知道她是名红军医生，便严刑拷打她，逼她说出伤病员的下落。但是，她却咬紧牙关、什么也不说。敌人没有办法，就用更加毒辣的手段，将王明玉推倒在雪地里，用皮鞭狠狠地抽打，一鞭、两鞭、三鞭……可怜的王明玉，一身单薄的破衣服，一会儿就被打成了碎片，鲜血随着敌人的鞭子，落在雪地上，染红了一大片。

眼看硬的不行，敌人又用糖衣炮弹来诱惑她。但是无论怎样，王明玉始终不为所动，气得敌人要活埋她……在去与留、生与死的面前，王明玉毫不畏惧、毅然决然地理了理凌乱的头发、扯了扯被打得稀烂的衣服，高喊着“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然后昂首阔步、纵身跳进了坑里……为了革命，为了人民，为了战友，王明玉献出了年仅19岁的生命。

晏来香：为诱敌人，勇跳悬崖

巍巍的金刚台耸立在金寨的北部，山高林密。1936年冬，大雪笼罩着金刚台。一天，商南县县委书记张泽礼的爱人晏来香和十几个战友正在猫儿石一带活动。大家两天没有吃一粒粮食了，身体极度虚弱。刚坐下休息，就发现敌人在搜山，大家只得一路快跑，躲进一片树林。年轻的晏来香见大队敌人向战友们藏身的树林方向搜来，她便毅然地冲出树林，用力地朝着另一方向跑去，把敌人引走。晏来香跑着跑着，跑到了一座悬崖边，无处可逃，可身后的敌人已追上来了。为了不当俘虏，她纵向跳下深涧，英勇壮烈牺牲。

詹凤梅：受尽酷刑，忠贞不二

詹凤梅，1926年加入农会任小组长，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乡苏维埃妇委会主席、县苏维埃委员。她积极组织 and 发动妇女拥军优属、锄奸支前。1932年冬，红军主力西征后，她带领妇女游击队侦探敌情、筹集军粮、护理伤病员，积极配合部队开展游击战。

1933年2月，詹凤梅不幸被捕。敌人对她施用种种酷刑，但无论怎样，詹凤梅——这位年轻的女性，始终坚贞不屈。最后，敌人把她绑在电线杆上，残忍地将其杀害。

（作者：胡遵远，原载《铁军·纵横》2018年第1期。）

好少年献身革命最风流

小英雄杜志强：视死如归

杜志强是金寨县桃岭乡人，他父亲杜昌甫是土地革命时期皖西地区二路游击师的创始人之一，因为善于带兵打战，敌人畏之如虎，故有“杜老虎”之称。杜志强在杜昌甫的教育下，13岁时就很懂事了，后来还成长为乡儿童团大队长。他带领儿童团站岗放哨，密切注视地主民团的一举一动，化装侦察敌情，为苏维埃政府送信。

一次战斗中，双河民团冯国梁的弟弟冯国柱被杜昌甫的游击队活捉了。冯国梁通过一个叛徒的密报，从杜昌甫的亲戚家抓走了杜志强和他的妈妈冯长茹，妄图以夫妻、父子之情软化杜昌甫。

杜志强被捕后，敌人对他严刑逼供。但他坚强不屈，拒不说出游击队活动的地方，敌人无计可施。冯国梁对外放出消息：“只要杜昌甫放了我弟弟、不再干共党，我就放了他的妻儿。”为表示“诚意”，他还假惺惺地先放了冯长茹。

杜昌甫对此毫不动摇，悲愤无比地说：“我要干一辈子共产党，决不中途而废。就算是妻儿死了，那也是为革命而死，是光荣的！”随即将十恶不赦的冯国柱处决了。

1933年春节期间，冯国梁得知杜昌甫的游击队在大游寨一带活动，便带着民团和国民党十一路军的两个团，偷偷地包围上去。他命令团丁押着杜志强在前面走，一边走、一边叫团丁们喊话：“杜昌甫，快出来吧，再不出来，你老杜家可就绝种了！”

这一天异常寒冷，下着大雪。杜志强因遭敌人摧残，早已遍体鳞伤，这会儿只穿了一件单衣，打着赤脚走在雪地上。游击队的战士们在山上看得一清二楚，个个义愤填膺，一致要求杜队长下令“下山救人”。杜志强的小叔杜立

光、舅舅冯兵等，更是要求单人去营救。

杜昌甫稳住大家，满眼含泪地说：“同志们，敌人就是想利用我们一时的感情冲动，盲目下山，好一网打尽啊！如果我们现在下去，毫无疑问是正中奸计。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冷静啊！”

冯国梁见团丁们喊话不中用，就威逼着杜志强喊话。杜志强虽然年龄小，但早已识破了冯的阴谋诡计，拒不喊话。冯国梁就用枪托打他、用皮鞭抽他……最后，忍无可忍的小志强跑到一个坳口上，面对群山，高亢激昂地喊道：“爸爸！你们要藏好，千万别下山，白狗子想骗你们！”冯国梁气急败坏地抽出刀，一刀将小志强的一只耳朵割了下来。杜志强捂着伤口，痛得在雪地上直打滚，冯国梁跟着又给了他一枪……

小红军胡小五：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胡小五是金寨县丁家埠列宁小学少年先锋队的大队长。他多次要求参加红军，均因年纪太小，未被批准。

一天晚上，六区红军独立营在他家住宿，半夜开拔时，胡小五便偷偷地跟着独立营回到了红家大山。

天亮时，独立营营长方藻生才发现部队后面有一个人跟着。方营长说：“你这个少先队大队长，怎么当起我们的尾巴来了？”

胡小五说：“我想当红军，你们不准，我只好跟着你们当尾巴了！”

方营长看得出，胡小五虽然年纪小，但是人很机灵，便把他收在营部当通信员。

红家大山是六区独立营的根据地，东接六安，西连金家寨，南至茶棚岭，北达梅山，方圆 100 多里，山高林密，沟壑纵横。

1934 年红二十五军北上抗日，大别山苏区被 10 多万敌人分割成无数块，唯有红家大山这一块根据地还比较完整。虽然独立营不断利用熟悉的地形打击敌人，但是由于敌人众多，红军不断地减员，原来的 300 多人只剩下不足 200 人了，营政委方藻廷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营长方藻生腰部负了重伤。为了保存力量，方营长命令独立营分成三个战斗分队，分散到敌人后方活动，他和通信员胡小五在南红石岩下面的山洞里养伤。

红石岩是红家大山面临史河的一座大石岩，由于石岩南北端各有一岩峰，间隔约 5 里，因而又分为南红石岩和北红石岩。南红石岩下面有一个可容下几十人的天然洞穴，欲进入洞穴，必须从红石岩上到洞口一棵 10 多米高的古松顶上，再攀援下到树根，才能进入洞内，因而十分隐蔽，敌人多次围剿搜山，

均未发现此洞。但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不但医药难以搞到，吃饭也越来越困难，只能靠胡小五采些野菜野果充饥。更使方营长放心不下的是三个小分队分散活动后，一点消息也没有。

方营长实在是耐不住了。他写了一封信，要胡小五送给南庄畈交通员王大和，想了解一下独立营分散活动的消息。为了防止敌人搜查，方营长将信放在胡小五袜底下面藏着。可当胡小五下山过门坎山封锁线时，被敌人发现了。狡猾的敌人将胡小五浑身搜遍，也没发现什么疑点，敌人就叫他脱鞋，他也脱了，当要他脱袜子时，胡小五坚决不脱。敌人便将他按倒，硬将袜子脱下，方营长的信被敌人搜去了。

敌人得到这个情报，惊喜若狂，立即向其上司——二十五路军司令梁冠英报告，梁冠英派特务营营长张天阁率领全营，要胡小五带路，抓捕方营长，进而一举歼灭红军独立营。

胡小五自知无法逃脱，便机智地带着敌特务营在红家大山转了一整天，连方营长的影子也未见到。敌营长气得暴跳如雷，一个劲地用皮鞭抽打胡小五。胡小五心想：自己牺牲倒无所谓，老是这么带敌人在山上转，红家大山地形被敌人摸清楚了，会影响独立营以后活动。他对张天阁说：“你们别打了，我带你们找方营长！”

胡小五把敌人带到北红石岩上，手指着前方对张天阁说：“方营长就在那里！”说着猛抓着敌营长腰间的皮带纵身向岩下跳去，就这样和敌营长同归于尽了。

（作者：胡遵远，原载《铁军》2018年2期。）

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县 首任县长白涛

金寨县的首任县长——白涛，1915年出生在河南伏牛山区袁家沟村（今属西峡县）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曾任国民党某部营长，是地方有名绅士。1947年秋，白涛随刘邓大军南下，先任金寨县县长，后任金东县县委书记兼县长。1948年7月7日英勇就义。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毅然选择了革命

白涛自幼好学，在家乡读了10年私塾，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少年才子，深得父亲喜爱。他是袁家长子，父亲本想由他来振兴家业，所以白涛15岁时，父亲便想让他停学，在家帮他操持家业。但白涛对于这个家庭却不太满意，不愿呆在家里守业，要父亲准许他到外地读书，走自己的路。父亲生气地说：“堂堂的大少爷不当，却要到外地流浪，真是阳关大道不走，反入鼠穴！”

“九·一八”事变后，白涛经常到附近的赤眉小学看书看报，和师生们谈论国家大事，他眼界逐渐开阔了，觉得自己的家庭是个“空气窒息”的“囹圄”，自己原来所读的“诗云子曰”，都是于国于民毫无解救之力的陈腐说教。1932年夏，白涛终于说服了父亲，随去北平经商的叔父到北平入精业中学读书。当时，从事地下工作的北平东城区区委书记张明何既是白涛的同乡，又是亲戚，张明何在和白涛叔父交往中，觉得白涛才思敏捷、思想进步，便介绍一些进步书刊给白涛看。当时的北平，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学生、工人不断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内战，要求蒋介石抗日救国。1933年，日寇进攻华北，国民党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又签订了《塘沽协定》，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素有革命精神的北平各大中学校，反对内战、要求国民政府抗日救国的呼声更加高涨，那些游行示威的青年，不怕国民党的水龙头喷、警棍打，甚至鸣枪威胁，那种勇往直前的精神，使白涛深受鼓舞，不断向

张明何请教一些时政问题。张明何向他讲解了一些国内外大事，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苏区红军情况，白涛万分激动地说，“真是耳堵丸豆，不闻雷鸣”，要求张明何介绍他到苏区当红军。张明何说他年纪尚小，劝他好好读书，报国有日。从此，张明何便把白涛视为可以信赖的同志。张明何住处经常召开党的工作会议，白涛去时，张明何也不避他，并让白涛帮助抄写一些宣传材料；情况紧急时，一些党内文件和资料也叫白涛帮助保存。张明何常对白涛说：“这些文件、资料比生命还重要，可不能叫敌人知道了，那是要杀头的啊！”每谈及此，白涛总是拍着胸脯说：“我是个学生，敌人不会搜查我的，就是查出来，杀头我也不怕！”

张明何说：“要是敌人追问你这些东西从哪来的呢？”

白涛说：“你放心，就是杀头，我也不会讲是你们的，我就说是从马路上捡来的！”

白涛的姑父王秋峰在北平开药材行，又做毒品生意，他很器重白涛，想要白涛帮他做生意，并经常接济白涛。但由于王秋峰是国民党观点，白涛看不起他。白涛姑母50寿辰，王请白涛去吃饭。饭后，王询问白涛学习情况，并要他好好读书，不要和北平一些学生搞什么游行示威，影响学业，政府抓住还要坐牢。白涛很生气地说：“我们的国土不断沦亡于日寇之手，将来当了亡国奴，念的书还有什么用处？”王说：“抗日是政府的事，蒋委员长自有安排，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还打不过小日本？”白涛说：“现在是蒋委员长不让中国人民抗日，老是屈辱退让，东三省完了，日寇又向华北进攻，蒋介石又和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宣布察哈尔、冀东为日寇自由出入地区，等于向日本打开了祖国的华北大门。这样下去北京城也是朝不保夕！”王说：“你们年轻人，就是容易受人家鼓动，那是国家的事，与我们平民百姓有什么相干？我写信给你父亲说了，让你到我药材行学生意，免得和学生们今天游行、明天示威的，让他老人家不放心！”白涛气愤地说：“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然后拂袖而去，再也不到姑父家去了。

1934年张明何调去外地工作，白涛考入开封高级中学读书，第二年日本帝国主义大肆向华北进攻，国民党政府依然是屈辱退让，又和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中国共产党鉴于民族矛盾日益严重，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但蒋介石一意孤行，竟答应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搞“华北政治特殊化”，并继续增兵围剿被迫长征的红军。12月9日，北京各大专院校师生6000多人举行游行示威，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开封各界也行动起来。开封高中学生领袖刘中和看白涛思

想进步、处事机警，派他担任开封各大中学联络员和印发传单及宣传工作。12月29日，开封万余师生在龙亭体育场集会，各学校均有代表在大会上发言，痛斥国民党打内战、屈服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会后，师生们沿街游行示威。白涛一面散传单，一面带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不抵抗政策！”等口号声。当游行队伍来到省政府门口时，学生代表要求省长刘峙接见，刘峙吓得不敢出来，命其秘书长方其道出面应付，学生们不满意，要去南京政府请愿，请省政府提供车辆。方支吾搪塞，学生们直奔南关火车站，但由于省政府的百般阻挠，火车不开。学生们在数九寒天里，冒着大雪，在铁轨上坐卧抗议，连续一个星期。白涛看很多同学饿坏冻伤，到开封医院请求医生治疗，各商家和市民也被学生抗日激情感动，向学生们赠送食品、棉衣棉被。终因火车不开，学生们去南京请愿未能成行。“一二·九”运动是全国性的，对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促进全民抗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36年秋，父亲去世，白涛回家吊丧。时任中共宛南工委组织部部长、公开身份为赤眉小学校长的张明何也来白涛家吊丧，白涛便向他请教抗日前途问题。张明何向他讲解了《八一宣言》和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要白涛坚定信心，只要四万万五千万中国同胞团结起来，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被赶出中国去，并介绍白涛到赤眉小学任教员。在张明何主持下的中共赤眉小学党支部，经常交一些宣传抗日救国的工作给白涛做。白涛善书善文，根据《八一宣言》精神，写了很多宣传材料刻印散发，并和刘焯等进步教师组织“潜涛读书会”，办《潜涛墙报》，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

当年底，西安事变爆发，白涛极为兴奋，但对共产党主张释放蒋介石，又不理解。学校一些进步教师也多有怨言。张明何找白涛谈心，耐心地说明放蒋介石的意义。白涛立即组织“潜涛读书会”进行讨论，邀请校长张明何作首席发言。会后，白涛组织“潜涛读书会”会员写稿，出版了《潜涛墙报》抗日宣传专刊《话说西安事变》，澄清了一些教师的模糊认识。

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毅然奔赴抗日前线

白涛带领县委和全县干部群众开展对汉奸、特务、伪、顽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辽西形势大为好转，经过两年斗争，敌占区大大缩小，日军只敢龟缩在县城和红都等几个据点里，辽西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全面进攻。白涛忧心如焚，毅然离开家乡，到开封参加了共产党举办的抗敌训练班。1937年9月，在

党组织的支持下，白涛冒着日机狂轰滥炸的危险，夜过陇海铁路，日夜兼程，到达山西临汾，参加了八路军学兵队（又称决死队），投入了革命的怀抱。同年12月，白涛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白涛参加革命后，立场坚定，工作积极，很快走上了领导岗位，1939年担任北方局交通科长，1941年党组织派他到环境艰苦、斗争复杂、日寇蚕食日益严重的辽西（今属山西省左权县）担任县委书记。当时的辽西是处在日伪、顽斗争最前沿的一块抗日根据地，敌人实施政治、军事、经济和特务手段相配合的总体战，妄图一口一口地“蚕食”它，彻底地抹掉这块“共军占领区”。敌伪几次在报纸上吹嘘“辽西全部维持，所谓抗日的辽西县政府及各级政府彻底消灭指日可待。”

白涛不负党的重托，到辽西后，带领干部到群众中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敌伪、顽情况，发现很多伪、顽组织，既怕共产党的八路军，也怕日本鬼子，他们帮日本鬼子做事，大部分是处于无奈，死心踏地的只是少数。干部们接触了一些上层人士，向他们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纲领，希望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支持八路军抗战。为了使广大干部统一认识，白涛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反复强调：对伪、顽，除了进行军事打击外，更重要的要做好政治工作，开展政治攻势，争取一部分人不反动或做两面派；对上层人士，坚持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他们从思想上站到共产党一边；对敌人，根据“敌进我进”的方针，寸步不让，一定要守卫好辽西抗日根据地。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白涛经常带领武工队到县城附近的石匣、三家村、七里店、盘城岭、小岭底、红都、管头等地贴标语、散传单，宣传党的抗日政策，袭击伪、顽，警告他们不要帮日本人干坏事。并在榆次到辽西敌人的交通线上，组织了由干部率领的10多支武装突击队，专门打击死心踏地的汉奸、特务，发动群众开展破路和抗丁、抗捐、抗粮的“一破三抗”斗争；向伪、顽家属送信，进行“记红黑点”“留后路”的宣传教育。群众说：“汉奸、特务，伪、顽是日本鬼子的鹰犬和耳目。日本鬼子干啥坏事都离不开他们，治服了汉奸、特务和伪、顽，等于日本鬼子失去了帮凶和耳目，他们就寸步难行。”由于白涛带领县委和全县干部群众开展对汉奸、特务、伪、顽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辽西形势大为好转。经过两年斗争，敌占区大大缩小，日军只敢龟缩在县城和红都等几个据点里。辽西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

白涛在对敌斗争中始终不忘关心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根据地巩固后，他立即率领全县干部战士，深入群众，对前段减租减息情况进行检查。他亲自在下白堠村蹲点，发现有些地方执行减租减息政策上有些感情用事，该减的没减或没减够，不该减的减了，甚至减过头了，被减对象有怨言。白涛在掌

握了点上经验和面上情况后，召开全县减租减息干部会议，总结前段减租减息经验教训，制定了适合全县情况的减租减息条例，从而使全县减租减息斗争得到顺利开展。《新华日报》还在头版上发表了辽西减租减息的经验。

为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号召，在减租减息顺利开展的同时，全县干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白涛同志身体力行，指挥在第一线，战斗在第一线，1944年全年获得了大丰收，扭转了因敌人封锁造成的困难局面。人民群众生活改善了，生产和抗日的热情更加高涨，辽西成了北方局的模范地区。

白涛是工作模范，也是学习模范。工作中只要有时间，他就用来读书。他除了读马列著作外，还读《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名著。邻县一位女县委书记李秀山，由于工作中和辽西经常配合，和白涛建立了爱情。李秀山也爱读书，但读的多是文学著作。一次，李秀山在看《三国演义》，白涛说：“看《三国演义》，要当政治书籍读才有意义，诸葛亮、曹操、周瑜，不但是军事家，更重要的是政治家。”李秀山说：“难道他们不是文学家？”白涛说：“当然是喽！不过我最欣赏的还是他们的谋略。”李秀山戏笑地说：“那么你也是政治家喽！”白涛说：“不敢当，你知鄙人祖居哪里吗？”李秀山说：“不就伏牛山那个小山沟里吗？”白涛说：“阁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俺乃卧龙先生隐居的洞天福地南阳人氏。”李秀山说：“怪不得人们说‘白涛登台敌人惊，南阳诸葛又复生’哩？”白涛说：“那是恭维了。不过看《三国演义》对我们和敌人作斗争、指导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都有意义。”李秀山说：“我看过一副对联：‘兄玄德弟翼德共兴汉室，师卧龙将子龙同安蜀邦’，但没提到关羽，有点遗憾。”白涛说：“我们给它加个横批如何？”李秀山思索了一会，说：“‘尚赖云长’怎么样？”白涛说：“你这横批虽然不太妥贴，但有个‘赖’字，也还过得去。”李秀山说：“你这‘诸葛’大概也没有更妥贴的横批了，也只好承认是‘赖’了。”

李秀山工作的地区和白涛领导的地区毗连，工作上互相配合，爱情上情真意切。但由于当时斗争艰苦，环境恶劣，两人都表示一定要等到抗战胜利才结婚。1944年冬，组织上调白涛到豫北地区工作，地委书记陶鲁笏通知白涛和李秀山到地委结婚。可白涛坚持要到抗战胜利后才结婚，陶鲁笏批评他说：“你工作上遵守纪律，家庭问题上也要遵守纪律啊！建立家庭后可以更好地工作嘛。”白涛硬是拖了半个月，再到地委开会时，才在地委负责同志主持下，和李秀山结了婚。地委准白涛和李秀山半个月婚假，可三天后，白涛就到河南汲县县委书记兼县长的岗位上去了。李秀山回忆说：“白涛是个工作狂人，虽然我们感情笃深，但除了到地委开会相遇外，平时很少在一起。抗战胜利后，

本想夫妻俩可以团聚一段时间，中央组织干部配合刘邓大军南下，白涛正在生病，可他坚持要去。组织上叫他第二批去，他坚持要第一批去。我看他还在咳嗽，放心不下，叫他治疗几天才去，他说：‘革命战士上了战场，什么病都会好的，仗打完了，会还你一个健康的白涛。’他就是这样倔强的性格，只好由着他，未想到从此一别，竟成了永诀！”

白涛不重夫妻感情吗，绝不是！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陈列着白涛的一些日记，有很多思念李秀山的记载。还有一封他在过黄河时给李秀山的一封长达3 000多字的书信，字里行间，饱含思念李秀山之情。信末还有两行是问候：“自如、文书、时芳、逢威、富玉、志田……诸同志好”。可见白涛是既重夫妻感情，又重同志感情的。

在生死考验面前镇定自若、大义凛然

1947年秋，白涛随刘邓大军南下。大军所至，势如破竹，连克大别山20余座县城。9月2日解放了金家寨，白涛被任命为立煌县县长、县委副书记。为了宣传人民政权的宗旨，白涛和县委书记张延积商量，准备出一张布告。当白涛提笔拟稿时，觉得再用“立煌县”名字不妥，便对张延积同志说：“老张，县名是否改一下，我们再不能给卫立煌树碑了。”

张延积说：“是要改一下，不能再用‘立煌县’名了。”

白涛说：“金家寨在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很有名，就叫金寨县吧！”

张延积觉得有道理，立即请示上级，经地委同意，定名为“金寨县”。

白涛才思敏捷，很快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五言诗句，拟出文稿，开头几句是：

查我金家寨，大别山中心。

革命根据地，中外有威名。

立煌本国贼，不应留其名。

改名金寨县，历史面貌真。

布告张贴全县后，人民群众争相观看，由于内容通俗，朗朗上口，很快成了革命歌谣传遍全县。从此，这个红军的摇篮、将军故乡的金寨县，载入了史册。

白涛任金寨县县长，身先士卒，做群众工作，深入细致，执行政策，严肃认真。当时，由于人民群众、干部战士对地主老财和乡绅民团十分痛恨，不少区、乡政府，不分罪恶大小，不注意分化瓦解，出现了乱杀、乱打、乱罚等现象，因而发生了少数人“跑反”的情况。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白涛在县委召开

的全县基层干部会议上专门作了如何按照党的政策执法的报告，要求干部战士要善于做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并亲自找一些罪恶不大、愿意重新做人的反、坏分子谈话，召开开明人士座谈会，反复宣传党的政策，要他们安心改造，靠拢人民政府。从而争取了多数，孤立和打击了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分子，扭转了乱“跑反”现象。原来一些怕接触共产党的人，主动找干部谈心、悔过。经过一个多月艰苦细致宣传，情况改变了，参加会议的人多了。有的地方，只要听说白县长来开会，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赶来听。由于深入发动群众，认真执行政策，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等工作进行得都较为顺利。

1947年11月，地委考虑金寨是大山区，面积大，为便于开展工作，将金寨划为金东、金西两县和金北办事处。白涛同志要求到地形复杂、群众基础较差、土匪蚁聚的金东县去，被任命为金东县县委书记兼县长。

金东形势当时确实十分严峻，除了地方数支股匪外，还有驻在邻县的国民党部队经常来犯。他们威胁群众，不准其与政府干部接触，并胁迫群众订立“五家连环保”，一家通共、五家连坐，一人通共、全家俱斩。白涛率领干部和县武装基干团，一面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一面调查研究掌握匪情，决定给地方土匪一次严厉打击，鼓舞民心。当时金东最大的一支股匪是黄英老八团，约200多人，经常活动在前后畈和天堂寨一带大山里，日伏夜出，杀害我基层干部，抢掠百姓。12月21日，白涛和两名战士在王立墩一户群众家吃饭，门口来了一个要饭的，机警的白涛看他细皮白肉，不像穷人，便和他拉家常，问他是哪里人，为什么要饭。那要饭的被问得越来越紧张，语无伦次，掉头就走。白涛命两名战士将他抓住，在他身上搜出驳壳枪一支。经审问，要饭的名叫黄守富，是黄英派来侦察金东武装基干团情况的。白涛向他交待了党的政策后问他：“你是当地人，当土匪总不是好事，你是愿受人民的惩办，还是愿意立功受奖？”白涛见他犹豫不决，说：“好吧，让你考虑考虑，什么时候考虑好了，对我说都不迟。”便把他带回县政府，关在自己住的隔壁的一间屋子里，中间只隔一层一人多高的木板墙。下午，白涛和县武装基干团团团长张绍基“研究”运棉衣棉被的问题，最后白涛故意高声说：“就这样决定，明天上午基干团除留下一个连执勤，其余全部去押运棉衣棉被，路上要特别小心，防止敌人偷袭。”吃晚饭时，白涛要看守黄守富的战士故意放松警惕，让黄守富逃跑。天刚擦黑，黄守富借故解手，真的顺后山溜跑了。晚上，白涛对张绍基说：“黄守富肯定回去报信去了，我们来等着逮鱼吧！”第二天一早，便将基干团一分为二，白涛和张绍基各带一部伏在进入王立墩的两面山坡上，等待敌人上钩。

黄守富逃回后，立即向黄英报告了基干团明天要去运棉衣棉被情况，黄英

迅速向罗田县民团头子郑效升通报了消息，第二天一早两股土匪 800 多人，向王立墩攻来。上午 10 时，进入到基干团伏击圈后，基干团各种火器一齐射杀，激战半个多小时，打死打伤敌人 100 多人，黄英股匪副大队长潘进荣也被击毙，余敌四散逃去。

1948 年春，由于我主力部队转战中原，只留下县区武装。这时白崇禧又增派其四十八师入侵大别山，地方土匪又嚣张起来，我基层政权无法立足，白涛率领县、区武装转入游击活动。5 月 19 日，在胡家山与数倍于己的敌人遭遇，激战至天黑，才突围出敌人包围，白涛和主力走散，天又下暴雨，白涛到一户群众家烤衣服，被一个叫漆德运的富农告密，遭土匪黄英部包围被俘。敌人听说白涛被俘，惊喜若狂，把他送到合肥安徽省政府处理。派县长吴曙光亲自和白涛谈话说：“白先生只要写个适当的悔改表示就可和我们合作了。”白涛说：“我已作好了牺牲准备，你们不要枉费心机了！”

吕绍钧受金东上层人士之托，曾往狱中看望白涛同志，想和白涛商量一个既不失共产党人气节，又能脱离樊篱的办法，白涛笑笑说：“你们的厚意我领了，明代于谦名句《石灰吟》吕先生一定很熟悉了。”吕绍钧自愧地说：“我还没读过这首诗，望白先生指教。”白涛随口吟出：“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身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吕绍钧连声说：“共产党人伟大，令人钦佩！”说罢和白涛握手，十分惋惜地离去。

白涛在狱中，镇定自若，每天打拳锻炼身体，写日记、写诗歌，还关心狱中同志。他对被捕的漆店区委书记江川同志说：“我准备牺牲，希望你坚持斗争，祖国的解放为期不远了。敌人狡猾，不要上当！”

敌人对白涛施尽了各种伎俩，折腾了一个多月，什么也没得到。7 月 7 日，敌人借召开纪念抗战 11 周年大会的名义，骗来一些群众和小学学生参加会议，公审白涛。

早上，白涛被通知参加纪念抗战 11 周年大会。白涛知道敌人要杀害他了，便要水洗了澡，换了一套干净衣服，穿了一双新草鞋，拿着一张国民党报纸，被敌人带到会场。敌官员在讲了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正在收复江北城乡等一类谎言之后，宣布白涛的所谓“罪行”。白涛同志走上讲台，主持会议的是国民党县参议长赵冀，以为白涛要承认错误，忙对白涛说：“白先生，现在悔悟，不晚，不晚！”

白涛痛斥道：“你不要啰唆，我知道怎么讲！”

“好，识时务者为俊杰，白先生不愧是有识之士！”赵冀退到一边。

白涛大义凛然，高声宣传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并抖着手中的报纸说：“我们的胜利，连国民党报纸都不得不承认！”接着他痛斥了国民党反动

派、蒋介石勾引美帝国主义打内战，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他指着台上的国民党官员说：“你们这帮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和蒋介石一样，都逃不了人民的审判！”

敌人被激怒了，杀害了白涛同志。

敌人杀害白涛后，严令暴尸三天，不准收尸。家住金寨西关的吕绍先老夫妇听到白涛被杀，十分悲痛，因白涛一到金寨就住在他家，担柴挑水，什么都干，视如亲人。吕绍先对老伴说：“白县长这么好的人，牺牲了，不能叫猪吃狗拖了，就是杀头，我们也要把他掩埋起来。”老两口半夜里抬着竹席，将白涛尸体裹好，抬到一个山坡上掩埋了。

后来，军民又共同隆重地召开追悼大会，沉痛哀悼白涛烈士，有诗赞道：“宁愿断头死，绝不屈膝降。法庭与敌辩，临刑骂贼党。心坚如金刚，气节松柏长。血染金家寨，浩气贯长江。烈士为民死，父老皆敬仰。金寨白县长，名垂青史扬。”

（作者：胡遵远，原载《华夏纵横》2017年第3期。）

第二部分

践行初心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建党初期，金寨地区党组织和共产党员们组织并发动农民群众站起来闹革命的口号就是“当红军有饭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一个政党有了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就会坚强有力、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就能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一名干部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

为了实现共产党人的初心，金寨地区的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们在茫茫的黑暗中上下求索，努力寻找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开辟根据地、建立苏维埃，齐心反围剿、实施大转移，坚持敌后游击战、誓死保卫大别山……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们让鲜艳的革命旗帜永远高高地飘扬在英雄的大别山上！

徐向前鲜花岭上出奇兵

1930年10月，蒋介石开始对各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当时，向鄂豫皖苏区“围剿”的敌军有8个师，近10万人，12月初完成部署。

中共鄂豫皖特委和红军面对强大的敌人，一方面以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迫使敌人不敢冒进，并想方设法分散敌人的“围剿”兵力；另一方面集中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薄弱点，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转变整个战局。鄂豫皖特委和红一军还采纳了副军长徐向前的建议，先打较为薄弱的皖西之敌。随后，他们通过采取“主力出击、突然袭击”等方法，在新州歼灭了敌人第二混成旅的2个团。12月中旬，我军又远程奔袭，歼灭了金家寨驻敌四十六师的1个营和朱孟功、杨松山、小罗成等8支民团，共1600多人。

皖西重镇金家寨之敌被红军歼灭后，国民党六安、霍山县政府接连向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告急。陈调元急令其四十六师和警备第二旅向皖西金家寨进军，敌鄂豫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李鸣钟亦令其八十一师的1个旅由河南商城向安徽金家寨进发，其新编第二十五师的1个旅由河南潢川向安徽叶集进攻，企图合围红军。

红一军鉴于上述敌人的“围剿”态势，随即将主力集中于金寨麻埠地区，准备相机歼灭敌人一部，粉碎敌人的合围阴谋。12月29日，敌四十六师分三路向麻埠进犯，中路一三八旅由六安苏家埠经独山前进，右路第一三六旅二七一团由韩摆渡经石婆店前进，左路一三七旅及警备第二旅1个团由霍山经诸佛庵前进。

红一军探悉敌之行动后，决定先打其中路之敌，挫其锐气。30日，徐向前率领红一师第一、三团与第二师第一团迎击敌人于金寨鲜花岭一带。部队午夜开进，埋伏于两侧山林。第二天中午，敌人先头部队1个团小心翼翼地向鲜花岭开来，全部进入红军埋伏圈后，徐向前一声令下：“打！”各种武器一齐向敌人射杀，敌军顿时混乱不堪，稍事整顿后，又向红军反扑。

由于敌人处于不利地位，经过两个小时激战，大部被歼灭。其后卫1个团一听先头团被歼，便向东溃退，徐向前命令红一军第一、三团奋起猛追，敌被包围于鲜花岭以东的同心寺附近，激战1个多小时，亦被全歼。

与此同时，敌右路二七一团进到鲜花岭西部，亦被红二师第四团迎头痛击，团长柏心山被活捉。

鲜花岭战斗共歼敌3个团，击溃3个团，毙俘敌团长以下3000多人，缴获长短枪1700多支，迫击炮10多门，电台一部。

红一军鲜花岭战斗胜利后，主力向豫南进击，沿途歼敌三十师的1个团，后移驻商南，又截击了拟进攻金家寨的敌彭国桢旅1个团。

由于红一军积极作为、多路出击、勇挑重担，各地方游击队、赤卫军纷纷积极响应、英勇参战、大力支持，进犯之敌又都并非蒋介石之嫡系，惧怕被歼。因此，一部分自行退出苏区，另一部分只敢待在边区的少数县城里，不敢“抛头露面”。到1931年1月，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获得全胜，敌人的第一次“围剿”计划终以失败而草草收场。

（作者：胡遵远，原载《人民政协报》2018年9月27日。）

徐海东：“我是青山 军事大学毕业的”

1934年2月，红二十八军在徐海东的率领下开进安徽省金寨葛藤山地区。

部队刚刚在葛藤山下落脚，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师一六一旅就向红军追来。徐海东了解到：国民党第五十四师代理师长叫刘书春，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但由于没有“后台”，所以混得个师长还是个“代理”的。为了争取得到上司的提拔，刘书春对红军作战很“卖力”。

徐海东掌握了刘书春的心理，与红八十二师师长梁从学、红八十四师长黄绪南详细研究了形势后，决定避免与敌军主力正面作战，先吃掉敌人部分兵力。

4月1日拂晓，徐海东命红八十四师一营坚守阵地，正面压制敌人火力，同时派出红八十二师一营和二营，向葛藤山西南边簸石沟佯攻，吸引敌军主力离开。果然，当敌人大部队看到山梁上出现一支红军队伍时，立刻尾随而来，对着石家沟的山头发起了猛烈攻击。见敌人上钩，徐海东当即命令部队“快速上山，待会儿更要迅速下山”。一时间，红军战士们很快就抢占了山顶。徐海东命令一个排用火力压制住敌人登山的速度，其他人则顺着一条山沟快速撤下山下。

敌人只看到红军上山，便误认为红二十八军的主力就在山顶，于是将全部兵力和火力对准山头。刘书春虽然知道徐海东外号“徐老虎”，但认为从前与徐海东交手的国民党将领不能与自己相提并论，此刻见红军火力稀疏，以为红军抵抗不住，于是命令部队急攻。

正当刘书春得意之际，突然炮弹声、枪声从左右两侧传来。原来，从山沟撤下来的红八十二师两个营协同红八十四师二营、三营则从东面迂回至敌人侧后方，配合山头的排和隐蔽在葛藤山东南山脊的红八十四师一营同时出击。敌军突然之间遭受到三面夹击，无法弄清红军的兵力究竟有多少，顿时四处逃窜。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敌人的两个团只跑掉了一个营，刘书春被

◆ 将军县的初心故事

活捉。

战斗结束后，刘书春被押到徐海东面前，还不知趣地问：“敢问徐将军是保定军校的？还是黄埔军校的？”徐海东风趣地回答：“我既没听过保定军校的课，也没进过黄埔军校的门，我是青山军事大学毕业的。”刘书春不解地问：“徐将军，鄙人知识浅薄，不知这青山军事大学在哪儿？”

徐海东手指着背后的山岭说：“喏，这就是青山军事大学！这方圆几千里的大别山，处处都是红军的军事大学！”

（作者：胡遵远，原载《人民政协报》2019年9月12日。）

红土地上走出的将军

——李耀的长征故事

李耀，原名李克新，安徽金寨县桃岭乡东岳村人。1911年12月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民主革命时期曾任手枪队队长、大队政委、兵站医院政委、团政委、军区分区政治部主任、地委组织部部长、地委书记、军区副政委等职。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鄂豫皖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斗争和红军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第一步兵学校政委、原总后勤部干部管理部部长、政治部主任、原总后勤部副政委、中央军委纪委委员，为我军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3年4月9日在北京逝世。

李耀的童年正值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军费猛增，农民的赋税日益加重，广大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李耀一家老小12口人，租种地主2亩旱田，由于缴不起租，只好借“驴打滚”的高利贷。全家人衣不遮体、食不饱肚，李耀的父亲和几个哥哥先后被饿死。他和母亲、嫂嫂靠乞讨为生。一天，李耀同母亲、嫂子讨饭到一个地主家，三人乞求了半天，地主才让佣人给每人一茶杯鸡食。当他们正要离开时，地主家的长工扛了一大筐白米饭和焦黄的锅巴倒在狗食槽内喂狗。由于饥饿难忍，李耀就拾起几块石头将狗赶走，在狗食槽里捡起一块锅巴。不巧被发现了，地主将李耀打了个半死，从此，李耀把社会不公现象看在眼里、把仇恨铭刻在心底。他立志长大后要为穷苦人报仇、为老百姓讲话。

地主阶级的剥削、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28年10月，李耀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光荣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后，他没日没夜地进行革命宣传，发动群众、发展团员，把革命的种子撒遍金寨。1929年5月，李耀的家乡爆发了农民起义，成

立了县、区、乡苏维埃政府，他任少年先锋队中队长、赤卫军排长，他带领一群扛着红缨枪的孩子们站岗放哨。革命的熔炉锻炼了李耀，是年，李耀加入了红军，后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从此，他出生入死，把精力全部投入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之中。

李耀参加红军后，在红一军第一师三团机枪连任战士、班长。1930年12月30日，他随部队由麻埠出发，在距麻埠20余里的东西鲜花岭与敌遭遇，经4小时激战，将敌先头团全部消灭，敌后卫部队见形势不妙掉头就跑。我军乘胜追击20余里，又全歼敌1个团，缴获1000多支枪。在这次战役中，李耀表现得非常勇敢，在追击敌人时，李耀扛着重机枪随部队猛追敌人20余里，当时就累得吐血，住进了医院。1931年2月，李耀出院后任皖西北道区苏维埃政府通信排排长，他率领全排出色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1932年5月，李耀调任安徽省六安县保卫局保卫连连长兼指导员，他率领全连在六安河西岸担任防守任务，并不断袭扰敌人，保证了驻独山街六安县领导机关的安全。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中共皖西北道委为加强敌斗争，决定成立了红二十七军。李耀先后任三团三营八连连长、三营营长，率部随军转战皖西10多个县，历时近2个月，行程3000多里，牵制敌5个多师的兵力，进行数十次的战斗，歼敌4000多人。1933年3月，李耀所在三团归属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指挥。李耀率部参加了郭家河战斗，此战1个多小时，歼敌2个团，毙敌二〇七团团以下百余人，俘敌二〇五团团以下2000多人。4月，李耀任红二十八军手枪队队长兼指导员。7月他在皖西北中心保卫战中奉命率部侦察敌人活动情况时，以智取的方法歼敌1个排，缴获长短枪20多支，并获取了重要情报。8月，李耀率红二十八军手枪队侦察到敌人有70多个毛排，装着大米、油盐、罐头、军装、弹药等军备物资，从史河运往金家寨。皖西北道区苏维埃领导立即组织红八十二师、第三路游击师在梅山上磊子伏击，歼灭敌护送物资的部队两个营。这一仗仅缴获大米就有140万多斤，在当时部队严重缺粮的情况下，解决了军需民食的大问题。9月，敌两个旅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向驻在瓦屋基的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八军八十二师进攻，李耀率手枪队勇猛冲杀，占领制高点，大部队迅即发起总攻，使敌人伤亡惨重，仓皇溃退。当月，由于战事频繁，加之劳累过度，李耀患了严重的水肿病，不能行走，只好听从部队首长的安排，就地在老乡家的地窖里隐蔽起来养病。当病情稍有好转时，李耀就化装成老百姓，四处打听红军的下落。一天，他在红军原来活动的地区打听消息时，被敌人抓到刘振华部独立旅某团三连当兵。李耀经过多方面的周折，乘一次站岗放哨之机逃出，找到了红二十八军政委郭述申，被安排在军警卫连当教练。

1934年4月16日，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在金寨县的豹迹岩会师后，整编为红二十五军，李耀被编入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二二三团一营。5月，李耀随部参加了远程奔袭敌五十四师后防所在地罗田县城，歼灭敌守敌一部，并缴获大量物资。9月，他又随部参加了远袭安徽太湖县城，消灭伪安徽省警备旅一部，并缴获了大批物资。11月8日，李耀随部参加了斛山寨反击战，在作战中李耀表现非常勇猛，备受好评。

1934年11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十五军在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的带领下，突破敌人的围攻开始长征。李耀担任一营派出工作队队长，他们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罗山县何家冲向西挺进，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从此开始。11月26日，当他们准备由叶县的保安镇至方城县之间的独树镇，通过许（昌）南（阳）公路进入伏牛山时，恰遇寒流，气温骤降，北风刺骨，雨雪交加，全军指战员衣服单薄，又被雨雪淋湿结了冰，许多同志的草鞋被烂泥粘掉，赤脚行军。在这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李耀忍饥冒寒不怕苦。他奋力疾行，突然一阵激烈的枪声，一排子弹向李耀他们射来。这时，同志们手指都冻僵了，拉不开枪栓，而头顶上的敌机正向他们冲来。敌人准备从两翼包抄红二十五军。在这危急时刻，李耀突然听到一声高喊：“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这喊声使所有的红军指战员都振奋起来了。军政委吴焕先的喊音未落，李耀就奋不顾身地冲在最前面，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李耀平时刻苦训练，武艺高强，枪法极准，他不顾极度的饥饿劳累，奋力反复冲杀将敌人打退。此役，共毙、俘敌800余人，使整个部队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包围。他在长征途中还参加了独树镇、庾家河等重要战役，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长驱1800余里，胜利到达陕西省东南地区。接着他又参加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第一、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为开创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1935年7月，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丰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与陕甘红军会合。7月16日，李耀随红二十五军从丰峪口出发，踏上继续西征的道路。8月21日，进至甘肃泾川地区，天气连降大雨，山洪暴发，泾河水猛涨，军直属队和担任掩护任务的二二三团，被阻于内河北岸的田坡村一带。就在此时，敌三十五师一〇四旅二〇八团突然向我军袭来。李耀奉命立即向敌展开猛烈反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掉头后撤，李耀带机枪班紧追不舍，并把机枪架在自己的肩膀上，叫射击手边跑边向敌人扫射，经过激烈战斗，全歼敌二〇八团。由于李耀在战斗中表现突出，被提升为连指导员。9月4日，红二十五军二二五团三营在板桥镇遭敌骑兵团突袭，在这紧急关头，李耀奉命率部担任掩护部队突围的任务。在战斗中李耀腿部受伤，但他仍坚持完

◆ 将军县的初心故事

成了部队首长交给的任务。9月15日，红二十五军胜利到达延川县永坪镇，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9月17日，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在永坪胜利会师后，合编为红十五军团。1936年10月，李耀任中国工农红军前线指挥部第一兵团兵站医院政委。

（作者：胡遵远，原载“中国红色旅游网”，2016年8月24日。）

“决死队长”曾绍山突围搬兵

在将星璀璨的共和国开国将领里，曾绍山中将的名气并不是很大，跟王近山、张震、皮定均等没法比。但实际上，曾绍山也是我军一员战功卓越、彪炳史册的猛将，在第二野战军时曾一度与王近山齐名。曾绍山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十二军军长、旅大警备区司令员等要职，后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政委期间参与指挥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曾绍山将军一生身经数百战，每役皆血雨腥风，荡气回肠。然鲜为人知的是，在长征时期红十师被困旧城、弹尽粮绝生死攸关之际，“决死队长”曾绍山冒死出城搬救兵，凭借大智大勇成功拯救了一个师，为革命保留了大量宝贵的火种。

三过草地苦作舟

曾绍山1914年出生于金寨县丁埠镇东湾村一个贫农家庭。幼时读过3年私塾，后因家贫辍学在家放牛，帮父母耕种。1929年6月参加红军后，因作战机智勇敢，于1932年3月被提拔为红四方面军少共国际团副排长。1935年春，曾绍山调任红四军第十师司令部侦察参谋。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

作为侦察参谋的曾绍山，总是身先士卒，打头侦察探路。红军第一次过草地出发前，曾绍山因忙于搜集情报，寻找并分配向导安置师部迁移，没有充足时间准备干粮，在别人帮助下才凑到了三四斤青稞制成的干粮，只够他每天抓两把吃，经常是靠挖野菜、煮皮革充饥。刚进入草地曾绍山就因受感染，腿上多处长了脓疮，过沼泽地时由于毒水浸泡，双腿红肿腐烂、疼痛刺骨，但曾绍山以顽强的毅力走出了草地。

红军穿过茫茫的“死亡地带”后，伤亡较大，粮草和物资也消耗殆尽，再加上长时间饥饿和疾病困扰，部队疲惫不堪。当红十师准备通过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包座乡前往甘南时，敌胡宗南部早已在北上的要塞包座集结重兵，妄

图凭借山险林密的坚固工事准备阻止红军北上。红军北出四川进军甘南，别无他途必须占领包座古道。为消灭红军，胡宗南在红军必经之路求吉寺布满嫡系精锐，又在求吉寺后山上修筑了环形工事，集群式地堡、暗堡等连环相接，还修建了一条暗道直通山下寺院，便于军力增援调配。寺庙内还囤积了大量粮食，敌人企图借助寺庙坚厚牢固的墙壁阻击红军。英勇的红军不畏强敌，曾绍山随后参加了攻打求吉寺战斗的组织协调工作。

1935年8月29日，包座战役最惨烈的求吉寺战斗打响了，红军在极度疲乏、装备极差、地形不利的情况下一一次次发起猛攻，但躲在寺庙里的敌人凭借围墙保护疯狂扫射，一批批红军战士倒下，英勇牺牲。经过三天三夜的战斗，红军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态势下仍取得了包座战役的伟大胜利，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等部，毙伤敌军近5000人，彻底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

1935年9月，曾绍山随部队再过草地。10月至11月，强渡大金川翻过夹金山，相继参加了绥崇丹懋战役和天芦名雅邛大战役。红军虽苦战两个多月，但还是未能打开立足发展的局面，反遭数十万敌军包围被迫转入守势。时间很快到了1936年2月初，上级要求红军各部队从天全、芦山出发时，必须尽量多带粮食，抓好部队的组织管理工作。此时曾绍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为再过雪山草地作准备。于是他全力协助师首长深入动员指战员，进行充分的物质准备和组织安排。2月中旬，部队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地区，再次连翻几座雪山，顺小金川向丹巴、道孚方向前进，一路扫清道孚、炉霍、甘孜、瞻化等地之敌。为接应红二、六军团，原本按计划立即北上再过草地的曾绍山所部就地等待整训，并筹集粮食物资。1936年6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地区，曾绍山率红十师慰问队敲锣打鼓，抬着丰厚的慰问品热热闹闹地迎接兄弟部队，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们的士气。

1936年7月上旬，红十师从瞻化出发，准备第三次过草地。这次过草地路程最长，行程近1个月。好在已有两次过草地的经验，曾绍山将这些经验编写成材料印发到连队，介绍战士们如何识别水体是否有毒、哪些野菜能吃、哪些草墩能走人、如何选择土包露营、夜睡如何隔潮防雨、如何避免陷入泥潭、如何搭救陷入泥潭者等注意事项。由于准备充分，这次过草地虽然路程长得多，但部队减员显著减少。在草地行军中，因为没有详细的地图，而大多数翻译和向导又不愿走太长的路，所以要不断地找人替换。一路上曾绍山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去寻找翻译和向导，还要多花钱多讲好话，设法请他们多带一程路。

“决死小队”守城墙

三过草地后，红四军第十师于1936年9月进抵甘肃南部一个叫旧城的地方。红十师在此边休整边侦察敌情，好为大部队开辟前进道路。不料进驻旧城的第3天，马步芳的骑兵旅从临夏夏河赶到旧城，把红十师团团包围在旧城内。红十师立即组织部队进行反击，打了三天三夜始终未能突围成功。师长余家寿、政委叶道志、参谋长范朝利等在城墙上从望远镜里清晰地看到，冲出城外反击的指战员大部分壮烈牺牲，一个长满络腮胡子的马家军，提着明晃晃的马刀，把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剥光衣服，推到碉楼顶层平台上，一个个活活地砍死。第十师指战员被惨无人道的挑衅暴行激怒了，发誓要为战友报仇雪恨，但苦于被数倍于己的马家军包围，根本无法冲出去，而且马家军正组织力量进行攻城，第十师只能固守待援。为此，师领导下了一道特殊命令，从师机关、直属队及交通侦察队中选拔一批精干人员组成敢死队，每人带一支驳壳枪，背一把最好的战刀，带上充足弹药，由曾绍山带领，不分昼夜在城墙上巡逻，发现哪里军情危急，就赶到哪里去支援守城部队。

当晚，“敢死队长”曾绍山立刻领命，组织了一支由侦察兵、传令兵、马夫和理发员参加的巡逻队在城墙上巡视，士气旺盛、斗志昂扬的巡逻队给予部队很大鼓舞。忽然，城北传来消息说马家军开始攻城了，曾绍山火速赶往城北，明亮月光下看到马家军已爬上城墙，下面还有许多马家军抬着梯子继续靠上城来，城外的一片房子已被马家军点着了火，火光照亮了半边天。曾绍山大吼一声：“打！”巡逻队疾如闪电般全部扑上去，子弹打光了战士们就举起大刀砍，刀刃砍卷了就搬起砖头砸。原来靠城墙处有一排破旧房子，红军把砖头、梁柱拆下来搬到城墙上做武器。在复仇的怒火中，砖头、滚木像雨点般飞向敌人，砸得敌人皮开肉绽、鬼哭狼嚎，骄横的马家军终于被压下去了。

空前激烈的血战，一直持续了5个昼夜。但马家军的攻势依然越来越猛，红十师的处境越来越危急，战士们身上的子弹所剩无几，粮食也吃完了，伤员还在不断增加。最令人焦虑的是早在战斗打响后的第二天，在旧城的红十师与上级红四军及红四方面军总部的电话联系就全部被切断了，红十师处于孤立无援、岌岌可危的境地。

搬来救兵破围城

万分危急时刻，师长余家寿决定派一支小部队突围，希望能与总部取得联

系。但第一次派出的部队，刚刚出城门就被马家军的密集火力给压了回来。第二次突围部队刚冲到城东大路上，便遭到马家军骑兵的包围，经过激战全部壮烈牺牲。傍晚曾绍山走进指挥所，师政委叶道志正在屋里焦急地来回踱步，师长余家寿左臂负了伤，脖子上挂着一条沾满血污的绷带，正伏在桌子上看地图。叶道志见曾绍山走进来，便严肃地对他说：“曾绍山同志，你来得正好，我们决定再派几个干部带领一支小部队突围，不论多么困难一定要设法冲出去，与总部取得联系，你看谁去比较合适？”曾绍山自荐道：“首长让我去吧，城外的地形和城里的情况我比其他同志熟悉，出城比较有把握，也便于向总部汇报情况。再说新城又不太远，最多一昼夜就赶回来了。”叶道志沉默着，余家寿抬起头来说：“我看让曾绍山同志出城可以！”

曾绍山领命后立即赶到交通侦察队挑选人员出城。他只选了两个人，一个叫魏生友，一个叫苟元书。当晚后半夜出城时，叶道志亲自来送行，看到这支三人小分队后疑惑地问曾绍山是不是人太少了？曾绍山说：“吸取前两次的教训，只能带两个交通侦察员。这样既不影响城内的战斗力，且人少目标小便于隐蔽。”

守城门的战士接令后，搬开堵城门的沙包，伏在门上听了一阵后才轻轻把门开了一道缝，曾绍山等三人迅速出了城门，顺着城墙根向东爬行100多米，在一段土坎下伏下来。旋即，曾绍山带着苟元书和魏生友，朝着城外一间平房和一个碉堡间空隙处慢慢摸过去。凭着身上的伪装掩护，三人越过了城外第一道警戒线。他们把身体紧贴地面，时而匍匐向前，时而低姿跃进，经过无数的洼地、田坎机警地向第二道警戒线爬去……几经凶险，三人终于来到新城。可来到城下时，三人却大吃一惊，只见城墙上贴着国民党军的告示，这到底是咋回事？出发前师长、政委明明分析说新城住着兄弟部队啊！

在城外一位老乡家，他们终于弄清了情况。原来新城的红军在当天上午撤走后，马家军的骑兵就进了城，又是烧又是杀，老乡的儿子因为给红军带过路，被马家军杀害了。听完老乡的话，曾绍山被迎头泼了一盆冷水，心里凉了半截。三人沉默了半晌，苟元书抬起头来问道：“怎么办？我们不能再耽误时间了。”曾绍山站起来，一摔帽子：“走！再往东走，一定要追上部队，他们一定还没走远！”绕开城墙曾绍山他们又出发了。不料出城不到两千米迎面来了一支骑兵队，眼前一马平川无处可藏，显然骑兵队也发现了他们三人，立刻纵马奔来，马蹄扬起的灰尘遮住了视线。三人立刻抽出手榴弹，准备同遭遇的骑兵作最后一搏。骑兵队愈冲愈近，30多个人手里挥着雪亮马刀。曾绍山心想：搬救兵的任务完成不了了，只好与敌人决一死战。突然，骑兵队领头的大个子突然勒住马，挥手喝问：“不要开枪！你们是干什么的？”心提到嗓子眼的曾绍

山听到这满口的大别山方言愣住了，心里怔了一下正要答话，魏生友抢先操着大别山的六安腔开了口：“我们是旧城出来的，你们是哪一部分的？”领头的大个子听到了乡音，对曾绍山他们打量了半天，笑着跳下马来，说：“同志们，是自己人！我们是九军侦察排的，来增援你们的，你们辛苦了！”兴奋的曾绍山飞奔上去抱住大个子老乡，泪如泉涌，“红十师有救了，有救了……”

第二天拂晓，曾绍山三人带着陆续赶到的红九军主力飞奔旧城外围。红九军指战员吹响嘹亮的冲锋号，机枪喷射出愤怒火舌，大刀闪出一道道寒光，如排山倒海般向马家军冲去，敌人猝不及防被冲击得人仰马翻。在旧城内的红十师指战员听到城外杀声震天，知道援兵来了，个个精神抖擞向城外冲杀出来，一举击溃凶悍残暴的马家军。至此，红十师安全脱险后顺利到达陕北，曾绍山因此荣立大功一次。

解放战争期间，战功累累的曾绍山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一军首任军长后，率部挥戈大西南参加了解放重庆的战斗。1955年曾绍山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7月被中共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作者：张应松、胡遵远，原载《文史春秋》2019年第1期。）

方子翼四过雪山草地

方子翼，原名方泰兴，金寨县果子园乡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部书记、三十军政治部青年科长等职。1938年，这位在长征途中曾四过雪山草地、经受血火淬炼的红军战士被选调到新疆航空队飞行班学习飞机驾驶技术，成为我军历史上第一代飞行员。新中国的空军部队建设，从一穷二白艰难起步，迅速地跨越螺旋桨时期，走进了喷气式时代，更经历过朝鲜战场的战火洗礼，才奠定了如今国际一流空军的地位，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这位新中国空军建设亲历者——开国少将方子翼的贡献。

一过雪山草地，雪山上遭遇雪盲症

1935年7月，为了集中力量北进，消灭胡宗南，夺取松潘，打通要道，挺进甘陕，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九师师部秘书的方子翼，第一次跟随大部队过雪山草地。

部队在威州过岷江，翻党岭山，抄近路向松潘开进。翻越大山的过程中，年轻的方子翼吃了不少苦头。幽深阴森的山谷，沟壑狭窄，似有似无的荆棘小路，在冰水河沟左右频繁变换，没有桥梁，全要开山徒涉。好不容易爬到2000米高度，又觉得胸闷气短，头昏脑涨，全身乏力，越往上越严重，很多同志都感到体力不支，有的当场晕倒，还有的不幸坠崖牺牲。在山上，雪盲症也开始在方子翼和战友中间出现，很多人由于眼睛长时间被雪光刺激，感到眼球发胀，到达山顶后眼睛开始疼痛，下到山麓，天一黑就变成了“瞎子”，一见火光便疼痛难忍。

连续翻越了党岭山、东谷山和打鼓山等几座大雪山后，红军部队又踏上了若尔盖大草原。第三天就逐渐进入沼泽地区，一脚踏错，就往下陷，越动越陷，越陷越深，直至没顶。人马陷进泥淖的事故不断发生，虽然大家相互救

援，但方子翼还是眼睁睁地看着很多同志陷在泥潭之中牺牲了。

爬雪山已是难上加难，但过草地还不如爬雪山。雪山无水还可以吃冰止渴，草地虽然到处都是水，但基本上都有毒。在雪山脚下露营还可以借树木遮挡露水，在草地露营只能找一块干地，大家背靠背地坐着挤成一团打盹儿。最难受的是人的一双脚，整天在脏水中浸泡，腿肿脚脱皮，每天早上刚开始行走时都很艰难，大家互相搀扶、互相帮助。方子翼他们在草地上行军一个多星期，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终于在8月26日到达若尔盖班佑进山，胜利结束第一次雪山草地行军。

二过雪山草地，从马粪里淘青稞充饥

方子翼他们第二次过雪山草地，是在红四方面军结束包座战役后，张国焘反对北上，分裂红军，带领部分红军南下期间进行的。

当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其红三十军、红四军，在包座战役中消灭了胡宗南的四十九师后，在包座、巴西地区待命。当时的敌情形势极有利于红军继续北进，可是张国焘却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命令所部红军回头南下，到川西建立根据地。于是，部分红军分别从阿坝和包座地区回头沿北上的道路，再过雪山草地，向西康大金川流域南下。

由于二过雪山草地时，已进入深秋，且军需准备不足，红军们的衣衫都很单薄，军粮供应也严重不足，在这期间，方子翼和战友们一起度过了一段艰苦卓绝的行军生活。有几次，方子翼都差点丢了性命，险象环生。

战士们进入草地第三天就遇上沼泽地带，行军之艰苦难以想象。而方子翼因为左脚曾在川北冻伤过，加上草地行军在冰冷的污水中泡得太久，左脚发木，踝部以下整个脚掌向内弯曲，正不过来，不能直行，只能侧着身体走路。就这样艰难地行进着，又渴又饿又累，走了5天后，赶到毛儿盖南面的俄德洛弄到热水泡脚，方子翼才缓过神来。

10月上旬，方子翼和战友们移驻卓克基。这里是红军北上时屯兵的中心区域，室内外均无粮食，他们饿得发昏，无法可想。方子翼看到马厩墙角堆着马粪，心想：藏族人用青稞喂马，马吃料嚼得不碎，马粪中一定有未消化的青稞，淘出来不是可以吃吗？方子翼把它弄来淘洗干净，果然淘出一些青稞，把它煮了和战友们分着吃了，又解决了一天的饥饿。

三过雪山草地，翻越“噬人魔鬼”折多山

红四方面军二过草地后，进行了绥丹崇懋战役。张国焘为继续贯彻其所谓“南下”方针，准备夺取川西平原。尽管绕着成都地区展开了一系列战斗，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摆在红军面前的形势仍十分严峻：东面有川军的100个团堵住去路；南面有国民党中央军7个师近10万人从雅安向北逼来。在敌人的包围之下，红军东进不能，南出无望，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宣告彻底失败。在党中央的感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张国焘不得已取消错误方针，宣布部队北上。方子翼也随同红军开始了第三次过雪山草地的行军。

红军这次北上翻越的雪山主要有两座：一是大渡河以东、邛崃山脉中的夹金山；二是大渡河以西的大雪山系中的折多山。尤其是5000多米高的折多山，茫茫积雪没过膝盖，风暴和雪崩接连发生，当地人都称这座山是“噬人魔鬼”。方子翼的不少战友陷入积雪或抵不住严寒长埋于此山。

尽管方子翼身高一米八，在战友中算是身体素质比较好的，但在北上的一个月中，也是苦不堪言。尤其是在爬夹金山的过程中，他的右腿开始疼痛，胫部内侧红肿一片，并肿起一个大疔包。走平路一瘸一拐的，还能跛行，到翻越折多山时，全靠战友前拽后推，一路爬行坚持下来。一直拖到甘孜后，疔包穿孔排脓，才缓解了疼痛。

四过雪山草地，踏冰卧雪走向胜利

人们常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实仅仅是红一方面军的路线，其他几路红军所经过的长征路线远不止这个数字。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所走的路线也是不同的。三次过雪山草地的比较多，四次过的相对比较少。方子翼他们正是少数一批前后经历了四过雪山草地的红军。而在四次过雪山草地的长征中，要数第二次和第四次最为艰苦，由于准备不充分，缺衣断粮，而且要翻山越岭，可以说是在挑战人类的极限，与死神作斗争。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合后，蒋介石忧心如焚，组织了大批军队挥师北上，全力剿共。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黄河西岸的红军西进，红五军、九军、三十军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打了半年的时间，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歼敌25000余人的战果。但由于孤军无援，再加上部队的武装力量较弱，弹药不足，不得不进入祁连山，也就开始了方子翼他们的第四次爬雪山过草地。

与前三次过雪山草地相比，因为承担着一边战斗一边转移的任务，部队遭遇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弹药的补充、伤病员的护理都是大问题。有几次战斗，全体指战员几乎全凭借着大刀、长矛，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数次突破重围，继续前进。

方子翼和战友们从战场上下来就进入祁连山，顺着冰河沟溯流而上，20天什么食物都没吃，渴了吃口冰，饿了也吃冰，白天踩着冰前进，夜里枕着冰睡觉。由于大家都是一身单衣，手背、足背和大腿都冻裂流血，几乎麻木。夜晚在山边露宿，没有铺盖，不敢睡觉甚至不敢坐下，只能站着跺脚，防止冻僵。加上高山缺氧，呼吸困难，头昏脑涨，浑身无力，两腿难支，大家全都变成了“四肢着地”，匍匐前进。爬在陡坡处，不时有人马坠崖，在山脊处有不少同志牺牲。

等到下了祁连雪山，来到青海草原，原本以为会迎来居民和粮食的红军战士，再次失望了：这里既无居民，也无粮牧，有的还是漫天的冰雪，一路上还是吃冰、踏冰、卧冰。由于方子翼脚上的草鞋已经散架，只好光着脚走路，脚底被草根冰碴子扎破，脚背冻裂流血，忍着疼痛一瘸一拐地，一直挨到马兰大坂。在那里，方子翼向牧民要了一块毛毡，缝了一双“毡鞋”，缓解了一下脚的痛苦；剩下的毡子，他白天披着挡风，夜间再当被盖，一直坚持到了最后。

与前三次相比，红军的第四次过雪山草地，虽然时间只有一个多月，只翻了一座大山，但是，在黄土高原和冰川上的这次行军，缺衣缺食，不停作战，比前三次都要艰苦。不过，红军战士都是好样的，坚定的革命信念鞭策着他们克服了这些困难。

（作者：胡遵远，原载《江淮风纪》2016年第10期。）

开国将军方升普

方升普，金寨县斑竹园镇人。他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红四军班长、排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连长、副营长，豫陕游击师师长，第七十四师副师长兼参谋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晋豫游击支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编一旅一团、二团团团长，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副司令员，豫西抗日游击第一支队副司令员，豫西军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他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一旅副旅长，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独立师师长，太岳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第十五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四十三旅旅长，第二野战军六十二军副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西康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总高级步兵学校第一副教育长，防空军第一军军长，福州军区空军、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方升普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从放牛娃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

方升普将军的老家在金寨县斑竹园镇联盟村，这个地方只有十多户人家，不大的村庄紧临一条清澈的河。这里距立夏节起义部队集合地——斑竹园朱氏祠仅5千米，也是当年立夏节起义部队到斑竹园朱氏祠集合时的所经之地。

方升普从小是个孤儿，靠给地主家放牛为生。有一天，他正在田里锄草，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爆炸声。不久，四周山上的人们开始走出树林，聚到一起。他们有的大声唱歌，有的向远处吆喝，有的背着鸟枪，有的扛着锄头，有的甚至拎着菜刀、斧头……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立夏节起义爆发了！

就在方升普对眼前的一切感到惊奇的时候，一支红军队伍经过他干活的田边。有个起义战士就冲着他喊：“小伢，跟我们走啊！跟着我们有饭吃！”早就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的方升普立即扔下手里的锄头，赤脚蹚过河水，投身到革命队伍中。

方升普苦大仇深，革命的决心十分坚定，很快就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

独树镇战役力挽狂澜

1934年11月，战斗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实行战略转移，就此开始了长征。在这支长征队伍里，从军领导到战士，平均年龄要比别的红军部队年轻几岁。方升普那时还不到20岁，已经是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八连连长。

短短的几日内，方升普所在的红二十五军就越过了平汉线，直抵桐柏山区，并在敌人大批兵力的围追堵截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进抵河南方城县以东地区。为了歼灭红二十五军，蒋介石调集了30多个团的兵力。红二十五军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跳出了桐柏山区的包围圈，计划取道泌阳、方城以东的独树镇、保安寨，向伏牛山前进。

在桐柏山与伏牛山之间，有一个叫七里岗的地方，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红二十五军到达此地之前，敌军利用地势完成了埋伏，筑好了临时工事，形成了沿公路东西长5千米的弧形堵击线。

11月的中原大地，寒风刺骨，风雪交加。红军指战员顶风冒雪，踏着泥泞，步履艰难地朝着七里岗急速行进，准备在此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进入伏牛山。敌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骑兵团早已抢先到达，突然向红军猛烈射击，并逐渐形成两翼包围。

此时的七里岗战场，地势陡峭，东面是河，西南连着一片平原，与附近的公路落差十几米，易守难攻。由于雨雪交加，能见度低，红军先头部队没有发现敌情。突然遭到敌人炮火的猛烈阻击时，红军几乎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加上寒流袭击，很多战士手冻僵了，一时连枪栓都拉不开。关键时刻彰显英雄本色！方升普从通信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高声喊道：

“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关头，决不能后退，大家跟我冲！”方升普一边喊着，一边带领战士们冒着密集的火力，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

经过一番恶战，红二十五军终于把正面进攻的敌人压了下去，占领了公路

两侧的有利地形，并沿着方城边界西进。正当前卫部队通过泔河时，又被占据泔河西岸部分高地的敌人先头部队挡住了前进的道路。黑夜中，方升普率领八连战士奋力疾驰，抢占了山寨，牢牢地控制了泔河西岸的制高点，成功掩护了红军渡河。尽管在战斗中方升普被打断两根肋骨，可是他却依然顽强指挥战斗，直到红军全部渡河，圆满完成阻击任务。

独树镇战役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生死攸关的一场血战。红军以不足3 000人的兵力，挫败了国民党数万步兵、骑兵的猛烈合击，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长征途中的阴谋，为红二十五军胜利完成长征并率先到达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组织伏击战，活捉敌县长

1935年5月，年仅20岁的方升普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二二五团二营副营长，不久又被调任豫陕游击师师长，豫陕特委委员、常委。1935年9月，刚刚创建豫陕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主力离陕北上，鄂陕、豫陕根据地陷入严重劣势。为了有效应对局面，组织上决定，将根据地的各路游击师和游击大队合编，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方升普任副师长兼参谋长。

红七十四师成立不久，敌人急忙调兵遣将，“划区清剿”。为了打破敌人的围攻，红七十四师巧妙地避开敌人的主力，绕道进入宁陕。当部队行进至青铜关时，敌四十军对我军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危急时刻，红七十四师利用有利地形布置“口袋阵”，组织伏击战，一举打垮了敌人，首战告捷。在这场战斗中，方升普率领一个营冲入敌阵，毙伤敌营长以下100余人，缴获轻机枪4挺、长短枪100余支。12月下旬，方升普又率部长途奔赴200里之外的宁陕县城，不到一小时，全歼保安团300余人，活捉县长居文召，缴获了一个武器库，解决了部队的装备问题。

在方升普等一批优秀将领的指挥下，红74师自1935年10月至1936年12月，独立坚持了鄂豫陕边区游击战争，经历大小战斗上百次，歼灭敌正规军和地方反动武装4 000余人，缴获各种枪3 000余支，建立了鄂豫陕边区，有力地配合了各主力红军的长征。

1946年内战爆发，中原军区党委决定由旅长皮定均、政委徐子荣、副旅长方升普等指挥第一旅掩护全军向西突围。任务完成后，他们孤军东征，突破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千里奔袭，挺进大别山。

那时正是大别山革命斗争最严酷的时候，国共两党在这里经常“拉锯”，人民群众一时也分不清是谁的队伍，每次有兵路过，老乡们都要去山沟、岩

洞、树林里“躲反”。方升普率领部队回到家乡，见到了熟悉的山水，却没有见到熟悉的乡亲。于是就派出战士们在山头上，朝四面大喊，“方升普回来了！升普带队伍回来了！”那些躲在深山里的乡亲听说是方升普回来了，就一起围拢过来。历经劫难的人们见面后，又是哭、又是笑，相互倾诉着生离死别。看到饱受战火摧残的家乡和正值春荒断炊的乡亲们，部队给每位乡亲都发了一块银元，缓解了乡亲们的燃眉之急。

方升普回到老屋时，发现老屋的地上长了杂树，昔日的房屋荡然无存。他来到父母坟前，看坟上青草萋萋，想到自己此去之后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祭拜于父母坟前，于是就委托叔伯兄弟帮他修葺一下父母的坟墓。辞别乡亲们，方升普又带着部队匆匆踏上新的征途。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调方升普到兰州任空军司令。在西出阳关之前，他又回到家乡。在祭拜父母时，他亲手培土、清理杂草，并召集族人在一起合影之后，洒泪而别。此次一别，直到老将军1981年离世，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方升普将军去世前一直想再回去看看家乡，可是终未成行。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家乡的小河阻隔了交通，孩子们上学极为不便。后来，将军的女儿为家乡捐了款、修了桥，了却了老将军的未尽心愿。

（作者：胡遵远，原载《铁军》2018年第3期。）

但远嵩：九死一生的长征路

但远嵩，安徽金寨人，1914年出生，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在大哥但远从、表哥皮定均的带领下参加红军。土地革命时期，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是我军早期从事机要、报务、通信工作的工作人员。1935年长征时，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电话排排长。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二翻雪山、三过草地，参加了慢川关战役、松潘战役、西路军西征，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生死考验。1955年，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红星功勋荣誉章。

爬雪山，因祸得福拣条命

但远嵩的右眼看不见东西，只有光感。这是长征爬雪山时长时间白雪反光刺激再加外伤造成的。

当年红军要爬的雪山是一座连着一座，有几千米高，山下是峡谷森林，山上是终年积雪，有的地方积雪厚达几十米。雪海茫茫，望不到尽头，好多天都看不到一片没雪的土地。红四方面军在历时一年多的长征中，翻越海拔4400米以上的雪山5座，其中梦笔山、夹金山都是两次经过。

但远嵩印象最深的是翻越党岭山。党岭山位于现在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主峰海拔5400米，终年积雪不化，气候变化无常，时而狂风漫卷，时而暴雨如注，时而冰雹雪崩。当地老百姓这样说：“爬上党岭山，如进鬼门关，若无大圣胆，难以再生还。”可想而知，翻越党岭山是多么的艰难！

红四方面军大部分战士都是从南方北上的，很多人都是衣衫褴褛，根本没有御寒的衣服。经过连续的行军打仗，同志们极度疲乏。再加上没有粮食，寒冷、饥饿、疲惫和稀薄的空气严重地侵袭着这支队伍。

一天，但远嵩所在的部队来到党岭山脚下，只见山上冰封雪锁，山势陡

峭。雪山上万里无云，阳光灿烂，白雪反光十分强烈，人们无法睁眼，但远嵩红肿多日的眼睛更加疼痛。大家沿着前面部队趟出的冰雪路，在崎岖蜿蜒的雪路上一个跟着一个地艰难行走。越往上走，山势越陡，积雪越厚，空气越发稀薄，连呼吸都非常困难了。好多同志因为疲劳、饥饿而倒了下来，而这一倒下，就成了冰雕，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到山顶时，忽然起风了，顷刻间，狂风大作，并卷带着大片的雪花和冰雹。这时，有人向天空开枪，一阵枪声之后，密集的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小的如黄豆，大的如馒头，根本就无法躲避，许多人被砸得头破血流。但远嵩的第一反应就是要保护好身上的通信设备。于是，他赶紧从背上放下设备抱在怀里，并弯下腰用身体挡住冰雹。忽然一个碗口大的冰雹砸到他的头上，一个跟踉脚一滑，他滚到了几十米外的一个山沟里。他坐在山沟里，眼睛流着血，什么也看不清，摸摸怀里的设备还在，他才放下了心。忽然，对面传来雷鸣般的响声，地动山摇，但远嵩抬头一看，雪崩了！就在自己刚刚滚下山沟的那个地方雪崩了！正在那里行走的上百名战友顷刻间被雪崩吞噬了……但远嵩因祸得福躲过了这场灭顶之灾！面对瞬息万变的雪山，部队接到命令“迅速下山，不准停留”。下山的路上，战友们互相搀扶、互相帮助，最终战胜了寒冷、饥饿和死亡，翻过了这座神秘诡异的党岭山。下山后，但远嵩的右眼就失明了。

在党岭山下，但远嵩遇到了皮定均。皮定均双眼湿润地看着他，哽咽着告诉他，他的大哥但远从在之前的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大部队突围，率领一个营的战士阻击敌军，在子弹打光而又负伤的情况下，与敌人展开肉搏，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皮定均告诉但远嵩，大哥是一个有思想、有智慧、骁勇善战、意志坚强的红军指挥员，为了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但远嵩当年参加红军时，他们家族中的堂哥、堂弟一共25人一起入伍。长征结束、到达延安时，他们25个兄弟仅剩下6人，那19位亲人都牺牲在雪山、草地以及与敌人的搏斗中。他们牺牲时，多数还是花季少年，年纪最大的就是但远从，当时也才25岁。

过草地，为救战友险丧生

过草地之艰难，不是亲历者绝对是无法想象的。1935年8月中旬，但远嵩随着部队进入了生死莫测的大草原。茫茫草地，一望无涯，到处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就没有路。人必须踩着草甸才能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但远嵩和战友们有的拄着棍子探路，有的几个人相互搀扶着行走。一天下来，大家都累得筋疲力尽。进入草地的第三天下午，天空突然下起大雨，并且伴随着电闪

雷鸣。走在但远嵩前面的小严，由于没有踩稳草甸，双脚一滑、陷进了沼泽，他拼命地挣扎，结果一会儿就陷进了齐腰深的泥潭。见此状况，但远嵩立即将手中的棍子递给小严，疲惫不堪、身体虚弱的但远嵩，使出全身的力气，试图将战友救出来。没想到，他不仅没把小严救出来，自己也陷了进去。

在这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几位四川籍的战友围了上来，他们迅速地解下自己的绑腿带，向但远嵩和小严扔过来，并让他们绑在自己的身上。几个战友小心翼翼地拉着绑腿带，缓缓地移动着，经过大家艰辛的努力，终于将两人救了上来。得救后的但远嵩，感觉右脚趾很痛，低头一看，原来右脚的两个脚趾已被满是泥浆的草鞋勒破，皮肉翻了过来，鲜血和着泥浆往下淌。当时，但远嵩并没在意，只是撕了一块小布条包扎了一下，结果夜里脚趾就开始红肿并发起烧来。

部队连续行军，整天在泥沼里行走，脚趾很快就感染溃烂了。由于当时缺医少药，只能经常用盐水洗洗。见他行走不便，战友们抢着帮他背武器装备。但远嵩常说，如果不是战友情、同志爱结成的巨大力量，自己早就陈尸草地了。

好战友，壮志未酬身先死

长征路上，在红九军的队伍里，有一位长着络腮胡子的红军战士。他整天挑着一副沉甸甸的担子，一头是大铁锅和炊具，一头是背包和一个六岁的孩子。孩子很瘦小，衣衫补丁连着补丁，但一双大眼睛却很机灵。他就是炊事员老赵。他是四川人，参加红军时家里已经没有其他人了，他带着唯一的儿子加入了红军队伍。行军时，他挑着几十斤重的担子，部队宿营了，他要架锅、烧水、做饭，收拾好炊具后才能照顾孩子。

部队过草地前，有的准备的是青稞麦炒面，有的来不及磨面就带着青稞麦。当时的环境，大家都知道，多节约一点粮食，就多一点生存的希望。于是，同志们都尽量地节省，即便如此，准备的干粮很快也就吃完了。茫茫草原，渺无人烟。粮食没了，只能挖野菜、吃草根、树皮充饥。有一天，到了宿营地，同志们挖了野菜交给老赵。大家又渴又饿，等了好一会还没见老赵喊开饭。忽然，传来了孩子凄惨的哭叫声，但远嵩和几个战友急忙跑过去，只见老赵口吐白沫、面色发青，已经不能说话了，只是眼睛还在一直看着孩子，手里攥着野菜。这时，大家都明白了，老赵是吃野菜中毒了！原来，大家每天挖回来的野菜和草根，老赵都要先自己尝尝，没有毒、没有问题的才煮给大伙吃，以确保同志们的生命安全。大家试图将老赵嘴里的野菜弄出来，可是已经来不

及了。但远嵩握着老赵的手，流着泪说：“你放心，我们一定把孩子活着带出草地。”听了这句话，老赵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随之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眼看着快要走出草地了，老赵却倒下了！孩子扑倒在老赵怀里撕心裂肺地哭起来。6岁的孩子历经如此血雨腥风的战争，面对如此悲壮惨烈的生离死别，幼小的心灵承担着多么大的压力啊！

在此之后，但远嵩和战友们轮流背着孩子，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帮扶，靠着吃野菜、树皮、皮带、枪背带，终于第三次走出了草地，九死一生地幸存了下来。这个孩子后来被送到后方医院，并逐渐成长为我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

当年的红军战士是因为有了钢铁般的信念、钢铁般的意志，才战胜了数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征服了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最终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万里长征，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而又珍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胡遵远、但春燕、任少松，原载《党史纵览》2016年第11期。）

林月琴：军中第一女大校

林月琴，原名林英琴。她在长征中三过草地时改名为林月琴。她的老家在安徽省金寨县城以西的南溪。十字街口，有一家林广顺杂货铺，这就是林月琴家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底。林月琴自小在南溪明强小学读书，校长詹谷堂是当时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林家女儿心目中特别崇敬的革命先生。

父亲林维尹，名义上是林广顺杂货铺的掌柜，实际上却以开杂货铺为掩护，做党的交通工作，经常跑汉口。林家的西厢房，不仅是中共地下工作者秘密聚会的据点，而且也是书写和油印革命宣传品的场所。

1929年立夏节起义，詹谷堂率领南溪200多名农民和学生，参加了红军第三十二师。15岁的林月琴也剪了长辫子，理成了新式的发型，从南溪跑到几十里外的斑竹园，参加了妇女运动讲习班，加入了共青团。1931年初冬，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在金寨麻埠建立缝纫兵工厂时，林月琴带领10多名青年男女前去参加。工厂领导给每个人发了个红袖标，就算是正式参加红军了。

1932年9月下旬，红军主力部队过境后，皖西北苏区到处都是扶老携幼、提包推车、仓皇逃跑的老百姓，哭喊声连成一片。此时，林月琴也投入到“跑反”逃难的人群之中，跟在红军队伍后面向西走。她还要干革命，还要当红军。

在沿途结成的“跑反队”中，林月琴和刘百兴两人，从鄂东北就跟上了红军队伍。刘百兴个子高，胆子也大，腰里别着一支不知从哪弄来的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是“跑反队”里唯一的武器。

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知道的革命道理也多，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工作。行军路上，尤其是越过平汉铁路以后，几乎每天都受到部队领导的劝阻。她们当然不肯回去，红军前面走，她们后面跟着走；红军途中休息，她们也就地休息；红军驻扎后，她们就主动帮着挑水、拾柴、烧火、做饭，或帮着做点针线活儿。她们走新野、过郑县，沿着鄂豫边的崇山峻岭，向着陕南方向行进。到了豫陕边上，将要徒渡丹江的时候，后卫部队领导被她们“坚决跟随红

军”的顽强意志所感动，不忍心再阻止她们跟进，便将她们分别收编在各个单位。林月琴、刘百兴被收留在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师政治部主任张琴秋问到她们的情况时，林月琴高兴地说：“我是在去年这个时候当的红军，就在七十三师缝纫工厂当缝纫工，现在正式归队了！”

妇女工兵营，这个番号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序列中实属少见。冠以“妇女”称谓的工兵营，主要任务是缝军衣、做军帽、织绑腿、打草鞋以及担负后勤运输任务等。妇女工兵营属于方面军总供给部编制序列，原本就是由随军被服厂改建扩编而成的，是集建制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于一体的特别“兵种”。妇女工兵营是红四方面军总部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的一个创造。当时，红军反三路围攻大获全胜，红四方面军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师，依次扩编为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军，总兵力由入川时的1.5万人，猛增到4万余人。在此大好形势下，郑义斋也快马加鞭，把几个军需工厂集中起来，改编成妇女工兵营。1933年10月4日，妇女工兵营在川北得汉城正式组建。营长林月琴、营政委王泽南、副营长刘百兴以及三连连长张茶清，都是来自鄂豫皖苏区的战斗骨干。除了这4名女将，全营3个连四五百名女战士，都是当地的年轻妇女。营的领导班子搭建起来后。连、排干部严重不足，只好在新兵中物色积极分子。工兵营组建时，仍在继续招收青壮年妇女。凡是自愿报名者，都尽量地吸收进来。

林月琴、王泽南两个军政一把手，当时的主要工作是领导和管理生产，保障部队的军需供应。长征中，她们各自又带领一个连队担任运输队，执行各种繁重的运输任务。她们所领导的妇女工兵营，堪称红四方面军后勤战线上的一面战旗，迎着战火硝烟飘扬了3年之久。

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和总部机关及直属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抗日先锋团共2.1万余人，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后改称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并执行“打通国际路线”任务。而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和红军大学等万余人，当时被留在黄河以东地区，参加了著名的山城堡战役，取得三军大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这样，红四方面军即一分为二，形成河东、河西截然不同的两种局面。

当时被留在河东的女红军，无疑是幸运的。她们没有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的艰苦征战。在个人的终身大事上，她们也大都获得了美满和幸福。

林月琴和罗荣桓的婚恋，既保持了红军中相识又相恋的时代特色，也富有一种罗曼蒂克色彩。而这段红色之恋，要归功于林月琴的好友刘桂兰从中穿针引线。

刘桂兰最早在独立营担任连长，后在随营学校当教务主任。她是随同红军大学直接抵达陕北的。1937年春节，刘桂兰和从事政治保卫工作的许建国结婚，并在延安中央党校建立了小家庭。婚后，许建国和刘桂兰谈到，有不少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大都已过而立之年，但至今没有婚配，其中就包括罗荣桓。刘桂兰是个热心肠，一听到罗荣桓，就立即想到了她的好友林月琴。经过一番筹划安排，刘桂兰先向罗荣桓提说婚事，并约定安排二人见面的日期。

那是个星期天，刘桂兰不显山、不露水地邀请林月琴来家中做客。谭政、张爱萍、冯文彬等人，当时也都自告奋勇陪同罗荣桓前往“相亲”。第一次相识，活跃分子冯文彬先与林月琴搭话，将其家庭情况、个人经历以及兴趣爱好，从头到尾问了一遍。林月琴以为冯文彬是组织部的什么人，对他的所问都如实作了回答。与此同时，林月琴也注意到一位戴着眼镜、30多岁的同志，默不作声地坐在一边，神色显得有点拘束。这样，林月琴便结识了时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

林月琴时年23岁。她随红军总部卫生所到达陕北后，被调到中央妇女部工作了几个月，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迁往延安后，她又被选调到中央党校学习深造。由于刘桂兰的牵线搭桥，这一对有情人常来常往，渐渐地，两个人便谈起了恋爱。1937年5月16日，林月琴和罗荣桓终成眷属。

林月琴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她是当时全军43名校级女性军官之中唯一的一名女大校。

（作者：胡遵远，原载《军嫂》2016年第10期。）

红军老战士郝毅的长征故事

郝毅，安徽金寨白塔畈人，1932年2月参加红军，1936年入党。入伍时年仅15岁，任霍邱县少年国际团通信员，以后相继担任川北王坪总医院护理人员、延安边区总卫生部医院门诊部副主任、三五九旅四一六团卫生队队长、四十七军卫生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四十七军后勤部副部长、广西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广西军区后勤部正师职顾问。曾参加过第三次、第四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以及黑山阻击战、平津战役、宜昌战役、湘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获得过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身负重伤，爬着走上长征路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刚从鄂豫皖突围到湖北枣阳县土桥铺地区，又被敌人包围了，虽经多次突围均未成功。这时，方面军领导决定用两个团的兵力，坚守一制高点，掩护其他部队突围。要求这两个团必须坚持守到黄昏时，才能撤退，然后去追寻大部队。

撤退中，郝毅这个班只剩两名战士了。撤退到山中间时，敌人就追上来了，高声喊叫：“别跑，老子要抓活的。”郝毅回头一看，敌人已到山下。郝毅他们还是往山头跑，没有跑多远，敌人的炮弹就打来了。郝毅还在往山上跑，旁边的战友说：“小鬼，你负伤了。”郝毅回头一看，鲜血已经流了很长一段路程。不见血还不觉得痛，一见血，郝毅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妈呀，好痛呀！”，眼泪也不停地往下流。这时，一名战友用力地从裤腿上面撕下一条布，把郝毅的腿包扎了，然后就架起郝毅继续往山上走。到了山顶，天也黑了，不知道碰了什么一下子，郝毅就被绊倒了，一下子就滚到了山底下，什么也不知道了。

敌人退了，大部队也不知走到哪去了。第二天下午，当地老百姓上山打扫

战场，到了山顶，有人发现山沟里有两个小鬼，一动不动。他们走近一看，摸摸那个，身上已经凉了，鼻子也没气了。又过来摸摸这个，发觉身上还有点热，鼻子还有点气，他们就用门板把他抬到救护站。这个人就是郝毅。

救护站里缺医缺药，就是几个护士，没有药，怎么办？他们就用食盐煮的棉药花水给郝毅洗伤口。这一下把郝毅痛醒了，痛得直叫：“好痛呀，哎哟，好痛呀！你上的什么药？怎么这么痛？”护士说：“这不是药，这是用食盐放上棉花煮过的水、来给你洗伤口，多放了点盐，所以就痛，这样你才能醒过来了。”

郝毅问护士：“你们没有药？”她说：“有，但是大部队都带走了，我们也要走。”郝毅又问：“我是怎么来的？”她说：“昨天下午有几个老百姓，在你们打仗的那个山沟里看见有两个小鬼，他们用手摸摸那个小鬼，结果他的身体都凉了。又摸摸你，身上还有点热，就用门板给你抬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郝毅好不容易才睡着。突然，有一个伤员跑来叫醒他，说：“赶快起来，到外面集合，走！”郝毅想问有没有担架，未等郝毅说完，那个伤员就走了。

怎么办？房子里就剩郝毅一个人了，他还在叫担架来，可是叫了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怎么办？没办法，他就用力往外爬，费了很大劲，才从病房爬到门口。往外一看，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外面一点动静也没有，怎么办呢？爬！郝毅受伤的左腿一点力气也没有，动一下就痛得难受。郝毅就靠两只胳膊和一条腿，爬呀爬，爬了半天才爬到院子中间。

正在这时，来了一个人，他见郝毅在地上爬，还拖着一条腿，就找来一根棍子，让他顺着一条小道慢慢往前走。郝毅正想说声谢谢，还未说出来，那位同志已经走远了。

所谓二万五千里长征，对于郝毅来说，从此开始了。

天已大亮了，郝毅看见前面站有一个人，看样子在等人。郝毅走上前问：“同志，你知道少共国际团在哪？”他反问：“你是哪里的？”“我是从鄂豫皖出来的，没走几天，就被敌人堵住了，领导上要我们少共国际团在一个山头上打阻击，打到黄昏时再主动撤退……”他不让郝毅说了。他说：“为了加强主力部队，上级已经决定把少共国际团编到各团去，你也不用到其他地方去了，就跟我们一块走吧，有人问你的话，你就说是十师的。”

饥饿难耐，空着肚子急行军

“你们还有没有饭？”郝毅两天没有吃饭了。十师的同志告诉他：你到伙房去看看。伙房在哪里？对方指了指。郝毅正在找伙房，号兵突然吹响了集合

号，哨子也不停吹起来，部队集合好就整队出发了。郝毅虽然还没有找到伙房在哪里，但是不得不跟着部队出发了。一路上，不时地跌倒，皮碰破了、肉划伤了，鲜血染红了衣裤。但是，那个时候，根本顾不上这些，一心就是想要跟上大部队。那里是敌占区，掉队了，碰上坏人怎么办？不管怎样，要忍耐，不管前面的大部队是不是十师，只要跟上红军部队就行。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郝毅已经是两三天没有吃饭了，肚子饿得直叫，但没有办法。有时正好碰到别人在吃饭，郝毅就走上去向他们要点饭吃，但是这样的机会太少太少了。没办法，走在老百姓地里，碰到地里有什么就拿着棍子挖什么。那时，吃饱肚子是最重要的。有一次，碰到一块红薯地，郝毅便挖红薯，已挖出了一个，还想再挖两个带上。这时，前方突然来了一位肩上扛着一把锄头的老乡，郝毅以为是来抓他的，拿起小包就要走。老乡见他要走，就向他招招手，意思是你别走。老乡慢慢地走过来，不像是抓人的样子。他来后也不说话，就用锄头挖几个红薯递给郝毅。不知为什么，郝毅当时一下子就向他跪下了，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郝毅当时的心情非常激动，无法用言语表达。那位老乡用双手把他扶起来，把红薯给他，然后又用手向郝毅指了指，意思是你走吧，不要停留了。郝毅接过红薯，放在挂包里，一拐一拐地走了，走了很远，他还回头看看那位老乡……

看样子，那位老乡也不过30岁左右，是正常的庄稼汉。他为什么不和郝毅说话？可能因为那里是敌占区，他害怕有人告密，会吃官司。郝毅心想，看来敌占区的群众对共产党、对红军也是有好感的，否则的话，郝毅就不会有今天了。

面对围追堵截，拎着脑袋去冲锋

正当郝毅他们急行军时，前面的部队又被敌人堵住了。前面就是漫川关，听说敌人用3个团堵住这个口子、不让红军通过。此前，敌人早用飞机侦察过，这里的地形十分有利于防守。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红军面临的形势十分危险。据说，敌人上一次就计划在土桥铺消灭红四方面军，结果红军英雄们都冲出来了。当时，敌人为了消灭红四方面军，动用了10万大军。这一次，先由飞机侦察地形，后有陆军现地勘察，共调集兵力10多万，还吸收了一些新的部队参加。红军还是一万多人，没有增反而有减，敌我悬殊非常巨大。

在此严峻形势下，张国焘也没有好点子了，想来想去，他提出，把部队分成小分队，这样目标小、好突围。徐向前总指挥一听，立即说：“那正好符合敌人的心愿。敌人就是希望我们把部队分成一块一块的，这样更便于他们一口

一口地来吃，最后就吃完了。”陈昌浩也急着说：“总指挥，你就下决心吧，没有时间讨论了。”张国焘不说话了。徐向前说：“根据目前了解的情况看，我军正前方的西北角，是敌人的结合部。通常情况下，结合部的兵力配备比较弱，要突围就只有从西北角突。”说完，徐向前停下来，想听听张国焘的意见。张国焘说：“同意，你就下令吧。”“许世友，由你带领红四团，再给你加一个团，由西北角那里敌人的结合部向外突围。”许世友打了很多硬仗，他向徐向前表示，只要他许世友在，他就一定突围出去。许世友回团布置时，徐向前又到红四团团部来，一再叮嘱说：“这一仗关系到全军的命运，一定要打好啊。”“总指挥，你就放心好了。”

部队准备好了，谁知一出发就遇到了硬骨头，遇到的是敌人的强劲之旅，这一下子，双方就只有“硬对硬”了。经过几次交战，红军终于击溃了敌人。

郝毅他们所在的后面部队一拥而上，像缺了口的水库，口子越打越大。郝毅也紧跟着大部队前进。伤口痛吗？不知道，这时，郝毅一心想的就是冲出去才能活命。过了一会儿，敌人发现了，就从各个方面向突破口开炮。当时正值夜晚，炮弹打在石头上，到处开花。郝毅他们紧跟着部队猛跑，跑到天亮终于突围了出去。

三座雪山，刻着永恒的记忆

郝毅回忆说，他所在部队在长征途中一共爬了三座大雪山。一是大巴山，海拔3 000多米，常年积雪，雪深过膝。红军在这样的夜晚里，身着夏装、脚穿草鞋，身上盖的是蓝色天空，照的是天空的月亮，根本无法入睡。二是夹金山，海拔4 000多米，高山空气稀薄、缺氧，怎么办？红军咬着辣椒，一边刺激一边走。三是党岭山，海拔5 000多米，空气更加稀薄。要翻山，必须在中午前过去，否则就容易出现雪崩，即使你有千军万马，也会一下子就把你推到山下。

（作者：胡遵远、任绍松，原载中国红色旅游网，2016年8月22日。）

红军老战士朱世卿的烽火岁月

征程趣事多

朱世卿，1911年出生在安徽金寨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4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冬天，朱世卿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十师三十团一路辗转拼杀，来到了位于川陕边界的通江县。从鄂豫皖苏区入川陕以来，部队沿途奔波浴血奋战，加之供给严重不足，战士们个个饥饿难耐衣不遮体。当地老百姓看见这些红军队伍，都觉得很奇怪，看着他们虽像“叫花子”，却又人人扛着一条枪；说是像部队，又个个衣衫褴褛夜宿街头。于是感到十分恐慌的老百姓们就纷纷把家里吃的喝的，包括盐巴都藏起来，然后跑得远远的，躲得无影无踪。

饥寒交迫下，朱世卿他们彻夜难眠，风吹在脸上就像刀子割的一样，战士们蜷缩在一起，默默地忍受着。朱世卿的裤腿早已破成了碎片，两只脚冻得青一块紫一块，肚子里还饿得咕咕直叫。不得已，他就在地上连蹦带跳地跺着脚取暖。跺着跺着，忽然听见地上发出异样的声音。异样的响声激起了他探索的欲望，于是朱世卿拿起铲子刨了几下，结果发现地下露出一个大坑。仔细一看，坑里堆着一些山芋。这一下，不亚于看见了满屋黄金，战士们把山芋拿出来生起篝火烤，不一会儿浓浓的香味就飘了起来，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久违的饱饭。第二天早上开拔前，朱世卿和战友们在山芋坑里放了两块银元，并原封不动地填上了土。

朱世卿机智灵活的表现革命战争中举不胜举。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四川山里的老百姓最缺最珍贵的是盐巴。兵荒马乱土匪横行的年代里，每看到有部队过来，当地的老百姓都赶紧收起家里的粮食和盐巴，然后躲藏起来。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朱世卿所在的部队刚刚开到一个山村时，村里的百姓连同土豪早已跑得一千二净。部队把土豪家里的一头肥猪杀了让战士们

“美餐”一顿，可是由于没有盐，白花花的肥肉实在难以下咽。于是朱世卿就到处转，一圈回来之后，便忙活起来。大家看着他所在连里的战士大快朵颐地吃起肉来，心中十分纳闷。这时，时任西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王新亭盯着他们走过来，二话不说直接夹起一块肉放到嘴里，发现朱世卿他们吃的肉是有咸味的。王新亭好奇奇怪，朱世卿连忙把一碗放了盐的肉端给他，并说出其中的秘密。原来，朱世卿和战友们端着空碗，到老乡家挨家挨户地用水清洗了人家的空盐罐子，这样用洗出来的盐水煮肉就好吃多了。王新亭听罢，顺手朝朱世卿的头上拍了一下说道：“还是你小子的脑子灵活，鬼点子多！”

勇敢救陈赓

1941年开始，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了疯狂的“大扫荡”，占领了大片村庄，华北抗战一时处于极为艰难的境地。在此形势下，八路军转入敌后开展游击战，经常露宿山头野外，没有粮食吃，只能挖野菜充饥。

1941年大年初一，北风刺骨天寒地冻。三八六旅的旅部刚刚转移到山西省武乡县韩壁村。虽然是过年，但村子里到处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年味，听不到孩子们的嬉笑声和鞭炮声。刚安顿好部队，旅长陈赓就命令朱世卿带领5名侦察员，到山西黎城、涉县交界的林峰山侦察地形和敌情，以便部队随时转移。摸清当地的详细情况后，朱世卿他们返回时已是第二天凌晨4点多钟，突然听到部队所在的韩壁村枪炮声连成一片。“不好了，部队可能是被敌人包围了，旅部及政治部领导都在那里！”朱世卿立即带领侦察员快步往回赶，刚到村口，就看见只穿了件单薄衬衣的陈赓带了几个参谋、警卫员正向外边射击边突围。看着陈赓穿得单薄，朱世卿立即脱下自己的棉衣给陈赓穿上，并端起一挺机枪，和其他警卫战士一起冲到前面，一阵猛烈扫射，在绝境中杀开一条血路，保护陈赓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脱了险的陈赓非常惦记其他人员的突围情况，命令朱世卿带领两名侦察员马上返回韩壁村把剩余部队的情况摸清楚。当朱世卿再次返回韩壁村时，敌人正“清剿”现场，面对黑压压一大片日军，朱世卿只得率部返回复命……日军的这次突袭，使三八六旅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政治部主任苏精诚壮烈牺牲。

1942年底，朱世卿被上级调往山西洪洞县第二军分区警卫四团。临行前，陈赓双手拉住朱世卿的手，深情地说：“世卿啊，你跟我三年，给了我很多帮助和照顾，吃了不少苦，没什么送你的，送你一张照片留个纪念吧！”说着，陈赓将自己的一张照片递给了朱世卿。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朱世卿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他说这里面铭刻着战争的回忆、战友的情谊，一定要世代永远留着它。

活捉赵承绶

1948年7月，朱世卿在晋冀鲁豫军区十五纵队四十四旅四十五团任营长，参加了赫赫有名的晋中战役。晋中战役是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和晋绥军区部队在晋中地区向山西国民党军发起的进攻性战役。这场战役从1948年6月11日开始，至7月16日结束。在徐向前的指挥下，解放军近6万人消灭了阎锡山的10万大军，创造了我军历史上以少胜多的一个光辉战例。

7月初，徐向前决定以“前牵后逼”的战法，诱歼山西保安司令、野战军司令赵承绶的集团军。太岳部队协同太行部队展开破击战并构筑工事，切断了赵承绶部周围的铁路，使其与榆次、太原的大本营失掉联系而成为孤军。7月7日晚，十三纵与八纵二十二旅不顾极度疲劳赶到指定位置，与车辋村东西一线的太岳军区部队和晋中部队聚合，宛如两臂环抱将赵承绶部包围于大常镇东西一线的狭长地带。此时解放军已连续行军作战20多天，人员伤亡极大，伤员已占1/3。然而，徐向前的决心毫不动摇，他明确指出：“非打不可，有意见打完仗再提。做好工事后可以吃饭睡觉。总之有一条，不准让敌人突围，谁让敌人跑了就拿谁是问！”

本已无心恋战意欲逃跑的赵承绶，此时集中全力向徐沟一带冲击，以其2个军部、4个师、1个总队的兵力，按说尚有突围可能。谁知徐向前又及时调整部署，以十三纵位于北及西北、八纵位于西南、肖文玖集团军位于东北、十五纵位于东及东南，紧缩包围圈困敌于东西10千米、南北不足5千米的范围内。赵承绶顿时发觉形势不妙，再想突围逃跑为时已晚。面临末日，被压缩包围在西范、小常、南庄、新戴4个村里的赵承绶野战司令部和残部恐慌万分，他们已把粮食吃光，连骡、马、羊、犬也所剩无几。阎锡山每日派8架飞机过来空投食物。虽然飞机飞得很低，有时甚至都能看见驾驶员的脸，但是由于赵承绶部的阵地是南北窄、东西宽的狭长条状，因此许多空投物资随风飘荡，反而落在了解放军的阵地上。

7月11日至15日，大常村、南庄和西范村先后被解放军攻克。赵承绶集团军总部及其三十三军、第十总队共1万多人退守到小常村进行垂死挣扎。7月15日拂晓，徐向前命令100多门火炮猛击西范村敌军阵地。7月16日下午，华北军区十五纵队四十四旅担负着攻打小常村的突击队任务，在占领小常村东、南两面阵地后，协同在小常村北面和西面的兄弟部队，向赵承绶总部发起总攻。解放军先是吹起嘹亮的军号，接着杀声震天发起摧枯拉朽般的冲锋。然而，由于敌人占据了村里的制高点，架在屋顶上的重机枪不停地向外射击，解

放军一时无法攻入村中，战斗进入胶着状态。就在这时，解放军的一发炮弹落在敌军司令部附近的山墙上，朱世卿立即带领两个连配合大部队，跳出战壕直插敌军中心点太谷县小常村。战士们迅猛冲进了院子，与敌人面对面地肉搏起来，随后炸开后墙穿墙而入，冲到敌军司令部……战斗结束时，审问多名俘虏仍不见赵承绶踪迹。突然，机警的朱世卿在伙房里发现一个穿着百姓旧衣服、正故作镇定低头假装添柴的伙夫甚是可疑，经俘虏当场指认，此人正是赵承绶！当罪恶累累的赵承绶被押解交给上级时，全然没了往日的八面威风……这次战斗共俘敌 500 余人、山炮 6 门、重机枪 7 挺，一举歼灭了山西保安司令、野战军司令赵承绶的集团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战功卓越的朱世卿先后荣获过解放西南纪念章、解放西北纪念章、人民功臣章、解放纪念章和抗美援朝纪念章，于 1954 年从正团职岗位转业参加地方建设，先后任山西忻州公安处处长、黄河三门峡工程局保卫科科长、化工部化工筹建处处长、开封制药厂厂长等职。曾当选为开封市第四届政协委员、开封市第七届人大代表，1994 年离世。

（作者：胡遵远、张应松，原载《党史纵览》2018 年第 3 期。）

特灶班长李开文的感人故事

李开文，金寨槐树湾人，1897年出生，1929年参加“六霍起义”后加入红军队伍。由于他年龄比较大、文化程度很低，开始就在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九团担架队当班长，后来又当炊事员，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1937年被选调到中央任炊事班班长、特灶班班长，在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工作了11年。

新中国成立前夕，从中央机关文化学校归来的李开文，被领导找去谈话：“组织上准备安排你到天津糖厂当副厂长，有何意见？”“我想回老家。”就这样，他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土地——革命老区金寨县槐树湾乡，到响山寺粮站当了站长。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他又干出了一番不平凡的事业。

1956年，李开文到北京参加全国粮食战线英模大会。在大会主席台上，毛主席见到了李开文：“啊！老班长回来了。”一边拉住他的手，一边伸出大拇指说：“真了不起，你回去后又得了一个大劳动模范。”

李开文的长征故事

1932年农历8月间，李开文所在的部队开始进行西征。别看李开文个头不高，不到一米六，但人壮实，担子一上肩，一天可以走上一百多里的山路。因为脚功硬、吃得苦，人又忠厚，接到突围命令时，他就被团长从赤卫队里挑出来，正式转为红军担架班的班长。

“那一天，也巧，大部队从金寨县的板棚出发，正好从我家屋后经过。我不敢进屋。只偷着望了几眼，就跟着队伍走过去了。”1976年，李开文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说。

“队伍就从你家屋后经过，你也没有进家里向爱人告个别？”记者有点不理解。

“爱人？”李开文一怔。

“啊，我是说，你没去同老婆打声招呼？”

“没有。”

“来不及？”

“是不敢。”

“为什么？”

“你想，”李开文说，“她刚生下了一对双胞胎，才16天，我要是一进屋，准当俘虏。我这个人不怕白狗子的子弹，就怕老婆的眼泪。”

就这样，他心一狠，就是走到自己家屋后的竹园子里了也没停步。

谁知，他却被跑出来看过往队伍的大儿子李锦旭发现了。八岁的李锦旭哭着喊着，奔到他的跟前，说：“爸，妈妈天天念着你，等你回家呢！”

他不敢看孩子，更不敢停下。

“李班长，你还是回去看下吧！”边上的担架队员忍不住地劝他。

李开文这才停下来，回了一下头，望一眼哭成了泪人的儿子。但他马上又折过脸，走得更快了。他再没有停下，不过，眼泪已经把视线模糊了。

这时儿子疯了似的冲过来，一下子抱住他的一条腿不放。李开文不由一惊，不敢再犹豫了，一脚把儿子踢开。

被踢了一脚的李锦旭，呆在了地上，没有再去追。李开文也没有再回头。就这样，他离开了板棚，离开了金寨，离开了大别山。

回忆起这段往事，虽然已过去了半个世纪，李开文仍然禁不住眼圈发红。他沉默了半晌，才对记者说：“革命是不能回头的，我的命大，当年许多战士就牺牲在西撤（西征）的路上。”

西征的路，是杀出来的一条血路。成为红军战士的李开文，一天没有摸过枪，枪声一响，他就带着他的担架一班，两眼不眨地盯住火线上的战士，战士们冲上去了，他们就地卧倒。有战士倒下了，他们就冲上去，首长负伤了就抬着首长，这时他们的肩头就会变成一个流动的“指挥所”。

为了甩掉围追堵截的敌人，部队忍痛丢掉了武器轻装前进。但是，担架上躺着的战士不可能丢掉，担架上负了伤的首长更丢不得。因此，李开文带领的担架班，每天都在负重前行。

离开了大别山根据地的红军部队，突然打响的遭遇战越来越多。因此，常常要不停地冲锋，连天连夜地急行军。大路都让敌人占领了，红军只能走那些没人愿走的山道。李开文脚上的草鞋早就磨破了，一走就留下一个血脚印。

七十三师数千名干部战士都害上了烂脚病，一边赶着路，一边龇牙咧嘴，忍不住地叫。有些战士吃不消，担架班里的一个老乡，有一天要溜走，被李开文发现了，他上去一把将那个老乡抓住。

老乡苦苦哀求：“李班长，我撑不住了，放我回家吧！”

李开文问：“回大别山去？”

“是。”

“你咋这么糊涂！你以为你还回得了大别山？”

老乡不解地望着李开文。

李开文开导他说：“你参加了革命，就成了离弦的箭，没有了回头的路。现在大别山已经落在敌人手里了，你回去就等于去找死。既然回去是一个死，不如跟着队伍杀一条活路来！”

老乡哑巴了半天，最后跟着李开文归了队。

李开文跟着队伍从皖西一直走到川北。这天刚到汉中附近，他们又被尾随而来的侦察敌机发现了，数十枚炸弹扔进了躲闪不及的担架队中。随着山摇地动的爆炸声，还没等李开文反应过来，他一下就被埋进了碎石泥土中。

战士们把他扒出来的时候，他已不省人事，大家都认定他已经牺牲，把他拖到死人堆里，准备找个地方统一安葬。

那一天，那个被他劝回归队的老乡，听说李开文在这次敌机的空袭中中弹身亡，怎么也不相信，硬是用手扒出了李开文，他哭喊道：“李班长，我是你老乡，你可不能就这样走了啊，我还要跟你奔一条活路呢！”

老乡一边抹泪，一边下意识地把手指头伸到李开文的鼻子前，竟发现还有气。

老乡大吃一惊。连忙跑到炊事班，找来小半碗米汤，掰开李开文的牙齿喂起来。谁知，李开文竟被他喂活了过来！

这消息被团长知道了，团长说：“这小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这以后，抬了一路别人的李开文，躺在了别人的担架上。队伍到达四川省的通江县驻扎下来。他被送进了医院。这一住，就是一年。

终于熬到了出院的这一天，他却突然改变了主意，找到自己的部队，找到团长说：“给我一支枪吧，我要当个真正的战士！”

团长说：“你早已经是真正的战士了！”说罢瞅着李开文哈哈大笑。

这把李开文笑傻了。他不知道自己要求扛枪上前线打仗有什么好笑的。

团长摸着自己的耳朵大声对他说：“聋子怎么可以打仗呢！你现在连担架班也去不成了。”

李开文一下愣住了：“那我还能干什么？”

“你就去烧饭吧。”

李开文听了，却不说话。

团长大声问：“怎么，你不乐意？”

李开文无可奈何地说：“只要能留在部队就好。”

团长见李开文回答得有些勉强，皱了皱眉头。李开文生怕团长改变主意，便慌忙脱掉身上的军衣，用才学会的四川话大声答道：“要得！”

1935年8月，李开文随部队进入草地。自古以来，人们都说，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可李开文最“难为”的还不是“无米之炊”。最难的，是没柴。尽管草地上满眼是草，可是那些草湿漉漉的，甚至到了宿营时，也找不到一块干净地皮。再说了，草地上的天，说变就变。一会儿大雨滂沱，一会儿冰雹如注，一会儿又是漫天飞雪。有许多战士走着走着，就倒在了泥沼中，再没有走出草地。

进入草地不久，人们发现，李开文变得面黄肌瘦，肚子也开始浮肿，浮肿得连走路也成了问题。但是等部队驻扎下来，大家这才注意到，他的肚子不是浮肿，那是他把能引火的湿漉漉的柴草塞进自己的衣服里。他是在用自己的体温把那些湿柴焐干，以便到宿营时，能马上把军灶烧着。

当中国工农红军三军会师会宁后，李开文就被调入中央红军。他做梦也想不到，调入中央红军后，不久又被派往延安，直接分配到中央机关，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炊事班班长，接着便调任中央特灶班班长，天天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生活在一起。

有人羡慕地问李开文：“你做了毛主席的炊事员，一定感到很骄傲吧！”

李开文听了，慌忙说：“我哪敢骄傲。不能瞎讲。毛主席不搞特殊化，我们不是只给毛主席一人做饭。在特灶班吃饭的，有毛主席，还有周副主席，陈云部长，李富春部长，多着呢。”

有一次，其他首长的饭菜都由秘书们取走了，就是不见毛主席的秘书来，他就端着热好的饭菜送过去。那是隆冬天，到毛主席的窑洞时，门一推开，一阵寒风也跟着卷了进去。他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听到开门声，毛主席抬起了头，恰好看到了李开文在打寒颤，他马上停下笔，说道：“老班长，我看你穿得太单薄了。”

李开文忙掩上门，连声说：“不冷，不冷，我习惯了。”

毛主席笑着放下笔，起身取出一件羊皮背心递给他。李开文放下饭菜，一个劲地摇手，执意不要。但是，毛主席坚持要给，不要不行。

毛主席说：“叫你穿上就穿上，你个小，我个子大，抗冷。你老班长要是冻病了，我就吃不到你做的那道我最爱吃的菜了！”

李开文穿上羊皮背心，抬起头问：“主席，我做的哪样菜，你说最爱吃？”

毛主席说：“当然是红烧肉嘛！”

李开文一听，不好意思起来。他刚来延安时就听说，毛主席是湖南人，最

爱吃湖南的红烧肉，他就偷偷跑去请教别的炊事班的大师傅，回来后照着葫芦画瓢，试了几次，自己都觉得拿不出手，没想到竟得到了毛主席的充分肯定。

穿着毛主席给的羊皮背心，李开文感到暖和了许多，回到特灶班，他发现刚调来的一个小战士穿得比他还单薄，于是他就把刚刚焐暖和的羊皮背心脱下来给了小战士。

1942年，为了打破蒋介石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延安掀起了大生产运动。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样，中央特灶班不仅要负责中央首长的一日三餐，还要随时随地把茶水送到田间地头。每天饭前的一次茶水都是李开文挑过去的，每次他一去，还离得老远时毛主席就会大声地问：“聋子，饭烧好了吗？”他就知道主席已经饿了，便高声应道：“好了！可以收工了。”每到这时，毛主席又会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喊道：“收家伙，吃饱了肚子再做！”

中央特灶班当时只有7个人，大生产运动中，他们除去送茶送饭，也开荒。班里多是年轻的小伙子，数李开文的年纪大，于是大家就不让他下田，说家里总归要留个人。李开文拗不过，就留下来烧水做饭。他除了按时烧水做饭，还打起草鞋来，他不光眼疾手快，还能打出花样。同样是草鞋，他会把收集来的各色布条、彩线，像插花织锦似的掺进草绳里，打出的草鞋既中看又耐穿。

他不光上班时见缝插针地打，大伙收工时也打。特灶班的年轻人一天忙活下来，爱凑在一起“侃大山”，有说有笑，好不热闹，他就坐在一边打他的草鞋。大伙洗漱完上床了，他还要再打上一双。打到后来，放米放菜的小库房里，草鞋摞得有小山高了，他就一筐筐地送到开荒种田的战士们手中。

他打的草鞋毛主席穿过，周副主席、陈云部长和李富春部长都穿过，毛主席的小女儿李讷也穿过。

当时李讷才三岁，李开文特地为她打了一双小草鞋，鞋面上还特地配上了两朵红花。小李讷穿在脚上，欢喜得又蹦又跳。主席瞧着，也乐，就说：“你还不快谢谢李伯伯！”小李讷连忙转过身，跑到李开文跟前，鞠了一大躬。李开文也乐了，问她：“咋啦？”李讷一字一顿地说：“爸爸要我谢谢李伯伯！”说罢却又认真地问：“你是李伯伯吗？”

问得大家都笑了。

那一年，李开文被评上了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劳动英雄。在上千人的大会上，毛主席亲自把一面白布毛边的奖状授给他，要他代表劳动英雄讲讲话。

李开文一上台心就慌了，感到自己没做出啥成绩，毛主席还亲手把劳动英雄的奖状给了自己，又要他代表讲话，他试着张了几次嘴，还没说出来个字，

脸就红到了脖子根。

毛主席鼓励道：“老李，想说听就说啥。”

李开文于是说：“我没做出什么样子，往后一定拿出成绩来。”

才说一句就愣在了台上。

毛主席带头鼓掌，大家也跟着鼓掌。李开文趁着掌声，走下主席台，因为走得太慌张，差点摔了一跤。

1947年2月，蒋介石从南京飞往西安，亲自部署胡宗南突袭延安。胡宗南为使“突袭”一举成功，作战计划连手下的师长、军长都不透露，只告知部队要集结，集结后要干吗却严加保密。其实，没等胡宗南的部队集结完毕，毛泽东已是成竹在胸。毛主席说：“存人失地，地终可得；存地失人，必人地两失。”所以，当胡宗南集中了34个旅的23万人马攻入延安时，才发现是座空城。

李开文跟随毛泽东、周恩来撤出延安，转战陕北。三月的陕北，天寒地冻，黄土高原一片肃杀之气。这可急坏了李开文。到处是冰天雪地，拖垮了首长们的身体怎么得了！

李开文一连两宿睡不着。这天，已将近夜半时分，躺在床上的李开文，骨碌爬起来。他悄悄唤醒两个身强力壮的小战士，叫他俩跟自己出一趟门。

两个战士迷迷瞪瞪钻出被窝，因为太冷，缩着脑袋问：“去哪？”

李开文小声说：“回延安。”

“回延安？”两个战士吃惊地望着李开文，以为他在开玩笑。延安已经被胡宗南的重兵占领了，半夜三更摸回去，岂不是送死？

李开文不容二人分说，说声“走”，先出了门。两个战士不敢怠慢，赶忙穿衣下床，紧紧跟上。

其实，李开文虽是个粗人，却粗中有细。他断定，这天寒地冻的，又是夜半三更，沿途的敌人哨兵一准会躲在哨棚里；何况他们又是一身夜色打扮，神不知、鬼不觉。再说了，特灶班随军撤出延安前，上级叫大家轻装出发，李开文却舍不得，他把大量的腊肉、腊鹅、咸鱼、咸鸡蛋埋进了一处秘密的窑洞。

当李开文带着两个战士抄小路直奔30里外的延安城，取了3担食物，然后手脚麻利地再回到驻地时，天也才鱼肚白。

开饭时，毛主席发现餐桌上忽然丰富了很多，吃惊地问李开文：“聋子，你会变戏法不成，怎么弄出了这许多东西？”

李开文直笑：“我和两个战士回了趟延安。”

毛主席更瞪圆了眼睛：“当真？”

“当真！”

毛主席筷子一摔，脸沉了下来：“这样冒险的事，你也去干！你是位老同志了，为什么不守纪律？”

李开文见主席真的生气了，忙分辩：“敌人没我们路熟。”

毛主席半天没动筷子，见李开文低着头，一个劲地抹泪，又有些不忍。于是招呼大家：“大家都吃吧，吃！别辜负了老班长的一番心意。这可是老李和两个战士整出性命讨回来的。吃吧，吃了有劲，争取一年收复延安！”

果然没出5个月，胡宗南的20多万人马就被拖得疲惫不堪。只用了1年时间，胡宗南的34个旅便被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赶出了延安。

延安收复后，毛泽东就率中央机关从此离开了陕北，东渡黄河，到了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

这时，51岁的李开文，没再随部队去西柏坡，也没留在特灶班，组织上将他安排到了中共中央群工部。一到群工部，就被安排到中央干部文化学校学习。

临行前，李开文去和毛主席告别。毛主席握着李开文的手，很久很久不放，动情地说道：“你先进学校学习，等革命胜利了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没文化不行啊！”

李开文多么不想离开特灶班啊，多么不愿离开这么多年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和中央领导啊！他强忍着才没让泪水流出来。

“有机会要来看我，”毛泽东叮嘱道，“不要躲我啊！”

“要得！要得！”李开文声音有些哽咽，除了想到在四川学会的这句话，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李开文的“两不”选择

1949年7月，李开文从干部学校毕业了，他高高兴兴地回到中央群工部，要求给自己分配工作。

群工部部长李维汉和李开文是老熟人，他半开玩笑地说：“李开文同志，组织上考虑你过去吃了太多的苦，现在就给你安排一个‘甜’的工作。决定派你去天津当糖厂副厂长。”

李开文一听，吓了一跳，忙问：“天津糖厂的干部群众很多吧？”李维汉说：“不会少于一千人吧！”

李开文直摇头：“不行，不行！这么多人，够得上一个团的编制了。这么大的厂啊，我哪有本事管好这么大的个摊子呀！不行，不行！”

他接着要求：“李部长，我不想去天津，也当不了那个副厂长，你还是让

我回大别山老家吧！”

“回老家？”李维汉有些意外。

李开文没有拐弯抹角，直率地说：“解放大军打到江南了，我的家乡早解放了，我要回去工作。再说，老婆孩子还在家里等着我呢！”

李维汉沉吟了一下，劝道，“老李啊，你如果不想去天津，留在北京工作也行啊！”

李开文坚持说：“我还是回去找她们。17年前，我硬着心肠丢开了她们，现在仗打完了，天下太平了，我得回去偿还这些年欠她们的债呀！”

李维汉知道李开文为人老实，不讲假话，但脾气倔。既然他决心已下，自己也不便再动，就安排工作人员把李开文的组织关系转到安徽。

离开北京之前，李开文很想见主席一面。他想，这一回家乡，就隔上了千山万水，今后不一定有机会能再见主席了。听说主席住在香山，就一路问过去，在双清别墅见到了毛主席。

毛主席关切地问李开文：“听说你不去天津糖厂？”

李开文说：“天津糖厂的糖再甜，也没有家乡的水甜啊！”

毛主席一听笑了：“你这是要‘叶落归根’啊。”

李开文说：“我识字不多，不是一块当厂长的料子，没有那么大能耐。回到家乡后，找个自己能够干得了的工作，好好干！”

毛主席高兴地说：“回去就回去吧，你要经常写信来。到哪里都要记住，你是从中央出去的！”

李开文的组织关系转到了安徽，安徽有关部门把他介绍到六安地委组织部。

地委领导试探着问：“李开文同志，您想从事什么样工作呀？”

李开文说：“服从分配，干什么工作都行。”

“那您就回金寨县当个副县长，怎么样呀？”

李开文一听，又是吃惊不小。心想：叫我去天津糖厂当副厂长，我已经感到一千多人太多，现在让我回家乡当副县长，一个县少说也有二三十万人，我哪有这个本事去领导呀！

他又是把手像蒲扇般地摇，说：“不行，不行，这当官的事我干不了。”

地委领导见李开文态度坚决，不像开玩笑，十分为难，说道：“您先在地区住下来。再想想，考虑一下，过两天我们再落实这件事。”

李开文说：“我就不在这里住了，先回老家看看。”

后来，李开文决定哪儿也不去，就在家乡附近的响山寺粮站工作。县委也不得不依了他。李开文接受了金寨县委给他的“响山寺粮站站长”的头衔。

响山寺粮站是一个中心粮站，下面还管着古碑、双河、南溪和帽顶山四个粮库，方圆上百里的地盘。为管理好这些粮库，通往这些粮库的山间小道，每一块石头差不多都被他踩过。

他一点儿也不像一个站长。一次，他踏着积雪走进古碑粮库，他的脚步很轻，直到守库的年轻人感觉到冰冷的屋子里有了暖气才吃惊地发现李开文已经把炭火盆烧着了。并且，已经把他的裤子架在火盘上烤热了。见年轻人醒来了，李开文慈祥地说道：“小同志，棉裤暖和了。起来吧，快到上班时间了。”

他更像粮站的一个长工。别人不愿钻进去的、黑漆漆的仓板底下，他钻进去了，把所有的鼠洞一个个地堵起来；别人不愿爬上的高高的屋顶，他爬上去了，将黄鼠狼开的“天窗”一块一块地补好；别人想不到的些小事，他也会当成大事来办。

粮库最大的消耗品就是扫帚。为了减少开支，他扛着扁担、带上柴刀，自己上山砍原材料做扫帚。没出几天，响山寺粮站的大院里便冒出了一座芭茅花的小山，站长室变成了扫帚加工厂。

大家觉得难以理解，响山寺粮站再缺钱也不在乎一点买扫把的钱吧，为啥还要这样抠门，这样的找累？

李开文的理由是：街上卖的扫把也是用手做成来的，咱自己也有一双手，干吗啥都用钱买呢？他常挂在嘴边的是：毛主席告诉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长出这双手就是为了劳动的。他从来都是穿自己编织的草鞋，吃自己种的蔬菜，用自己编扎的扫帚扫地，用自己磨出的柴刀砍柴。

响山寺粮站的下面，就是一个小集市，边上有一条一丈多宽的小河。多年来，河面上一直架着几根树干当桥板，人走在上面，摇摇晃晃。一旦遇上连阴雨，山洪暴发，人们不但赶不成集，也没办法来粮站买粮食。李开文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着急，于是他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备齐了木料，请来一个木工，两个人忙了一个多月，终于修成了一座桥。这事，一时传为佳话，当地山民就将这座桥称作“红军桥”。

1956年底，全国各条战线上的英雄模范人物云集京城，李开文当选上全国粮食系统的劳动模范，并登上大会的主席台。毛主席得知李开文现在又成了全国劳模，并来到北京，非常高兴，亲自请李开文到家里吃饭。

12月的北京，冰天雪地，出现在毛主席面前的李开文，一身单薄的黑色小棉袄，一双破旧的黑布鞋。主席见他穿得太少，就送给他一件皮大衣和一双毛皮鞋。

李开文穿着毛主席送给他的皮大衣和毛皮鞋回到响山寺。一到家，好多乡亲都拥上来，听说他不仅见到了毛主席，还到了毛主席家里做客。身上的皮

◆ 将军县的初心故事

衣、脚上的皮鞋，都是毛主席送的，一个个都非常羡慕，都说他太有福气！

后来，县里举办“建国十周年成就展”时，想要他的大衣和皮鞋，他很高兴地交了上去。展览馆留下了那件皮大衣，毛皮鞋还给了李开文。李开文十分珍惜那双皮鞋，舍不得穿，当宝贝似的收在柜子里，想主席了，就把它拿出来摸摸、瞅瞅。

（作者：胡遵远，原载《实践论坛》2017年第4期。）

一位西路军战士的“流浪”生涯

廖永和，安徽金寨人，1916年12月出生，1929年12岁时就是一名儿童团员了，1931年参加红军，1932年随部队离开大别山，1934年在四川苍溪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担任过青年干事、连长、党支部书记，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副营长、营长等职。

大军西去兵如沙

1932年10月，廖永和随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西去川陕。后来，他们在长征途中三过雪山草地，历尽艰难曲折，1936年10月，总算到了陕北会宁。当时，廖永和任营长。

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廖永和他们非常高兴，认为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大家可以集中力量去打蒋介石和日本了。可是，还不到一个星期，新的命令就下来了，上面要红四方面军去西渡黄河。于是，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相继西渡。红四军、三十一军为敌所阻，未能西渡，后来在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下东进了。渡过黄河的红军，不久即改称西路军，分成三个梯队，向河西走廊进发。

西路军面临的主要敌人是回族军阀马步芳等“五马”。西路军的将士们勇敢善战，打了不少胜仗，到11月份，先后攻占了古浪、永昌、山丹等县城，不断地给敌人以重大的杀伤。但是，河西走廊自然条件对我军非常不利，北临长城之外的荒凉沙漠，南临终年积雪的祁连山脉，人烟稀少，又没有我党我军的工作基础。那一带气候寒冷，入冬后，我军依然是破衣草鞋，没有御寒装备。在频繁而又激烈的战斗中，粮食弹药极其缺乏，部队减员非常严重。1937年1月中旬，红五军在高台苦战九日，最终还是城池陷落，军长董振堂及以下3000余人大都壮烈牺牲。红三十军在永昌以东的三天战斗中，损失也很严重。到了3月份，渡河时的两万多人剩下的已不足3000人。

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余部分成3个支队分别行动，有的深入祁连山区打游击，廖永和所在的左支队，则奉命继续西进、向新疆转移。后来，廖永和在倪家营子战斗中，左腿负了伤，拄着棍子勉强行走。他们一行12人，由廖永和负责，沿着左支队的行军方向，在祁连山里向西进发。约有两个月，没有人烟。一路上没有吃的，只能拣一些兽皮兽骨砸碎了煮一煮充饥。

1937年5月的一天，他们12人到了柴达木盆地的苏里，在一个小石洞里过夜。黎明前，他们中一位当过指导员的洪同志，也是安徽金寨人，起来烧开水，忽然发现洞外有人影移动。洪指导员拿起一支枪，说了声：“我去看看。”一声枪响，洪指导员倒在了地下。廖永和与一位班长立即各拿一支步枪，奋起抵抗。接着班长也牺牲了，廖永和的左腿被打断，当场昏了过去。

在同志们的精心护理下，八天以后，廖永和才慢慢地清醒过来。廖永和看了看周围的同志，想坐起来，但身子像散了架一样，左腿一阵剧痛，差点又晕了过去。他意识到自己的腿部负了伤，想继续赶路已经不可能了。为了不连累大家，便说：“你们别守我了，快找部队去吧！”大家表示要走一块儿走、要死一块儿死。他狠了狠心说：“干脆你们抬个石头把我压死算了，省得再挂念我！”大家要抬着他走，廖永和心想：同志们身体都比较虚弱，单身长途行军都很困难，哪能再增加负担呢？于是，廖永和就决定留下14岁的小同志何建德陪伴自己，其余八人继续前进。同志们表示，如果不死，如果在附近找到吃的东西，一定给廖永和他们送来。廖永和指定担任过护士长的胡传基（也是金家寨人）带队，并托他在条件可能的时候，给自己家里送个家信。同志们为廖永和找来许多散失在草地、石滩上的兽皮兽骨等可供充饥的东西，又弄来许多干草，为他重新做了一个“床铺”。分别时，他们心里都很难过，大家依依难舍、迟迟不愿离去。

石洞栖身算作家

廖永和他们苏里石洞里住了40多天。到了夏季，柴达木的风光美丽起来，牧草长、牛羊壮，景色宜人。但是，他却躺在干草铺上不能行动，根本没有心思去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一天，来了3个骑马的人，看一看他们就走了。于是在草原上就流传开“苏里石洞里住着两个人”的消息。

又过了几天，一位老大娘带着她的儿子到石洞来看廖永和他们，她会讲几句汉语，问廖永和是什么人的军队？到这儿来干什么？廖永和告诉她：“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是打蒋介石、打马步芳、马步青到这儿来的，部队受了损失、我们落难到这儿。”坐了一会儿，廖永和看她没有什么恶意，便向她要些吃的东西。第二天，她的儿子又给廖永和他们送来了一些黄米、麦面和盐。

半个月后，廖永和想试着行动，但是不成，伤势太重了。老大娘又派她的儿子和一位姑娘来告诉廖永和：头人要把陪伴廖永和的小何拉去做奴隶。她们愿意把廖永和接到自己家去。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人们把廖永和抬上马，到了老大娘家。小何硬是被头人派来的打手拉走了。眼看着小何被强行拉走，廖永和心里十分难受！

廖永和在老大娘家的蒙古包外面住了两个多月后，拄着棍子能勉强行动了，他就替头人的管家放羊。他们早晚各给半碗炒面。由于断腿行动迟缓，跟不上肥壮的羊群，廖永和为此经常受到斥责，稍有不慎，管家的皮鞭就没头没脸地打来。他反抗，结果被打得更加厉害，有两次还被打得昏死过去。廖永和试图逃跑去找党、找红军，但是都没有成功。

蒙古族的贫苦牧民是善良的、友好的。他们只有很少的几头牛羊，不足以维持生活，经常受到蒙古王爷、管家的剥削蹂躏。他们对廖永和的身世非常同情，不断给他一些小的帮助，劝他坚强地活下去。一位老大爷还偷偷地告诉他，他的左腿就是管家开枪打断的。天长日久，廖永和逐渐地由听得懂蒙语到学会了蒙语，和贫苦的牧民们和睦相处，还能互通消息。

塞外流浪十二载

1939年10月，廖永和所在的这个蒙古族小部落自苏里向德令哈以西迁移，10多天后到达一处草原。不多久，游牧的一批哈萨克族人也从西北方来到这里，先是相安无事，继而发生摩擦纠纷。1942年，蒙哈两族发生了武装冲突，规模越来越大，伤亡严重。廖永和所在的那个蒙古族小部落被冲散了。廖永和脱离了小部落，开始在草原上流浪，在蒙古族老乡家放羊、做零工。

1942年2月，草原上风雪阵阵。在德令哈附近，廖永和遇到一位年轻的蒙古族姑娘，名叫格民，她的父亲已经病故，哥哥在蒙哈民族武装冲突中被打死，母亲和妹妹又冲散了。她独自一人流落在草原给人帮工放牧，生活贫苦，受尽欺凌。同是天涯可怜人，都有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他们每次见面，彼此都非常关怀，久久不愿分离。阶级的友爱，把民族间的距离弥合了。一次，格民红着脸告诉廖永和：“我俩都是受苦人，心心相印，就住在一块吧！”廖永和听后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很快，他们就结了婚，找了两块毡片搭了个小帐篷，算是有了一个“家”。

柴达木盆地，处于西口塞外，日夜温差大，无霜期短，生产条件很差，流浪的奴隶般的生活更是痛苦不堪。廖永和他们仍旧靠卖工过日子，仍旧要到处流浪。他们有时挖个地窖，搭个篷子住下去，种点青稞弥补生活的不足。白

天，他们夫妻俩辛勤地劳动，以求不饿肚皮。晚上，廖永和总是对着天空，呆呆地思念培育他成长的党、思念红军、思念父母、思念鄂豫皖苏区的家乡。月儿常圆，他盼望自己和他们也能团圆。格民察觉出丈夫的心思，便极力地安慰他。格民和他相依为命，真诚地互助互爱。1944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有了孩子，就有了希望。廖永和怀着一定能够找到党、找到红军的信念，在妻子格民的帮助下，终于在西口塞外度过了艰难熬的12年岁月。

种子逢春又发芽

1949年9月初，廖永和在德令哈听说青海来了解放军，把马步芳打跑了。解放军是什么样的军队呢？恰巧，有几个蒙古族的头人要到湟中县塔尔寺拜佛，廖永和主动要求为他们拉骆驼。到了塔尔寺，他听了解放军某团政委兼湟中县委书记在大会上的报告。廖永和感到非常痛心，由于在蒙古族地区生活了12年，他已经听不懂汉语。团政委兼县委书记的报告，他只听懂了减租减息一件事，还没听懂怎样减法。接着，解放军秧歌队出来做宣传演出，在一个节目里使用了镰刀斧头大红旗，廖永和猛地明白了：1929年在大别山闹革命，不就是高举着镰刀斧头的旗子吗？1934年入党，不就是站在镰刀斧头的旗帜下宣誓吗？解放军就是共产党的军队啊！

廖永和马上找到县委书记，含着热泪诉说自己的经历，要求收留，可是讲了半天书记还是不明白他的意思。后来只好给他开了证明，把他介绍到西宁去找省军管会主任廖汉生。

经过翻译，话是讲通了，可是因为没人证明，廖汉生也不能接收他。在场的人们都发现，廖永和的眼神里那一丝发亮的光彩黯淡了！第二天，廖汉生就派人把他找了回去，让他进了干部训练班。原来，廖汉生是本着既严格审查，又热情关怀的精神处理这件事情的。经常饿肚子的人才能闻到米饭香，做过奴隶的人才能真正懂得自由的可贵。12年的苦难生活终于结束了！廖永和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得到了第二次解放！

1950年3月，廖永和在训练班里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这时，混进训练班的特务造谣破坏，说什么“马步芳快回来了”。一些立场不够坚定的新学员被吓得偷偷地离开了训练班。廖永和积极协助领导，经过周密调查，终于抓住了那个特务。

5月，青海省都兰县成立，廖永和被调往都兰县工作，任德令哈区区长。这个区距县委机关驻地有400多里，草原荒芜、人烟稀少，匪徒出没无常。廖永和同一个蒙古族出身的文书，骑着两匹马到了德令哈。第二天，便有蒙古族

老乡报告说：“从新疆来了一批土匪，前面的19人已经到达，叫准备粮草，说后面还有两三千人。他们给海西的大王爷送了礼物。大王爷给了帐篷，给了牛羊等食品。”廖永和得到情报的第二天，就派人与大王爷松安邦杰力联系。这个人很反动，摆架子、不接见。经过同贫苦牧民密商，廖永和便借大王爷的名义，“请”来了两个土匪头子。

一见面，那两个家伙知道中了计，想退回去，可是已经晚了。廖永和说：“我是把你们找来谈判的。”接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宣传党的政策，迫使这两个头子下令交出十二支步枪、一挺机枪、一支手枪、几十颗手榴弹和一些子弹。廖永和派两个老乡把这两个自称“连长”“排长”的人送到县里。县里派来一个排的武装把余下的17人也带走了，以后又转送到西宁。经审讯，这19个人原来是在新疆搞叛乱的伪军残部。那两个头子不是什么连长、排长，而是叛军的师长、团长。说什么后面还有两三千人，全是骗人的假话，虚张声势罢了。这伙叛匪逃到柴达木，是为了勾结海西左盟监长、蒙古的大王爷松安邦杰力共同扩大叛乱的。瓦解了这伙匪徒，粉碎了这些民族败类的罪恶阴谋，就保住了海西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此，上级党委还表彰了廖永和，称赞他为革命立了新功。

解放后，廖永和长期工作与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在海西蒙藏哈萨克自治州担任县长、县委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多次打听，廖永和得知家里的地址和父亲的下落。1954年冬，他回家乡探亲。他的家已由金寨关庙的大埠口搬到了汤家汇的竹畈村，他父亲和叔父还住在一起。冬天的太阳，显得格外温暖，故乡的山山水水更加吸引了他这个少小离家的游子。到了家门口，见到有10多个人正在向阳的墙边聊天、边晒太阳。廖永和就问：“廖永春（他弟弟）家住在哪里？”廖永和的小侄儿在一旁认出了他，就忙着喊：“四老（即四叔）回来了！四老回来了！”一阵叫喊，聚来的乡亲更多了。父亲出来看见廖永和，激动过度，当场昏过去了。姐姐来看他，没说话，也哭死了过去。原来，当年的护士长胡传基，自苏里石洞分别后，辗转回到了家乡，他向廖永和的父亲说了当时的情况，家里人都认为廖永和早已不在人世了。所以，后来当廖永和写信给父亲时，父亲还以为是哪位好心的同志冒名写信安慰他的呢。现在亲人重逢，全家人尽情地放声大哭了一场。

廖永和经常对亲人和同志们说：“在河西走廊，几乎是全军覆没，我在柴达木流浪飘泊12年，过着难以忍受的苦难生活，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解放了中国，再次解放了我！”

（作者：胡遵远，原载《铁军·纵横》2018年第10期。）

第三部分

坚守初心

在革命早期，金寨县广大共产党员们坚守初心、视死如归；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金寨县的革命先烈们大义凛然、舍生取义；广大金寨籍的老红军、老将军们，无论面对多么大的困难和挫折，始终都坚守初心、永不变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初心就是要牢记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永远不能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建党以来，我们党团结和带领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的。但是，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我们一定要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不能走着走着就变了味，要永远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四起三落终不悔 一代风范励后人

——洪学智的初心与使命

洪学智，金寨县双河镇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军现代后勤工作的开拓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原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原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1955年和1988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人称“六星上将”。

筹集粮草全力支援中央纵队

1935年4月，洪学智率红四军政治部、红十二师留在后方侧尾，负责建立地方政权，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中央红军。7月份接到指示，中央纵队要经过黑水、芦花，要洪学智准备粮草，并负责接收中央红军的伤病员。

洪学智立即组织民运部、保卫部等机关和直属队，连夜出发，翻山越涧，打开了几个反动分子的寨子，筹集到几万斤粮食和几百只牛羊，为中央纵队共送去4批粮食、牛羊和慰问品，并圆满地完成了中央红军伤病员的转送和安置的工作任务。

在中央纵队离开黑水、芦花时，洪学智第一次见到了刘少奇。刘少奇身材修长，态度和蔼可亲，见到洪学智很高兴。他紧紧地握着洪学智的手说：“洪主任，谢谢你了，也谢谢红四军对中央纵队的大力支持，你们送来的粮食、牛羊和慰问品，可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

不离不弃五战士“死而复生”

1935年10月，红四方面军发动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强渡大金川江，继而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再克天全、宝兴、芦山。

夹金山上气温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风雪弥漫行进困难，洪学智发现6个战士在风雪中倒下了，停止了呼吸！他不忍心把他们留在山上，就派人把他们的“遗体”抬下了山。下山后走了一程，发现有个磨坊可避风寒。当晚，红军就住在那个磨坊里休息，烧水煮青稞，磨坊内温度升高，有人发现一具“遗体”动了一下，大家都说：“你看花了眼吧。”“不信你们看，真的是在动呢！”洪学智走近一看，可不是，呼吸很急促，是在动。洪学智大声说道“赶快抢救！”当时没有医生，大家就用人工呼吸，还给那位战士灌姜汤，七手八脚把他弄活了。有1个人活了，说明另外5个也有希望。大家就一个一个地抢救，结果一共救活了5个人。在懋功休整四五天以后，又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折多山。洪学智这时有了经验。他让各部队夜里2点钟就起来吃饭，用大锅煮辣椒、牛汤，大家喝了，热乎乎地上路。路上每人还带一瓶辣椒汤，爬到主峰时喝两口，增加一些热量，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减员。为此，方面军总部专门表扬了洪学智。

四起三落，初心不改

洪学智的一生功勋卓著，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他的一生也饱经沧桑，经历了三次大的政治劫难。面对“四起三落”的人生，洪学智始终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始终坚持以党的事业为重，对党忠心耿耿，把个人得失荣辱置之度外，表现出了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

第一次政治劫难是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在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时，洪学智等人也被错误地关押审判。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延安，红军大学政治部在布置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时，也把矛头指向了红四方面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正在红军大学学习的许世友、洪学智等红四军6位高级干部被错误关押。不久，毛主席亲自为他们平了反。应洪学智要求，毛主席同意洪学智仍然留在抗大学习。“红大风波”让毛主席认识并了解了洪学智，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用人之际，毛主席总会想起洪学智。

第二次政治劫难是庐山会议后，因为受彭德怀冤案的牵连，洪学智被降职。1960年5月，又被下放到吉林省地方工作，任省农机厅厅长。有人问他：“从后勤部部长到一个省当厅长，你不觉得亏吗？”洪学智说：“参加革命不是为当官，只要是有利于革命的工作我都干。不论做什么官，干什么工作，不都是为了把国家建设好，让祖国强大起来，使人民富裕起来过上好日子吗？”他对降职始终看得很淡，没有半点怨言，他说：“只要有工作干，能为党和人民继续做事情，也就别无所求了。”

第三次政治劫难是“文化大革命”中，洪学智遭受长时间的关押、批斗并被下放到农场去劳动改造，再次遭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直到1972年5月，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心下，吉林省革委会负责人才被迫将洪学智调回长春。1974年8月，他被任命为吉林省石油化工局局长。

心系群众，情牵故土

洪学智热爱人民、心系故土，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他常说：“我们国家谁最好？人民最好，老百姓最好。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老百姓。”严冬来临之际，他向老区人民送去御寒的棉衣棉被；缺医少药时，他向老区派去一支支解放军医疗队。他虽然身居高位，却始终没有忘记大别山这块红色的土地，没有忘记家乡的父老乡亲，没有忘记那些为国捐躯、长眠故土的战友们。

新中国成立后，洪学智曾7次回到金寨看望父老乡亲，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洪学智第一次回金寨是在1953年8月。当时他奉中央军委命令，到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去南京之前，他先回到金寨，去看望自己的姐姐和乡亲们。当时，金寨的交通很落后，洪学智就从县城步行30多里赶到双河老家。当他得知姐姐已经去世时，十分悲痛。区委领导提出：“家乡刚解放，社会治安比较复杂，请将军在区委机关食宿。”洪学智说：“我是请假回来探亲的，如果食宿都不在家里，那还叫什么探亲呢？”他谢绝了县区领导的安排，就住在堂兄洪学成的家里。

1986年4月，洪学智带着夫人和三个儿子，第二次回到金寨。1990年10月，洪学智第三次回到金寨，视察双河区缫丝厂。1991年12月，洪学智第四次回到金寨，参加金寨县红军纪念堂的奠基仪式。1994年6月，洪学智第五次回到金寨，冒雨视察金寨红军纪念堂。1997年4月，洪学智第六次回到金寨，参加全国政协委员高敬德出资援建的双河职高“敬德楼”竣工仪式。2002年5月，洪学智带着夫人和三个儿子第七次回到金寨，受到了家乡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洪学智十分关心老区人民的身体健康，十分关心革命老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1984年深秋，洪学智得知家乡地方病比较严重的情况后，心情十分沉重，他说：“再穷也要把病治好，一个家有一个病人，这家人就穷定了。”

1985年春，总后卫生部为金寨派出了医疗队。随后，又向湖北红安、江西井冈山、山东沂蒙山等革命老区派去了医疗队。洪学智把金寨作为试点，把派驻医疗队推广到所有的革命老区。

◆ 将军县的初心故事

为了改变金寨的教学条件，洪学智除了动员全国政协委员高敬德出资援建双河职高“敬德楼”外，还动员全国政协委员张勋贤出资在金寨全军乡建设了“勋贤中学”。

洪学智关心同志，平等待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王修圣患肾衰竭，需要做肾移植手术。洪老说：“你虽然是我的管理员，但你是组织派来的，你现在得了病，我给你向组织写报告。”同时，洪学智全家还赞助王修圣1.3万元。王修圣说：“我要不是在洪老身边，早就死了。”

（作者：胡遵远，原载《中国人才》2016年第14期，
《红皖撷英》2019年第7期。）

从师长降为挑夫再升司令的 “游击大师”

在安徽省金寨县红军烈士陵园林维先中将的墓碑上，由聂荣臻元帅亲笔题写的“游击大师”四个大字分外引人注目。林维先将军的一生，先从战士升师长、再从师长降为挑夫，最后又从挑夫成长为将军，充满跌宕传奇。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的革命信念坚定不移，对党始终是一腔忠贞热爱。

师长蒙冤降挑夫

林维先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南溪镇一个贫寒农家，1929年9月，不满18岁的林维先就参加了红军。由于他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多谋善断、屡建奇功，1934年4月，林维先由团政委升任为红八十二师师长。1934年春，敌人纠集16个团对皖西苏区进行重点围剿，妄图一举歼灭在皖西活动的红二十五军。中共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鉴于严峻形势，决定由红八十二师掩护中共鄂豫皖省委机关和红二十五军军部向鄂东北转移。师长林维先和政委江求顺一致认为，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军部去鄂东北，向东从长岭关走最近，但此地敌重兵驻扎，且周围30里之内均有大批敌人主力可随时增援。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军部本身能够作战的力量不过一个营，要想从这个最近的关口去鄂东北困难很大。而向西从沙窝、新集去鄂东北，虽然敌人防守兵力相对薄弱，但要多走一半路程，万一目标被发现将会被瞬间包围，危险性更大。林维先征得道委书记郭述申和省委、红二十五军领导同意，决定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将红八十二师（仅辖三个营和一个手枪队、一个交通队）一分为二，由政委江求顺率一营和手枪队向沙窝、新集方向游击，引诱敌人向西追击；林维先则率二、三营和交通队带领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军部昼伏夜出，向长岭关运动，力求速战速决。

果不出所料，当江求顺行动时，敌总指挥梁冠英率一个旅跟踪追击，东线之敌相对减少。林维先探知敌人西去，迅速带领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军部由莲花

山向长岭关疾进，午夜到达长岭关东侧。凌晨2时，林维先亲率二营攀登悬崖，直捣关上驻军，同时命三营和交通队乘关上激战、关东之敌增援未到时，带领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军部由关左侧碉堡前过关。林维先率二营攀登上关，迅速歼灭了敌哨兵，两营驻敌还在梦里即大部被歼。这时关东西两边守敌听到枪声纷纷向上攻来，林维先指挥全营向两边还击。同时，三营和交通队带领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军部从敌碉堡下面冒充敌追剿队顺利过关。机智的林维先趁黑夜引诱关东、关西驻敌接火后，率部从右侧悄然离去，尾随已过关的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军部向麻城方向转移。关东、关西之敌夜战近一小时，才知道是误会，便收拾尸体撤回各自防地。林维先率部成功掩护红二十五军转移鄂东北后，又向西绕了一个大圈子，袭击了长竹园、四姑墩、叶家墩等地方保安团，在商城西余集与江求顺会合。一个月后，皖西之敌又转向鄂东围剿，省委机关又回到皖西，听信了少数人对皖西苏区的片面汇报，对皖西进行了错误“肃反”，道委书记郭述申被撤职，江求顺等一批英勇善战的红军干部惨遭杀害。1934年10月，在“肃反”运动扩大化的影响下，林维先也被怀疑是反革命的“第三党”遭逮捕。他不仅被撤销师长职务、开除党籍，还被带到英山县陶家河公审准备处决。公审大会时，不少战士和干部群情激愤，冒着生命危险为他求情，林维先这才被免除一死，被罚到苦工队当挑夫、抬担架。一个昔日指挥千军万马的师长，无端蒙冤受屈，一下子降为最底层的挑夫，很多人为他鸣不平，但林维先没有任何抵触情绪，他动情地对大家说：“为革命抬担架当挑夫也是光荣的，照样随时打敌人！”

到1934年冬，由于鄂豫皖省委的“左”倾领导、红军连遭败绩，一度曾发展到13000多人的红二十五军大部战死冤死，只剩3000多人。因面对10多万强敌围剿难以支撑，便根据中央命令，于11月16日以北上抗日名义离开鄂豫皖苏区走上长征路。被留下的皖西道委书记高敬亭，为坚持大别山苏区斗争，在金寨沙河店将地方武装和一些体质稍好的伤病员集中起来，组建了有800多人的二一八团，下辖2个营和1个交通队、1个苦工队。

扁担退敌洗清白

红二十五军长征后，敌人疯狂“进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很多地方成了白天不见人、晚上不见灯的无人区，造成二一八团不仅枪支弹药奇缺，就连吃粮也非常困难。为解决吃饭问题，道委书记高敬亭命令罗成云团长和熊大海政委带领200多人到产粮区白塔畈一带征粮，苦工队也带着扁担、布袋随同前往准备挑粮。那天天亮时部队到达目的地，团长和政委带领部队分头找地主富农

征粮，并命令交通队的一个排带领苦工队隐蔽在山坡丛林里，向北警戒可能由霍邱、六安方向来犯之敌。下午2时许，驻霍邱大顾店的安徽保安第三团，闻听所属防区的白塔畈有红军活动便来进攻，派一个前锋营试探前进。

当敌人距苦工队隐蔽处只有千米时，林维先对交通队队长吴大友说：“敌人看样子是保安团，他们历来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不用怕，跟他们干！”当时苦工队仅有80余人，而且每人只有一根扁担并无枪支。林维先遂向苦工队作动员：“冤死不如战死，战死了还算烈士，冤死在自己队伍里算个啥？”他的话激励了交通队员，也鼓舞了苦工队队员，大家齐声说：“和白狗子拼了！”交通队队长吴大友原本就是林维先的部下，也断然说：“林师长，你就指挥我们干吧。”林维先一面命吴大友带交通队一部向前面的山林运动，切断敌人的退路。一面嘱咐苦工队注意隐蔽，待敌人靠近了先缠住再打，使其火力无法展开。不一会儿，敌人进至苦工队隐蔽的山坡下。林维先一声大喊：“冲啊！”几十条“扁担”顿时像猛虎一样冲到敌群中左劈右砍，与敌人厮打在一起。这时，交通队又从敌人背后杀了过来，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四散逃窜。一个骑马的敌军军官，见林维先只拿着一根扁担，举起手枪就打。林维先就地一个翻滚到了马下，一扁担将敌人扫下马来。紧接着又是一扁担，打得那家伙脑袋开花。林维先缴了他的枪，撕下领章一看，原来是个少校军官。这时罗成云团长和熊大海政委闻讯也带着部队增援而来，大家一起将逃敌追到下骆山，敌前锋营被消灭大半，其后卫两个营望风而逃。傍晚，打粮队挑着几百担粮食，带着缴获的100多支枪凯旋。

白塔畈打粮战斗的胜利，令高敬亭十分高兴。苦工队用扁担拼命杀敌的出色表现重新得到了党组织的信任。回到驻地，高敬亭就宣布摘掉苦工队的“帽子”，将他们编为红二一八团第三营，任命林维先为营长，林维先又从挑夫成为红军指挥员。1935年2月，鄂东北独立团近千人来到皖西，高敬亭将其与二一八团合编成立了红二十八军，下辖3个营和1个手枪团，全军1800余人。林维先任一营营长一年来，机智勇敢出奇制胜，先后歼敌8个多团，令敌人闻风丧胆。他还从战斗中总结出一些成功经验，如“敌情明、地形好，缴获大就打，敌情不明、地形不好，缴获不大不打”的“三打三不打”原则和“伪装歼敌”“杀回马枪”“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等。1936年初，恼羞成怒的蒋介石急调第六纵队司令卫立煌来大别山担任剿共头目。1936年3月，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在太湖县柴家山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寻求应敌之策。林维先建议：“敌人从四面八方开进大别山，我们集中力量拼不过敌人，应分散活动。最好抽出一支队伍，远离大别山，西出平汉铁路，造成红军主力向西追随红二十五军的气势，诱敌一部离开大别山，便于红军游击。”高敬亭十分欣赏林维先这

条调虎离山的妙计，遂命其率一营执行西出平汉铁路的任务。

功勋挑夫将星灿

1936年3月13日，林维先率全营从金寨抱儿山出发，一路翻山越岭，遇弱敌猛打一阵，遇强敌绕道而行，三天三夜大小仗打了10多次，3月17日到达湖北孝感平头山隐蔽休息。林维先一营一路冲杀，敌军果然以为红军主力要跳出大别山。卫立煌急令东北军一〇一师、一〇三师追击，令孝感保安团堵击。这时敌一〇三师三〇九团已进至平头山北侧，林维先命一连连长雷文学绕道敌后边打边退，造成红军返回大别山的假象。敌人果然中计，当雷文学撤到刘家坳丛林里隐蔽起来后，敌人以为红军已被撵回大别山，大喜万分立即向卫立煌报告。而林维先率二、三连在平头山隐蔽一天一夜后，刚过平汉铁路便遇孝感保安团阻击，林维先命二连火速前进到适当地方杀回马枪，自己率三连在敌后牵制，前后夹击敌人。这时雷文学率一连也从后面攻来，敌人疑为被红军主力包围，阵脚大乱，被分割歼灭近半，余部四散逃去。得胜后林维先率全营在吴家湾休息，第二天刚吃过早饭，派出侦察的同志回来报告说：“青山镇昨晚驻有一个连敌人，押着一百多个民夫，挑的都是军用物资，往大别山二十五路军总部运送，为首的像是个大官，还有一匹马。”林维先高兴地说：“太好了，敌人给我们送礼来了！”立即命全营作好战斗准备，隐蔽在青山镇东边山林里。上午10时，敌人大摇大摆地押着民夫向大别山行进，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林维先一声令下，各种火器一齐向敌人射杀，敌人怎么也想不到在大后方竟会遇到红军，只得仓惶应战，冲锋号激荡山谷间，林维先率全营冲入敌群，打得敌人丢盔弃甲，四散逃命为首的军官被活捉。经过审问，原来他是敌二十五路军后勤部长王国珍，是从武汉押运给养回大别山的。这时民夫已跑光了，林维先看见缴获的都是银元、服装、药品，还有一叠崭新的二十五路军通行证，高兴地说：“这回我们可发财了，回大别山也有通行证了。”

至此，林维先率一营远离大别山活动了一个多月，准备回大别山与高敬亭会合。林维先叫大家换上敌人服装，揣着敌二十五路军通行证，押着王国珍大摇大摆地来到一个叫陡门港的镇上休息。为麻痹敌人，林维先晚上故意集合战士们训话：“红二十八军已进入桐柏山区，很快就会和红二十五军会合，我们后卫队一定要在两天之内与主力会合……”夜里又故意放松警戒让王国珍逃跑，回大别山报信引诱敌人出山，减轻大别山红军压力。果然二十五路军总司令梁冠英得到王国珍情报后立即向卫立煌报告，说红军主力撤出了大别山向红二十五军靠拢会合。卫立煌命刘茂恩六十四师、东北军一〇二师向平汉铁路西

追击。林维先在陡门港休息两天后绕了一个大圈子，经应山、安击回返大别山，行至黄冈白羊山口，突然从树林里钻出两个敌哨兵，喝问林维先是哪一部分的，并问口令。雷文学上前指着领章说：“狗日的你瞎了眼，老子是二十五路军进剿队的！”并反问哨兵是哪一部分的，敌哨兵看雷文学佩戴的是少校军衔，立即敬礼回答说六十四师一九二团第三营，奉命在这里堵击红军。雷文学即命一个哨兵去找他们营长前来会话。不一会敌营长来了，后面跟了一个排武装。雷文学递上二十五路军通行证，指着佩戴上校军衔的林维先说：“这是我们团长，我们是二十五路军追剿队，昨天奉命来这里追剿红军，请你们配合！”林维先威严地说：“你们发现敌情了没有，听说昨晚有一小股红军从这过！”敌营长说：“没有发现有红军活动。”雷文学火冒三丈地说：“妈的，你们六十四师都是饭桶，前天我们从武汉运给养的一个连就在你们这被红军截去的！”林维先随即要求对方集合部队配合清剿，敌营长不敢怠慢，立即集合部队请林维先训话，可敌人刚集合起来，一营300多支枪口已对准了他们，旋即敌军被缴械成了俘虏。1936年7月中旬，林维先率部安全返回大别山，在金寨的熊家河与高敬亭会合。林维先这次出击平汉铁路，带走了大别山10多个团的敌人，恢复了大片根据地，使红二十八军发展到了3000多人。前后3年游击战争中，红二十八军是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转战鄂豫皖边区牵制10多万敌人的，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反复“清剿”。身为红二十八军指挥员之一，赫赫有名的游击专家林维先，出生入死8次负伤。随着全国抗战爆发，共产党和全国军民一致抗日，蒋介石才不得不停止了对大别山红军的进攻。林维先也走上了抗日前线，驰骋皖中大地抗击日军。

解放战争期间，林维先任七纵副司令员，参加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1954年初夏，林维先调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翌年1月，协助张爱萍将军指挥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一举解放了江山岛。1955年春节前夕，毛主席到浙江省视察，听到了时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的林维先汇报民兵工作后，赞扬说：“你不但是游击专家，还是民兵专家呢！”

1985年7月28日，戎马倥偬一生的林维先在武汉病逝。

（作者：胡遵远、张应松，原载《钟山风雨》2017年5期。）

中原突围中的皮定均

抗战胜利后，中原解放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了国民党向华东、华北乃至东北用兵的重要障碍，也成了全国解放区的最前沿，因此国共双方都极其重视其战略地位。为抢占这一战略要地，国民党环绕中原解放区部署了重重重兵，修建了6 000多座碉堡，将中原解放区压缩至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50千米的狭窄区域内。1946年6月23日，蒋介石下令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26日，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10个整编师30万兵力，对我中原军区部队发起进攻，全国内战由此全面爆发。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被重重包围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6万将士浴血奋战，突破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完成战略转移。

此次战略转移中，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旅长皮定均，政委徐子荣）作为“丢卒保车”之策的“卒”，从1946年6月26日打响阻击第一枪开始，一直到掩护大部队突围后，连续急行军5昼夜，抢在敌人合围计划实施之前，冲出内层包围圈，进入大别山。第一旅首战松子关、再破青风岭、抢渡磨子潭、血战津浦路，不仅完成了掩护主力部队突围任务，还带领部队成建制地冲出了重围。

强越松子关

1946年7月1日，第一旅越过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潢（川）麻（城）公路，顺着大别山脊背飞兵东进，准备翻越横亘于豫皖两省之间的大牛山。此山高度虽只有1 900多米，但一上一下却有50多千米。这是第一旅东进必经之路，又是顾敬之统治的地区。他手中有不少武装。部队在忽晴忽雨的大别山崇山峻岭中行军，来到河南商城县瓦西坪附近的一个小山村之后，刚要埋锅做饭休息，前方突然响起了激烈枪声。原来，顾敬之的商城保安团伙同金寨县保安团和国民党七十二军1个团抢先占据了大牛山松子关前面的两个山头，恰似松子关的

两颗门牙，紧紧地锁住了前进道路。第一旅决定由素有“老虎团”之称的一团担任主攻，抢占瓦西坪附近有利地形，“要像撕布一样把它撕开，动作要快要猛！”指挥员下达了战斗命令。战士们冲进密林飞奔上山冈，一霎间，枪炮声、喊杀声如巨雷滚动在山谷里。从组织战斗到攻上山顶不到两个小时，一团猛打猛冲杀开一条血路拿下了右翼山头，连同敌人派来偷袭的手枪队 100 多人也大部分被歼灭。突围路上第一仗硝烟未尽，全旅迅即强越 1 900 米高的松子关。此刻，主峰上天气骤变，闷雷在头顶滚动，狂风卷来倾盆大雨，打得人睁不开眼睛，战士们却个个精神抖擞地向顶峰疾进。

7 月 3 日晚，第一旅巧取金寨县吴家店。巧的是，金寨既是中原突围途经地，又是旅长皮定均的家乡。由于连日大雨，山洪暴发交通阻塞，敌人还没有搞清第一旅行动意图和动向，追击尚待几日。一个多星期的连续行军和战斗，使广大指战员身心俱疲，为此第一旅决定抓住这个时机在吴家店休整 3 天。部队安顿好后，指挥部立即架设电台，向纵队、中原局、延安、太行军区、华中兄弟部队发报联络，争取上级指示了解全国局势。此时的驻地吴家店，群众虽然白天表现冷淡疏远，但到了天黑就纷纷来到部队驻地，诉说十几年来对红军的思念，探询自己亲人的消息，反映周围的敌情，并帮助部队指认敌军仓库。妇女同胞们则是彻夜赶制军鞋，帮助部队缝补衣服。部队则把敌人搜刮来的粮食分给群众，老区人民笑逐颜开，再现了当年打土豪、分田地，军民一家亲的动人景象。

与此同时，指挥部综合俘虏供述、敌人的文件和报纸消息大体查明了周围敌情：敌人在西面正集中兵力追击我军主力，在东面正积极准备对苏皖解放区发动进攻，而在安徽境内只有为数不多的桂系部队。通过艰辛努力，第一旅终于在休整的第三天获得中央“快走！快走！快走！”这一简单明了的指示。由此，第一旅决定趁敌人后方空虚及对我部行踪的捉摸不定，围追堵截尚未形成之际，迅速跳出大别山横越皖中平原，向苏皖解放区前进。为了克服没有军用地图，不熟悉敌情、民情、地形和道路的难度，规定旅部主要领导要和旅前卫营走在一起，各团团、政委要与团前卫连走在一起，各连连长、指导员要与尖兵班走在一起，以便随时掌握情况辨别方向，指挥部队并与上下级联系。

智取青风岭

7 月 8 日，第一旅沿深沟铺进入霍山境内，在阴雨中沿霍山县漫水河向东挺进。漫水河俗称“七十二道弯”，实际上何止 72 道弯！那两天，部队成天过河，好不容易翻过高山，以为不会看见漫水河了，谁知低头一看，漫水河不知

又从哪里钻出来了。战士们的脚板因急行军磨得都是血泡，马蹄子也被泡烂了。

经过两天艰苦的急行军，10日中午，第一旅抵达千笠寺。忽见山门上有一副对联：漫水飘来干笠寺，青风吹去万人愁。问和尚得知，青风就是前后的青风岭，万人愁是天柱山主峰，在青风岭南面。青风岭是进出大别山的必经关口，是从湖北入安徽的最后一个茶水歇脚站，地形万分险要。它北麓紧靠淠河支流，河两岸都是陡直峭壁，南面是天柱山，远远望去似天柱直插云霄，青风岭就是它伸出来的一根横梁。敌人必然会利用它进行堵击，要是冲不过这一关，后面追兵再堵住退路第一旅将会陷入绝境。

第一旅当即决定由二团担任主攻，抓紧时间吃饭，争取每一分钟抢占青风岭。此时的青风岭仿佛一道铜墙铁壁挡在面前，山上树林茂盛、山坡陡峭，中间唯一的石板道已被敌人轻重机枪封锁得水泄不通。一团隐蔽运动到山下，发起两次攻击都被敌人密集的火力压了下来。据守山顶的是国民党安徽挺进纵队，两天前才从霍山出发抢占关口。二团团钟发生率部抵达青风岭时，惊讶地发现巅峰处是一片几丈高的峭壁，山腰木林密如梳篦，根本无法插足。上山前由于当天天气炎热，近百里山路走下来，二团机炮连的大骡子都被热死了，许多战士惜别老伙计哭了鼻子。担任前卫的是二营，由武占奎当营长，王子波当教导员。钟团长在山下听取二营营长汇报并抵近观察地形，望远镜中青风岭主峰左面有个山垭口，石板路就是通向垭口的唯一小径，敌人占领了垭口和垭口左边比较低的一个山头。钟团长令一营从垭口右翼隐蔽攀登峭壁迂回上去，伺机发起攻击。此刻的敌人占据险隘高高在上，随时准备迎击二团二营正南的佯攻，却没有发现一营的行动。皮定均见二团几个小时没发动进攻，遂派来一个通信员前来询问作战准备情况。钟团长把自己的部署告诉通信员，叫他回去速向皮定均汇报。过了半小时，皮定均又派作战科副科长晏明鳌来传达命令：快攻上去，否则全旅有覆灭的危险！过了半小时，皮定均又派方升普副旅长来了，钟团长再次汇报后把望远镜递给方副旅长，他远远地观察到了迂回部队的动作，只见一个战士爬上悬崖绝壁把绳子挂系在悬崖上，部队正顺着绳子鱼贯往上爬。其他战士则用绑带、扁担和牲口身上的绳子攀上峭壁后，用砍柴刀劈林开路。方副旅长又观察了敌人坚守的鞍部状据点后，表态同意二团的部署，回去向皮定均汇报，此后旅部再没派人来。

过了1个小时后，迂回部队终于登上了青风岭右翼主峰，居高临下出其不意地向敌侧背开火发起急冲锋，几个机枪手平端机枪迈着大步边走边扫射，另一路战士们同时甩出一排手榴弹。紧要关头正面的一团也从石板道直冲山顶，内外夹击下不到半个时辰击毙国民党军200多人，俘19人。第一旅攻占青风

岭后一鼓作气追击了残敌5千米，此战打通了通往滬河上游磨子潭的道路。

血战津浦路

7月20日拂晓，第一旅越过津浦铁路，在安徽的明光车站以东与国民党军队发生激战。这一仗是第一旅突围途中发生的规模最大、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国民党军用装甲列车掩护，后续不断增援。当第一旅后卫部队一团过铁路时，正值敌装甲列车从三界车站开来，第一旅已布置在铁路两侧担任掩护的二、三团部队以各种火器向敌装甲列车开火。工兵排长杨立德把仅有的几块炸药全部埋在铁轨上，待装甲列车进至爆破点后引爆炸药，吓得敌装甲列车往后退，但由于炸药太少铁轨没有炸断，敌装甲列车又朝部队开来并胡乱扫射。与此同时，从明光、管店和滁县出动的敌人，分五路从两翼运动，构成了钳形攻势。三团截住滁县的敌人，二团截住了明光、管店的敌人，并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已越过铁路的一团指战员们，又回过身来配合部队从两边向装甲列车发起冲击。大伙都明白，这是突围的最后一仗！只见三团的勇士们冒着敌装甲列车上密集的机枪火力，挺身站在紧贴铁路东侧的崖顶上，把一批批冒着青烟的集束手榴弹投到敌人的装甲列车上，掩护部队再次以猛烈的火力向敌装甲列车射击。敌装甲列车顿时一片火海。敌人见势不妙向明光东边逃去。

血战津浦路后，第一旅于7月20日胜利到达苏皖解放区盱眙根据地。至此，历时24昼夜经历大小战斗23次，为跨越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四省行军750千米的第一旅中原突围圆满画上句号。

第一旅突围前有7000人，最后仅以大约伤亡300人、掉队1700人的损失抵达苏北，抵达后还有5000人。在整个突围过程中，皮旅是孤军行动无友邻支援，补给相当困难，有时一天只有一顿饭，有时仅前卫部队有点饭吃，后续部队只能从老乡那里买些生瓜果、玉米填肚子。除了打仗就是强行军，特别是皖中平原的五天五夜强行军，部队是边走路边睡觉休息的。在挑战人的生理极限时，许多干部战士宁可拼命牺牲也不想多走一步了。在这种情形下，不怕苦比不怕死更难做到。

1969年，在党的“九大”期间，毛主席同皮定均谈话，在讲到著名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句口号时，特别强调说：“如果怕苦怕死，革命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就要有像你们中原突围时那种冲锋陷阵的拼命精神。”

（作者：胡遵远、张应松，原载《文史春秋》2017年第8期。）

江上青在金寨的 100 个日日夜夜

江上青原名江世侯，江苏扬州人，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1927年，江上青考入南通中学高中部，受刘瑞龙、顾民元革命思想影响，192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29年，江上青在扬州被捕，被判刑三个月，出狱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受党组织派遣到上海暨南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在此期间，他奔走于工厂、学校，在工人、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1931年底他在上海被捕，后经多方营救出狱。1938年5月他受党组织委派担任中共皖东北特支书记。8月底到达安徽省临时省会金寨，被分配到省民众动员委员会做青年教育工作，开始了他在金寨的战斗岁月。

经陈索引荐，江上青在金家寨镇船舫街与党组织接待员、张劲夫的夫人胡晓风接上了头，并吃住在张劲夫家。江上青很有才华，会编曲，他经常和张劲夫一起聊天，还讲很多故事给他们听。胡晓风见江上青的身体很不好，胃口又差，就经常给他下挂面吃。挂面是江上青在金寨吃得最多、印象最深的一种食物。

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良好环境为江上青施展才华提供了有利条件。病体得到康复后，他便满怀激情、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1938年9月，安徽省民众动员委员会为了加强组织建设、培养骨干队伍，决定在金家寨边的响山寺大庙举办工作团讲习班，由组训部副部长周新民兼任班主任，江上青负责教务兼政治指导员，詹运生负责总务，朱蕴山、张劲夫等领导人直接参加授课。学员有工作团成员，也有来自省内外沦陷区的学生，共170多人。教师出身的江上青将教学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课外生活丰富多彩。

讲习班理论结合实际，知与行相结合，强调实际锻炼，重视自我教育。经常开学习讨论会和生活会，大家畅所欲言、激烈辩论、探求真理、增长才干。

为学以致用，江上青还要求学员每周写一篇学习心得或时事评论，经他批阅后，张贴在墙报栏上。这样尽管他的工作负担加重，但有效地调动了学员的

学习积极性，大家都想在墙报上发表自己的文章，情绪十分高涨。

由于江上青工作出色，1938年11月，中共安徽省工委宣传部部长张劲夫代表省工委在金家寨约见了江上青，宣布他担任中共皖东北特别支部书记，带领一部分骨干前往皖东北做国民党盛子瑾部队的统战工作，开辟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按照省工委的安排，江上青任书记的特别支部，包括赵敏、周邨、谢静鸿、李艺、王毓贞、吕振球等7名党员。江上青深知敌后形势复杂、环境险恶、任务艰巨，临行前作了一副“自祭”联：“拼将瘦骨埋锋镝，常使英雄祭血衣。”表示自己已做好牺牲的准备，以誓死的决心，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江上青到盛子瑾部队后，积极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注意协调与盛子瑾的关系，认真工作，团结各方面抗日分子，展开统战工作。他的工作态度、敬业精神和知识才干，深得盛子瑾的赞赏和信任。行政上，盛子瑾是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江上青的公开身份是专员公署秘书；军事上，盛子瑾是第五战区第五游击支队司令，江上青为政治部主任。江上青利用合法身份，把几位中共党员都安排了公开行政职务和重要工作。在江上青努力下，中共之党政军东来人员迅速与盛子瑾建立了密切关系。盛子瑾允许中共在皖东北建立公开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作为与之公开联络的机关。中共皖东北党组织答应给盛子瑾以支持，打击敌伪及土匪武装。

1939年8月29日，江上青陪同盛子瑾到泗县张大路与国民党顽固派代表人物许志远谈判，傍晚谈判结束后，盛子瑾未听江上青劝告改变返回路线。江上青与朱伯庸等率特务大队一个连从原路返回时，带领一个班走在队伍前面，途经小湾子村时，遭到由许志远策划的反动地主武装的伏击。江上青身材高大，戴着眼镜，骑马走在前面，被误认作是盛子瑾，一阵排枪直射过去，江上青、朱伯庸等应声落马。走在后面几百米的盛子瑾听到枪响，立即钻进了附近的树丛。

当驻在附近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胡炳云、田维扬大队闻讯赶到时，江上青、朱伯庸已经停止了呼吸。江上青、朱伯庸以生命的代价为淮东北地区国共两党的进一步合作、打开中共组织在敌后坚持抗日斗争的新局面铺平了道路。

（作者：胡遵远，《铁军》2017年第4期。）

金寨籍女红军彭素的长征故事

彭素，安徽金寨人，1916年出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红军，任宣传员、看护，1931年入党。长征时，历任红十师医院、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药局主任，三十一军野战医疗所所长、护士连连长、担架营营长。到延安后，任留守兵团卫生部药局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协和医院女宾支部书记和协理员、中央机关保育院院长、五一小学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三〇二医院副院长。

走投无路当红军

彭素于1916年10月出生在金寨县南溪镇三道河旁边的一个穷苦农民家庭。8岁那年，父母亲为了不让她饿死，就把她送到一个姓张的财主家里当童养媳。谁知童养媳的日子更是难熬，彭素在张家五年，吃不饱、穿不暖，还挨打受骂、受气受辱。

正巧，这时候家乡来了共产党。1929年，爆发了著名的立夏节起义。在彭素的家乡南溪这一带成立了农民协会。慑于农会的声势，姓张的财主才不敢到她家来要人了。共产党领导穷人翻身求解放的斗争，强烈地吸引着彭素。这时，她虽然只有13岁，但已经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她决心投奔共产党，参加红军。

1929年9月的一天早晨，彭素吃过饭，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对母亲说：“我上山去拾柴。”其实，她是要去找红军，怕母亲不答应，就撒了谎。一到山上，她就径直向东北方向走去，因为她听说红军就在那边山里。她想，找到了红军，就找到了幸福，就摆脱了被人压迫的命运，再也不用担心受侮辱了。所以，她对山高路险都顾不得考虑，只是一个劲地往前跑。

太阳快落山时，她来到了一座破庙前。这时，她才觉得又渴又饿，就到附近的小河边喝了点水，坐在庙门前的大石头上，两眼呆呆地望着通往东北方向

曲折延伸的小路。秋天傍晚已经稍有凉意，天又渐渐黑了下来，她就往庙里走去。一进去，看到那些奇形怪状的泥菩萨，她仿佛就像看到了凶神恶煞般的财主一般，被吓得马上退了出来，心想，在这荒山破庙旁，怎么度过这一夜呢？

正当她心里焦急时，忽然从路上走来一支队伍，里面有男的也有女的，大约有20来人，他们拿着一面绣有斧头镰刀的小红旗。在村上成立农会时，看彭素见到过这种红旗，于是她断定他们一定是红军，就跑去迎了上去。这时，走在队伍前面的一位头戴八角帽的大姐姐边走边问她：“小妹妹，你是干什么的？要到哪里去？”彭素说：“我就是找你们，我要参加红军！”她说：“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没等她说完彭素就抢着说：“我是穷人，我是童养媳。”她见彭素急不可待的样子，脸上露出了笑容，又说道：“你能吃得了这份苦吗？”彭素正要回答“我不怕吃苦”时，忽然听到队伍中有人笑着说：“这么大点个子，能当红军？”彭素一听这话，不由得看看自己，又比比这些大哥哥、大姐姐，自己的确显得小多了。彭素生怕他们嫌自己小、不收自己，就急得哭了起来，同时赶紧挺了挺身子，尽量使自己身材高大一些。

停了一会，刚才同彭素说话的大姐姐拉起她的手，笑着说：“你多大年龄了？”彭素说：“十五了。”其实彭素当时才十三岁。那位大姐姐听了她的回答，犹豫了一下，说：“当红军，干革命，要准备吃苦啊！可不能哭鼻子。你年龄小了一点，先跟我们走吧！”

彭素一听让她先跟他们走，就忙用手擦掉眼泪，说：“我不哭，我不哭，我能吃这份苦。”

原来，他们是红军的一支宣传队。打那以后，彭素就紧跟着他们，生怕他们把自己给丢了。每到一个地方，彭素就帮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时间长了，他们看彭素能吃苦耐劳，手脚也勤快，也就不叫她走了。

勤奋学习练本领

有天傍晚，吃过晚饭，大家围坐在一起谈笑，他们的队长脸上带着神秘的笑容，叫彭素到她跟前去，小声说：“小廖（彭素原姓廖），给你一套服装，批准你入伍了！”彭素一把接过那套土布红军服，高兴得不知怎样才好，当着同志们的面，就急着穿起来。一来心情太激动，二来那是一套列宁装，和彭素平时穿的腋下开口的中式褂子不大一样。彭素不知道怎样穿才对，头套进去了，手就不知道怎样穿进去，手穿进去了，头又不能套进去。在那么多人面前出洋相，她急得差一点哭出来，周围的同志们却乐得大笑。等她穿好长到膝盖的军服、戴上崭新的军帽时，想到自己从此就是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了，也跟

着大家一起笑起来了。

彭素在这支红军宣传队中呆了不到两个月，就被调到一个红军医院做看护（护士）工作。1931年初，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在商南长竹园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年8月，经组织考查，彭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又被调到红四军所辖十师医院做司药工作。

那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和“围剿”，医院条件之差是现在无法想象的。很多伤员本来伤势不太重，但因医疗条件太差，无法治疗，结果牺牲了。有的伤员伤口没有办法消毒，烂得都生了蛆。看到伤员那痛苦的情景，彭素十分焦急，心想，自己是一个医务人员，一定要努力为伤员解除痛苦。于是，她就和同志们一起想方设法、改进医疗条件，到处寻找中草药，用土方法给伤员治疗。

当司药需要有文化，可彭素参军时连名字都不会写，更不要说看懂外文药名了。说实话，刚当上司药，初看到那些外文药名，头都发晕。但是，她没有被困难难住，她下决心刻苦学习文化。部队领导也正是看中了彭素爱学习这个优点，才决定调她去做司药工作的。

彭素她们在部队学文化不是一帆风顺的，学习条件差，没有书、没有笔，战斗紧张时没有时间，等等。不过，她们还是想法克服了。战斗间隙、行军路上，都是她们最好的学习时间。当时医生很缺乏，所以部队对于俘虏过来的医官总是十分优待的。这些医官经过教育，多数思想开始进步，能很好地为红军服务，并能体谅彭素她们文化水平低的困难，总是尽量用汉字开处方。而有几个医生却总用英文、拉丁文开处方，字迹又十分潦草。遇到这种情况，彭素总是格外慎重，一个药名一个药名地校对清楚，或者请教其他医生，决不让自己出丝毫差错。同时，她还主动向懂外文的进步医生学习英文和拉丁文药名，把医院常用的西药名称工工整整地抄下来，一个一个字母地念、读、拼、写。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医院里常见的几十种西药的外文名字，彭素都会认、会读、会写了。

在一次战斗中，彭素她们医院得到了一本缴获的《药理学》。这下真是如获至宝，争相传阅、传抄。一本《药理学》很快变成了两本、三本。彭素自己接连几个晚上，在昏黄的油灯下，一丝不苟地抄了一本。遇到认不得的字，就依葫芦画瓢。抄成以后，又下功夫一个字一个字地认、读、记、写。不到三个月，彭素就把这本当时极为珍贵的手抄《药理学》上的药名，背得滚瓜烂熟了。

就这样，经过艰苦的努力，彭素比较熟练地掌握了当时红军医院一些常用药物的性质、应用原理、剂量以及药物的配伍禁忌等知识。在彭素所属的药房

里，只要别人说一个药名，她就能按照需要把它取出来，并说明药品的剂型、规格、吃法、用法，治什么病，有什么副作用，等等。

永跟党走不变心

部队生活越来越艰苦，有时一连几天吃不到粮食。为了避开敌人的追击，部队要经常转移。由于张国焘逃跑主义错误的干扰，红四方面军吃尽了苦头。这些艰难困苦，对于一个女同志来说，就更是难以想象。

1936年夏，正当战士们积极准备二过草地的时候，彭素不幸得了斑疹伤寒，病情十分严重，连续高烧。彭素的皮肤和口腔出血，大便带血，一连几天昏迷不醒，汤水不进。部队没有特效的药物治疗，不得不把她送到附近的一户老百姓家里。房东老大娘热爱红军，像照顾自己的女儿一样护理她。

一天，彭素昏昏沉沉地半睡在草铺上，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她身边喊她，她以为是大娘又来喂他米汤，便强睁眼睛一看，然而出现在她眼前的不是大娘，而是红军在入川时俘虏过来的邓医官和杨医官。

彭素记得他们被俘虏过来不久，经过短期教育，就让他们为部队伤员治病了。不料，他们工作没几天，就在彭素她们面前摆起架子。有一天，杨医官给一位伤员开了一张处方，上面用的一种西药是当时国内无法生产的，不要说红军医院没有，就是国民党的大医院也不一定经常有。他把这种明知没有的药开到处方上，而且用外文把药名写得十分潦草，显然是想要难一难彭素这个司药主任。彭素一见这张处方，当即拿到他的面前，一五一十地说出了这种药物的特点，说明医院这里没有这种药。从此，他们再不看彭素她们了。

今天，他们在彭素病中来到这里想干什么呢？只听他们轻轻地对彭素说：“部队马上要二过草地了，这可是死多活少啊！你年龄还小，还是个女的，并且正在病中，还是暂时跟我们留下来另找出路吧。”彭素一听要她离开红军，就挣扎着坐起来，两眼直瞪着他们说：“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这两个家伙经不住彭素的追问，连忙说：“随便问问，随便问问。”说后就溜走了。

这时，彭素在草铺上再也睡不着了，便硬撑着走下地来，突然觉得天旋地转，她扶着墙慢慢地往前挪步。房东老大娘听到彭素下床的声音，慌忙进来，说：“孩子，你病成这样子，要往哪去呀！”彭素说：“部队要开拔了，我要随队伍出发，不能留在这里。”老大娘扶彭素坐到床上，轻轻地捋捋她的头发，不想头发一捋就掉下来一大把，这是高烧造成的。再看看皮肤，皮肤也是东一块、西一块地往下脱落。这半个多月来，彭素病得可真不轻啊！但是，战士离不开队伍，正如孩子离不开娘一样。彭素不能留下，她又强撑着站起来。大娘

忙说：“这样吧，你先歇着，我去问问你们医院领导。”彭素这才重新躺到了床上，心里却翻腾得厉害。

正在这时，彭素第一次见到红军时那位大姐姐说的话又在耳边回响：“当红军，干革命，要准备吃苦啊！”现在，要二过草地，困难之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正是对一个革命战士的考验，是百炼成钢的大好机会，自己怎么能当逃兵呢！

想到这里，彭素似乎产生了无穷的力量，四肢也仿佛有了力气一般。这时，老大娘和医院领导一起走了进来，领导首先告诉彭素，根据形势，摆在部队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排除万难，再过草地，北上抗日；二是不过草地，但这样会被国民党军队消灭。在这种情况下，确有少数思想不坚定的分子不愿再过草地，准备开小差。领导了解了彭素的病情后，决定让她跟部队一起出发。第二天早晨，天刚放亮，就传来了嘹亮的集合号声。彭素赶紧起床，穿好军装，告别了半个多月来日夜护理自己的大娘，拄着拐棍，来到了总医院集合地点。一点人数，邓、杨两个医官果然跟另外几个人开了小差，投奔国民党军队去了。

朝霞映红了天空，彭素随着大队伍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虽然征途上充满着艰难险阻，但是“当红军，干革命，要准备吃苦”的话，彭素一刻也没有忘记，她暗暗地告诫自己，决不能掉队，一定要坚持下去，迎着困难前进，直到最后胜利。

（作者：胡遵远，原载《江淮时报》2018年7月6日。）

金寨女红军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后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来。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格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去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节起义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江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处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

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右小腿负伤，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响当当的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

班里学习过，所以林月琴讲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做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饥肠辘辘，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孩子最后还是在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了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

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瘾，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1/4。

陈映民回忆说：“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建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在巴中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红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她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有一千七八百名。其中，除来自大别山的10多人及来自井冈山的3人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只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地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

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 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武汉到延安，改名为王营

1937年末，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高兴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政治审查。当时，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她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因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

◆ 将军县的初心故事

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斗，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迫害而死。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认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

（作者：胡遵远，原载《中华魂》2016年第10期。）

红色女特工文媛

文媛，安徽省金寨县人，1911年生。1926年入团，1931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32年到上海中央分局做地下工作，后赴江西苏区，在中央局机要科任译电员。1938年到延安，任边区银行机要秘书。

宝剑锋从磨砺出

1929年11月，六霍起义爆发后，文媛转移到了安庆。稍后，组织上即派人同她取得了联系，并指示她继续留在安庆，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点。工作不到两个月，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从霍山来了一批土豪劣绅，说文媛她们都是共产党员，要求国民党省党部把她们捉拿归案。文媛无法在安庆容身了，组织上决定叫她立即转移到上海，并且派一个姓张的交通员护送。离开安庆那天，正好下着雨，交通员为文媛雇了一辆黄包车，并且把布帘放下来。他们顺利地到了码头，上了船。船行三天，到达上海。文媛拿着介绍信，找到王日叟同志，接上了头。1931年底，文媛又转到江苏省委，担任内部交通工作。在这里，文媛由团转党，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时，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是为了推翻旧社会的黑暗统治，使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文媛她们早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为了打掩护，文媛的穿着打扮完全是学生样，上身穿白洋布褂，下面穿一条黑裙子，这是当时女学生的流行服装。

有一次，文媛送文件，在半路上突然遇到紧急情况：一时警笛长鸣，租界上外国巡捕拿着警棍，疯狂地驱赶着马路上的行人。文媛被隔在马路一边，而要把文件送出去，必须穿过这条马路。怎么办？文媛的心虽然咚咚直跳，但她还是提着小皮箱，壮着胆子走到“红头阿三”（指巡捕）面前，镇定地和他说话：“啥事情？能走吗？”巡捕上下一瞄，就用警棍把文媛扒拉向马路的另一边。她赶紧穿过人群，顺利地把文件送到目的地。

还有一次，文媛送文件时，在电车上遇到了停车搜查。文件装在小皮箱里，销毁已经来不及了，又下不了车，情况十分危急。文媛想，只有沉着冷静、面不改色，才不会惹人注意。她装着要看热闹的样子，主动靠近上车搜查的警察。警察看她是个学生，便不放在眼里，还把她赶下车。下车后，她便立即钻进人流中去。

文媛还干过“交通报警”，哪里出了问题，就马上发出报警通知。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通知文媛她们马上转移。组织上派一个小报童，趁给文媛她们送报纸时，把写着“家父病重，快回南京”的纸条夹在里面送给她。文媛一看，知道情况危急，怎么办？这时，组织上又派了一位女交通员与她们联络。上级要文媛她们搬到俭德公寓，等候安排。为了不引起邻居的怀疑，文媛告诉二房东，说外出走亲戚，过几天就回来。到俭德公寓安顿下来后，文媛的爱人陈一新等一部分同志被派到江西苏区去工作。文媛因为身怀有孕行动不便，便留在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有时，她们为了刺探敌人的重要情报，还精心装扮成上层人士出席有国民党要员参加的宴会。

秘密战线创佳绩

1932年下半年，组织上派文媛到江西苏区工作。这次去江西，要从广东、福建绕道，组织上安排了一位广东籍的交通员护送她。他们在吴淞口坐上了一艘外国商船，从海上航行了几天到了广东汕头，然后再到潮州、大埔。他们白天不敢行动，怕被敌人发觉，全靠晚上摸黑走小路，一走就是100多里。沿途爬山越岭、风餐露宿，有时还要冒险穿过敌人埋下的竹签、铁蒺藜……最后，终于从广东到了福建，又从福建来到江西。到江西后，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另派了一位交通员，护送文媛到沙洲坝。

沙洲坝离瑞金城很近，是中央机关的所在地。文媛的丈夫陈一新任中央机要科科长，文媛任机要员，负责译电，与在白区工作的同志进行电讯联系。

当时，中央苏区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对外联络十分困难，因此无线电就成了中央苏区同上海党组织及其他根据地进行联系的唯一通信工具。靠着它，党中央才能及时了解敌人的动态；靠着它，党中央的声音才能及时传到各个红色根据地，领导各地的反“围剿”斗争。可以说，电台和密码对于中央苏区十分重要。正因为如此，敌人也在千方百计地设法破坏我们的通信设备。那时敌人经常派飞机来轰炸瑞金，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电台，妄图截断我们的红色电波。文媛非常重视电台和机要科的工作，时刻做好通信联系

工作。为了防止敌人的飞机轰炸，文媛常常带上密码本和纸笔躲到山上办公。到隐蔽的地点，得爬山越岭，还要穿过荆棘树林，衣服常常被挂烂，腿脚被划伤，弄得全身血迹斑斑。但不管多么困难，就是牺牲自己，也要绝对保证电码本的安全，因为它是党中央的耳朵和眼睛啊！每到出发时，文媛总是检查着装，看有没有什么漏洞。虽然环境异常艰苦，但文媛他们总能顺利地完成任务。

虎口脱险得安宁

长征开始时，文媛因为身怀有孕，不能跟随大部队行动。组织上指示她们回到上海继续搞地下工作。文媛她们只好同留下来打游击的小部队一起与敌人周旋，一直随军打到了赣东。这时，战士伤亡很大，张鼎丞指示文媛她们五个女同志原地留下来隐蔽。部队负责人还告诉文媛她们，如果被捕，就说是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时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派到江西来参观的。

文媛她们五个女同志离开部队辗转到了会昌，躲在山上，没有吃的，就到附近地里挖红薯来充饥；没有房子住，就住在露天野地。这时，国民党部队在会昌有一个铲共团，和当地民团一起，常常搜山。一天，他们狂呼乱叫，蜂拥而上，文媛她们虽然四下藏匿，到底还是被抓住，并被带到会昌县城，关在牢里。在此之前，被捕的还有一个在苏区办报的编辑，叫谢然之。敌人审问文媛她们五人时，她们异口同声地都说是福建人民政府参观团。敌人不信，就把谢然之拉出来指供。他只认识文媛，说文媛是中央译电员。敌人便进一步逼问文媛的身份，文媛回答：“家庭妇女，没有翻过电报。”

敌人看问不出什么名堂，又去问其他几个女的。她们也一口咬定文媛是家庭妇女。就这样，敌人一无所获，对她们也不再追问了。

后来，敌人把其他四个女同志押到南昌，关进了国民党的感化院。文媛因为临近产期，被押到了宁都，转交红十字会，并同意出保释放，否则就遣送回安徽原籍。文媛想，如果回安徽就是重犯了，只好说家里人己不在安徽，在上海。当时，文媛也确有一个伯父在上海光华火油公司任职，她就给伯父写了封信。不久，伯父来了信，还寄来了钱，文媛才被放了出来。在宁都红十字会医务所时，有一个安徽籍医生，为人忠厚，他听说文媛被保释，便告诉她去上海的路径。这时，文媛的儿子刚满月，她一手提着篮子、一手抱着孩子，只身到南昌，又转九江，乘船到上海。

1938年5月，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文媛来到了日夜思念的延安，先进陕北

◆ 将军县的初心故事

公学学习，后进中央党校学习。此后，文媛和陈一新一起跟随部队转战东北、南下中南，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工作。

（作者：胡遵远，原载《党史文苑》2017年第17期。）

红色特工王文、王凤岐的传奇人生

革命队伍里的精英

王文出生在金寨桃岭乡胡店村一个贫苦农家。1931年4月，14岁的王文和两名青年瞒着父母，步行40多千米，找到红军队伍，要求参军。后被分到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政治处当勤务员。1938年初，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建议并经党中央同意，从红军队伍中选派王文等文化水平相对较好的20多人，到苏联莫斯科学习无线电通信和情报专业技术。

经过一年多的勤学苦练，王文熟练地掌握了无线电通信和情报专业的相关知识和技术，成了一名合格的红色特工。

王凤岐，1916年出生于河北省安新县白洋淀一个小渔村。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凤岐参加了青妇会，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百团大战开始后，组织上看她胆子大、打枪准，又将她调入区妇联任武装干部，随地方武装辗转河北一带，与日军展开游击战。

为了潜伏闪电结婚

1942年，王凤岐被调到易县华北社会部学习。学习内容以掌握敌占区北平、天津的城市生活和民俗风情为主，背诵并牢记地名和街道名称，为派往敌占区做好地下工作作准备。王凤岐虽然文化水平较低，但是记忆力惊人，两个月后的考核结果让教员非常满意。

随后的一天，华北社会部副部长钟子云给王凤岐引见了一位身穿军装的青年人，让他们在一起多交流，并说“如果谈得来，今后会在一起工作”。

这个青年人就是王文。1938年，经中央密派赴苏联学习情报工作，1940年回国后携电台在北平妙峰山一带活动，负责平西情报站的转发工作，归华北

社会部领导。此次，组织上让他遴选一位女同志假扮夫妻，潜入北平腹地，组建新的情报站。

20天后，华北社会部部长许建国电话征求二人意见：如果谈得来，组织上批准他们结婚；如果谈不来，为了革命工作，也要以夫妻的名义去北平。

二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服从组织决定。几天后，他们秘密地举行了婚礼。婚后，他俩和一个陈姓的老太太（对外称是王文的母亲），组成一个临时家庭。

1942年冬，一家三口先后离开易县，相继进入北平，住进鼓楼南大街烟袋斜街小石碑胡同11号。

在朋友“七哥”叶绍青的帮助下，儿子每天到书店照顾生意，婆媳俩操持家务，表面上日子过得还算体面。不久，一家三口又搬到大石桥胡同7号院。7号院是个独门独院，南、北两个院6间房，宽敞、气派。屋子内一水儿老式红木家具，古色古香。更可心的是房东是日本宪兵队翻译官，对门儿是伪警察所的张警长。这在日本人占领的北平四九城，有这么二位“罩”着，谁还会来找麻烦呢？

潜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

平西情报站规定，王文和王凤岐三个月内不准活动，主要是熟悉环境。三个月后，“七哥”叶绍青把王文在北平妙峰山游击区使用过的发报机托法国朋友秘密运进北平。没想到，这北平城里，交流电线多、干扰大，天线又不能架得太高，电台输出功率太小，和平西情报站的电台一直通联不上。经平西情报站领导同意，王文决定自己组装一部发报机。

想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城组装一部电台，其困难和危险是可想而知的。王文决定化整为零，分头购买电台零件。庙会上有些人摆旧无线电地摊的，卖些旧零件。王文就趁赶庙会时有合适的买一件。

经过两个多月的游击采购，王文运用在莫斯科所学的知识，计算、设计、画图，开始组装电台。一台有三个6L6真空管、输出功率为30瓦的发报机，终于组装成功了。此外，王文还搞到了一部美国海军用的长短波两用收音机，并将其改为收报机。

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架天线，必须伪装。于是，王文就弄了个粗铁丝，白天晾衣服，晚上搭上电台的线，就成了天线。为了增加天线的长度、高度，王文将30多米长的天线拉出，拴在两根竹竿上，放在南房上。

为避开日伪侦测台监听时段，王文就在凌晨2点到5点，抓住空隙，与华北社会部电台通联。除了打时间差避开日伪侦测台，他还大胆地模仿日伪电台报务员的手法。这样，就算日伪电台报务员听到呼叫，还以为是自己人的电台在工作。就这样，鼓楼街7号院发出的红色电波，频频飞越古城，传到平西。

对外，王凤岐是位职员太太，很光鲜。可实际上，当时，党的地下活动经费很紧张，一家三口连饭都吃不上。为此，贫苦出身的王凤岐想了很多办法。天黑以后，她换上旧衣服，悄悄地到菜市场拣别人掰剩下的菜帮子、烂萝卜，回家洗一洗，放点盐煮着吃。她还养起了鸡。养鸡的好处既可以吃鸡蛋，给王文补身子，又可以借喂鸡、捡鸡蛋、开门找鸡的机会，观察院子内外、胡同里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可疑人员。

1943年8月7日，“七哥”叶绍青急匆匆赶来通知王文、王凤岐：藏好电台，立即撤离。夜里9点多，王凤岐用红包裹好改装的收报机，送到东四十一条胡同西口交接点，交给了地下交通员黄云。

王文撤到河北阜平史家寨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房子退了、户口也销了，但是王凤岐并没有出城，而是在北平继续潜伏，直到抗战胜利才撤回解放区。

1944年2月，一切平静后，王文第二次潜入北平，继续开展情报工作。两个月后，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派王文前往上海，到李振远情报组和郑凯一起继续做地下工作。

情报抵上十万大军

1946年10月15日，王文第三次潜入北平城建立秘密电台，掩护身份是阜成门内巡捕厅胡同（今民康胡同）影悟无线电商行的技术员。

影悟无线电商行是秘密党员苏省悟为掩护工作向北平有关部门申请开办的，对外挂牌营业，以修理收音机为主，苏省悟为经理、王文为技术员。

1947年4月，苏省悟在国民党新一军当战车队长队的同学程震来到北平，住进了苏省悟家。他一住就是3个月，这给王文发送情报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程震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喜欢喝酒、唱戏、凑热闹。他不睡觉，王文收到的情报就没有机会译成电报，夜间发不出去。一次，敌人要袭击我河涧等根据地的情报得到后，就是因为不能及时发出而使敌人阴谋得逞。王文对此心急如焚，他找到苏省悟，一起商量应对的办法。

之后，只要来了情报，苏省悟便主动拿着胡琴，到程震的房间找他一起唱京戏，将程震缠住。王文就在修理收音机的屋子里摆上修理收音机的书籍和线

路图，装作学习修理知识的样子，以此掩护译电工作。因为程震和其他人的干扰，有时一份电报需要分四五次才能译好发出。由于王文是在危险情况下发报，所以根据地的电台报务员常常是几个人从凌晨2点守候到早晨5点，一有电报几个人同时抄写，尽量避免重复，以便王文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将内将电报发完。这样，既能减少被程震发现的危险，又能减少被敌人侦测的可能。

1947年1月4日，蒋介石从南京飞抵北平，召集傅作义、孙连仲等高级将领开会，策划驻石家庄的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新三军第七师全部和军直特务营共8000余人于10月15日开始北移保定。

打入敌司令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刘光国及时将这个情报传递出来。王文收到情报后迅速译报，在夜间分几份电报发了出去。

晋察冀军区接到这份情报后，司令员聂荣臻立即调动部队，从徐水地区奔袭100多千米，赶往定县城北清风店地区迎敌。

在朱德、聂荣臻、罗瑞卿的指挥下，10月20日至23日，我军在清风店地区全歼敌新三军军部、第七师全部和军直特务营8000多人，活捉了敌中将军长罗历戎、中将副军长杨光钰。

清风店大捷后，王文收到了晋察冀军区的嘉奖电。聂荣臻称赞道：“我们的情报组织抵得上十万兵马！”

随后，王文等人又得到了石家庄兵力空虚、敌人内部矛盾重重、增援迟缓等情报，建议赶快攻打石家庄。晋察冀军区接到情报后，立即周密部署，于1947年11月12日解放了石家庄，取得了全歼守敌24000多人的伟大胜利。

随着电报的增多和我军的节节胜利，敌人对我秘密电台的搜索越来越严。

一天晚上，王文养的3条狗叫得很凶。王文便悄悄地起床，贴着墙根查看。他突然发现，一个人在房顶上正将一根天线挂在自己的天线杆上。

王文知道这是敌人在侦察，便迅速将情况向上级作了报告。上级指示他将电台交给苏省悟隐藏，迅速撤退回到华北局社会部。1948年6月底，王文回到根据地，在华北公安部任政治保卫处电讯科副科长。

借敌掩护屡建功勋

1948年11月19日，党组织第四次派王文进入北平，目的是加强华北局与北平的电讯联络。王文又回到了影悟无线电商行。

这时的北平已经被解放军包围，傅作义指挥的军队都龟缩在北平附近，城里很多民房都住进了傅作义的军队，苏省悟家也住了一个炮兵排。

王文见原来架设电台的房间已经被排长和两个班长占住，自己只好收拾北

院盛煤的小屋作为工作室。他将地下方砖起开，挖了个洞，将小型收发报机隐藏在里面。工作室解决了，可是这里与原天线距离远，无法使用，新架设天线是个大难题。

王文经过反复观察和思考，终于想出了办法。他以这排士兵乱放毛巾、手套、杂物为借口，在他们屋里拉了一条铜线，一头在原天线附近，一头钉在北门头上，可连接小煤屋。这样，将发报机的输出端用小夹子夹上天线就可发报了。

铜线接好后，王文假装关心地对这些当兵的说：“我给你们拉一根铜线，诸位长官可在上面挂毛巾、手套等物件，这样屋里就可以整齐一些。”士兵们对无线电是外行，没有看出真实意图，连声称谢。

这些士兵们昼夜无事就玩牌、赌钱、喝酒。王文就利用他们赌钱、喝酒的机会，在凌晨2点用手电筒照明发报，在十分困难危险的环境中，保证情报传递渠道的畅通。

1949年1月22日北平和平解放，至此，王文结束了潜伏生涯。

1949年1月30日，就在大家欢庆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即将举行入城仪式之际，王文奉命离开北平，随社会部部长许建国赶赴天津，从国民党手中接管警察局。在组织的安排下，他与长期分居的妻子王凤岐在天津团聚，这对红色特工从此真正过上了正常的夫妻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王文历任天津市公安局科长、处长、副局长等职；王凤岐历任天津市公安局边防检查股股长、侦察股股长、行政处副科长等职。这对革命伴侣是新中国的第一批人民警察，在建设新中国的战斗中，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公安工作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作者：胡遵远，原载《江淮时报》2016年4月12日。）

老红军张泰升的战斗人生

张泰升（又名张太升），安徽省金寨县南溪镇人。13岁时参加红军，先后3次过雪山草地，参加了北上抗日、西路军西征，历经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以及1958年台海炮战。他是一位久经沙场、南征北战，为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老红军。

少小离家当红军

张泰升1918年出生在河南省商城县南溪乡曹畈村（现属安徽省金寨县南溪镇）一户农家，排行第三。由于家中自有的耕地还不到1亩，为了让全家8口都能有口饭吃，父亲张少勋只得去向地主租地耕种。一年到头，起早贪黑地干，除了向地主交租外，家里所剩无几，一年的辛苦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张少勋瞅着这个刚刚来到人世的男婴，内心涌出一股期盼，期盼着这个孩子将来能给贫寒之家带来好运。于是，识字不多的张少勋便给儿子起了名字叫“泰升”，乳名“发子”。“泰”“升”“发”这3个字，寄托着张少勋一家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

8岁时，发子便被父亲想方设法送进了村子里的小学堂。整天和土地打交道的张少勋知道：儿子要想从这块贫瘠的土地走出去，要想以后能出人头地，不念书是不行的。

在小学堂里，发子认识了一位叫作廖静民的教书先生。27岁的廖静民是张家的远亲，他特别喜欢活泼好动的发子，经常给他讲大山外面的故事。不过，年幼的发子并不知道，他的这位“亲戚老师”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秘密党员。

发子在小学堂里念书的时候，正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时期。一批批头戴八角帽、身穿土蓝布军服的红军战士，开始频繁进出曹畈以及附近的几座山村。大别山下，到处可以看见迎风招展的红旗，到处可以听见声震云霄的嘹亮歌声。红军打土豪、分田地，让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许多村民纷纷报

名参加红军。发子的爸爸、妈妈参加了农会，二哥张泰均参加了红四方面军，成为一名司务长。年纪尚小的发子，也和小学堂里其他孩子一样，高高兴兴地加入了儿童团。

1929年底，红四方面军成立了皖西北银行。次年，根据父母的安排，年仅13岁的发子，便跟随着教书先生廖静民，离开了家乡，来到位于槐树湾响山寺附近的皖西北银行财务科当上了一名勤务员。廖静民担任财务科科长，发子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廖科长端茶倒水，做些勤杂事务。张少勋之所以要儿子跟随廖静民前往皖西北银行，除了信任这位远亲外，也希望儿子能在银行里学点生意经，长大后能经商致富。不过，张少勋并不太清楚，皖西北银行其实就是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即后勤部）的一个下属部门，而自己寄予了颇多希望的发子，从此就成了中国工农红军这支英雄队伍里的一名“红小鬼”。

历尽艰辛去长征

1931年底到次年5月，徐向前、陈昌浩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地区，接连打了几场漂亮的歼灭战。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50多万人马向红四方面军发起规模浩大的“围剿”。为保存实力、争取主动，红四方面军主力主动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向四川、陕西边界地区转移。临行前，张少勋特地从南塘村赶到槐树湾看望儿子，父子俩依依惜别。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站住脚跟后，迅速与川东游击军会合，部队很快就由3万人发展到8万人，并扩编为5个军。1935年3月，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红四方面军根据中央指示，于3月29日攻克苍溪、阆中一带，火速造船100余艘，抢渡嘉陵江，随后开始了伟大的长征。

长征途中，张泰升随部队南下北上，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辛。他和战友们常常是忍着饥寒与疲劳，与围追堵截的敌人展开周旋。

夹金山雄峙于四川甘孜、阿坝和雅安3地的交界处，海拔4000余米，山上气候恶劣，积雪终年不化，山下的宝兴河波涛汹涌，涛声如雷霆万钧，久久地回荡在九天之外。来到夹金山脚下，战士们抬头仰望着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只见雪连着天、天连着雪，一个个都十分兴奋。然而，这样的兴奋很快就被刺骨的严寒给驱散了，不大一会儿，身穿单衣的战士们就开始打起了哆嗦。为防寒，部队特地给每名战士分发了几颗红辣椒，叮嘱大家在挨冻时放进嘴里嚼上几口。

由于夹金山每天下午都是狂风呼啸、冰雹满天，因此要想翻山，必须赶在中午的12时之前。张泰升把红辣椒塞进了上衣口袋，咬紧牙关、打着寒颤，

随部队一起向山顶奋力攀去。“大家注意了！一定要跟上前面的队伍，脚千万不能停下！”从队伍的前方，不断传来这样提醒的声音。爬到半山腰时，突然，张泰升的眼前一片雪白，仿佛置身于浓浓的雾气之中，什么也看不清了，周围的战友们也都转眼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后来才知道，这是“高山反应”的一种典型症状——“雪盲”。他努力摸索着向山顶爬去，嘴里一阵阵往外冒着酸水，一阵恶心之后，便栽倒在了雪地上。等张泰升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已经随着部队登上了夹金山的山顶。一问才知道，原来自己是被战友们给抬上山的。

下山时，战士们排起长队，沿着光滑如镜的冰面，朝山下径直滑去。张泰升往夹金山的两侧望下去，所见的只有万丈深渊。他心里一阵哆嗦，但也顾不得多想，就鼓起勇气，再深深地吸一口气，朝着山下奋力滑去。滑在他身边的，是一位背上背着大铁锅的炊事员，由于滑偏了方向，这名炊事员一下子滑入夹金山旁边的深渊之中，转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党岭山是折多山的主峰，海拔5470米。这里气候异常恶劣、山高坡陡，当地的藏民称这座山是鸟儿也飞不过去的“神山”。部队要翻越这座高山，必须花费两天的时间。张泰升和战友们爬至半山腰时，夜幕降临了，党岭山寒气袭人。徐向前总指挥发出了“就地宿营”的命令。

战士们用大刀砍下山上的野树枝，在山坡上搭起了帐篷，点燃了一堆堆篝火。大家围聚在篝火前取暖。张泰升和战友们一起，就着冰水，吃起了糌粑。

尽管想尽了驱寒的办法，还是有一些战士没能熬过寒冷的长夜。天色微明时，张泰升发现，雪地上已经横七竖八地躺倒了不少的战友，他们都是被冻死的。临出发前，泪流满面的张泰升与战友们一起，用积雪将这些死去的战友掩埋了起来，并在堆起的大雪堆上，放置了一顶红军的八角帽。

刚刚往雪山山顶上爬了没多久，突然，山顶上猛地下起了“暴雪”。“遇到雪崩了，大家注意！”话音未落，“暴雪”便凶狠地砸了下来。一些战士因为躲闪不及，瞬间便葬身在了大雪之中。而从雪崩下捡回一条性命的张泰升，很快又受到了“雪盲”的困扰。不过这一次，有战友给他出了个好主意：解开绑腿，系在腰间，再让前面的战友牵着爬山。就这样，张泰升被安安稳稳地“牵”过了党岭山。

过草地时，红军将士们更是遇到了多次生死挑战。这里一会儿烈日炎炎，一会儿雨雾交加；一会儿晴空万里，一会儿狂风呼啸。草地上到处是深不可测的烂泥潭。行军中，后面的战士只能紧跟着前面战士留下的脚印前进，稍不留神，踏偏了草皮，就会立即陷入充满恶臭的沼泽中去，只要陷进沼泽，任凭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别再想一个人拔出腿来。张泰升好几次碰上了这样的“倒霉

事”，都是靠着战友们的救助，才脱离了危险。然而，不少战士没有这么幸运，蹀入沼泽后，还没等战友们反应过来，整个身体便在刹那间被泥潭吞没，再也出不来了。

太行山上打鬼子

1940年5月，张泰升被分配到驻扎在太行山区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总部炮兵团，担任三营九连的一名炮兵排长。

同年8月，为粉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争取华北战局朝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八路军总部决定：组织105个团约40万人的兵力，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百团大战。张泰升所在的一二九师总部炮兵团参加了这场规模空前的大战。

8月下旬，战斗打响了！总部炮兵团接到命令：全力支援步兵攻打榆次县城。榆次县城是西北地区一处重要的战略枢纽，汾河的支流潇河贯穿其间。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八路军很快便占领了城门，日军丢弃城门后，全部龟缩到了炮楼里。张泰升指挥战士们向日军的炮楼展开了猛烈的炮击，但由于火炮平架在地面上，几发炮弹射出后，躲在炮楼内的日军，却毫发无损。眼看步兵就要发起新一轮的进攻了，怎么办？情急之下，张泰升便和战士们一起，将火炮抬到了狭窄的城楼上，这样，躲藏在炮楼里的日军，就彻底地暴露在八路军的火炮之下了。随着火炮发射时发出的巨响，日军的炮楼土崩瓦解了。

在攻打太古县城时，由于炮弹越来越少了，上级指示张泰升：一定要百发百中，绝不能浪费炮弹。张泰升于是和战士们一起，乘着夜色将大炮悄悄推行到距离日军炮楼仅有数百米远的高粱地里。然后，大家把高粱地悉数铲平，瞄准目标，狠狠地向日军的炮楼轰了出去。谁知这第一炮，竟然是颗“哑弹”，炮弹径直地从炮楼中穿了过去。不过，令大家高兴的是，这颗“哑弹”尽管没有爆炸，却将炮楼打穿了一个大窟窿，炮楼在一阵摇晃之后，轰然倒塌。

百团大战历时3个半月，八路军共进行了大小战役1800多次，击毙日伪军2万多人。这场大战，成为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战期间独立发动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场经典战役。

挺进中原见乡亲

解放战争打响之后，八路军一二九师被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政委是邓小平。1945年9月至11月，蒋介石调集大

批军队向解放区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挥下，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奋起还击，先后取得了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的胜利，歼敌 2.5 万多人。张泰升参加了这两场战役，战役结束后，他被提升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炮兵营副营长。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张泰升一直随主力部队转战于陇海铁路周边地区，并先后参加了多场重大战役。

为“把战争引向蒋管区”，1947 年 6 月，中共中央发布命令：刘邓大军 4 个纵队共 13 万人马，由鲁西南出发，千里跃进大别山，“将一把钢刀插进敌人的心脏”。

张泰升所在的二纵主力部队奉命发起了对商城的进攻，在攻克了商城之后，二纵犹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浩浩荡荡地向着大别山挺进。1947 年，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部队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前进到了黄泛区的北侧。

刘邓大军的挺进行动被蒋介石发现后，赶紧调集了大批军队围追堵截。遍地齐膝的污泥，加上天空中敌机的轰炸和低空扫射，使部队的行动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此时，刘伯承一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豪迈口号，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泥泞和积水中并肩携手，艰难地跋涉前进；而张泰升则沉着地指挥着大家，将火炮抬过头顶，雄赳赳地蹚过了这片泥海。

越过黄泛区，部队挥戈南下，经过数次战役后，顺利进入大别山区腹地。考虑到山地作战的需要，张泰升根据上级命令，指挥战士们将大炮全部埋进了大山中。再往前走，就是张泰升小时候经常玩耍嬉戏的挥旗山和老虎山了。“终于回家了！”离家乡越近，骑在马背上的张泰升心里就越不是滋味——是啊，自己打小离家，已经有整整 17 个年头了。家中的亲人们，你们可都安康？

行至曹畈村头，张泰升按照习俗下了马，牵着缰绳步行走进了村，只见家家户户门窗紧闭，村子里也见不到一个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后来张泰升才知道：原来，见村头来了这么多的军队，不少村民还误以为又是国民党军来抓壮丁了，纷纷躲藏了起来。

张泰升凭着记忆找到了自己的家，家还在原先的地方，甚至连房门前的老树也依然挺立着。他悄然走近家门，轻轻地拍了拍房门，问：“老乡，请问这户人家是不是姓张啊？”这时，一位面色惊慌的老农从房中走了出来，他看着眼前这位牵马的“大官”，点了点头说：“这户就姓张，‘老总’要找谁呀？”

看见这位老农，张泰升的眼睛一下子就潮湿了，他一把抓住老农的手，激动地说：“爸，是我，我是泰升啊！”可张少勋迟疑着，半天也不敢说一句话。良久，他才怯怯地问：“‘老总’，你说你是泰升，我可不敢认哪！如果你真是泰升，那你说说看，你的小名叫什么？”张泰升听罢，忙说：“爸爸，我就是当

年的发子啊！”说话时，他的声音不住地颤抖着。

父子俩的谈话，把张泰升的小弟从屋内吸引了出来。见门外的“老总”自称是自己的哥哥，小弟便说：“我哥哥小时候曾经被马蜂叮过，左腿上有一块疤，你如果真是我哥哥，就把腿伸出来让我们看看。”张泰升连忙把左腿伸了出来，父亲和弟弟瞅见了那块伤疤，3个人当即抱成一团，放声痛哭。

村里的乡亲纷纷走出了家门，张泰升站在高地上，大声地对群众说：“乡亲们，我们就是当年的工农红军，大家不要怕，南塘已经解放了！”

进入大别山后，部队首长考虑到张泰升是当地人，有利于开展地方工作，便将他从二纵炮兵营调入金寨县武装大队担任副大队长。1948年春，金寨县武装大队与商城县武装大队合编，组建成金商大队，张泰升又受命担任了该支队参谋长。淮海战役结束后，张泰升奉命返回第四野战军，并协助组建了湖北省军区炮兵营，张泰升任营长，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作者：胡遵远、张忠平，原载《党史纵览》2019年第1期。）

“将军县”的女红军

——“三寸金莲”走完万里长征

周起义生于1914年，1929年立夏节起义时加入儿童团，1931年8月参加红军。入伍后，曾在红四军第十师医院当护理员。1932年冬，随红四方面军西征翻越大巴山，后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担任看护长。

1935年3月，周起义随红四方面军从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1936年春节后，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调到女子警卫连担任政治指导员，长征途中改任红军总部卫生所卫生员。1936年10月，周起义随卫生所的姐妹们到达陕北。抗日战争时期，她在延安担任司药。1948年在绥远省军区任助理员。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军队从事医务行政工作。

提起小脚女人，在人们印象里，往往是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样子。万恶的旧社会，也给周起义留下了一双“三寸金莲”。可是，在党的培养下，作为革命战士，她就靠着这双小脚，走过了万水千山，走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为了跟随部队转移，周起义自己 决定实施“快速疗伤法”

周起义刚参加红军时，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的被服厂当战士。部队被迫从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时，她被调到第十师医院当护理员。1935年1月，周起义在川北王坪四方面军总医院养伤。有一天，突然听说部队要转移，她心里急得火烧火燎的。她偷偷掀开“纱布”（实际上是没有消毒的碎布条），只见两条腿肿得有瓦罐那样粗，小腿上大水泡一个挨一个的，烂得像马蜂窝。由于筋和肌肉萎缩，小腿向后蜷曲，已经伸不直了。这是从鄂豫皖根据地往川陕根据地转移时，翻越大巴山留下的“纪念”。

当时，周起义只穿着单衣，山上风大雪紧，手、脚、耳朵、小腿、全冻伤

了，住院四个多月，还是没有痊愈。为了能按时随部队出发，周起义决定采取“快速疗伤法”：趁没人时，她把水泡一个一个地挑破，放出里边的脓血；为了使小腿尽快直起来，她硬撑着练习走路。她又用稻草做个小“枕头”，休息时夹在大腿和小腿之间，不让小腿向后弯。过了几天，她的腿真的不那么疼了。于是，她就去找医院的领导，要求出院。院长看了看，不放心地说：“小鬼，你这种精神是好的，可你的伤好了吗？”

“好了，好了！首长不相信，请看！”说着，周起义就把早已准备好的动作，重新演习了一遍，原地跳了跳，又用一条腿换着站立。

“哟，还能金鸡独立啊！”在场的领导全被逗乐了。

“院长，这哪是金鸡独立嘛，这叫金莲独立！你看周姐那三寸金莲。”卫生员小李突然闯进来打趣地说。

“真不愧是小燕子，进门就咋呼，金莲怎么着？从皖西到川北，比你少走一步了？”周起义假装生气地说。小李的性格活泼，爱说爱逗，人们都喜欢叫她小燕子。

“瞧，这姐妹俩真是有意思，三天不见想得慌，见了面就斗嘴。小鬼，还不赶紧回去准备呀？”院领导总算松了口气。

周起义一听，高兴地抱着小李跳了起来。

面对缺医少药的窘境，周起义更多地 依靠“精神疗伤法”

出院后，组织上派周起义到总政妇宣队当队长。时间不长，周起义的小腿又溃烂化脓了，水泡连成了片，不得不又住进了医院。

说是住院，实际上和在连队里没多大区别。照样是“天上有飞机炸、后边有敌兵追”，每天百十里行军不算，还得三天两头打仗。周起义的身材瘦小，又是小脚，别人大步走，她就得一路小跑。脚上很快打起了血泡，一着地就像踩上针尖似的。再加脚上的疾患，每迈出一小步，周起义都要忍着痛苦。

在那种情况下，想靠药物减少疼痛，是不可能的。因为红军的物质条件很差，药品更是缺乏，一般轻伤员能用盐水擦擦伤口，就算最好的消毒了。所以，周起义只得更多地依靠“精神疗伤法”：一边走，一边和同志们说说笑笑、唱唱歌，以此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到了宿营地，她就帮着医护人员照顾重伤员。有几个同志的伤口化脓生蛆，周起义就用手一个一个地挑，用干净破布蘸盐水给他们洗伤口。这一忙，她就不觉得疼了，干完活，往地上一躺，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同志们见周起义挺勤快，就把她留在了工农兵医院。医院里的工作人员，除院长赵开国当过医生外，其他人都是半路出家，临时从各单位抽来的，不用说给人治病了，有的穷得连药也没有吃过。医院的设备很简单，不过几把剪刀和铁镊子，四五个药包，至于药品嘛，只有“红降丹”“白降丹”等三四种，全靠自己采、自己熬。因此，这些治疗技术也好学，时间不长，周起义就能应付下来。为了更好地掌握医疗本领，她们边行军、边学习。

前边的人背块小黑板，写着“盐水”“红降丹”“消毒”等常用字词进行教读，后面的人边走边看。这种方法看来很好笑，可对于周起义这样没有读过书的人来说，却很起作用。她就是靠着这种方法学文化、学技术。当时，周起义还找了一本中药书，边走边背，不懂就问，走到陕北时，已经能够背下来了。

那时候，成天行军打仗，瞌睡很多，根本不知道失眠是啥滋味。不管是破庙里、树荫下、坟堆上，只要脑袋一沾地，立即就打起呼来。说来很可笑，有时行军拽着别人的衣襟就睡着了。有次睡了一夜觉，第二天起来一看，腰下还垫着足球大的土疙瘩。至于铺的盖的，现在的人根本无法想象。那时，红军里流传着一首歌谣：“天当被，地当床，树皮、草根是干粮……”要是能找到一点稻草，就是最大的幸运了。

一次，在一个场院里发现个大筐箩，同志们半开玩笑地说：“小周，这儿有个‘柳丝床’，就是小点儿，你睡正合适。”周起义一瞧可高兴了，这总比睡土疙瘩强啊！她躺在里面把身子弯成个“小船儿”，腿和脑袋搭在筐箩沿上，美美地睡了一夜。第二天，同志们叫醒她，她还埋怨说：“你们真坏，把我的美梦搅没了。”

“你梦见什么啦？”

“梦见咱们到了根据地，上级决定放假，睡三天大觉。我睡得正香哩，就被你们吵醒了。”

“哈哈，小周真美气，连做梦也想得美。”

周起义带着女子警卫连，历尽千辛万苦翻过党岭山

光阴似箭，一晃一年多过去了。由于张国焘主张向川康边退却，红四方面军走了许多冤枉路。周起义他们跨过了滔滔嘉陵江、大渡河，走过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翻过了连绵起伏的邛崃山、大雪山，在四川、西康地区来回折腾。

1936年春，组织上派周起义去女子警卫连当指导员。随后不久，她们就来

到了党岭山底，上级要求她们准备烧酒、辣子等东西，准备爬雪山时御寒。

由于国民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残酷掠夺，老百姓穷得叮当响，根本找不到这些东西。当地老百姓见周起义她们穿的都是单衣，就苦苦劝说，党岭山的冰雪都顶着天了，你们穿这么单薄，上去非冻死不可。周起义她们说，有党中央的领导，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莫说是冰峰雪岭，就是刀山火海，我们也要闯过去。

第二天，鸡还没有叫，她们就开始上山了。

这山路呈“之”字形，开始觉得没事，边上边说笑。往上走，空气就稀薄了，很多人觉得心慌气短、头痛恶心，好像天也旋地也转。于是，大伙倒安静多了，为了节省体力，尽量都不说话。

这时，担任过闽浙赣省工农民主政府主席的邵式平骑着马过来了。他平时经常到警卫连来，爱说爱逗，又没有架子，人们和他相处挺融洽。他见周起义累得满头大汗，笑呵呵地说：“小鬼，累吧？来拉着马尾巴吧！”

要是能拉着马尾巴上山，那可真是享福了。可是，周起义觉得别人都不拉，自己是共产党员，哪能去拉呢？于是，她把嘴一撇，嗔怪地说：“首长，你门缝里瞧人把人看扁了吧？为啥偏让我拉马尾巴？”

“哈哈，你是小脚，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

又是小脚，周起义涨红了脸，说：“小脚？你能上去，我也能上去！”说完，把头一扬，故意不理他，大步向前走去。

他紧加一鞭，大声说：“同志们，加油啊，可不能落在小周的后面呀！”一句话逗得大伙哈哈大笑起来，同志们前进的步子也加快了。

太阳偏西，周起义她们才逼近山顶。这里山风刮得人站不稳，到处是没膝的积雪，雪下边是一二尺厚的冰层，滑得像玻璃板上抹了油，稍不小心，就会坐“滑梯”，滑进深不见底的山涧。人们根本站不起来，只能手脚着地向上爬，实在爬不动了，党团员们就在前边拉、后边推。

这里的气候，正像当地群众说的那样，山顶的天，小孩的脸，一天变三变。正当周起义她们累得气喘吁吁的时候，突然西北方出现一股粗大昏暗的云柱，旋转着向周起义她们扑来。

不一会儿，黑云压顶，大雨倾盆。暴雨过后，核桃大的冰雹又劈头盖脸地砸来。顷刻间，被汗水浸透的衣服变成了冰甲，硬邦邦的，身上、手、脸、耳朵，冻起了水泡。在这种情况下，一坐下来就会起不来，活活地冻死在山顶上。

一个女战士冻得脸色铁青，牙齿咬得嗒嗒响，往石头上靠靠就不能动了。周起义走过去拉她，她摇摇头说：“指导员，别费劲了。”说着，她大口大口地

喘着气，用瑟瑟颤抖的手，解下干粮袋，要周起义拿走。

周起义含着热泪急忙制止说：“不行！你赶紧吃几口干粮，肚里有饭，身子就发暖，我们好一块翻过雪山！”

“指导员，我不行了。留给同志们吃吧！”说完就闭上了眼睛。

周起义她们忍着悲痛掩埋了战友的遗体，勒紧腰带，咬紧牙关向上爬。黄昏前，终于爬到了山顶。大家又脚不停步地向山下走去。天黑后，她们在半山腰上扫扫雪，就地宿营了。

面对部队首长，周起义含泪诉说自己的苦难童年

翻过雪山后，周起义就开始发高烧，腿、脚烂得血肉模糊，但还是勉强跟着走。一天，邵式平找到她说：“小周，病好点了吗？我想和你谈个事。现在，部队天天行军打仗，你病成这样子，我看不如找个可靠的群众家先住下，等伤势好了，我们再来接你！”

周起义一听，立刻急得大哭起来，说：“我不，我不！我就是死也要和红军死在一块！不能走，就是爬，也要爬到延安去见毛主席！”不等邵式平开口，周起义又连珠炮似的说：“入党时，我已宣了誓，誓死不脱离革命，誓死不离开红军。难道这话就不算数了吗？”

“可你眼下病成这样子，尤其是那双脚……”

一提到脚，周起义哭得更伤心了，不等邵式平说完，周起义就急着说：“首长，要不是这双脚，我还参加不了革命哩。”

往日的悲惨遭遇，又呈现在她的眼前，她沉痛地哭诉起来。

“我的家在安徽省金寨县小河村，虽不算富裕，可家里有田，打的粮食也勉强够吃。为什么还参军呢？那得从这双脚说起。我六岁时，婆家就送来了只有三寸长的鞋样，要我照样子裹脚。那时，我不懂事，家里人就开始给我裹脚。起初慢慢缠，七岁时缠得就厉害了。妈妈把我的脚趾一点一点地捏，捏一下，用裹脚布缠一下，然后用针线把布缝起来。到八九岁时，缠得更厉害了，还要外加‘鸡肠带’，一边缠、一边喷烧酒。”

“我疼得直哭喊，可娘狠着心，还是下死劲地给我缠，一双脚，整天折磨得火烧火燎的，白天，我偷偷地放在凉水里泡，晚上，不敢放进被窝里，而是蹬着墙，凉快点，好减少点痛苦。有几次，我偷偷拆开裹脚布，妈妈发现后，总是数落我：女孩子蒲扇脚，妨人败家没人要。骂过一通后，缠得更狠了。”

“九岁那年，母亲生下老六。爸爸一看又是女孩，就不想要了，把她放在地上，冻得哇哇直哭。这时，我已开始懂事了，听着妹妹的哭声，我真揪心

啊。就去找奶奶说：奶奶，为什么把妹妹扔在地不要啊？”

奶奶说：“谁叫她是女的呢？”

“女孩就该扔？”周起义哭着非要奶奶抱起小妹不可。

奶奶哭得更伤心了，说：“你爸说了，成家的儿子，败家的闺女……但是，不管怎么说，她也是咱周家的一个后娃呀！走，忠臣（周起义的乳名），抱你妹妹去！”

就这样，妹妹活下来了，起名叫冻女。

随着年龄的增长，周起义越来越觉得不公平，家里对自己和弟兄们不大一样。她整天被留在家里烧火、做饭、练针线，连娶媳妇的花轿从门前过，也不让她看看热闹，说她属虎的命硬，怕冲了人家的喜气。家里从不让她打扮，连穿的衣服，也是捡哥哥们的破烂。她闹肚虫时，肚子疼得满地滚，家里只用烧糊的锅巴、黄连根给她治病。没参加革命前，她不明白其中的奥秘，只是恨父母太偏心。参加革命后，她才懂得其中的道理，才知道这是“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害了她。

1929年夏天，周起义的家乡爆发了立夏节起义，家乡来了红军，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等。外边发生的新鲜事一下子对周起义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她越来越感到，红军对老百姓真好，他们的一切主张，都是为穷人说话的。后来，周起义干脆剪了辫子，加入了童子团。不料，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妈妈打她，哥哥们说她是疯丫头，一家人都不理她。但是，周起义自有她的主意：打骂由你们，我要当红军。

1931年8月，周起义刚满16岁时，家里人出了个主意，给她做了双新鞋、一身新衣服，想赶紧把她嫁出去。周起义一听，急得大哭起来，因为她见过那个男的，是个傻子。他爸是个放债的，拖着长辫子到处要账，乡亲们恨他，都叫他狗尾巴。周起义想：我怎能嫁给这样的人家呢？于是，她哭着说：“妈，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啊！就是死，我也不去！”

周起义的妈妈也哭了，可还是劝她：“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扁担抱着走。你还没生下来时，我们两家就指腹为婚了。这是命里注定的，你早晚也是人家的人呀！”

那一夜，周起义再三地劝说妈妈，妈妈还是不依，非让她出嫁不可。劝说无望，周起义气得一夜没合眼。她想了许多，想到自己十几年的痛苦，想到她所认识的一些姐妹们的悲惨遭遇，想到红军来后的可喜变化……最后她认准了一个理：只有红军，才是为老百姓着想，才能帮助我们妇女获得新生。跟着红军走，一定没错，只有这条路，才是唯一的出路。第二天，周起义就偷偷地跑

了70多里路，到麻埠参加了红军。

说完这些，周起义擦了把泪，对邵式平说：“首长，旧礼教害了我，逼得我走上了革命道路。今天，旧礼教还没有被彻底砸烂，广大群众还没有翻身得解放，您就忍心让我半途而废吗？”

邵式平感动了，同意周起义继续留在部队。他走后，周起义心里像揣着个小兔子似的，生怕被部队留下，一夜没敢睡。

第二天，邵式平派来一副担架抬着周起义行军。周起义心里很不是滋味，同志们都很累，肚子又填不饱，我怎忍心增加别人的负担呢？只坐了一天，周起义说什么也不上担架了，咬着牙跟着部队走。

长征途中，周起义当上了总部卫生所的“医生”

部队进驻炉霍以后，情况好转了一些。有一天，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忽然找到周起义，说：“小周，听说有人给你编了几句顺口溜：‘解放脚，坚如铁，穿上草鞋大步越；踏破千年冰和雪，征途万里不停歇。’”周起义听了好生奇怪，随口问道：“你是听谁说的？这是我们连里同志编的。”康克清笑了笑说：“我听邵式平同志说，你还当过看护长？”周起义笑着回答：“康大姐，我当过护理员，也当过看护长，今年才当上指导员。”

这时，康克清说明来意：“小周同志，调你这个指导员来当卫生员，你有什么意见？”周起义不知其中的缘故，连忙应道：“没有，没有，只要是干革命，做什么工作都一样！”康克清一笑：“把你降职使用，可不要闹情绪哟！”就这样，周起义就到了总部卫生所，由政治指导员改为卫生员。

其实，这一工作调动安排，都是邵式平找康克清事先商量好的。因周起义不适合在战斗连队工作，这才将她调到卫生所。从此，她就和医疗卫生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1936年10月，周起义随红军总部卫生所到达陕北。抗日战争时期，她在延安医疗卫生部门担任司药。1948年在绥远省军区后勤卫生科任助理员。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军队从事医务行政工作。

卫生所刚成立，周起义去时只有傅连璋一个人。他过去曾是外国一个教会医院的院长，因为向往革命，抛弃了舒适的生活条件，带着些贵重的医疗器械和药品，投奔了红军，曾挽救过许多中央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后来，又来了林英琴、陈金人、李克芬、张天南、王玉春等八个姐妹，卫生所也就热闹起来了。

周起义过去在工农兵医院待过，也算个半拉子医生了，所以，傅医生出诊时常常带着她。这样，周起义接触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肖克等首长

的机会也就多了。朱老总很和蔼，一见面总爱问：“小鬼，多大啦？累不累哟！再加把油，到了陕北，就可见到毛主席啦！”每当听到这和蔼可亲的声音，周起义就感到浑身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一天，傅医生带她去给任弼时的爱人陈琮英接生。在一间四面透风的土屋里，一个红军后代终于降生了。傅医生严肃地叮咛说：“小周，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啦！这是长征路上诞生的革命后代，你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后来，组织上又派来汪荣华共同接受了这项任务。由于生活条件太差，陈琮英产后身体很虚弱，整天躺在担架上。婴儿因缺乏营养，也瘦得皮包骨。周起义和汪荣华两人竭尽全力护理，千方百计地让陈琮英和婴儿活了下来。

周起义和卫生所的姐妹们克服种种困难，终于走出了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原，结束了漫长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不久，周起义他们来到了毛儿盖，从那往北走40里，就进入了草地。

茫茫草地荒无人烟，连飞禽走兽也看不到。到处是一人高的蒿草，脚下是黑乎乎的烂泥，一踩稀软，臭气直呛鼻子。弄不好掉进泥潭里，越挣扎陷得越深，抢救不及时，就会遭到灭顶之灾。

碰到这种情况，别人还不能拉，一拉，两人就会一块陷下去，只能几个人用绳子或竹竿往外拽。为此，走路得格外小心，必须踩着向导的脚印，一步一步向前挪。周起义他们整天泡在泥水里，腿、脚全肿了，身上长满了虱子。休息时，男同志解开衣扣捉虱子，女同志不好意思，只能拽紧衣袖来回蹭。宿营时，连一块巴掌大的干地方也找不到，只好几个人靠在一起，把年龄小、身体弱的同志放在当中，互相挤着取暖。

草地里虽然到处是水、草，但是水不能喝、草不能吃，因为大都有毒，吃下去腹胀、腹泻，很容易中毒死亡。进入草地时，每人只带了三四斤炒大豆、青稞和炒面，就是按粒数着吃，也维持不到走出草地。那里，水草茫茫，没有人烟，唯一的出路，就是靠野菜度日。

一路上，见到能吃的就拔，什么野韭菜、苦苦菜、灰灰菜、野蒜……都往兜里装。到了宿营地，在黑水里一涮，也不管洗没洗净就煮了吃。有时煮一锅野菜没有油、盐，就放上一把炒面，那就是最丰盛的美餐了。就是这样，也往往是供不应求，因为卫生所经常走在部队后边，能吃的东西被前边的指战员拔光了，所以挖点野菜很不容易。一次，周起义她们捡了块烂牛头皮，在火上一烤，就连毛带血地割着吃。一边吃，还一边高兴地嚷着：“会餐啦，过年啦！”

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周起义她们还是很乐观。一路上，宣传队的快板声、同志们的歌唱声，啦啦队的欢呼声此伏彼起，大家有说有笑。宿营时，同志们好像忘记了一天的疲劳，说笑话、讲故事、唱歌曲，可热闹了！傅连璋年岁大，懂得的知识也多，周起义她们就缠着他讲故事。一天晚上，他刚讲了个开头，突然停住了。人们催他快讲，他故意咂舌头，摇摇头说：“我就是个万宝囊，也让你们倒尽了，哪有那么多故事？”

“不行，傅医生不讲，就别让他睡觉！”姐妹们七嘴八舌地围着他吵。

“好，好，今天换个样。”他沉吟了一会，笑着说：“我给你们改改名字，好不好？”

在她们眼里，傅医生既是威望很高的领导，又是学识渊博的大学者，要是他给改名字，保准没错。“好，好！”“傅医生，先给我改！先给我改！”大家争先恐后地说。

“好，咱们一个一个地来。就说陈金人吧，这名字太俗，想发财，抱个金娃娃。我看不如改成陈真仁，愿你成为真正的仁人志士。”

“周其玉不如叫起义，既红火，又好听。”

“林英琴，叫起来绕口。不如改成林月琴，顺口好听。”

从此，周起义、陈真仁、林月琴她们三个人都有了既响亮又有新意的名字。

进入草地十几天后，粮食已经吃完了。有些同志吃野菜中毒，浑身浮肿，再加上每天遭受雨、雪、冰雹的侵袭，同志们身体极端虚弱。有时，走着走着，身子一栽，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一天，给陈琼英抬担架的一个同志晕倒了。周起义看他苍白的脸，铁青的嘴唇，知道是饿晕了。她赶紧摸了摸自己的干粮袋，干瘪瘪的。她把它翻过来，真是喜出望外，袋角里还残存着一小把青稞面，要知道，就是这么一点点青稞面，说不定就能救活一个战友的生命啊！他把炒面用水泡软，捏成个小条条，塞到那个同志嘴里。不一会儿，他醒过来了，看到嘴里的面条条，急忙拿出来说：“小周，你也是几天没吃粮食了！”

他把面条推给周起义，周起义又推给他，一直推让了三四个来回。最后，周起义生气地说：“你这样子，怎么能抬担架？担架没人抬，红军的后代还要不要？”

他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接受了面条条，含着泪花吃了下去。

就这样，经过了整整 20 天时间，周起义他们才走出了草地。

过了草地，遇到的第一个村子叫核桃铺，部队在那儿休息。周起义望着泡肿的双脚，情不自禁地说：“这一会，你也该解放解放了。”可因为脚肿了，她

左脱右脱，怎么也脱不下鞋来，只得找三四个人硬拽，鞋总算脱下来了，可已经拽得四分五裂……

很多年后，回忆起长征历史，周起义说：“我深深地感到革命胜利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不知有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哪里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啊？就我个人而言，是党把我这裹着小脚的黄毛丫头从虎口里救出来的，使我懂得了革命道理、成长为革命的战士！”

（作者：胡遵远，原载《党政周刊》2018年第9期。）

第四部分

不忘初心

金寨籍的老红军、老将军始终保持革命本色，时刻不忘初心、严格要求自己、注重家风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和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

让我们以这些老红军、老将军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让改革与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

洪学智将军的“八条铁令”

安徽金寨籍老红军洪学智，曾两度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后勤部部长。他经常告诫自己和下属：“人生一世，可能什么情况都会遇到，但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以宽容之心待人、敬业之心做事、敬畏之心律己，任何时候都不要去贪图小利。”

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洪学智定下了许多规矩。后来，这些规矩被他概括归纳为“八条铁令”，始终认真执行：“不管是我的家人还是别的什么人，不该办的事一定不能办；任何时候都不许用公家的钱请吃请喝；部队和下级送的礼一律不收；下部队吃饭必须交钱，账不结清不走；下部队就餐严格执行‘四菜一汤’标准；就餐摆酒一律不喝；饭桌上不许有剩饭；出差不允许子女搭车。”

洪学智带头执行廉政规定，精心为国家和军队理财，从不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私利。有诗赞道：两授上将垂青史，一代风范励后人。

必须从细微之处做起，从严做起

洪学智经常到部队、地方去开展调查研究，遇到部队与地方领导送礼，他一概拒收。有一次，洪学智下部队，在乘车返回的途中，发现车上多了一布袋花生，立即追问是怎么回事？工作人员报告说：“是基层官兵的一点心意，特意从地里挖了点送的。”洪学智听了立即火了：“我们到部队，吃住都在部队，给人家添了那么多麻烦，走了还拿部队的东西，哪有这样的道理？”洪学智还说：“现在社会风气有不好的一面，别人怎么做我管不了，但咱们自己一定要做好，不能让人背后戳脊梁骨、说闲话。我现在管的是全军的钱物，到部队里去哪怕是拿一点东西、占一点便宜，官兵们会怎么看、怎么想？如果身居要位的人这个拿一点、那个占一点，必然会带坏部队风气。如果部队的风气坏了，还怎么指望他们去好好打仗？”以后，洪学智还多次拿这件事教育大家严守他

的“铁令”。

一次，洪学智到内蒙古视察，当地领导安排参观鄂尔多斯羊绒衫厂。厂领导准备了几件羊绒衫，请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转给洪学智，希望能够帮助扩大宣传。政协主席征求洪学智随行人员邢秘书的意见，邢秘书说：“首长不会收的，您还是别去碰他的规矩。”政协主席坚持道：“这是我们这里的特色产品，是请首长帮助扩大宣传的，我直接去跟他解释。”最终，羊绒衫还是被悉数退回了。事后，政协主席感慨地对邢秘书说：“还是你对老首长了解深，虽然礼物被拒绝了，可我这心里却更加敬重他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尚品质的确让人钦佩！”

在洪学智身边工作了24年的邢秘书，对洪学智将军的“八条铁律”只有一次动过“破例”的念头。那一次，他陪同洪学智到安徽芜湖调研，当地政府的同志送给首长一个砚台，邢秘书觉得这个东西对首长练习书法有用，就自作主张收下了。结果报告洪学智后，还是挨了一顿批评。洪学智语重心长地说：“收了第一次，就会收第二次，这个口子绝对不能开。这些看似小事，许多人犯错误都是从这些看似点滴小事开始的，所以必须从细微之处做起、从严做起。”最后还是按他的意见退了回去。

洪学智不收礼也不送礼。有一年春节前夕，工作人员善意提醒他：“您是不是也适当地给领导同志拜拜年？”他摇摇头，说：“首长们那么忙，有事在工作时间里就汇报了，没有必要节假日期间再去打扰，人家也需要过一个安静不被打扰的节日，我们不要去搞那些庸俗添乱的东西。”不过，也有例外，那就是逢年过节，他一定会去探望老师或老师的遗孀们，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洪学智动情地说过：“老师们为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

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能丢

洪学智每次到部队检查工作，都是到食堂与干部、战士一起用餐，并主动结算费用。一次，天山之行，车队出发已经大半天了，洪学智忽然得知还没有交伙食费，勃然大怒。返回去补交已经不行了，无奈只好猛批秘书。随行的领导想解释几句，不料越解释，洪学智越火。他从历史讲到现实，从党的要求讲到个人操守，摆事实、讲道理，滔滔不绝，整整讲了三四个小时。从那以后，随行人员总要互相告诫、彼此提醒：吃饭千万不要忘了交费，而且一定手里捏着凭据才敢离开。

洪学智下部队，坚持轻车简从，反对前呼后拥；招待用餐，严格执行“四菜一汤”的规定，不准突破、不准搞变通。有一次，他到总后的一个直属单位

去调研。第一天晚餐，按正常速度上菜，两道菜之间相隔时间比较长。洪学智吃过四道菜后，说吃饱了，起身便走。单位领导明知菜还没有上完，也不便明说，只好陪同离席。

第二天晚餐，上菜速度加快了，不等洪学智吃饱饭，已经上了六七道菜。洪学智问：“昨天上四个菜不是很好嘛，今天怎么搞的，为什么增加？”到了第三天晚餐，虽然还是四道菜，但每道菜都换成了大盘子，一个大盘子中放了好几样菜，成了大拼盘。洪学智问：“你们还有比这更大的盘子吗？”单位领导开始说有，但很快琢磨出这是变相的批评，便连声说：“没有了，没有了。”

洪学智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想让我吃好一点、多吃点，是一片好心，但菜多了，一是破坏了规矩，二是造成浪费，三是可能有害健康，何苦呢？”随着物资的丰富和社会风气的变化，有人劝他不要太较真，可以变通一下。洪学智则说：“不管物资多么丰富，社会风气怎么变化，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能丢。”

（作者：胡遵远，原载《学习时报》2019年11月4日。）

三位开国将军的家风故事

在安徽大别山金寨县这块红色土地上，走出了 59 位开国将军。他们不仅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建立不朽功勋，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初心不改，严以律己、艰苦奋斗，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教育和影响着子孙后代。

洪学智：“你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洪学智十分注重家庭建设，他对子女的爱体现在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上。洪学智的三女儿洪炜和女婿金元都是 1965 年考上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的。20 世纪 70 年代，洪炜所在的清华大学化工系高分子教研室承担了国防科委和教育部联合下达的研制高强度、高模量新型纤维的任务。该项目属国防军工项目，国内无先例，难度很大。洪学智知道后，鼓励她要知难而上、刻苦钻研，一定要做出成绩，为国争光。洪炜与课题组的教师们历经近 10 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科研任务，填补了国内空白。

1978 年，洪学智的女婿金元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硕士研究生，1981 年毕业。当时，部队医院急需工科院校研究生，金元被分配到 301 医院超声波室工作。到医院报到后，洪学智非常认真地找金元谈了一次话，对他提出三点要求：一要努力学习新业务、新技术，认真钻研、做出成绩；二要多联系群众，尤其要向老专家、老教授学习；三要少说话、多做事。

金元遵从老将军的教导，刻苦学习、努力钻研，与同事合作发表论文 10 多篇，与军内外专家合作撰写了《临床超声诊断学》等 4 部专著，获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成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医学分册）中“超声诊断”条目的撰稿人。

由于科研成果突出，1985 年金元任 301 医院党委常委兼科训处处长，负责全院的教学和科研管理工作。1987 年，总后勤部让 301 医院民主评议推荐副院

长候选人。根据专家推荐，301 医院党委将金元作为副院长候选人之一正式上报总后。洪学智看到 301 医院报上的名单后，立即把金元找来，问：“医院推荐你当副院长，你知道吗？”

“一开始我不知道，后来听说了。”

“我是总后勤部部长，如果我同意你当 301 医院的副院长，我以后怎么领导 301 医院的工作？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

金元说：“爸，您的想法我完全理解。如果我是您，我也会这么考虑的。您放心，我还年轻，当不当副院长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 301 医院的科研和训练工作抓好，落实您把解放军总医院办成一流总医院的要求。”

“你有这样的想法很好，你今后的路还长着呢！”就这样，洪学智把金元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中划掉了。虽然失去了一次晋升的机会，但洪学智出于公心的举动，让女婿心服口服。金元说：“父亲始终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作着表率，我心里没有埋怨，反而对他更为敬重。”

林维先：“灾情就是命令”

林维先的三儿子林军是坦克十一师通信营的一名战士。1975 年 8 月初林军休探亲假回湖北武汉的父母家，经过一天一夜的辗转，第二天早上才进家门。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林维先见到儿子先是有些诧异，接着就问：“你怎么回来了？”林军告诉父亲，是休探亲假回来的。林维先关心地问了下儿子途中的具体情况，而后话锋一转，说：“你刚走四个多小时，你们驻地附近的水库就因特大暴雨溃坝了，现在是一片汪洋。”在给林军讲述了目前灾区的情况后，紧接着林维先就给林军下了命令：“你在家吃完早饭，然后赶紧回部队参与救灾！”

此时的京广线已经被大水冲断，林军随口问道：“京广线都被大水冲断了，我怎么走啊？”林维先一听，立刻火了，大声说：“虽然你在休假，部队也没要求你归队。但是，灾情就是命令！你要牢记军人的职责，赶快回部队去参加抗洪救灾！现在你的战友都奋战在抗洪第一线，你是我的儿子，就更应该作表率！”说完，林维先就到救灾指挥部值班去了。父亲的话让林军深感惭愧，他吃完早饭后就匆匆踏上了归队的征程。历时两天半，返回部队的林军马上投入到灾民安置和疏散工作中。

后来据林军回忆，这段只在家待了两个小时的休假经历成了他难以忘怀的珍贵记忆，父亲一心为公、一心为民的思想境界让他受益终生。

曾绍山：“长大后要自力更生”

曾绍山的女儿曾明顺回忆说，她上初中时，一位首长夫人到家里做客，当看到时任沈阳军区政委的曾绍山家里除了被褥之外，其他用品都是公家配发的后，她感到十分吃惊。曾明顺清楚地记得，看到父母用的枕头后那位首长夫人嘴巴张得老大，半天没有合上，因为她看到枕芯里面填的全是小孩子穿旧、穿破的衣服。

曾明顺说，父母一生都非常简朴。在她的印象中，父亲总是穿着一身布军装，母亲穿的也很朴素，姐妹仨从小穿的衣裤都是姥姥和母亲一针一线手缝的。1965年，曾明顺考了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母亲送她两双袜子。这两双袜子是把新布袜从底子中间剪开，翻上缝好，再在下面缝上袜垫。这种袜子不好看，但很结实。当年，市场上已有尼龙袜，自制的袜子显得很土，曾明顺便被同学嘲笑。但曾明顺回家后观察到，父母穿的都是这种布袜子。

“父母是我人生最好的老师。他们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是他们的言行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曾明顺回忆说，“小时候，父母经常对我们说，长大后一定要自力更生，不要有依靠父母的思想。”

1970年，曾明顺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大连210医院当卫生员。当时大连缺淡水，需要卫生员们每天用扁担挑井水到各个科室。由于在高三下乡时学过挑水，所以她每天挑的水都最多。医院里有的患者看到了，就写了表扬信贴在走廊里：“希望大家向曾明顺同志学习，她是个从农村来的孩子，很能吃苦，很能干。”领导和同事们看到表扬信都忍不住笑了，患者竟把曾明顺当成从农村来的孩子。

1972年，曾明顺调到铁道兵十师四十七团卫生队工作。她所在的部队驻在陕西省安康地区旬阳县蜀河镇，那里当时是全国没有通公路和铁路的极少数县城之一。部队的工作是和民工们一起修铁路，大部分时间吃不上新鲜的蔬菜，住的是活动板房，条件非常艰苦。许多人根本不相信她是高干子弟，认为高干子弟不可能到这么艰苦的地方来工作，但曾明顺工作勤恳，从没叫苦叫累。

1975年，曾明顺在北京卫戍区四师医院工作，经常和战友们一起下乡巡诊，到农场劳动。曾绍山赶到北京开会的空隙看望女儿，到曾明顺住的筒子楼，和她的邻居打招呼、拉家常，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将军。

（作者：胡遵远，原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8月16日。）

自设关卡树家风

——“三让将军”徐立清的家风故事

徐立清，安徽省金寨县斑竹镇人。老将军是我军优秀的政工干部，他曾经让级别、让军衔、让级别，被人们称为“三让将军”，毛主席称他是我党我军的“好干部、好同志”。

明确提出“三不准”“五过关”

徐立清对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人严格要求也是出了名的。他给家人定了个“三不准”：不准以我的名义办任何私事，不准搞任何特殊化，不准参与政事。对自己的秘书提出了“五过关”：政治上要强，工作上要实，不要搞特殊化，遇事要冷静，要能委曲求全、顾全大局。他对自己也提出了要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

徐立清的夫人党秀玉也是一位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考虑到党秀玉的职务较低，和她同期参加革命的很多女同志都比她职务高。干部部门就找徐立清商量，准备调整一下党秀玉的职务。徐立清说：“党秀玉做了不少工作，可她是我的妻子，她的职务问题你们就不要考虑了，可以挑选比党秀玉更优秀的同志。”就这样，党秀玉在团职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很多年，她从不提过分的要求。

1952年干部定级时，党秀玉也主动提出来，不要高级别，要把待遇让给别的女同志。1955年，军队要安排大量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当时不少人不愿意离开部队，到处找人托关系。徐立清就和党秀玉商量，让她转业到地方工作，党秀玉非常理解和支持丈夫，立即转业到北京市教育局幼教科，协助教育局筹办幼儿园，一干又是很多年。

1953年底至1954年初，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期间，有很多老首长去徐立清家里拜访，看到他家里坐的还是战争时期转交过来的一个旧沙

发，用的是旧桌椅，连一台收音机也没有，有人就建议管理部门把徐立清家的旧沙发给换了。当时的总干部办公室主任王迪康就给他家买了一个新沙发。徐立清对此非常生气，他对王迪康说：“难道我家用的沙发还让公家出钱，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现在不是都没有换吗，就因为我是总干部的副部长，就可以搞特殊化吗？”几天后，徐立清还是坚持把新买的沙发退了回去。

徐立清的女儿徐延旗，1948年8月出生后，因高烧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平时说话、走路都不方便。徐立清和党秀玉到处为女儿求医治病，花费了不少钱，也不见好转。组织上想帮徐立清夫妇解决生活和经济上的困难，被徐立清婉言谢绝了，他说：“谁家的孩子都会有个三长两短的，这是正常的事，如果都让公家出钱，国家也承担不起呀。”在给女儿治疗期间，徐立清夫妇没有花公家一分钱。徐立清最小的儿子徐秋京，1956年9月出生时，正赶上徐立清病重住院。夫人党秀玉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徐立清，有人提出来，想从其他单位给徐立清家找个人照看孩子。徐立清说：“这可不行，这个任务还是交给秀玉吧。”再次谢绝了同志们的好意。

徐立清的两个儿子徐甘泉、徐和平正在上学读书，徐立清经常教育他们要好好学习，不要搞特殊化，在老师、同学面前不要提自己的父亲。有一次，儿子徐和平因病不能按时到校学习，想用爸爸的车送一下，徐立清说：“这样不行，车是供我工作用的。一点小病，还是坚持一下走着去吧。”就这样，徐和平还是带病步行到学校去了。

徐立清不仅对家属子女要求严格，对秘书要求也很严格。在他身边工作过的秘书，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受到大家的一致赞扬。

1955年5月，李刚锋从兰州军区干部部调往总干部部，曾为副部长徐立清当秘书。当时，徐立清身体有病，住进了医院，李刚锋几乎天天守在他的身边。总部经常有文件送给徐立清，让他审阅。李刚锋认认真真地读给他听，李刚锋的工作作风受到了总部机关同志们的高度称赞。到了1960年底，徐立清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时又调原总干部部统计部的杨弘为徐立清担任秘书，杨弘既踏实肯干，又有较高的文字水平。他跟随徐立清多年，受到了同志们的高度评价。跟随徐立清同志的几任秘书，都受到了各级领导部门的关注，有关领导同志找徐立清商量，想调他的秘书到新的单位去工作，委以重任。还有的想直接给他的秘书下调职命令。徐立清对他们说：“我的秘书工作很出色，这是他们的职责，是应该干的，有我在总政治部管干部，你们就不必考虑他们的职务问题。”在会议讨论时，他说：“我的秘书不要考虑提拔，可考虑别的人选。”干部部门考虑到徐立清的一位秘书，不但工作能力强，而且作风正派，具有开拓精神，很想把他用起来，况且这位秘书也到了该解决职务的时候。干

部部门的同志跟徐立清商量，准备把他安排去当科长，徐立清一口拒绝了，他说：“对于这位同志的能力和水平，我比你们任何人都了解。不要说当科长，就是当部长也绰绰有余。但是，他是我的秘书，对他的要求就更严格。所以，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上，你们就不要考虑他的问题。等我下来了，你们想怎么重用都行。”于是，这位秘书同志一直在徐立清身边工作了9年，职务和大家一样齐步走，没有提前晋升过。就这样，在徐立清身边工作过的几位秘书，职务都没有得到特有的提升。不过，他们都无怨无悔，非常感激和尊重徐立清。徐立清对警卫员、公务员也很严格，要求他们平时注意学习，外出要请假，回来要销假，接待客人要和气、要有礼貌，等等。

始终坚持“两个不”

1950年，徐立清到总部工作以后，一家被安排住在北京东四三条一个四合院里。他对此很不安，几次跟管理部门的同志商量，想把这个住处让给年老资深的同志住。他说：我有三间房子就行了，一间做卧室，一间接待客人，一间供工作人员住。徐立清还找到罗荣桓部长谈退房的事时说：“我有个住的地方就行了，最好能把这套房子让给年龄大、资历深的老同志去住。”当时的管理部门考虑到徐立清夫妇有3个孩子，再加上秘书、司机、警卫员，住房并不宽敞，没有同意徐立清调房的要求。

徐立清穿着也很朴素。他无论是在总部还是到基层检查工作，总是穿着一双圆口布鞋。当时总干部部办公室的一位同志给徐立清买了一双皮鞋，说让他开会或者到一些重要场合穿。徐立清对这位同志说：“我要到农村去，到山区去，那里的群众连饭都吃不上，看见我穿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皮鞋来了，人家该会怎么想？要我说，穿布鞋最合适，一是少花钱，二是穿着舒服。”第二天，他就把新买的皮鞋退了回去。曾担任过赖传珠副部长秘书的毛华山回忆说：“徐立清在总干部部期间，他除了上班穿军装外，在其他时间穿的都是便装。到了冬天，他穿的是战争年代留下来的一件旧大衣，很多同志劝他到被装仓库换件新的，他总是乐呵呵地说：‘不管是新的、旧的，穿上不冷就好。’”徐立清衣不重彩、食不重味，他是南方人，爱吃辣子和咸菜，有时因加班耽误了吃饭时间，为了不给机关食堂的工作人员增添麻烦，他就随便要碗米饭，来点辣子就凑合过去了。他不抽烟、不饮酒，处处节俭。他这种艰苦朴素的美德，在总部机关中是出了名的。

徐立清的生活作风不仅感染和教育了身边工作人员，而且对其家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爱人党秀玉是一位“三八式”的老干部，她对自己和家人要求

一直非常严格。徐立清去世几个月后，她把自己宽敞的住房让给了别人，把徐立清坐的专车交还了组织，带着全家十几口人住在北京东四三条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她和女儿徐延旗住两间，当时已经是军职干部、挂着少将军衔的大儿子徐甘泉住两间，二儿子徐和平也是部队的高级工程师，也住两间，小儿子徐秋京住在院外。党秀玉要求儿女们一定要向他们的父亲学习，不要讲究吃穿，不要讲排场、讲阔气，要比工作、比贡献。在这个拥挤的四合院里，找不到一件高档商品，沙发、桌椅也都是过去留下来的。四合院由于年久失修，墙壁用料有些脱落，下大雨时还有渗漏，总政有关部门准备给他家装修一下，党秀玉婉言谢绝了。1998年，上级考虑到党秀玉年岁已大，住这样的房子有些不合适，按照条件她也该分一套房子了，当组织上征求党秀玉的意见时，她却说：“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上几年？住那么好的房子干什么？我看还是把它退了吧。”就这样，党秀玉又把分到的住房退了，全家人对此毫无怨言。

（作者：胡遵远，原载《党史纵横》2018年第8期。）

开国少将胡继成与家人的故事

胡继成，1915年出生，安徽省金寨县人。1931年参加六安县游击大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编入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等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从胡小店的放牛娃到共和国开国少将，从反“围剿”到长征胜利，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场，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为了中华民族独立、国家独立富强和人民幸福，胡继成英勇冲锋舍生死，多次负伤洒热血。作为老一辈革命家，胡继成的百年人生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本色，对子女家人严格要求，注重清正朴实的家风建设。

严厉——儿女的前途自己闯

在亲人的眼中，胡继成是一个非常正派、铁面无私的人。“他从来不会用自己的特权为家人谋私，就连自己儿女的前途，也让他们自己闯”。

胡继成一生共养育了6个儿女（4个儿子，2个女儿）。在儿女们的眼里，他是一个“周末才能见到的爸爸”。从小他就教育孩子们要努力学习，做诚实本分的人，不要和别的孩子攀比父亲的官阶，也不要时时处处炫耀家庭的优越，要懂得尊老爱幼，热爱劳动，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

为了培养儿女自己成长的本领，胡继成将他们一个个送进军营，送到最艰苦、最偏远的基层部队。几个孩子都扛过枪、打过炮，修过坑道、挖过战壕，驻过海岛、守过铁路，扛过水泥、挑过大粪，摔伤过腿、扭伤过腰，可他们都咬紧牙关，坚强地挺过来了。子女中当兵最长的有26年，最短的也有10年。最后，他们都从部队转业到了地方，其中有3人是自由职业者，3人在单位当普通职工。

大儿子胡向东1944年出生。由于当时战事紧急，襁褓中的他还没断奶就

被寄养在了老乡家里，直到抗战胜利，父母才将他找回。长大后，胡向东在广州当了10年坦克兵。第8个年头时，他与妻子结婚并有了孩子。那时，他在广州，而妻子在成都。为了结束两地分居，他曾通过母亲向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的父亲求助。“其实只要他一句话，我们夫妻的两地分居问题便可以解决，他却拒绝了。”胡向东最终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转业到成都才解决这一问题。

二儿子胡建军在河南新乡修筑工事的时候，由于过度劳累，腰部受损。胡继成知道后虽然很是关心，但还是没有把儿子调回身边照顾。胡继成的妻子张鸣燕实在不忍看儿子这样受苦，瞒着胡继成让儿子请了假，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已经造成了永久性的损伤。如今30多年过去了，胡建军腰部时常还隐隐作痛。

有一天，全家人聚在一起吃晚饭，胡继成和平常一样闷头吃饭不说话。张鸣燕笑着问：“你看看今天吃饭是不是少了个人？”胡继成这才抬起头，仔仔细细地看了一圈，有些犹豫地说：“好像老四没在。”这时全家人都笑了起来。原来胡继成的小儿子这时已经参军离家有3天了。

胡继成对自己的家人“无情”，对别人的家事却特别热心。据他女儿胡玲玲介绍，曾经有一个医生患了癌症，家里还有两个孩子，非常困难。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胡继成给予这个家庭很多帮助，费了很多精力帮其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解决了工作。

吃“牛皮菜”——不要忘记本

“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保护孩子，让他们远离造反派，胡继成让妻子带着儿女去了广东老部队，让孩子们参加社会实践。当时除三儿子参军外，大儿子胡向东、二儿子胡建军、小儿子胡晓军都去了部队农场。他们和战士们一起吃住，一起劳动，学会了收割水稻、育秧种菜，还学会了开拖拉机。两个女儿——胡玲玲和胡凯在部队里也得到健康成长。

胡继成相信身教重于言教的作用，对孩子他言语不多，但要求孩子们做到的，自己首先带头做。在广州军区任参谋长时，由于那里气候潮湿、炎热，常常几场雨一下，他家的院子里便杂草疯长。于是，胡继成就经常带着孩子拔草，每次家里6个孩子齐上阵。他们用稚嫩的小手，或用小棍，或用小铲，努力地掘着土，把草根一棵棵地挖出来。天上太阳晒，不怕；地上蚂蚁咬，不吭。大家干得汗流浹背，也没有一人临阵脱逃。

20世纪60年代初，胡继成家因人口多，生活十分困难，经常吃粗粮。为了解决吃菜问题，他带着孩子们在院子里挖地，种上牛皮菜。牛皮菜一般用作

青饲料，可喂猪、牛、兔、鸭、鹅等，也可打浆喂鱼。现在的牛皮菜摘掉菜秆上的茎，加上油和作料炒出来是一道上好的川菜，色香味俱全。可那时候，整棵菜只是用水煮一煮就端上了桌，吃起来又粗又涩，确实很难吃。吃饭时，孩子们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嘴里嚼着就是不往下咽。胡继成就夹一筷子菜放到嘴里，故意大口大口地嚼，一边嚼还一边说：“这菜很好吃，比起我们当年吃草根、树皮好多了。你们是红军的后代，可不要忘记本啊！”

抗洪——家里物品一件没有抢出来

1959年6月，广东惠阳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因为洪水来得太突然，胡继成奉命指挥部队抗击洪水，期间遇到部队一名产妇即将分娩，他立即安排战士将产妇送到卫生所，产妇顺利产下一个男婴。因为抢救产妇等其他事，胡继成连家都没有回，更不知道自己家也出现了险情。当时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在外地上中学，妻子一人在家带着4个孩子，4个孩子中最大的10岁，最小的才3岁。当时，洪水漫进家门，地上的鞋都浮起来了，张鸣燕抱起正在床上玩耍的小女儿胡凯，牵着5岁的大女儿胡玲玲，对另外两个儿子大呼：“孩子们，快跟妈妈跑啊！洪水来了！”当她把4个孩子带到营区的高地后，还不到10分钟，他们家的那座平房便被洪水淹得只剩下房顶了，家里所有的物品一件也没有抢出来。

身为惠阳县组织部部长的张鸣燕，刚脱离危险，就将孩子全交给保姆带着，自己也立即投入抗击洪水的斗争中。胡继成白天在齐腰深的水中组织救灾，一共救出了3000多名老百姓，晚上才抽空回家看看。那几天，孩子们住在山顶军部的招待所里，吃的是战士们节省下来的干粮，度过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日子，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

家事——妻子退休还是副处级

唠起家事，胡继成心里最愧对的就是妻子张鸣燕。

胡继成带兵行军打仗，一直都很忙，根本无暇照顾妻儿。所有的家事，包括儿女们的前途问题，他从不过问，家里所有的事，都是妻子去打理。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时期，胡继成都带领着部队在前线打仗，一家人聚少离多。胡继成带领四十二军前往朝鲜以后，整整3年的时间，和家里没有任何联系。张鸣燕早在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是一名有文化的“老八路”。1943年深秋的一个夜晚，经黄克诚师长的撮合，在团里几位领导、警卫员见证下，

胡继成就是以一盘大葱爆肉加大饼的一顿饭，和张鸣燕结婚了。由于胡继成工作频繁调动，妻子的职务升迁受到严重影响。解放战争时就担任副团级职务的她，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先任广东省惠阳县组织部部长，后调入广州在中山大学医学院大内科任总支书记。胡继成调任成都军区后，她又跟调到四川。当部队领导要将张鸣燕调整到机关重要岗位时，胡继成说：“我要是带头为家里人谋职位，那我在部队和地方上还有什么威信？领导干部的言行举止就是部队作风的风向标，我们不能带坏风气啊！”

就这样，张鸣燕被安排在成都市机关招待所工作，直到退休还是个副处级。对此，妻子偶尔也有点想不通：“跟着东西南北到处跑，身体越跑越糟，职务越跑越小！”

对此，胡继成耐心地对妻子说：“思想正，作风正，心正行正；私欲多，杂念多，贪多失多。我们共勉吧！”胡继成的族弟胡继忠也说：“继成不顾家，其兄弟侄孙皆务农，没带走一个。”胡继忠的不满情绪，或许就是将军“两袖清风，为官清廉”的最好的人生写照。

2000年后，张鸣燕的身体每况愈下。她病重时，胡继成总是整日整夜守在妻子身旁，紧紧握住她的手，四目相对。2002年，张鸣燕辞世，胡继成这位钢铁将军情绪失控，号啕大哭，眼睛瞬间失明。此后，胡继成一直视线不清。女儿胡玲玲深有感触地说：“父亲的眼睛陪着母亲去看天堂的美景了。”

来生——“吹号！冲锋！”

胡继成常常教育孩子和下属，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和军人，只有为党、为祖国、为军队无私奉献的义务，而没有向党、向军队伸手要荣誉、要地位的权力，国家和人民用乳汁和汗水养育了我们，我们就应该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去报答。

“英雄到老都归学，老将还家只论书。”胡继成曾说，自己爷爷给他取名是“继承”（后来误写成“继成”），目的就是希望他继承家风，耕读传家，做个有文化的读书人。所以，他退休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报名上老年大学。他还说，我们经历了历史，见证了历史，还应该责无旁贷恢复历史真相。经过3年努力，他完成了57万字的《吹角连营——胡继成将军征战回忆录》的撰写。有人问他，如果有来生，将军会作什么人生选择？他毫不犹豫地说，“愿将来生常报国！”

（作者：李业坤，原载《党史纵览》2017年第10期。）

开国将军言传身教润后人

董洪国将军1910年出生，1930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第一至四次反“围剿”。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途中参加了魏家店、新集、土桥铺等战斗。1933年7月，调任红三十军医院政治部主任。1935年5月，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途中曾三过雪山草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董洪国所在的部队编入了西路军，在那茫茫的西域边疆，董洪国吃尽人间苦难、所幸九死一生。1945年2月，董洪国任新四军第五师供给部副政委。解放战争时期，董洪国历任中原军区供给部副部长兼副政委、华东军区快速纵队供给部部长、豫皖苏军区供给部政委、河南军区供给部部长兼政委等职，参加了中原突围、挺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河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武汉军区财务部部长、后勤部副部长、代部长等职。

董将军不仅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建立了不朽功勋，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是初心不改、继续前行，严格要求自己，始终艰苦奋斗，为祖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人民兢兢业业、殚精竭虑，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身体力行教育和影响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些感人至深的家风故事。

克己奉公，廉洁自律

新中国成立后，董洪国长期在后勤领导岗位上工作，经手的财物不计其数，但他始终克己奉公、廉洁自律。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董洪国虽然管着后勤，有仓库、有农场，但家里从来没有伸手拿过公家的一粒米、一寸布。我们和其他家庭一样，没有吃的，只能喝粥、吃野菜。董洪国原来喜欢抽烟，而且烟瘾还很大，但是后来他却毅然决然地戒了烟。原因是1949年河南军区供给部在郑州办起了河南省第一个烟厂，随后烟厂负责人逢年过节经常给上级领导

送烟，说是请领导品尝鉴定是否有质量问题。董洪国想：这样怎么行呢？如果经常这样送的话，那不是要出问题吗？于是，他以顽强的毅力戒掉了几十年的抽烟习惯，使别人再也没有送烟的借口，保持着自身的清正廉洁。

改革开放后，虽然生活条件逐步改善了，但是董洪国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有一次董洪国过生日，女儿董汉荣给他买了一件衣服。董汉荣跟爸爸说：“爸，今天是您的生日，我给您买了一件衣服，您试试看怎么样？”那时候，一件几百块的衣服还不多见，家里人纷纷说：“老爷子，试试吧，名牌，可贵着呢！”董洪国不但没有露出高兴的表情，反而皱着眉头问女儿：“多少钱？”女儿说：“几百块。”董洪国一听上了百元，立马生气地说：“我不穿！买这么贵的衣服干什么？穿什么不还是一样？”这件事使家人深受教育，也给家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董洪国常说：“艰苦奋斗是革命胜利的法宝，要天天讲时时讲，只有长期保持这种传统，我们才能迎来一个又一个胜利。”

董洪国从不贪图个人享受，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常常挂在嘴边的是：“我们一起从大别山里走出来的很多革命同伴都牺牲了，有的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我能活到新中国成立这一天，已经是非常荣幸。我们要记住，胜利和光荣永远属于那些为革命而英勇献身的先烈。和他们比，我们现在的生活赛过天堂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信念坚定，赤胆丹心

董洪国有七个子女，长子董保华、长女董卫华、次女董新华、次子董中华、三子董国华、三女董汉荣、么女董玉萍，前五个孩子姓名中的字连在一起就是“保卫新中国”。董洪国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孩子们精忠报国为国争光。七个子女长大后，董洪国把他们全部送到偏远艰苦的部队，让他们接受锻炼和磨炼，教育他们不搞特殊化。

董洪国从领导岗位下来后，依然情系部队心牵国家，为着党和军队的事业而殚精竭虑。就在他离世前不久，他还始终关心着军产流失问题，对部队搞起房地产开发，他一直是忧心忡忡。他在日记里写道：“军队土地是否能交易，有没有违反《军队房产管理条例》？交易后资金有多少，用途是什么，为什么不公开，搞暗箱操作？与开发商联合开发，这符合党中央、中央军委、上级部队的规定吗？”同时他也发现改革开放后腐败现象悄然滋生的苗头。他常常告诫子女们：国家出现了腐败现象，这是对人民不利的事情。有些领导打着抓经济的旗号，开始不务正业，搞起小金库，做起房地产，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丢在了脑后。有些党员干部喜欢打着老同志的牌子，以权谋私滥用职权，耍起官

老爷的派头，不关心人民群众疾苦，吃喝成风就是腐败的典型现象。周总理早就提出来，吃饭只准四菜一汤，开会要自己购买餐饮票。这些人现在都不讲这些规矩了，不仅要吃好，还要喝好，一瓶茅台就是几个农民一年的劳动收入啊！不看不说事情小，一看一说事情大得不得了。腐败是害虫，是腐蚀剂，危害党的执政根基。腐败之风不治，最终必然亡党亡国。

言传身教，激励后人

董洪国早年家穷，没有上过几天学，参加革命前主要靠打铁为生。走上革命道路后，在红军队伍里，在工作中读了一点书、认了一些字。新中国成立后，董洪国更加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于是，他就开始孜孜不倦地学习理论、学习军事、学习历史，从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大老粗”成长为一名有知识、有学问的军队后勤管理干部。即使是在晚年，董洪国还是笔耕不辍，为后人研究革命战争历史撰写回忆录。

在他外孙女胡丹丹的印象中，董洪国书房里的灯总是亮着。那时候丹丹还小，不知道外公每天都在书房里忙什么。直到前不久整理外公留下来的整整一大箱子的文稿，丹丹才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号召老同志撰写革命回忆录。为了积极响应这个号召，当时已经年近八旬的外公，忍着痛风带来的脚趾剧痛，每天坚持伏案写作10多个小时，最终完成了近40万字的回忆录《从铁匠到将军——革命艰苦历程》，为后人研究革命历史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胡丹丹说：“我从小生活在外公外婆身边，外公在世时，从未和我讲过自己在革命生涯中的功绩和荣誉。小时候，外公经常教我唱歌，我会唱的第一首歌就是《红军不怕远征难》。外公是安徽金寨人，乡音很重，歌中有句歌词我一直以为是‘只登险’，唱了十几年。直到后来上军校学唱《长征组歌》，才发现原来是‘只等闲’。外公说红军时代，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行军打仗随时都会牺牲，因此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

胡丹丹认为，外公教会她的不仅仅是一首歌，他的身体力行传递了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一种勇往直前的态度、一种百折不挠的恒心。董洪国在去世前的一段时间里交待：“丹丹在军校上学，凡事都要以学业为重，要当一个好兵、做一个好学员。我要是走了，不要告诉她，不要让她请假回来，不要耽误她学习、考试。”董洪国从小对外孙女呵护备至疼爱有加，不仅没有打骂过她，甚至连大声呵斥都没有过。外公离世后，无尽的思念总是萦绕在她的心头。

在董洪国夫妇的精心教导下，在良好家风的熏陶下，董保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虽然头部中弹，仍然坚守岗位，及时报出了一组敌机数据，保证了战斗

◆ 将军县的初心故事

的顺利进行，被授予“一等功臣”光荣称号。董卫华、董国华 1979 年都随各自所在的部队参加了自卫反击战，并且作出了积极贡献。

董洪国的子女们继承了他那种浓浓的爱国情怀和拳拳的赤诚之心，他的红色基因在他的子女后代身上薪火相传。

（作者：胡遵远、张应松，原载《清风》2017 年第 9 期。）

老红军邓六金、陈兰曾为金寨 脱贫“鼓与呼”

“十三五”期间，集老区、库区、山区、贫苦地区于一体的安徽省金寨县，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就是脱贫攻坚，掀起了众志成城脱贫热潮。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攻坚战，金寨人民不禁会想念起邓六金、陈兰这两位心系老区、情牵扶贫、曾为金寨“鼓与呼”的革命妈妈。

1982年，邓六金（国务院原内务部部长曾山夫人）、陈兰（国务院原副总理邓子恢夫人）两位老红军响应党的号召，主动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本来，有关部门准备安排她们去外地休养，而她们的第一个愿望却是回到当年战斗过的苏皖地区重游故地。虽然苏皖两省处处皆有旅游胜地，但是两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没有寄情于青山绿水，而是往返奔波在第二故乡的山水乡间，探访当年的房东、看望当年热情支援革命的老区人民。

一路风尘一路行。她们用了近40天时间，几乎走遍了当年所到之处：歙县、岩寺、泾县、金寨、天长、宿县、泗洪、双沟、淮安、盐城……她们乐此不疲地走着看着，深情关注着当年出生入死、支援抗战的老区人民，并深深地陷入忧虑之中。在这片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土地上，老百姓们仍未完全解决温饱，这片土地依然贫瘠！她们晓行夜宿，路过每一个村庄都要停下来，迈进乡间的土房，坐在那吱呀作响的床板上和大娘交谈、看望乡亲。晚间，听取地方领导的汇报，详细了解老区的发展情况，十一二点休息是常事。

安徽金寨，这个被誉为“红军摇篮、将军故乡”的地方，在红军时期和战争年代曾为部队输送了十几万人，走出了59位开国将军，当时却是安徽省最穷的一个县。20世纪50年代，国家在这里兴修了梅山、响洪甸两大水库，移民并村后，很多人衣食无着、被迫返回到原来的住地，无田无房。库区实行封闭管理，连打小鱼、摸虾米充饥的行为也被强行制止，多数人只好在山坡上搭个小竹棚度日，种些芝麻、油菜却又无处销售，只得以挖野菜、挖山笋度日。更有甚者，白天行乞为生，夜晚如野人般栖居树上，最穷的人家穷得连衣服都

没有。乡亲们充满辛酸地说道：“上封山、下封水，中间封住了老百姓的嘴。”

听到这些，两位老妈妈难过得从饭桌边站起身来，流着泪水感叹道：“金寨苦啊！老区人民在挨饿，我们怎能吃得下饭？不仅老百姓的生活无着落，孩子们也因为交不起学费而终日与牛羊为伴！”金寨老百姓向她们疾呼：要发展教育，要让孩子们读书！只有努力学习，靠知识来改变贫瘠，才能真正改变老区的现状啊！因为贫穷，没有姑娘肯嫁到金寨，一些人只得近亲结婚，导致一些家庭多人弱智；由于山区缺碘，发育迟缓的侏儒残疾者随处可见……身临其境、亲眼所见，她们身心震撼！她们决心帮助金寨脱贫，要让外乡的姑娘自愿来金寨落户；改善金寨的医疗卫生条件，不能让老区人民继续缺医少药地生活下去了。听说有的家庭几个人共穿一条裤子，平时只能躲在家里不出门，她们含着眼泪将自己为数不多的几件衣物留给了群众。离别时，全村的乡亲们就像当年欢送红军一样将她们送出一程……

在调查时，邓六金、陈兰深切地感受到，在这片无数人奉献了青春和热爱的土地上，还有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许多老红军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解放初期返乡的残疾军人尚未得到很好的安置，老区的建设明显滞后，这些都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大力扶持，需要有一定力度的倾斜政策。

一个多月的“休假”，使她们大病一场。身体尚未完全康复，1983年春，她们又风尘仆仆地赶回闽西故乡。在那里，她们同样发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回到北京后，她们就如何解决老区问题反复商谈。如何才能改善老区群众的生活？怎样才能帮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经过多次探讨、反复思忖，她们慎重地写下了一份报告，呈送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案头，她们在报告中提出：今后修水库要先妥善解决移民的安置问题后再开工，以免难民层出、后患无穷；对于告老还乡、居住乡村的老红军要给予固定的生活费用，做到老有所养，让他们充分感受到党的关怀，幸福地安度晚年；要让失学的儿童重返校园，要重点解决老区人民的温饱问题，要关注当年对革命作出过贡献的人员，告诉他们共和国没有忘记昨天、没有忘记有功之臣！

对于她们的倡议，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开国元帅徐向前看到她们的报告，称赞道：“两位大姐不辞劳苦，深入老区考察，精神可嘉。”她们的《回乡见闻》还作为1983年的中央传阅文件下发到各个部委。为此，国务院专门成立了支援老、少、边、穷地区办公室，国家计委、财政部、民政部、妇联、卫生部等单位分别派出工作组去实地解决问题；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专门用专列给金寨人民送来了军队换发下来的旧军服。乡亲们穿在身上、暖在心间；山上的小窝棚拆了，移民们搬进了新建成的房屋里，不再惧怕雨雪风霜了；政府专门派来技术员指导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发展网箱养鱼、养蚕一条

龙、茶叶一条龙，种植木耳、蘑菇、板栗，实行山货深加工；青年人进厂做工缫丝、纺纱、织布，年长者留在家中种桑养蚕……金寨在安徽的经济水平由末位上升到中等水平。

听到老区人民的欢声笑语，得知他们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两位老红军的脸上漾起了由衷的喜悦！她们的调查汇报、她们的奔走鼓呼，极大地促进了支持老区发展政策的出台、加快了支援老区建设的步伐，可谓是开了扶贫工作之先河。此后，许多离退休的老同志相继返回老区，为老区的建设和发展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和具体问题。

（作者：胡遵远，原载《党史纵览》2016年第7期。）

上将夫人、老红军张文的故事

一路长征，吃尽艰辛

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来到川北，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张文惊奇地发现，洪口街上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地主老财们跑得无影无踪了。当时，驻扎在洪口镇街上的是红四方面军第十师，二十八团团部就住在张文的家。团长一有空就给张文的父母讲革命道理，张文有时候也凑近去听。渐渐地，这些革命道理就像“巴山夜雨”，滋润着张文那求知若渴的心，“参加红军、参加革命”的念头渐渐地在张文的脑海中形成。1933年2月，张文和二哥张熙汉先后背着家人参加了红军，兄妹俩都被分配在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供给部的被服厂工作。

当时，张文虽然年纪小、身体单薄，但她心灵手巧，又不怕吃苦，每天除了做完自己的“定额”，还去帮助手慢的战友。

在革命的大家庭里，张文生活得十分充实、愉快。由于工作积极、表现出色，她很快地就当上了女兵班长。

1935年1月，红四方面军开始西撤，3月下旬，在连续进行了广（元）昭（化）、陕南和强渡嘉陵江战役后，开始长征。

一天夜晚，下着毛毛细雨，红军被服厂的战士们背着设备、物资，从通江向巴中清江渡行军。张文背了一篓马尾手榴弹，50多斤的重量把她的肩膀压得又红又肿。山上的羊肠小道又窄又滑，加上天黑路滑，人又疲惫，行军更为艰难，稍不留神便会掉下山涧而致粉身碎骨。

张文和战友们一边在山路上小心行军，一边互相提醒：“当心路滑！”“尽量靠山里边走！”谁知一不提防，张文的左脚踩在一块松动的石头上，“扑通”一声连人带篓滚下山坡，一下子摔得晕了过去。排长刘文芝带着两名女战士，拉着树枝小心翼翼地爬下山坡，边爬边喊张文的的名字。张文慢慢地醒了过来，

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浑身上下疼痛难忍。仔细打量周围，张文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自己恰好被一棵大树卡住了，下面就是黑黝黝的万丈深渊。如果没有那棵大树，张文早就滚到深涧里去了。

红军强渡嘉陵江后，由于连续长途行军，饥寒交迫，张文患上了肺病，身体极度虚弱，脚肿得穿不上鞋子，每迈一步都疼痛难忍。但行军的脚步却不能停止。战友们争相为她背背包、背线团，她肩上只剩下了一个盛水用的铁桶。

一天，张文和战友们行军走到一个小山坡，不远处的几间破草房里，竟隐蔽着一股国民党军的散兵。敌人一边朝张文他们开枪射击，一边兵分两路包抄，还狂叫着：“投降吧，你们跑不了啦！”张文和战友们手中没有武器，不能与敌人硬拼，只能拼命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尽管大家身上都有几十斤甚至上百斤的负重，还是勇敢地冲了出去。

当时，张文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只觉得天旋地转，两眼直冒金星，敌人的子弹“嗖、嗖”地从她身边掠过，她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宁死也不当俘虏！她一个劲地拼命奔跑，最后终于摆脱了敌人，赶上了大部队。一到宿营地，张文就瘫倒了，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粗气。战友们都围了上来，帮她卸下背上的那只铁桶。“好险啊！”一个战友惊叫起来，大家马上都围了过来。原来，张文背的铁桶上被敌人的子弹打了5个窟窿。张文不禁在心里暗暗庆幸：是这只铁桶救了自己啊！

穿越松潘草地的时候，张文遭遇了第三次险情。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影响，张文所在部队已经往返两次过草地了，现在准备第三次过草地。经过几天准备，张文和战友们每人背着布匹和线捆、15斤青稞和一捆干柴，第三次进入了草地。在一望无垠的草地沼泽，饥饿与寒冷像两个恶魔紧紧缠绕着长途行军的红军将士。很快，张文和战友们随身带的粮食都吃完了，许多同志因饥饿而病倒和累垮。

有一天，张文从草丛里捡到一个生牛蹄子，可是草地上湿漉漉的，可以取火的燃料很稀少，十分饥饿的张文将生牛蹄子用茶缸随便煮煮就吞进了肚子。可能是因为这只牛蹄子没煮熟，也可能是早就变质，害得张文闹起了肚子来，又发烧、又腹泻。红军队伍中药品奇缺，没有药医治，腹泻使张文几乎虚脱。但是，即使这样也不能不行军，张文只能一边忍着腹痛、一边拖着两条像灌了铅的双腿向前走着。

回首往事，张文曾激动地说：“长征路上，红军战士们团结一致、生死与共，表现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和不畏艰难困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应该教育子孙后代永远学习和弘扬这种精神。”

一次谈话，缘定终生

张文和洪学智是在长征路上喜结良缘的，此后，他们虽然辗转南北、多次离散，但始终是恩爱有加、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70多个年头。可是，有谁能想到他们当年只见了面就结婚了呢？

1936年5月30日，张文所在的红四军在雅砻江畔召开运动会。各项比赛结束后，主持人突然宣布：“欢迎供给部女兵班的同志给大家唱个歌。”会场上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坐在主席台上的军首长也鼓起掌来。

张文是班长，只好硬着头皮站起来，带着女兵班列队走上主席台。张文领唱了《打骑兵歌》。飒爽英姿、嘹亮歌声，张文的歌声打动了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洪学智，他“盯”上了张文。

当晚，军参谋长陈伯钧的爱人何克春就来找张文，然后把她领到了供给部谢政委的办公室。一进门，张文看见军长王宏坤和他的爱人冯明英，以及谢政委都在，吓了一跳，很明显这些人都是冲她来的。张文低着头，站在屋子中央，不知所措。

冯明英一把将张文拉到她的身边坐下，亲切地对她说：“今天你们班歌唱得很好啊！”

张文连忙说：“不好，不好。”

谢政委接着问张文：“你认识军政治部洪学智主任吗？”

张文立即摇头回答：“不认识。”

其实张文说不认识是假话。她参军后，在被服厂见过洪主任，还听他作过报告。在长征路上，张文还经常看到他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洪学智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谢政委一口气对张文说了洪学智的很多优点，在一旁的王军长也笑容可掬地对张文说：“小张同志，我和明英想介绍你和洪主任认识一下，你看怎么样啊？”

在张文的老家四川，女孩子的婚姻大事全由父母做主，现在参加了红军，由谁帮忙做主呢？张文这样想着，面对军长，她支支吾吾地，不知说啥才好。

谢政委看出了张文的心事，就关切地说：“这件事先不定，你自己考虑一下，也征求一下你二哥的意见吧。”

于是，张文连夜找到她二哥。他二哥可是个直爽人，当场表态：婚姻大事，只要你愿意，我不会说半个“不”字。

第二天，张文按照何克春的指导，走进了洪学智的办公室。他见到张文来了，便微笑着站起来让座。

洪学智开门见山地说：“谢政委、王军长找你谈过话了？”

张文点了点头。

他又问：“你有什么意见？”

张文说：“听组织上的。”

洪学智哈哈大笑起来，说：“那是我个人的意见，几位领导都同意，所以，咱们个人的事就变成了组织的事。”

接着他又问张文：“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张文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先是摇了摇头，紧接着又频频地点头。

就这样，张文和洪学智的第一次谈话，就达成了“婚姻协议”。

6月1日晚，张文和洪学智在军政治部办公室举办了简朴而又热闹的婚礼。军长、政委、参谋长等首长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一个女儿，送给乡亲

1939年，张文和洪学智的长女在延安出生。洪学智给她取名“醒华”，意思很明确：中华民族，觉醒吧！

不久，张文抱着女儿，随洪学智所在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大队前往华北地区开办抗大分校。转移途中，必须穿越日军封锁线，带着孩子行军非常不方便，时任抗大校长的罗瑞卿以及洪学智都多次给张文做工作，劝她把女儿送给老百姓。

可是，一个母亲怎么舍得扔下自己的亲骨肉呢？洪学智见张文态度坚决，也不好再说什么。

穿越日军的封锁线前，罗瑞卿动员所有带孩子的女同志要绝对保证孩子不哭不闹，不暴露目标。

离封锁线越近，张文的心绷得越紧，她背着女儿，几乎是一溜小跑地跟随部队急行军。

突然，奔跑中的张文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个趔趄，女儿“哇”的一声哭了。

紧张的张文一边哄女儿，一边向前跑。

正在指挥部队前进的洪学智，听到孩子哭声后找到张文，严肃地说：“把孩子留下吧！”

张文一愣，继而着急地对丈夫说：“你……你怎么忍心？”

洪学智没有吭声，只是用严厉的目光盯着张文……

张文含着泪，慢慢地把背上的女儿解下，交给了洪学智。

她紧紧地跟在洪学智的身后，找到附近一户农家，把女儿连同5块银元一

起交给了老乡，并告诉老乡：“我们是八路军，不能照顾孩子了，如果我们在战争中牺牲了，那你们就把孩子当成亲生女儿吧！”说完，洪学智拉着张文就跑回了部队。他们与老百姓彼此都没顾得上问下姓名，更不知道那家老百姓的具体身份。

但是，张文努力地牢记女儿身上的特征，细细地辨认周围的地貌地形，并问清了地名：东西房山。

第二天清晨，部队顺利地穿过日军封锁线。休息时，张文忽然发现，女儿的一块尿布还搭在丈夫的马背上，睹物伤情，她不禁又哭了起来。

一个外号叫“马克思”的老红军给张文做思想工作：“别难过了，以后全国解放了，再回来找孩子吧。”

正如“马克思”所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个离散了多年的女儿才被找回张文的身边。

一家动员，资助学生

离休后，一直关注老区建设的张文，将视线投向了贫困学子。1982年，特别关心下一代成长事业的张文被聘任为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理事。1995年1月，她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文中提到一位来自革命老区的北京大学学生品学兼优，但生活特别困难。当时，张文心里很难过，继而萌发了资助特困大学生的想法。

在一次全家聚会上，张文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得到了孩子们的热烈响应。张文知道，孩子们分别在军队、国家机关和学校工作，经济上并不宽裕。但大家仍当场分工，决定由在京的6个子女一人负责一个。

很快，北大给张文送来了来自湖北、四川、山东等革命老区的8名特困生的资料，供她挑选。洪学智看了这8名特困生的情况介绍后说：“我看这8名同学都应该资助。”于是，一家人商定每人每月资助100元，一直供到他们大学毕业。1997年春节，张文和洪学智还把这8名特困生请到家来吃饭，鼓励他们继承革命传统、努力学习、立志成才。

后来，这些大学生有的读了研究生，有的当了工程师，还有的出国留学深造。

回首自己走过的艰辛又光荣的人生历程，张文自豪而又乐观。她十分风趣地说：“人就是要乐观，就要有一种精神，有了好的心情和强大精神动力，干啥事都成。”

（作者：胡遵远，原载《传奇传记选刊》2018年第3期。）

金寨籍老红军梅少卿的家风故事

梅少卿 1909 年出生于河南省商城县汪岗乡梅家老湾，4 岁时随爷爷逃荒迁往金寨县沙河乡香铺村。1929 年，立夏节起义胜利后，20 岁的梅少卿毅然参加红军。1932 年春任商南县区共青团书记、巡视员、儿童团少先队大队长兼指导员、代理少共县委书记、赤南县委组织部部长。后任赤南县五营七连指导员兼五乡苏维埃主席。因掩护群众转移时负伤，未能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在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手枪队任指导员。1937 年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梅少卿先后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组织股长。1943 年任凤怀总队政治处主任。1945 年任新四军区师十三团政治处主任。抗日战争中，任特务连指导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团政委兼党委书记。后因身体 7 处受伤，组织照顾他转到后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要他到疗养院休养，直到 1951 年才到华东军区后勤干校任政委。1954 年任沈阳军区防空军政治部副主任，1956 年任该防空军干部部部长。1957 年任广州空军任干部部部长。1963 年离职休养。1983 年病逝。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梅少卿南征北战、冲锋陷阵、屡建战功，一个耳朵失去听觉、一只眼睛神经性失明，属二等甲级残废。新中国成立后，他始终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工作，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和培养革命下一代作出了突出贡献。

珍惜分分秒秒，废寝忘食干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梅少卿为了部队建设，简直像一个工作狂。1957 年，梅少卿同志由沈阳军区防空干部部部长调任广州军区空军干部部部长，当时部队进行组织体制改革，防空军各自原有的行政干部部、政治干部部等四个部门并为一个干部部。部队扩大了，干部增多了，工作范围更广了，大家面临着艰巨复杂的新形势、新环境、新任务，工作千头万绪，梅少卿把考核、熟悉干部作为

自己的第一位工作。下部队期间，他每天都起早贪黑地开会、看材料、与干部谈心，中午从不休息。他废寝忘食地工作，连跟随他下部队的年轻干部都感到受不了，可他却是一个负伤带病之人啊！1958年元月，他因工作过度劳累病倒了，但仍然默默地坚持上班，直到身体虚弱得连走路都感到困难了，他才被迫地住了医院。在住院期间，他仍然记挂着工作，每天照样批阅文件，把一些住院的干部请到病房来开座谈会、和干部个别谈话，抓紧一切时机了解干部。出院后，病尚未痊愈，他又赶赴北京参加安排部署干部上山下乡的工作会议。同志们看见他日以继夜地工作，日渐消瘦了，劝他要爱护身体，注意休息。可是他总是回答说：“在战争年代，我的眼睛负伤致残，趁现在还有一个眼睛可以看得见，得抓紧干几年，等看不见时，想干也干不成了。”

不到一年的时间，梅少卿就跑遍了华南三省十多个航空兵、高射炮兵和雷达、探照灯部队，对师以上班子逐个进行考核，对绝大多数团以上干部进行了个别谈话。经过紧张的工作，他摸清了广州空军所属师、团领导班子思想、组织、作风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掌握了领导干部的德才表现，为正确选拔干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创造了条件。

增强服务意识，约法三章严作风

梅少卿认为，干部部门是党委的办事机关，是党的干部路线的具体贯彻执行者，因此，应该努力把干部部门办成“干部之家”。而要做到这点，干部工作者要切实增强全心全意为广大干部服务的意识，成为干部的知心人、贴心人。为此，他对部属制定约法三章。第一，要坚决贯彻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工作路线，坚持用人唯贤的原则。在空军与防空军两个兵种刚刚合并的情况下，特别强调要搞好内外团结，对所有干部一视同仁，不搞亲疏厚薄；第二，要树立起立党为公、为政清廉思想作风，坚决克服那种认为做干部工作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吃请、不受礼、不看人办事；第三，要尊重、关心、体贴干部，对过往和上访的干部，要热情接待，态度要和蔼可亲，并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坚决摒弃干部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作风。

梅少卿是这样要求别人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从沈阳空军调到广州空军工作，按理说自己是干部部部长，他爱人又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老干部，加上他身体不好，随同调动安排个好工作是顺理成章的事。可当干部部主动提出为他爱人联系安排工作时，他却说：“现在地方安排工作比较困难，许多部队、机关的干部家属工作安排长期得不到解决，我如果利用职权先把自己爱人

的工作安排得好好的，别人会怎么想呢？”就这样，他不让组织出面替他爱人安排工作，生活坚持自理，自己经常打草鞋，吃饭到食堂打买，发什么穿什么，供应什么用什么，床上用的仍然是在部队时用的黄色的粗布被子。直到半年以后，他的爱人才通过地方系统联系，调到广州工作。

梅少卿同志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每天早上六点多钟就赶到办公室上班，直到晚上十点钟以后才回家休息，节假日也是一样，同志们都说：“办公室就是梅部长的家。”

放弃特殊照顾，与民同甘共苦

梅少卿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从不要特殊照顾。大家感动地说：“梅部长不但不搞特权，而且连应该享受的权利都不用。”他在任广州军区空军干部部部长时，到广州和广州附近的部队检查、了解工作，坚持不是紧急情况不用小车，从不坐公家的汽车办私事。一次，他到一个团去检查工作，助理员安排乘坐汽车去，他说：“就不要用车了，这里距离团部近，我们走去。”说完，便带领助理员出发了。30 多里路程，他拖着伤残的身体走了5 个多小时，到团部时已经是下午，错过了部队吃饭时间。团政委问：“首长，您吃饭了没有？”“我们带点干粮在路上吃过了，赶紧召集大家开会！”梅少卿回答道。他为了不给下级增加麻烦，明明没吃饭却说吃过了。

梅少卿是老红军，又是二等甲级残废军人，身患多种疾病。可是，生活上他从不要求特殊照顾，发给他的残废军人证也从来没有使用过。“四人帮”横行时期，市场供应紧张，秩序也不好，他和大家一样艰难地排长队买菜。1981 年，广州军区又向部队的老红军、老干部发了一种红色的“优待证”。“优待证”规定：持有此证的，可以免费进入公园，可以优先在影剧院购票；在市场买鱼、买肉可以不用排队。他的“优待证”却一直沉睡在抽屉里。逢年过节地方又向老红军、老干部增发鱼、肉、蛋等票证，他总是把这些票证夹在“优待证”里，从不用它。有时自己跑了几个市场也没买上菜，但是，他宁可空手回家，也不愿享用“优待证”上规定的照顾。

永葆优良传统，爱撒革命接班人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梅少卿同志就把自己的心血花在青少年的教育上，担任四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经常从工资中拿出大部分资助学生。他到学校参加各种活动，总是先声明，一不要接送，二不要吃请，时刻保持着党的艰

◆ 将军县的初心故事

苦奋斗的好传统。有一次，他应邀到广州市郊建筑工程学校作报告，学校领导和工作人员在大门口迎候多时，也不见他的车子来，后来才发现他是步行到学校的，早已进入会场了。大家问他：“梅部长，你是老领导，配有专门车子，身体又不好，怎么不乘小车来？”他爽朗地回答：“我是来讲党的艰苦奋斗革命传统的，现在我还走得动，不用坐车！”

1983年1月18日，梅少卿因病逝世。在清理他的遗物时，亲人们发现他的钱包里只有14元钱，个人存款总额只有160元，还有四封给少先队员的信，遗物中找不到一件贵重的物品，唯一一件像样的的卡上衣只是在参加重要会议时才穿一次。梅少卿走后，他的亲属遵照遗嘱，将160元钱分成四份，连同他写好的四封情意深长的信，分别交给了四所学校。

（作者：胡遵远，原载《铁军·纵横》2017年第5期。）

金寨籍老红军陈瑞先的家风故事

陈瑞先，原名秦起周，安徽省金寨县双河镇秦家湾人。1905年出生于一个贫农之家。1928年参加农民革命，1930年1月入党。1932年霍邱保卫战中负伤被俘，押南京军人监狱。为了隐瞒自己代理团长的身份，在监狱中更名为陈瑞先，就这样用了一辈子。

他没有留下房产，因为他居住的地方是“公产”。陈瑞先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77年平反后，他的子女也没有提出回原地居住的要求。他也没有留下金钱，因为他的一生不仅清正廉洁，而且常常自费照顾困难的同志，所以很少积蓄。但是，他却给子女们留下了三句“铮铮铁言”。

“个人要绝对服从组织！”

1958年夏天，陈瑞先的儿子陈建国从南昌五中毕业，被保送上大学。陈建国是全校两名“勤工俭学积极分子”之一，学习成绩好，又出身于老红军家庭，自然被列为保送对象。但是，等到录取通知书到手时，才发现录取学校是南京大学，并不是志愿中填写的学校。陈建国想，早知如此，就不接受保送，直接参加高考，一定会去自己理想的大学。他一时想不通，情绪十分低落。

陈瑞先见到儿子低落情绪的样子，问：“你的升学志愿书里有没有写上服从组织分配？”

陈建国说：“写了，这是招生的人让我写的，说不写不行。”

“那你想过没有，为什么要服从组织分配？”不等儿子回答，陈瑞先又说：“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比如我们的党和军队，能打败日本鬼子，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就是靠组织起来，靠铁的纪律。所以，个人要绝对服从组织，组织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如果大家都强调自己的愿望，不服从组织安排，这个党，这个国家就会一盘散沙，没有力量。”

这个道理陈建国懂，可心里总觉得别扭、窝囊。为什么偏偏是我“事与愿

违”？听了爸爸这一番话，他心里平静下来，乘船去了南京。他牢牢记住父亲的话，在学校认真学习专业知识，将自己培养为一个又专又红人才，随时等候国家建设需要。五年以后大学毕业，他高高兴兴地站出来让祖国挑选，写了一份请愿书：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是我的志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他又一次接受国家建设需要，去了条件最为艰苦的内蒙古工作。

“千万别搞特殊化！”

千万别搞特殊化，是陈瑞先对子女的第二要求。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是几乎所有红军干部对子女的要求，但能不能做到，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1963年华北大水刚退，陈建国从学校到呼和浩特分配工作，乘坐的火车就跟老牛车一样慢，有时还得跟着火车慢慢走，听说得要36个小时。有几位高级干部的子女撑不住了，打电话给山东省委，要求交际处派车接他们坐飞机去北京。他把这件事告诉父亲时。陈瑞先听后生气说：“你可千万不能学他们。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同群众同甘共苦。我们没有一丝一毫搞特殊化的理由。”

他问爸爸：“有没有我们可以特殊的时候呢？”

他想了想说：“当党和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人民群众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和一般老百姓不一样了，我们要率先挑起革命的重担，要努力做得更好。这时候我们就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

他听后明白了：这就是特殊与不特殊的辩证法。

“要想有出息，就得靠自己！”

陈瑞先不幸被捕后，直到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才经党组织从南京军人监狱中营救出来。出狱以后，由八路军办事处安排，辗转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他从没有文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到能够看懂党的文件，能够签自己的名字、会算账。从党校出来，他到中央社会部当总务科长，管中央领导的伙食，后又担任中央社会部特别交通科科长。他经常对子女说：“干什么都得靠学习。要想有出息，就得靠自己，自己不努力，什么也不会有！你不要指望有熟人帮助你，有上级关照你，有好运气。那都是靠不住的。”

“只能靠学习、只能靠自己”这一思想和观点，教育和影响了其子女的一生。

他的儿子陈建国从内蒙古调江西以后，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要求他放弃

业务，改行从事政治宣传和干部培训工作。除了政治可靠，还有就是他懂地质业务，从事宣传工作更能深入地质人员的思想深处，领导再三强调需要“内行”做宣传工作的道理。可是搞宣传，搞干部培训，他就成了“外行”。怎么办？个人要服从组织，陈建国满口答应。为了胜任工作，他努力学习宣传业务，从写文章、照相、排练文娱节目等一样样学起。经过不断的努力，后来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人物。2010年，他出版了描写地质生活的长篇小说《野山风》。2012年8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海洋轶事》一书中收录了他的长篇散文《群岛星光灿烂》。

陈瑞先虽然没有给子女们留下房产、财产、家产，但是他却给子女们留下了胜过万贯家产的三句“铮铮铁言”。它就像一种无限的力量，永远地激励着他的后代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无私奉献、不懈努力、奋斗终身！

（作者：胡遵远、李玉迪，原载《皖西日报》2018年3月7日。）

老红军骆斌：言传身教正家风

苦难童年奠定坚实的革命基础

骆斌，1917年10月出生于金寨县双河镇皮坊村王家湾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时，骆斌家中没田没地，全靠父亲给地主当长工养家糊口，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骆斌2岁时，姐姐被送给别人家当童养媳；3岁时，哥哥患病身亡；6岁时，母亲被卖改嫁；7岁时，父亲病亡，从此骆斌成了一名孤儿。后来，骆斌过继给一个远房的叔叔当继子才得以勉强糊口。1929年，立夏节起义爆发时，13岁的骆斌参加了儿童团，15岁时，当上了红军。之后，他随红二十五军参加长征，后来，又参加过平型关、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以及解放海南岛战役，并入朝作战。

坚定的革命信念支撑他闯过各种艰难险阻

“文革”期间，骆斌夫妇都成了“打倒对象”，靠边站，抄家、批斗、游街是常有的事。每次批斗、游街回家后，骆斌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依旧坐在书桌前，读毛选和马列主义著作，并不时地用红蓝铅笔在重要章节处作注解。有一次，“造反派”将骆斌夫妇拉去同台批斗，并将骆斌穿的大衣的白里子翻向外面给他反穿在身上，还将他五花大绑地“坐飞机”，要骆斌双膝跪地接受批斗。骆斌回答说：“大衣反穿可以，但是跪下来坚决不行，我没有反党！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为什么要跪下来？”对此，骆斌的爱人想不通，“我们为了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为什么还要受到如此屈辱？”骆斌豁达地说：“这只是暂时的，要相信党，这种现象不会长久，终会改变的！”

骆斌一生拥有“好人”的名声，这是他几十年用坚韧、正直、厚道、善

良、豁达的性格赢得的尊称。骆斌常说：“我很知足，1932年当红军时，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家族里一起参加红军的5个人，到全国解放时只有我一个还活着。战争年代有多少战友在我身边倒下啊！如今，我衣食无忧，儿孙满堂，儿女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都有着出色的表现，遵守党纪国法，孝顺父母。”他要求子女们要珍惜先辈用鲜血换来的幸福生活。

严格要求，教育和培养子女成人成才

骆斌对子女们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行为规范等方面的要求十分严格。从小就教育他们要艰苦朴素，不能跟别人比吃比穿，要比就比思想进步、比工作成绩。据骆斌的女儿骆惠萍回忆，“我们当兵前穿的衣服都是大的穿了小的穿，小的穿了再小的穿，一直到不能再穿了就扎成拖把继续用。”有一年，骆斌的一个老战友来到她们家，在院子门口碰见一个身穿补丁衣裤的孩子，便问：“小朋友，你知道骆斌家住在哪？”骆斌的儿子一听是找爸爸的，便飞奔回家相告。事后，这位叔叔对骆斌和其爱人宋毅说：“真不相信这是你们的孩子。”

父母非常怜爱骆惠萍，但是，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工作，父亲从不让她享受干部子女的待遇。1962年，那时骆斌在湖南民航局当政委，骆惠萍只有四五岁。一个星期天，骆斌要骑自行车到离家较远的地方修理全家的鞋子，骆惠萍就缠着非要跟着他去。由于骆斌的车技不太好，结果在一个大下坡的地方，父女双双从自行车上跌了下来，骆斌的手臂和膝盖全都摔破了，自行车也摔得不能骑了。当时，很小的骆惠萍非常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要骑自行车？为什么不用公家的小车呢？”骆惠萍痛得大哭，骆斌却忍着疼痛，告诉她为什么不能用公车办私事的道理。

骆惠萍回忆，作为家里的独女，从小到大她深受父亲的宠爱，但是父亲从不允许她利用权力搞特殊化。1983年8月，她生完女儿的第三天要出院回家，她想让父亲用他的小车来接她和刚出生的女儿回家，骆斌却说：“小车是配给我的办公用车，用公车接你回家，影响不好！”结果是骆惠萍抱着刚出生三天的女儿，自己戴着草帽，顶着烈日步行两千米回家。

良好的家风家教，永存字里行间

骆惠萍回忆，在她的一个笔记本里，抄录了骆斌1975年3月30日写给她的一封信，他信中这样要求女儿：“除了政治学习以外，我希望你抓紧学习业

务知识，这是你终身的革命事业，对技术要精益求精，可以说你现在是刚刚入门，只走了一步，甚至一步还不到，无论如何要深钻、深研，不能只求过的去、不求过的硬。你现在还年轻，正是用功的时候，千万不要自己混过去了，此事你要特别注意！还有一件事，在这里特别向你提出来，引起你的注意。你在党和上级的培养、教育下，被提拔为干部了。你要谦虚，不要骄傲，你刚刚踏入干部队伍的大门。对干部来说，要求高、要求严，你一定要以干部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能有一点自高自大、骄傲自满，更不能目无同志、目无组织，目无领导。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跌跟头、就要失败。我们一定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一切都要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事，不能有一丁点的松懈和麻痹。”

骆斌就是用这些朴实无华的言语，道出了为人处世最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骆斌在他二孙子骆坤上大学之际，也专门给孙子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了“八点要求”：

“爷爷、奶奶向你提几点要求，希望你们在学习和今后工作中注意：

第一，在你即将迈入大学校园、接受高等教育时，应该明确学习目的，遵守学校各项制度和纪律，学好学坏全靠自己，要学好本领报效祖国。学习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学好本领是为了为人民服务，做一名合格的人民勤务员。

第二，要克服好高骛远的思想，要脚踏实地，对任何事情都不能无所作为，要严于律己。社会知识是汪洋大海，学习是无止境的，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增长各种知识。

第三，鹏鹏、雁雁、晶晶、翔翔、坤坤、伟伟（都是骆斌的孙子辈），你们要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艰苦朴素。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切事情都要自力更生，在生活上不要和他人比吃、比穿、比花钱，要牢记你们是老红军的后代。

第四，要团结互助、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要努力克服自身存在的缺点，发扬优点，在学校里争取做个三好学生。

第五，要以雷锋同志为榜样，做一个敬老爱幼的模范，对人要谦虚有礼貌，对待任何事情都不要玩小聪明，要做到务实为本。

第六，在网上千万不要结交男女朋友，切记切记。你们现在正是求知的时候，年纪还轻，千万不要过早地结交朋友，以免影响个人前程，要记住先立业、后成家。

第七，父母为你们学习操尽了心，省吃俭用、起早贪黑，心血都用在你们身上了，你们要知恩图报，用实际行动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第八，爷爷、奶奶年纪都大了，对你们也尽不了力了，路靠自己走、业靠

自己创，希望你们把这两句话牢记心中、切切记住！

爷爷：骆斌

奶奶：宋毅

二〇〇四年七月一日。”

“撒什么种开什么花，栽什么树结什么果。”在骆斌和宋毅的言传身教、精心培养下，他们这个革命大家庭几十年如一日，坚定信念、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勤勉敬业，为人友善、忠孝传家。在骆斌的教育和熏陶下，孙子辈的后人们共有4个研究生、2个本科生，其中3个是“海归”。

（作者：胡遵远、张应松，原载《清风》2017年第7期。）

英雄金寨 多姿多彩

——给您说说咱金寨

朋友，您到过安徽金寨吗？我们金寨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发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县、全国著名将军县。

提起金寨，很多朋友的脑海里立刻就会想起红军、游击、将军、长征……这样一些关键词，这说明很多朋友都知道金寨是一块红色的热土、著名的老区，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

2016年4月24日至25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金寨调研指导工作。霏霏细雨中，总书记向金寨县革命烈士纪念馆敬献了花篮。随后，总书记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瞻仰了金寨县红军纪念馆、参观了金寨县革命博物馆。

随后，新华社在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金寨”这一重要新闻时，就把金寨称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简称“两源两地”），这是有史以来对金寨的最高最新历史定位。

为什么会把金寨称为“两源两地”呢？主要是因为金寨人民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牺牲了10万英雄儿女！正所谓：“十万英烈铸两源，伟大精神万代传”！

那么，大家可知道金寨是什么时候建县的？为什么要设立金寨县？设立金寨县的历史背景和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可能有些人会认为，金寨是一个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那不就意味着金寨也是一个老资格的县份吗？

不！事实恰恰与之相反！金寨虽然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但是它的建县时间却比较晚。1932年之前，还没有金寨县。

一、从金寨的建县历史看，我们可以这样说： 金寨虽然很年轻，但是金寨很著名

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名叫金家寨的集镇。今日的金寨县位于大别山腹地、

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地方。由于这里马克思主义传播早、党的组织建立早、革命武装起义早、红军队伍诞生早、革命根据地形成早，因而危及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所以，蒋介石就调集大批的部队对金寨这个地方进行“围剿”。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围剿”，他们都失败了，第四次开始“围剿”之前，蒋介石就公开承诺，谁的队伍最先攻下金家寨、就以谁的名字命名成立一个新的县。结果是国民党第十四军军长——卫立煌的部队最先攻占了金家寨。于是，蒋介石就兑现他的战前“承诺”，打破鄂豫皖三省的界线，在中国的版图上，以金家寨镇为中心，从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几个县各划一部分设立一个新的县，并以卫立煌的名字命名，设立了立煌县。一直到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解放了金家寨，才将立煌县改为金寨县，这就是金寨的由来。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金寨是中国革命的产物”的重要依据。金寨县的设立与共产党、与红军、与革命息息相关、紧密相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金寨县！

1932年建县之后，事实上，应该是从1920年金寨地区建立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开始，一直到1949年全境解放，在金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始终是革命红旗不倒、革命斗争持续不断……

由于这里红色历史光辉灿烂、红色人物灿若星辰、红色遗址遍布各地、红色精神代代相传。所以，金寨虽然很年轻，但是金寨很著名。金寨拥有很多靓丽的名片，比如：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县、全国著名将军县等等。

二、从金寨的红色历史看，我们可以这样说：金寨红色有特色，金寨红色有内涵。金寨不仅是一块红色的热土、革命的老区，而且有着鲜明的特色和丰富的内涵

（一）红色金寨有特色，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红得时间早、红得历程长、红得程度深

早：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在金寨地区传播的时间早、党的基层组织建立早。早在1920年10月，金寨燕子河地区的燕溪小学就成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1924年秋，在汤家汇笔架山农校建立了皖西地区第一个基层党组织。

长：主要是指革命的时间长，历经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几个革命历史阶段。自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建立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金寨地区革命红旗不倒，始终高高飘扬；自立夏节起义（商南起义）开始，到金寨全境解放，金寨地区革命武装斗争持续不断，革命烈火始终

生生不息、熊熊燃烧。

深：主要是指革命的力度大、贡献大、影响大。这一点，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一是革命宣传深入人心。正因为如此，金寨这里才会屡屡出现“千家万户送子、送郎当红军”“把最后一粒米拿去当军粮，把最后一匹布拿去做军装，把最后一个儿送去上战场”的动人场景。

二是党、团组织广泛建立。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党才能动员、组织、领导广大军民赴汤蹈火、前赴后继。

三是红军队伍快速发展。一共组建了12支成建制的主力红军队伍，在全国以县为单位建立的红军队伍支数最多，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县。

四是铸造了伟大的大别山精神。我们用“坚贞忠诚、牺牲奉献、一心为民、永跟党走”这16个字来表述。有实践、有总结、有理论，在实践中凝炼、在实践中提高、在实践中升华，英雄的金寨人民用热血和生命铸造出伟大的大别山精神。

（二）红色金寨有内涵，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事”“人”“物”“魂”

长期的革命斗争、伟大的革命实践，给金寨留下了丰富多彩、积淀深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可以这么说，金寨是安徽乃至全国的红色文化资源大县、党史资源大县，具体体现有这样四个方面。

一是“事”：主要是指革命大事要事，战役战斗等。比如：成立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建立党、团组织，举行革命武装起义、组建红军队伍，夺取政权、建立民主政府、开辟革命根据地，反“围剿”、进行西征、长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中原突围、千里挺进大别山等等。

二是“人”：主要是指革命人物、历史人物。金寨的革命人物不仅人数多、门类全，而且作用大、影响广。比如：在革命人物中，金寨就有59位开国将军、151位省军级领导、500多位地师级干部，10万革命先烈。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有11000多人，占安徽省烈士总数的1/5，占全国烈士总数的1/50。

三是“物”：主要是指革命遗址、遗迹。据统计，全县现有国家、省、市、县四级重点革命文物保护单位91处、123个文物点。共有不可移动文物372处，其中革命文物251处。

四是“魂”：主要是指伟大的大别山精神——坚贞忠诚、牺牲奉献、一心为民、永跟党走。

三、从金寨的自然资源和老区的独特优势看，金寨不仅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金色的、蓝色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英雄金寨，多姿多彩

（一）金寨是红色的——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

由于金寨这里的红色历史积淀深厚、红色基因丰富多彩，一共走出了12支主力红军队伍、59位开国将军，因此，我们把金寨称为“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

（二）金寨是绿色的——希望的原野、绿色的天堂

红色，是金寨的本色，但不是唯一的颜色。金寨有广阔的田野、绿色的山林，有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天堂寨，还有神秘的燕子河大峡谷和迷人的马鬃岭，等等。全县的森林覆盖率近80%，负氧离子含量很高，是天然氧吧、长寿之乡。说金寨是“希望的原野、绿色的天堂”毫不夸张。

（三）金寨是金色的——金色的世界、矿产的宝藏

有人看见金寨这两个字，就望文生义，说：“金寨，金寨，不就是金子堆成的山寨吗？”刚开始，我们听了觉得有点好笑，但是，仔细一想，又觉得很有道理。从矿产资源情况来看，金寨有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钨矿，还有铜矿、铅锌矿、大理石矿等多种宝贵的矿产资源。所以，我们又说金寨是“金色的世界、矿产的宝藏。”

（四）金寨是蓝色的——高峡之平湖、蓝色之海洋

国家重点治淮工程——梅山、响洪甸两大水库均坐落在金寨境内，流域面积大、水的质量好，水面宽阔、景色宜人，发展蓝色旅游的潜力巨大。这两大水库兼具防洪、灌溉、发电、供水等多种功能，特别是供水，现已成为淮河下游城市六安、合肥等地的“蓄水池”“大水缸”。所以，我们还说金寨是“高峡之平湖、蓝色之海洋。”

（作者：胡遵远，原载《党政周刊》2019年第8期。）